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刊

区域经济评论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1年第4期,总第52期)

双月刊

学 术 顾 问 范恒山 程必定 洪银兴

编 委 会 主 任 金 碚 谷建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	王一鸣	王承哲	史育龙	宁越敏
任晓莉	安虎森	孙久文	李同新	李国平
李海舰	李曦辉	杨开忠	杨继瑞	肖金成
谷建全	张可云	张占仓	张世贤	张军扩
陈 耀	金 碚	周金堂	赵 弘	郝寿义
秦尊文	高国力	崔民选	覃成林	喻新安
魏后凯				

主 编 任晓莉 陈 耀

社 长 任晓莉

副 社 长 刘昱洋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评论

(双月刊)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

- | | | |
|----|-----------------------|-----|
| 5 |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创新 | 孙久文 |
| 10 |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认知误区辨析与学科框架讨论 | 张可云 |
| 16 | 中国区域经济学:概念、特征与创建思路 | 吴殿廷 |
| 19 | 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学 | 覃成林 |
| 23 | 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与创新 | 张满银 |

区域经济理论

- | | | |
|----|---------------|-----|
| 29 | 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起点 | 冯彦明 |
|----|---------------|-----|

区域协调发展

- | | | |
|----|----------------------------|------------|
| 39 | 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若干重大问题 | 陈晓东 |
| 49 | “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思考 | 成长春 刘峻源 殷洁 |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 | | | |
|----|-----------------------|-------------|
| 54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 贺灿飞 王文宇 朱晟君 |
| 64 | 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及路径研究 | 李新安 李慧 |
| 74 | 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评价及优化建议 | 何泽军 姬一帆 张朝辉 |
| 82 |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的路径研究 | 冉净斐 曹静 刘清峰 |

区域高质量发展

- 95 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
107 我国居民消费的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 傅 娟

城市经济研究

- 116 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阶段的研判与推进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127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史育龙 潘昭宇
135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张合林 申政永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 145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综述
肖金成 沈体雁 梁盛平
15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座谈会综述
张学良 贾文星 费婷怡
158 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研讨会综述
陈锦山 黄桂媛 沈 奕

主 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 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
地 址 郑州市丰产路21号
邮 编 450002
电话/传真 0371-63690786
投稿邮箱 qyjpl@163.com
网 址 www.qyjpl.cn
http://qyjpl.cbpt.cnki.net/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登记证 金市监广发变登字【2020】021号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郑州市邮政局 邮发代号 36-44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BM5690
刊 号 ISSN2095-5766 CN41-1425/F
定 价 16元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1.4 *Bimonthly*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Sun Jiuwen(05)
Analysis of Cognitive Errors and Discussion of Subject Framework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Zhang Keyun(10)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on Ideas	Wu Dianting(16)
Developing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Qin Chenglin(19)
The Perf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Manyin(23)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ics	Feng Yanming(29)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en Xiaodong(39)
Thinking 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eng Changchun Liu Junyuan Yin Jie(49)
The Industry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in China	He Canfei Wang Wenyu Zhu Shengjun(54)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 Xinan Li Hui(64)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on Region Layout of Animal Husbandry Green Productivity in China	He Zejun Ji Yifan Zhang Zhaohui(74)
Study on the Path of Industr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Source Area in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Ran Jingfei Cao Jing Liu Qingfeng(82)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D Investmen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earch Group of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95)
Realistic Dilemmas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the Resident Consumption	Fu Juan(107)
The Judg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esearch Group of Hen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16)
Study on Spatial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Shi Yulong Pan Zhaoyu(127)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Zhang Helin Shen Zhengyong(135)
Overview of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Xiao Jincheng Shen Tiyao Liang Shengping(145)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Belt of Zhengzhou-Luoyang-Xi'an	Zhang Xueliang Jia Wenxing Fei Tingyi(152)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New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s in Ethnic Regions	Chen Jinshan Huang Guiyuan Shen Yi(15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创新*

孙久文

摘要: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并没有区域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当时主要是经济地理专业。二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又分为三个阶段:理论引进阶段、消化吸收阶段和实际应用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部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由资源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运输成本理论三部分组成。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与教学体系分成三部分,即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区域经济关系研究和区域经济应用工具研究。区域经济学是一个国内外接轨的学科,未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区域经济学的中国化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的模型化和计量化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的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方向和区域经济学的生态经济研究方向。

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核心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05-05 **收稿日期:**2021-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研究”(17JZD024)。

作者简介:孙久文,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872)。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大门类下面的应用经济学科,主要任务是总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空间布局及发展规律,在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性学科,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要对在现实区域经济运行中可能产生的重大问题给予经济学理论上的解释,并通过对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为现实区域经济运行中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方法和政策建议。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从大的分期来看,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前

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28年,中国并没有区域

经济学科的研究,当时主要是经济地理专业。我国的经济地理专业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展。与自然地理相对应,成为地理学的两个重要的学科门类,这种情况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孙敬之教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孙敬之教授从1950年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研究室主任,为了新中国经济地理事业的发展,以废寝忘食的精神,编写了100多万字的经济地理学讲义,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确立经济地理学体系的讲义。这套讲义编写完成后,就被教育部指定为高等院校的参考教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孙敬之教授还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地理学教材,并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写出了近百篇论文。

2.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后

现代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是从产业布局学

开始的。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建设任务很多,产业发展需要科学的布局理论来指导。“产业布局理论”从1978年开始兴起,到2000年前被区域经济学理论完全代替,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产业选择、国土规划、农业区划等重大国家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使我国东部沿海承接国际大跨度的产业转移,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制造业的中心。这段时期,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绩效很不一致,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则相当缓慢。我国的区际差异,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轻微下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又迅速扩大。缩小城乡差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加快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经济等的迫切性日益凸显。与之相对应,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区域经济学从引进到成型的时期。进入21世纪,伴随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在区域发展规划、区域开发行动和地域整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学科本身也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的区域经济学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又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理论引进阶段。区域经济的理论引进是循着这样的脉络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引进区位论;20世纪90年代,引进区域经济学理论;21世纪00年代,引进新经济地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区位论”,中国的区域经济学专业开始形成。北京大学杨吾扬教授的《高级经济地理学》、人民大学周起业教授的《西方产业布局》是引进“区位论”的代表著作。

二是消化吸收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化吸收,是以出版区域经济学教材和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为标志的。1989年,第一本区域经济学教材出版;20世纪90年代后期,区域经济学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二级学科;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学教学体系开始完善。

三是实践应用阶段。进入21世纪后,区域经济学大量应用于中国地区发展的实践,成为重要的指

导地区发展的经济理论,并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三部分:区域发展理论、区域关系理论和区域经济学应用工具。实践证明,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深入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阶段,区域经济学的应用将更加宽广。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重点

1.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理论研究方面。由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区域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区域资源配置理论、区域相互依存理论、区域产业发展和转移理论、区域空间格局演变理论和区域政府干预理论等构成了现代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到21世纪00年代开始完善,经历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融汇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精华。二是应用研究方面。具体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包括区域特征分析、区域发展与协调、区域产业结构、人口增长与迁徙、城市建设与中心地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国土规划、区域经济关系和区域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区域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问题而提出并得到不断完善的一整套方法论。

2. 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看,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很多,这些理论有些是借用发展经济学的,有些是来自产业经济学的。但哪些是区域经济学特有的?笔者认为,在早期区划理论和区位论的基础上,演化出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禀赋理论。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区域多样性、互补性和区域分工的基础,也是经济区形成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发展,拓展了资源禀赋的涵盖范围,提升了智力资源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二是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的存在反映了区域经济的聚集要求,经济的聚集带来人口的增加,形成城市和经济中心。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形成增长极、发展轴和经济带。其中,中心城市形成的理论

基础也是规模经济。三是运输成本理论。经济活动必须克服空间的距离限制,并支付距离成本(运费),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克鲁格曼以“冰山理论”来表述。运费因素是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高速运输技术、能源传输技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特别是5G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理论正迎来深化与创新的节点。

3.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迄今为止,区域经济学仍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各种理论、各种观点的同时存在,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笔者将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与教学体系分成三个部分。

(1)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要素禀赋问题。生产要素禀赋是指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在可利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中,那些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相对较低价格的要素即是丰裕的要素,丰裕的生产要素就具有禀赋优势,禀赋优势是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区域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因此引出产业选择问题和产业布局问题。第二,增长极问题。如果说利用比较优势解决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选择问题,那么利用增长极理论就解决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选择问题。增长极理论描述的是建立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产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辐射周边区域,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增长极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就是现实中的城市。增长极理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用工具。第三,发展差距问题。不同的区域经历一定的发展时间以后,由于各区域不可能保持同等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发展差距的产生不可避免。对于区域发展的差距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了区域收入水平趋同假说,即著名的“倒U曲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趋同还是趋异,或者称为收敛还是发散,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都在资助这个问题的研究,努力寻求解决区域收入水平与福利水平差异的途径。第四,区域贸易问题。区域发展离不开区域贸易。通过区域贸易,各区域可以获取本区域缺少的资源或者为本区域的产品寻求市场,

同时,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及商品也得以丰富并相应降低了价格,从而使生产的成本降低。对区域贸易问题的研究,一般着眼于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区域贸易,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技术水平、需求结构、市场规模、运输成本等对区域贸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第五,梯度转移问题。区域差距的存在,使区域之间产生高梯度区域和低梯度区域。研究者将产业的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产生了区域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区域产业结构的状况,区域产业结构的状况与区域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相关。主导产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劣。如果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或发展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该区域就是高梯度区域;反之就是低梯度区域。受到产业发展要素变化的影响,有些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从而促进了落后区域的经济增长。这种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而展开来的。梯度推移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创新产品不断趋于成熟,产品市场扩大,要求生产规模扩大;其次是高梯度地区创新活动加强,新的创新产品代替原有的创新产品,要求为其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提供足够的生产要素和生产空间;再次是高梯度地区生产费用上升,从降低生产成本的角度,也要求产业向成本低的区域转移。

(2)区域经济关系研究。区域是国家经济整体的一部分,区域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区域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区域之间的关系。区域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或区域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经济联系,有摩擦和冲突,也有互补与合作。因此,区域经济研究十分关注对区域关系的考察。

第一,竞争关系。区域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特点相似的区域之间。这些区域的产业特点比较相近,结构趋同,极易发生区域竞争,包括争夺市场,也包括争夺资源。正如胡佛所指出的那样,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活动对于稀缺、不易开拓的地方性资源的竞争。市场区域之间存在竞争,供给区域之间也存在竞争。竞争可能是善意的比赛,也可能是摩擦,更可能是冲突,这主要看竞争主体的规模、水平和竞争客体对竞争区域的重要程度。

第二,合作关系。区域竞争虽然存在,但区域合作仍然是区域关系的主流。这是区域关系中一种活动的产出表现为另一种活动的投入时所结成的相互吸引的关系,对区域合作的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合作的内容经常是两区域之间劣势生产要素的互补,或者是互为市场以扩大生产的规模。合作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后向联系、前向联系和旁侧联系。后向联系是针对供给性部门的经济联系,即一个生产部门与对其投入的、为其供应原材料的上游部门之间的联系。后向联系对应的是产业的感应度,指这种联系通过感应度,依照生产活动的顺序不断向后传递。前向联系则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影响产业链前面的产业的生产,即一个生产部门与消耗其产品的其他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前向联系对应的是产业的影响度,指这种影响通过一系列传递过程向前延伸。产业的生产活动除产业链上的联系外,在产业链的主链外面还存在一系列的与其服务的辅助性产业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联系部门的个数很多,分布十分广泛,这就是所谓的旁侧联系。各区域产业生产不可能都局限在本区域,区域之间的产业上的生产联系十分普遍,成为区域合作的基本形式。产业合作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合作,因此开展区域合作应当从产业的合作开始。

(3)区域经济应用工具研究。区域规划、区域政策等属于区域经济的应用工具,是近年来区域经济的研究热点。欧盟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区域规划与经济政策的问题。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区域经济政策,应该构建中国区域经济政策体系,对区域经济政策概念、范畴进行理论的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应当是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区域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制定专门的区域政策。两种观点虽然有很大区别,但都认为中国目前的区域政策尚缺乏理论的基础。

三、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向

区域经济学是一个国内外接轨的学科,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国际上的区域经济研究也在向前推进。笔者对未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做

如下的研判。

1.区域经济学的中国化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学理论是指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国内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如生产力均衡布局、区际非均衡发展、区际协调与协同发展、城乡统筹、以人民为中心的平衡充分发展等,这些概念和理论组成了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尤其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引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2.区域经济学的模型化和计量化研究方向

国际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计量化特点,是在投入产出模型、线性规划模型、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环境影响模型、动态城市模型、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分散化城市理论模型等方面,更多和更广泛地应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因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与国际接轨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一是进行区域经济结构分析,对反映区域经济结构的经济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二是进行预测分析,应用计量模型进行计量测算,给出经济变量值在未来时期或其他区域上的预测结果;三是进行政策评价,模拟各种政策措施,对比政策的模拟结果,对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比较选择。

3.区域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研究方向

到目前为止,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等基本的、直观性比较强的理论贡献,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性的发展成果继续强劲,这些研究和应用目前更多的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走出已有的框架,从更多的方向研究新的问题,比如异质性,城市体系,交通,公共政策等,这些研究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进步,把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区域经济学,无疑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克鲁格曼认为,当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收益递增的色彩弱化了,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外部性、聚集经济等的色彩加强

了。就是说聚集经济理论等完全竞争范式下的理论正在具有更加重要的解释力和应用前景。需要注意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更侧重于强调有形因素的影响,但现实世界中无形因素的影响更加重要,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4. 区域经济学的国家—区域一体化研究方向

国际上的新区域主义研究,首先把经济规模的差异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来,改变了传统理论的一些假定,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这种国际层面的研究对于国际上地位日益重要的中国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国内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使区域层面的问题更加宏观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城市群建设,所涉及的六个区域是最有条件率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过程和一种状态:资源有效利用、要素自由流动、结构得到优化、政策取得一致。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 and 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归宿。正如当前宏观经济对转型问题十分重视一样,区域经济对转型问题也十分关注。但区域经济是分区域来关注的。比如,东部地区更多的是关注创新和产业服务化发展

问题,中部地区关注产业升级与发展现代制造业问题,西部地区关注转型与能源开发等问题。注重不同区域的转型路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伴随着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良好的产出收益。

5. 区域生态经济学的生态经济研究方向

以“两山理论”为指导,建立严格的生态保护和资源管理制度,已经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论和现实的发展需要人们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处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生态系统,都有特定的能流和物流规律。生态安全关系全局,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避免产业转移带来污染转移。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做好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保护。建立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控制污染排放总量,确保资源永续利用,走出一条绿色生态的新路。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和纵向生态补偿机制。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Sun Jiuwe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irst,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was no research o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At that time, it was mainly economic geography. Seco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 this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ory introduction stage,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sta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tage. The research scope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clude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The core theory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resource endowment theory, scale economy theory and transportation cost theory. The subject and teaching system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economic application tools. Regional economics is a subject that connec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in the fu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aspects: the Sinicization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modeling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dire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ecological economy in regional economics.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Subject Development; Core Theory

(责任编辑:柳 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认知误区辨析与学科框架讨论*

张可云

摘要: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光明,但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妨碍其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在这个学科领域还存在较多的认知误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混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及其子学科之间的关系,二是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并过分追求模型化,三是重现实决策解读而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与理论方法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学要有中国气派,就必须直面中国现实,反映中国特色,用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法解释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避免上述三个方面的认知误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关系协调与区域治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双黄蛋”。区域治理主要研究政府如何运用区域战略、规划与政策引导区域发展和调整区域关系。

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学;认知误区;学科框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10-06 **收稿日期:**2021-03-13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学研究”(21XNLG01)。

作者简介:张可云,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问题区域发展的经世济用之学,其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在西方国家诞生,正式成为一门新学科,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其被引入中国,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第一波热潮,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步入正轨。至21世纪初期,区域经济学已成为一门颇具影响力的学科,学科发展呈现勃勃生机。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与话语权,使得中国道路成为举世关注的新话题。其中,与之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管理创新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学成长,有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呼之欲出。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光明。然而,不得

不承认,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妨碍其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在这个学科领域还存在较多的认知误区。本文就学科关系、方向与重点三个方面辨析一些明显的误区,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中国区域经济学框架。

一、误区一:混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及其子学科之间的关系

与区域经济学有关的学科较多,主要有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亦称区位理论或产业布局学)、空间经济学、区域科学、新经济地理学(或称地理经济学)。将这些有联系但存在明显区别的学科混为一谈,是较为常见的一个误区。

空间经济学是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学问,包括

三个子学科,即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亦称区位理论或产业布局学)与区域经济学。区域科学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除区域经济问题外,还包括区域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涵盖了空间经济学及其子学科的研究内容。新经济地理学致力于用主流经济学范式解释空间经济现象,在方法论上与正统的经济地理学完全不同,因此,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其根本就不是新经济地理学,故称其为地理经济学。另外,这些学科产生的时间、背景与内容是不一样的。

经济地理学孕育于古老的地理学之中。公元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催生出经济地理学的前身——商业地理学。1760年俄国科学家M.B.罗蒙诺索夫(M.B.Lomonosov)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一词。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格茨(W.Goetz)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一文中区分了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并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经济地理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区位经济学(或称区位理论、产业布局学)是始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催生出一门学问。产业革命导致了许多新产业的出现以及原有产业的分化,各种产业如何在空间上合理布局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区位经济学应运而生。区位经济学致力于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早期开拓者主要有杜能(J.H.Von Thünen)、韦伯(A.Weber)、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与廖什(A.Lösch)等。

空间经济学首次出现在廖什于1940年出版的德文版《空间体系经济学》(Die räumliche Ordnung der Wirtschaft)中,该书的英文版译为《区位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美国学者胡佛(E.M.Hoover)在1971年首次出版并在之后多次再版的著作《区域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将区域经济学等同于空间经济学,这使得人们对空间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空间经济学是一个学科群,包括了涉及空间经济问题的所有学科。

区域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导致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区域差距扩大。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区域经济,以促进区域发展和区

域关系协调。

区域科学同样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门更广泛地研究区域问题的科学。区域科学所研究的范围超出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但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使命是将空间经济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中,为区别于之前的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P.Krugman)将其开创的学科命名为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人称之为空间经济学。西方一些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只能称为“地理经济学”。这个问题在后文分析。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区域经济学领域,许多人不注意区分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实际上,这两个学科的产生背景不同,所依据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论以及关注空间经济问题的角度都有明显的不同。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也可分为微观空间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与宏观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只有辨析清楚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确中国区域经济学的重点与方向,从而避免泛化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区域经济学的核心使命是研究区域(特别是问题区域)的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两者可称为区域经济学的“双黄蛋”。

二、误区二: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并过分追求模型化

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并过分强调模型化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的误区。

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者克鲁格曼于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许多中国区域经济学家将新经济地理学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将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前进方向。事实上,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主要是由于新贸易理论而非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过分抬高新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有害无益。

区域经济学具有多学科背景,是地理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在这个学科中有明

显的地理学派和经济学派之分,而且两个学派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争议。在西方区域经济学界,来自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与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一直相互指责对方是区域经济学的旁门左道,认为自己的研究范式才是区域经济学的正统方法论。

地理学者与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辩都是源于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地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式存在巨大区别,两个学派的学者都希望区域经济学使用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范式,这是二者争斗不断的根本原因。地理学采用的是归纳方法,而经济学采用的是演绎方法。具体而言,地理学家强调对现实区域的描述与规律的总结,而经济学家则强调用正式的模型推导出区域经济运行规律。当两个领域的学者聚首区域经济学领域时,尖锐的矛盾就产生了:到底是依据地理学方法还是依据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学?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截然相反的回答,热爱自己专业的学者均视与自己专业在区域经济学这一领域竞争的对方为异类。

艾萨德(W. Isard)创立的区域科学主张兼容并包,区域科学领域汇聚了来自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城市规划等众多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来研究与解决区域中存在的问题。但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特点,导致区域科学因所研究的问题过于泛化而在美国衰落了。克鲁格曼等人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再次让来自经济学与地理学领域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克鲁格曼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存在缺陷,即主流经济学主张在无空间的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假设下进行经济推理;经济地理、区位或区域经济分析同样存在缺陷,即都缺乏主流经济学方法与技巧,这便是克鲁格曼创立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自产生之日起,便遭到了地理学者的批评。克鲁格曼之所以将自己创立的学问命名为新经济地理学,是因为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已过时。因此,一些人认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对正统经济地理学的污辱。于是,在西方地理学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抨击克鲁格曼者,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恩·马丁(R.

Martin)等。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的最大缺陷是缺乏为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正式模型,因而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适的区域经济解释模型——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然而,正是这一创新之举遭到了地理学家们的无情嘲讽。罗恩·马丁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有三个突出缺陷:具有短视性的理论观点、沉湎于主流的数理经济学以及忽视地理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乔舒亚·奥尔森(J. Olsen)也指出了克鲁格曼的三个缺陷:第一,克鲁格曼及其同伴忽视了关键的外部性;第二,对外部性的狭义界定导致不能很好地理解空间规模问题;第三,克鲁格曼等人过分依赖正式的数学模型。地理学者如此猛烈地批评克鲁格曼及其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目的是努力为自己的学科争取在区域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区域经济学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给出具体区域问题的解释与解决方案,而这并非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至少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其试图构建一套模型以解释所有尺度区域的问题,这与现实不符。大到国际区域,小到一个县,都用CP模型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不同规模与尺度的区域的运行机理可能不完全相同。第二,其所研究的区域只不过是几何区域而非现实区域,为了建立模型的需要,将区域模糊化是必要的,但研究现实问题时是绝对不能模糊化的。例如,能将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视为一样的区域吗?不针对具体区域的研究对现实问题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将新经济地理学抬高到代表区域经济学方向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自己专业掘墓者的角色,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不可否认,数学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应用激发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同时,除数学外,如物理学等学科方法的应用也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经济学中的研究手段并提高了其解释力。然而,越来越多的区域经济学学术论文倾向于采用复杂的模型,但得出的结论却过于简单且几乎是常识,这样的学术论文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其实,任何模型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模型本身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其高度的抽象,这与现实相违背,因为现实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无法用

模型反映真实的现实情况。或许有人会说,不抽象哪来科学?的确如此!演绎与归纳都离不开抽象,但抽象也应该把握一个度,而且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抽象程度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在考察中国的城市空间分布规律时,可以选取抽象程度不同的空间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是省,也可以是市,甚至可以具体到镇,采用模型对其进行经验研究。但是,当研究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时,空间单元就相对固定了,而且几乎不能靠模型来指导京津冀的具体政策行动。由此可作出一个推断,不同学科与不同研究领域的抽象程度应该是不一致的,不能将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抽象程度标准套用到其他学科或领域上。模型无一例外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但在将区域纳入模型中时,所谓的区域已经成为了几何符号,而非真正的现实区域。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数学的运用期较短。在数学方法运用于空间经济学之前,空间经济学领域就已经产生了许多不朽的思想。这充分说明经济学思想的诞生与数学的运用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技术与产业生命周期缩短的时代,思想也有缩短生命周期的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大数据分析最终或许会取代模型,而大数据分析运用的是归纳而非演绎方法。新时代需要新思想,但新思想很难仅凭模型演绎出来。模型研究应该建立在新的思想与变化中的事实基础之上,为模型而模型只会阻碍思想与应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大数据分析如果取代模型,将导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或许为期不远。

区域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扎根于现实的区域;不注重现实问题的探究,而单纯沉湎于几何区域(即抽象或模糊的区域)的演绎,或者与数量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攀比模型的复杂与漂亮程度,会将区域经济学推向深渊。区域经济学放弃经济地理学崇尚的田野调查与归纳方法传统而一味追求主流经济学范式是十分有害的。模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区域经济学的本质要义在于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要构建有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就不能陷入新经济地理学的窠臼,也不能置活生生的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实践于不顾而一味开展模型化研究。

三、误区三:重现实决策解读而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与理论方法创新

重视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进行解读,而忽视在中国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与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同样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日益受到党中央与各级政府的重视,中央与地方制定了许多区域规划与政策,同时新的区域经济概念不断出现。毋庸置疑,区域经济研究需要对一系列的决策作出解释,但仅仅停留于解读政策文件与规划难免有流于表面之嫌。与受热捧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解读相比较,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特别是理论方法创新相对受到忽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媒体为博取关注度往往会对新出台的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过度解读。一般的解读较容易,而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受媒体与社会大众关注度不高,而且分析难度十分大。此外,这一误区的存在也与区域经济决策不完善有关。

重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而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是中国区域经济决策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提出的各种区域发展战略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最近10多年以来,不断有新的区域规划问世。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政府为本地或涉及本地的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欢呼雀跃。在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热兴起的过程中,前所未闻的新名词也不断出现,如沿海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协作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央与地方决策者都十分重视区域发展。

然而,在区域经济热点不断涌现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越发显现,即虽然提出了各种区域战略并制定了各类区域规划,但是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完善却未同步跟进。这个问题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接二连三地出台,但这些战略或规划的执行主体与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去监督和评价这些战略与规划的执行过

程与结果?用何种区域政策工具去支持这些战略或规划目标的实现?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与区域政策不完善的主要原因有体制不完善、区域研究存在缺陷、实际操作避难就易等。体制不完善是一个基本原因,区域研究的缺陷表现在不能为区域管理与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实际操作避难就易指的是重视相对较容易操作的区域战略与区域规划,而回避难度大的区域管理制度与区域政策。区域管理制度基础涉及机构改革、决策程序改革、区域管理立法等复杂的问题,而区域政策涉及区域援助或限制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等十分具体的问题,在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不完善的情况下,区域政策是不可能完善的。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克难阶段,区域管理制度改革就是难点之一。提高各级政府区域治理能力并使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正视区域管理制度建设,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得以继续繁荣的现实基础。当然,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特别是对国外的案例研究以及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研究,已取得不少喜人的成果,但许多研究尚处于浅尝辄止阶段,这个方面的研究需要得到决策层更多的重视。

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重视模型研究,但缺少理论分析,而且几乎没有人对不同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这导致“拿来主义”之风盛行,即不管模型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随意将国外学者创造的模型直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

目前,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明显分化为两条几乎没有交叉的平行线:一条线专注于现实问题分析;一条线专注于模型构建。专注于现实问题分析的研究者忽视理论与模型,或者是由于对模型没有兴趣,或者是由于学者本身缺乏基本的数理分析与计量研究功底。专注于模型构建者往往忽视对现实地理分布状况及动态变化过程,只注重数理推导和计量分析。后一类学者中有些人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但可能不知道长江经济带包括哪些省份,更不关心中国区域战略的演变及其原因。认为这两条线上的学者老死不相往来或许过于绝对,但两者之间并未形成良性互动,几乎没有学术争鸣。这两类学者虽然同处于区域经济领域,但研究兴趣迥异,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with 范式不同,在学术讨论时缺乏共同语言。当然,就学者个体而言,

这两条线并不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因为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兼顾这两条线。但这些学者也存在困惑:模型强调的是“解释统一”,致力于研究空间现象的一般性,而现实区域问题无一不具有特殊性,可见,用模型解释现实区域问题存在一个明显的、难以逾越的逻辑障碍。如何克服这个障碍是一个世界级学术研究难题。

四、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目前中国已成为经济体系最完整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这是全国不同区域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区域经济实践是中国故事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中国区域经济学要有中国气派,就必须直面中国现实,反映中国特色,用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法解释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避免上述三个方面的认知误区。

从空间的角度考察,中国面临的首要现实难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发展主要是指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及由此产生的区际利益矛盾与冲突,而不充分的区域发展主要是指区域内部存在的突出问题,可概括为穷、堵与老。这些是中国区域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先后出现了沿海内地关系平衡思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早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学诞生之前,中国的区域经济管理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沿海与内地平衡发展思想、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还是1992年以来不断丰富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都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富矿”。此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中也存在许多闪耀着不朽光辉的区域经济思想,如孟子的“通功易事”(区域分工思想)、“绝长补短”(绝对优势思想)以及墨子的“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比较优势思想)。这些也都是中国区域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除学科的基本概念与发展历史外,中国区域经

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关系协调与区域治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双黄蛋”。区域治理主要研究政府如何运用区域战略、规划与政策引导区域发展和调整区域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是政府如何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区域差距与区域问题(即区域病)。由此可见,吸收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的长处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畅通不同区域之间的大循环无疑将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J].求是,2021(2).
- [2]张可云.空间经济学新论[J].开发研究,1992(2).
- [3]蔡之兵,张可云.区域的概念、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J].区域经济评论,2014(6).
- [4]张可云,孙鹏.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兼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构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5]谢地,贺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1).
- [6]张可云.区域科学的兴衰、新经济地理学争论与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向[J].经济学动态,2013(3).
- [7]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Analysis of Cognitive Errors and Discussion of Subject Framework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Zhang Key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bright, but the development is not satisfactory. The prominent problem hindering its development i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cognitive errors in this subject field,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one is to conf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s and space economics and its sub subjects. Seco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s regarded as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and is excessively pursuing modeling. Third, it emphasiz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tic decision and neglects the basic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innovation of regional management system. I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s wants to have Chinese style, it must face up to China's reality, refle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ain China's miracle with Chines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is sens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s must avoid the above three cognitive error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should include three aspect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relations are the main body of reg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and constitute the “double-yolked egg”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mainly studies how the government uses regional strategy, planning and policy to guid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djust reg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gnitive Errors; Subject Framework

(责任编辑:柳 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概念、特征与创建思路

吴殿廷

摘要：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为基础，把研究对象（区域）看成是一个系统（区域系统），抓住区域发展和协调发展主线，探索区域发展规律，寻求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协同发展途径的科学。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创建，一是以中国区域发展和区域间协调发展丰富实践为依据，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分为四大板块，板块一是中国区域发展的特征与机理，板块二是中国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机制与部署，板块三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框架，板块四是新时代伟大理论与伟大实践融合共进。

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学；概念；创建思路；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16-03 **收稿日期：**2021-03-14

作者简介：吴殿廷，男，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北京 100875）。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艰苦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区域发展的巨大成就，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世界少有，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发展需要中国区域经济的实践总结、理论提炼和新发展理念指导。非洲国家经济长期不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世界大国中唯有中国仍保持经济正增长，主要得益于地方经济的繁荣。全球时代需要中国治理经验和中国区域发展方案。创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既有客观基础，也与中国更加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契合。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内涵及特点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为基础，把研究对

象（区域）看成是一个系统（区域系统），抓住区域发展和协调发展主线，探索区域发展规律，寻求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协同发展途径的科学。主要有以下特点和努力方向。

一是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发展目标。新时代区域发展和城乡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西方经济学以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以区际关系为主线、以缩小区域差异和经济效用极大化为目标诉求截然不同。

二是梳理和界定区域经济新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生产力布局经历过几次重大调整，区域概念在中国情境下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经济特区”“战略区”“示范区”“试验区”等概念，“行政经济区”客观上已经形成，土地公有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土地经济的价值和合理运行机制等助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三是提出和论述跨区域、超区域、次区域等新

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关注对象都不是一般的区域,而是跨区域、超区域或次区域,中国区域经济学应从理论和实践结合方面对此做出科学阐释。

四是区域协调、区域协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机理探索。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表现形式和目标诉求多种多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区域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且行之有效。本学科不仅要对此给出系统的回答,还要在各种典型区域发展机制方面用严谨、科学的概念模型甚或数学模型给出解释。努力提高中国学界在有关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创建依据

一门学科的创建是需要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合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创建的总体思路是:以“实践→理论→理论与实践融合共进”为主逻辑,在全面客观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提炼总结一般区域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提出中国情境下的假设;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进一步解释、指导中国的区域实践。

其一,以中国区域发展和区域间协调发展丰富实践为依据。包括行政区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等不同类型区的发展机制,土地经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的不同发展路径,民族自治、对口支援、问题区域扶持、五年一度规划部署等的协调途径,以及沿海与内地、三大地带、四大板块、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湾区协同建设、长江经济带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步骤的推进等。从这些实践中挖掘新素材、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模式,是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基石。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区域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区域发展和协调、协同发展的主线,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发展目标,以五大理念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内容框架。在此基础上提炼区域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学派。

三、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四大板块内容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分为四大板块(见图1所示),按照先后逻辑顺序依次为如下内容。

板块一:中国区域发展的特征与机理。以中国特色区域治理实践为基础,探讨中国区域发展的形式和规律,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土地经济、县域经济、外贸经济等。

板块二:中国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机制与部署。考察区域发展的空间规律与区域差距变化特点,探讨区域分工、产业布局与开放发展的规律,从总体布局、五年规划、政策制定实施等角度,分析中国统筹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努力过程和作用效果。

板块三:中国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框架。以系统科学原理为指导,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空间系统,探讨区域系统的形态和类型、区域系统的组成要素、区域经济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以及区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演化和控制规律等。在此基础上,论述区域发展决策和对策,包括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区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

板块四:新时代伟大理论与伟大实践融合共进。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中心论、“两山论”、命运共同体论等为指导,以五大理念与协调、共同发展为内容框架,探讨中国区域发展的思路 and 模式,包括统筹区域关系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关系共享发展、统筹人地关系绿色发展、统筹内外创新发展等。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概念、特点、框架结构等的基本认识,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全貌,中国区域经济学是在不断丰富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尤其是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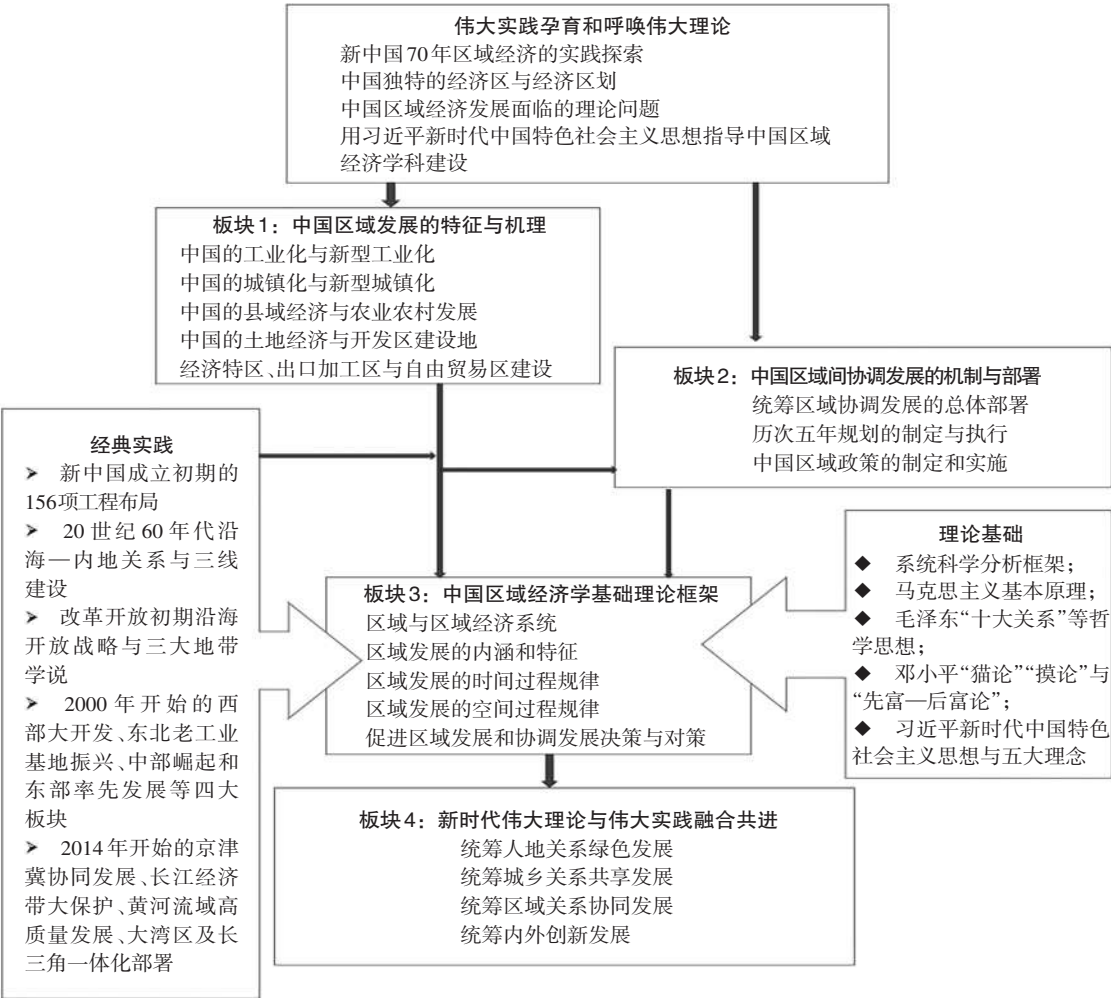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区域经济学内容体系及创建路径示意图

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区域经
济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得到河南大学李小建教授、南昌大学刘
耀彬教授的支持和指导,特此说明和致谢!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on Ideas

Wu Dianting

Abstract: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the science that is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gards the research object (region) as a system (regional system), grasps the main lin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plores the law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eeks the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way of coordinated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based on the rich practic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main contents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ar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1 i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rt 2 is the mechanism and deployment of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rt 3 is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Part 4 is the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of grea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Concept; Creation Ideas; New Era

(责任编辑:柳 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

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学*

覃 成 林

摘 要: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为事实和经验根据,在现有区域经济学的基础上,建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并服务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门科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其独特性。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学,无论从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的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需要看,还是从服务于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事实,可以在以下方面对中国区域经济学进行理论建构和创新:区域双重性质理论、区域经济竞争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管理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开发区与改革试验区理论、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理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19-04 **收稿日期:**2021-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区域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研究”(19ZDA055)。

作者简介:覃成林,男,经济学博士,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广州 510632)。

社会科学的兴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兴盛。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特别是社会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就社会影响而论,区域经济学无疑进入了“显学”的阵营。中国多层次多类型、丰富多彩的区域经济发展为区域经济学提供了世界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舞台,区域经济学家幸运地成为这个舞台上站在C位的舞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发生阶段性的转换,由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学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给区域经济学家提出的学科发展之问。笔者拟就这个问题谈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必要性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为事实和经验根据,在现有区域经济学的基础上,建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并服务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学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决定于我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区别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点的认识。如果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解为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翻版,那么,既没有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事实和经验基础,也没有另搞一套的必要。反之,如果承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外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别,那么,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学就是有根有据且有必要的。毫无疑问,

笔者是持后一种认识的。

那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究竟有何特点呢?笔者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府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具体表现在,政府是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表,具有维护和增大区域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担负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能;政府运用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及企业直接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为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创新、结构调整等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政府运用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等的编制权,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而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政府还是区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建构者和协调者。

第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组织性。换言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有组织且目标导向明确的经济活动。政府广泛、深度地参与区域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组织者和主导者的作用。一方面,各级各类区域基本上都是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为目标,以年度、三年或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等时间单位,根据所确定的发展战略及各类规划而制订工作计划,把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组织动员起来,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引导各级各类区域加快发展,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形成时间和空间有序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权益是相对独立的。各级各类区域都有自身的经济权益,都会想方设法地增大和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但是,与企业、个体的经济权益完全不同,区域的经济权益并非绝对独立的。表现为,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上,区域的经济权益要服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是非完全的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竞争关系。但是,上述第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完全竞争关系。亦即,区域之间存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这是常态。不过,在一定的时期、在某些领域,区域之间会在国家或者上级政府的安排下而开展分工合作,服从于全国或者上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

第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常常以行政区为区域单位。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一个特点决

定的。因为,地方政府参与区域经济发展只能以其管辖的行政区为界。在中国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及各种经济政策都需要各级地方来组织实施,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区域经济发展单位的模式。笔者认为,这种被称为“行政区经济”的经济组织模式有其不合理之处,但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行政区经济”的是与非,我们仅需要说明其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

上述5个特点足以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或者特色。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既有符合世界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一面,也有其特殊的另一面。而后者也蕴藏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成功的秘密。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翻版,而是有其独特性。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学,无论从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的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需要看,还是从服务于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二、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事实的 区域经济理论创新

近40年来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局面之活跃、规模之浩大、过程之复杂、成效之显著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中,不乏新实践、新经验和新问题。这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为修正和发展已有的区域经济理论提供了可能。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事实,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理论建构和创新。

1. 区域双重性质理论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是经济空间。然而,根据对区域性质的这种认识,我们是不能对区域经济利益、区域经济竞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做出合理解释的。因为,经济空间是经济活动的场所,其本身没有经济权益,更没有经济行为能力,无法产生主动的经济行为。对于这个认识问题,区域经济学长期以来缺乏反思。笔者认为,从上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看,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这是区域性质的另一面。据此,就不难对区域经济利益、区域经济竞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现象做

出合理的解释。

可见,区域具有双重性质。一个是经济空间,另一个是经济组织。认识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不仅更新了区域经济学仅将区域作为经济空间的认知,还为从经济组织角度发展已有相关理论、建构新的理论等提供了新视野和新路径。

2. 区域经济竞争理论

区域经济竞争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学术界对此多有批评,部分学者甚至持否定的态度。笔者认为,虽然区域经济竞争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积极作用。正是区域经济竞争使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发展局面。因此,有必要以中国丰富的区域经济竞争事实建构区域经济竞争理论,对其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方式及其变化,以及效果等做出科学的阐释。

3.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理论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既有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的借鉴,也摸索和积累了大量的成功发展经验。如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已为人熟知。但是远不止这些。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中发现许多尚未被进行理论解释和理论建构的成功例子,可以对其进行研究,提炼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领域方面,还存在着旧模式失效或者演进,新模式形成等现象。这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4.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新实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了中国指导经济发展的一条方针。从此,中国开始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七大战略之一,使区域协调发展上升到全局战略高度。经过近30年的实践,在全国、大经济区域或战略区域、省(区、市)、城市群等多种层次上,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已经十分丰富。这为研究和建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5. 区域经济管理理论

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区域经济管理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重要的。中国的区域

经济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从管理的领域看,主要包括了区域发展战略、经济区划、主体功能区划、区域规划或空间规划、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区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城市群规划、城市规划、乡村规划,以及各类开发区规划等的编制和实施,区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其中,有许多中国的新实践和独创经验。可见,在区域经济管理方面,既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建构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包括对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认识。

6. 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理论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动力转型过程。在宏观层面,有经济体制转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及其时间上的变化等。在中观层面,有引进外资的变化、技术引进与创新、要素禀赋的变化及改造、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等。在微观层面,有企业构成、产业组织、要素流动与配置等。对于各类区域而言,这三个层次的动力因素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交织,并不是单因素作用那么简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需要重点揭示各种层次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动力的差异性、发展阶段变化与动力转换等。

7. 区域对外开放理论

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布局对外开放城市、对外开放地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沿边对外开放城市,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及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中国经济发展走过了一个渐进式多层次推进的区域经济开放过程。当前,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使区域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与国际经济发展连接起来。毫无疑问,对外开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塑造全国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然而,关于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的研究还缺乏创新性的理论建构。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

8. 经济开发区与改革试验区理论

设立各种类型多个层次的经济开发区、改革试验区,是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方式。在类型上,包括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产业园区、专业镇、经济合作区、特别合作区,以及功能不一的各类发展示范区、新

区等。在层次上,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等。这些经济开发区、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体制机制、规划建设方式、运行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中国经济开发区建设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同时,也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和创造。以此为事实根据,构建经济开发区、改革试验区理论是完全有条件的。

9.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规划建设以交通、信息、能源为主的基础设施,并使之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速度快、现代化、网络化、超大规模、国土全覆盖等特点,因而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是既有理论不能有效解释的。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某种基础设施或者区域经济发展的某个领域,缺乏对这种复杂影响的理论分析。因此,需要对既有理论进行完善或者构建新的理论,以解释富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象。

10.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理论

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理论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方面开展了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如,划分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四大战略区域、优化调整空间结构;规划建设城市群、推进空间近邻城市同城化发展;撤地设市、撤县设市、撤县(市)设区;通过设立计划单列市促进省域双核结构发展。

目前,全国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正在朝着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演进。对于这些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实践及发展趋势,急需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从而发展已有理论和创立新的空间组织理论。

11.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演进过程中的表现形态大体符合既有理论,但是在发展阶段的动力构成、结构、机制,以及发展阶段的时间长度和阶段转换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特点。这是因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具有后发经济体的共性,另一方面又渗透着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因素和中国自己的创造性实践。此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还表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并不一定遵循已有理论揭示的路径,而是存在多种形式,并且,不同层次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演进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更新。

12.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所包括的类型、问题和方式等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范畴,也超越了纯经济的范畴。如,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特殊区域的经济发展;区域间对口援助、对口合作、对口带动等;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等。这些现象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也包含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对于这些现象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阐明其规律及价值,从而建立相应的理论。

Developing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Qin Chenglin

Abstract: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a scienc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fact and experience, an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s, constructs the subject system and theoretical system, and serv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has its own uniqueness. It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establish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whether from the need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to discover new phenomena and reveal new laws,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ng China's futur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act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can construct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gional dual nature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competition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opening-up the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and reform experimental zone theory,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organization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Regional Economics; Regional Economy

(责任编辑:柳 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与创新*

张满银

摘要:新时代新发展条件下中国区域经济重大发展战略与协调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重大现实需求,迫切需要完善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在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内涵的基础上,重点是完善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学决策和区域经济学评估的三位一体的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应用体系。新技术条件下迫切需要创新区域经济学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区划理论,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学决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理论。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决策;经济区划;政策评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23-06 **收稿日期:**2021-03-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区域规划实施评估理论方法、机制与案例研究”(71641027);中央基本业务科研经费精品文科、特色理科资助基金(BR-B)(FRF-BR-18-004B)。

作者简介:张满银,男,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83)。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格局正在进行新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和等级分工正在重新布局,全球产品分工和部门分工加速转向以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工且有日益固化的倾向,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将持续影响世界地缘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也将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中国共产党正值建党百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不同阶层的差距依然显著,中国区域经济学如

何加快发展、协调和走向一体化,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要“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这无疑是摆在区域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任务,时代呼唤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和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协调的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总体来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还滞后于中

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有待于进一步形成严密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新时代新发展条件下迫切需要重点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涵、理论、决策和评估体系,以期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指导力和解释力。

一、迫切需要厘清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涵

区域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上的发展与协调规律的科学。区域经济学的区域是客观存在的时空。人类生产活动的时空性,总是具体地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上的阶段性,这种不同的特定空间上的特定禀赋和特定阶段上的经济活动就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强度是划分不同区域经济空间的依据,也是规划和发展不同区域经济空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也是国民经济中的、具有特定禀赋的、在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空间单元,该特定空间内的经济活动及其相互作用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质或功能,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区域往往拥有各自的核心区或综合的或特定的功能或取向,国家和地方治理上的区域至少是拥有一个中心城市的、适宜的行政单元区。

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先后涌现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1826)、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霍特林的企业间区位竞争论(1929)、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理论(1936)、胡佛的区域经济学(1937)、廖什的市场区位论(1938)、艾萨德的区域科学(1975)和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1991)等,从中可以看出,经典的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借鉴、吸收国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在立足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主要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域分工理论、生产力均衡布局与协调理论、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理论、城市间分工理论等在内的区域经济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生

产力均衡布局的理论,毛泽东关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和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江泽民的区域协调发展观和胡锦涛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系列重要论述。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先后经历了沿海向内地倾斜发展、沿海区域率先突破发展、“四大板块”战略区域总体发展和国内外区域全面开放合作发展的4个阶段。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一五”以来,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和发展战略及规划的不断实施,使得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后得到了较快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城市与乡村现代化为支撑的,以区域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的,以区域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为保障的,以区域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为路径的,是适应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发展格局下的能够指导和解释中国区域经济活动高质量空间发展规律的理论 and 实践的总和。

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创新的三个重点是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决策和区域经济评估,其理论、决策和评估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因为区域经济理论的落脚点在区域经济决策,区域经济决策的成效需要进行区域经济评估,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其区域经济决策和评估,区域经济决策和成效评估又检验其区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三者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否则都会偏离区域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实际。

二、迫切需要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 创新区域经济学理论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迫切需要构建能够反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影响的区域经济学,特别是需要探索区域经济学在逻辑起点上的及其逻辑演化中的新范畴和新理论,且要能够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提供新思路与新框架。因为任何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或提出,都是为了寻找其内在的区域

经济规律,并致力于为其区域经济决策提供建议或支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全球化、数字化网链、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消费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对传统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在或已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尤其是网络化协同的加强、智能化制造和服务的发展、个性化定制的推广、数字化管理的实施,使得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的突破,时空压缩、甚至不受时空的限制,“0”距离甚至“0”成本的出现,使得一些区域经济活动的生产和服务不需要集聚即可即时生产、即时服务,譬如原来厂商区位的选择即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散的运输成本和吸引其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集聚经济之间的均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得以弱化或消失;新发展条件下具有黏性的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的流动性在加强,且新兴生产要素如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具有显著的流动性与一定程度的可复制性,使得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合作、竞争及其层次和分工的效益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区位的可进入性在发生改变,区际的边界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将不断弱化甚至消失,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发展中地区和落后地区如中国中西部地区在原来传统的垂直分工中,就有可能获得水平分工;新发展条件下不同空间尺度的部分区域产业链的更替形成机制出现快速变化的趋势,使得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先进产业链成为可能等。也就是新技术革命、新区位因素和新产业链的形成和变化等问题使得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及其经典理论和模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区域市场结构将逐渐或快速地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相结合的市场结构转变,线上空间的实时交互性、均质化趋向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使得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交易模式和交易效率、空间组织模式和形态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区位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雁形发展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核心—边缘模型,以及增长极、增长轴等理论和模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线上和线

下寡头竞争和完全垄断市场的快速出现,客观上要求政府的战略利益协调能力、发展规划能力和有效实施调控政策的能力必须加强。

新时代新技术条件在发展和变化,要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切实从中国国情和区情的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借鉴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致力于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迫切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区域经济区划理论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各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类型结构,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基础。中国区域经济类型识别的理论即其区划理论要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各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能够在新发展条件下识别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区。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需要切实解决“真实的经济区域是什么”,然后才能谈其“为什么”和“怎么办”,也就是区域划分方案在现实中要有可操作性,因为准确识别与划分中国区域经济的类型区,是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区域经济决策的前提条件,由此才能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才能分区分类精准施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至少30多次提出过区域经济区划研究、建议或调整的方案,曾经经济区划方案频繁出台。仅就在十四个五年总体规划中,其中“一五”至“九五”经济区划的空间格局由“一五”的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二五”的六大经济协作区、“三五”的十大经济协作区到“六五”末的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及“十五”和“十一五”的“四大板块”“十二五”的三个支撑带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到“十三五”和“十四五”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区域划分,“十三五”和“十四五”中两次继续实施

的19个城市群的划分;另外还有老、少、边、穷地区的划分,以及其他特殊类型地区如革命老区、生态退化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资源型地区、采煤沉陷区和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林场林区、边境地区等的划分。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的板块区、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到底该怎么划分?譬如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大不大、东北区域小不小、20多类开发型的区域多不多等问题,迫切需要系统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不同空间尺度的且能够涵盖各种功能区和各种特殊类型区的中国区域经济区划理论体系。

准确的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区划,就是要依据其本身的差异,按照特定的区划标准,包括同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划分的标准来划分。当然,这种同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的划分都是相对的,在具体的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治理中,又往往表现为各种战略区、规划区和功能区。中国的自然区划理论相对成熟,但对于经济区划的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特别是如何选取区域经济区划的指标体系,如何建立其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区划的等级系统,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具体体现特定区域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差异,如何在其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等方法进行持续调查、监测和研究,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区划的分类指标体系也尚未形成共识,在其方法论的层面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需要从新时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借鉴欧盟、美国等的标准区域划分的方法,在充分考虑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并将进一步提高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和经济轴带的产业链分工及其分布规律,既要考虑同质性标准区域的划分的必要性,也要考虑到异质性区域在特定区域经济发展中互补性的要求,实现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规划区和各种功能区的有机构成和融合,实现东中西、南北中、海陆边等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经济及其等级体系的相互衔接,由此才可能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支撑体系。

四、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其经济决策制定与实施中必须遵循和把握的规律及方法的总和。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主要由中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重大区域经济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构成。中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确定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重大区域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实施的具体化,重大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对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和规划的直接支撑。事实上,中国正在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40多个(狭义的)重大区域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重大区域发展政策,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的支撑体系,中国这个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体系,能够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和能够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中国方案。

毫无疑问,中国制定和实施的重大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也存在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发展支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不完全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情况,还没有有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初衷和目标,一些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区域发展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趋势。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重大问题,需要系统构建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虽然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所解决的区域经济问题很不相同,各区域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各区域发展的利益诉求差异很大,且涉及各级各类政府行政部门和相关利益主体,但客观上需要统一构建起能够指导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

论体系,以期丰富而生动的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战略相对单一,区域经济计划与政策的制定遵循的主要经济规律和理论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和综合平衡的规律等,那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些规律和理论,如何在充分把握世情、国情和区情的前提下,在制定和实施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更加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特别是如何体现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律,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创新的理论课题。

中国特色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主要包括其战略、规划和政策本身的构成体系和内容体系、主要目标体系和指标体系、主要措施体系和保障体系,以及其制定和实施的程序和决策过程、制定和实施的工具和方法、社会参与和协商的机制等;包括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以及需要紧密配合的产业、投资、环保等政策体系。另外,也包括区际组织与利益协调政策体系、区际冲突与协调管理政策体系、区际产业转移的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体系,以及差别化援助政策体系,流域开发政策体系,城市群一体化政策体系、大都市区和经济圈治理政策体系等。

五、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评估的理论

中国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效如何,需要基于一致性和有效性对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评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的评估理论主要包括对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等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根据本规划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任务,制定实施一批国家级区域规划实施方案”,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政策评估评价制度和重大风险识别预警机制”“落实规

划实施责任,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强化政策协同保障”。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的成效如何,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成效评估。过去我们注重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完成成效评估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有的甚至不进行评估就马上进入下一轮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不仅难以发挥其战略与规划的导向作用,而且使其相应支持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

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各类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的体系庞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其实施评估工作的时间尚短,评估的理论和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各自评估的组织模式和评估程序,各自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各自评估的过程和评估方法,以及各自的问责和纠偏机制上存在很多不足。全面系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决策实施评估理论,其涉及的范围、主体、内容、任务和方法等十分复杂,迫切需要相关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断总结、研究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评估的理论。目前,迫切需要系统研究和构建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理论体系,系统回答其各自为什么要评估、如何评、评什么、谁来评、何时评等核心问题,需要具体回答评估的目标、各自评估的标准、各自评估的方法、各自评估的程序、各自评估的结果应用、各自评估的机制建立、各自评估的质量保证等系列问题,亟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一步进行系统地研究和解决。

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完善和创新的重要任务是构建其理论、决策和评估的“三位一体”体系,其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内涵是关键,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类型识别理论即经济功能区划理论是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理论的前提,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是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理论的基础,中国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理论首先主要是关于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理论。新时代“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和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的深入实施,将不断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将进一步成为经世济国和济民之学。

参考文献

- [1]安虎森,孙久文,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 [2]埃德加·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王翼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3]瓦尔特·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M].陈宗兴,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4]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5]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950—959.
- [6]Krugman P.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2): 161—174.
- [7]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8]张满银.中国区域规划评估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
- [9]李震中.计划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The Perf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Manyin

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and new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maj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imbalanced and inadequate major real need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gently need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regional economic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putting forward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mphasis is to perfect and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 theory, region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alu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urgent need to innovate regional economic theories under new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th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establish the regional economic zoning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theor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Economic Zoning; Policy Evaluation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起点

冯彦明

摘要:所有科学研究的使命都在于弄清楚关于人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人的问题,服务于人类的发展。人的活动方式不同,其认识也不同,进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结果不同,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人类活动的经济学不应离开人这个主体。鉴于此,中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起点可以归结为人,中国经济学中的人是多维一元的。人是存在与思维、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体,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人类的认识是可以统一的,而人类的实践是有局限性的,对人类的认识与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统一的。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人的经济学;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29-10 **收稿日期:**2021-03-04

作者简介:冯彦明,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 100081)。

从经济的角度讲,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动,所有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活动,都是建立在人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活动;人的活动方式不同,其认识也不同,也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结果不同,当然也决定着人类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人类活动的经济学不应离开人这个主体,也不应离开人类行为和决定人类行为的人的认识这个主题,当然更不应离开为人类服务、实现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个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①“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②。中国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华文明是关于人的文明,中国经济学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关于人的经济学,应当首先回答人现在是什么样的(现实人)和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人)问题,然后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人

如何通过经济活动、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活动成为其应该成为的样子等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从而正确地理解、解读、修正和统一关于人的认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起点是人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根据自己的认识,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作用于社会 and 整个世界。不同的人由于其不同的认识 and 行为习惯,其作用于社会 and 世界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将不同。各门科学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人,这是因为人是所有问题的根本,离开了人,也就离开了问题,也就没有研究各种问题的科学。虽然从表面看,自然科学尤其是一些纯粹关于自然的科学如物理学、植物学、矿物学等,似乎与人无关,或者可以与人无关,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反观一下就会知道,这些研究都是人的研究,都是由人进行的研究,研究的直接目的可能是揭示对象世界的规律性,但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而

且,即便是对于同样的问题和现象,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很大不同。我们尤其注意到,由于研究的立场和目的不同,其结论会大相径庭。这就意味着离开了研究这些问题和现象的人,不仅没有研究及其结果,也没有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现象,也就没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这里的人既不仅仅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或直接关系人(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属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国家或民族),也不仅仅指纯粹自利的个人,还应包括人类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体,以及人类的思维。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是存在的人而不是假设的人,是与自然和历史相统一而不是脱离了历史、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独立存在或傲慢自恃的人。这里的研究也不一定必须指那些学术的、专门的研究,即便是那些些微的关注,或者不经意间的一瞥,甚至个人加入到习以为常的社会或群体之中,都会对主客体产生影响,导致研究结论的某些改变。因为一方面,正如“薛定谔之猫”实验所揭示的,虽然在揭开盖子之前猫到底是死是活确实无法确定,但不管是死是活,都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是人放进了镭和氰化物;离开了人进行的这个实验,谁还关心这个猫的存在。另一方面,“双缝干涉实验”也告诉我们,人的研究对自然界也确实有影响。

现实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和问题就是忘记初心,缺乏反观。比如,人类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自然而然的的存在前提和自然主宰,然后去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从而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研究,而忘记了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为了提高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人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地对自然界机理的研究,从而出现了初期的技术,如种植和养殖;如此不断进步,各类技术层出不穷。但随着技术的演变和进步,生产效率确实成倍提高了,而劳动强度不减反增,人类越来越异化;此外,人类本是一种社会性生物,不可能独立存在,为了社会生活的顺畅运行,就需要自我约束,相互理解,完善制度,但现实中许多制度也被大大异化了。因此,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关于人自己的知识。人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的思维,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他人和自然界,也就无法很好地认识

我们生存的环境,当然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个人和人类的问题。

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也是统一人的认识的学问。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也是关于人的文化;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也是全人类的文明。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也是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在。中国经济学扎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用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看待人类经济活动,广纳全人类所有进步成果,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入手,服务于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而对全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这样的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人为起点,以不断完善理想的人为归宿,因此要建立在对人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很好地认识人类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认识自然界这个客体;只有很好地认识“自己”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认识由家庭、村庄(城镇)、单位、民族、国家等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客体;只有很好地认识人类的思维这个主体,才能很好地了解人及其存在这个客体。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学只有从人出发,为人服务,以现实人而不是假设人为研究起点,才能揭示人的真实面目,才能根据人的需要有效配置资源,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真理性,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与此对比,西方经济学可能是缺乏灵魂的。虽然其理论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但这里的“经济人”并不是人,而是没有人的责任的自私自利的生物;其研究对象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中把人(劳动力)与资本等同,成为生产的一个普通要素;其研究和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创造利润。可见,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人的因素,只有僵尸般的生产和流水线。马克思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细胞出发,不仅揭开了剩余价值这一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更揭示了商品经济自发发展、过度发展造成的商品成为人的化身和人退化成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中国经济学中的人:多维一元

迄今为止,人类对人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西方的简单的自利者;另一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合的一元体。

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西方逐步形成了以家庭庄园为主体的私有制,从而开始了人的自利之路。之后西方的工业革命在造就工业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消灭了商业和农业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为新兴资产阶级突破“神”的束缚提供了组织准备和思想试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为新兴资产阶级编制了优胜劣汰的理论依据。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成就”了西方“人”的异化:使得人类在脱离神的主宰的同时,也脱离了自然界而成为高高在上的自我主宰,而且资产所有者脱离了整个人类成了傲慢横行的无赖,无产者也脱离了人而变成了“自由的螺丝钉”,从而造成了在国家认识上的“高贵的雅利安”“纯洁的德意志”“美国优先”和个人认识上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物质财富管理和计算金钱的理性人(经济人),形成了西方从剥削别人开始,到自我毁灭结束的短视行为和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中国原始公有制的解体没有形成私有制,而是形成了“家”有制,这里的家不同于西方的家庭庄园,而是天下一家,即家天下。家长(皇帝)领导、家庭经营(从大国营到小家庭)、上下分层、同级分封、内部平调、限制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过程中,由于“常无欲可观其妙”,中国培育出了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贤圣,因而出现了以儒、道为代表的圣贤之道和圣贤教育,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对人和世界的看法,凝结成绵延不绝、长盛不衰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创造了长达数千年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

对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奇迹,西方人迷惑不解。一方面,17世纪的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这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以及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等,一知半解地将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但遗憾的是,长达数千年的自私传统已使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无私的可能和无私之人,由于他们私欲过重,心浮气躁,没有也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和中

国制度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是“为我所用”地借用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为其遮羞。另一方面,英国的李约瑟利用其对科技的参悟和对中国较长时间的考察,提出了“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中国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应该了解它的统治原理,从而使生物能与它和谐共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把它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⑥,但他不仅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更不知道这种文化和制度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而是想当然地按照西方的逻辑,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从形而下的角度讲,中国文化中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但从本质上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体,是个人与社会(人类)的统一体,是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体,也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人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智慧的存在;人不仅仅是个人,也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自然关系的总和,同时还是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总和。

所谓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即在中国人眼里,整个社会凡圣同居,人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就是逐步修正认识、完善自我、实现去凡入圣即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⑦且全面发展的“君子不器”^⑧的过程。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⑨,而“教之道,贵以专”,因此要通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⑩的“圣人为腹不为目”^⑪才可达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圣人之境界。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⑫。“止于至善”的过程就是由凡入圣的过程,就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⑬的过程。

所谓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亦即天人合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⑭,故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欲真正了解天人合一之理,非当今浮躁、自利之人所能为,更不是西方物欲横流所能解,只有“常无欲(知止)”即一念不生方可“观其妙”“常有欲(贵以专)”即一念不灭方可“观其微”^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⑩

所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亦即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一方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⑪,另一方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⑫;一方面,从诚意正心修身开始,以达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界,另一方面,“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⑬。西方的“家天下”损人害己,只有你死我活,只能零和博弈,永远也理解不了个人如何能与社会统一;中国的“家天下”虽然在落实过程中也曾周期性地出现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但对立的结果或者是统治者觉醒后的自我革新和完善,或者是统治者沉睡不醒而被迫更替和覆灭。因此“家天下”是最接近人与社会统一的制度模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⑮“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⑯“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堵上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⑰

所谓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亦即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同源同宗,既非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也非意识决定物质、思维决定存在,就如既非手心决定手背,也非手背决定手心,而是手心与手背互为条件,同存与共亡。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⑱不论是从现实的某一时点观察整个人类,还是从人类的整个历史中观察任何一个人,都既不存在无物质(存在)的意识(思维)活动,也不存在无意识(思维)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本来互为一体,没有思维不称其为人,没有存在(身体)恐怕也不能成为人。

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神学

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人类的智慧(认识)问题,是了解人的多维一元本质的钥匙。

现代量子力学为我们打开了重新认识人类和世界的大门,使我们能够从所谓“科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关系,证明中国圣人的睿智和中华文明的智慧。比如,传统物理学认为可以通过制造出一种足够精准的计量工具来测出一个物理系统的长度、温度或质量;要测量的物理系统的状态是独立于测量工作而存在的,即使停止测量,该系统的物理性质如尺寸距离、温度高低、质量大小也都是不变的,除非发生有限的热胀冷缩或者其他被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是可测的;光速是绝对极限,没有、也不可能超过光速的物质运动。但量子世界的发现意味着这样的认识必须改变:一是宇宙万物都存在着“测不准”这个特性,量子系统的精确测量不仅在实践中不可能,而且“精确测量”在物理上也没有意义;二是“双缝干涉实验”告诉我们,人与物不是相互独立的,有观测者和没有观测者的最终观测结果是不同的;三是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不仅距离不是问题,而且光速也不是极限。如此之类颠覆常识、引起西方认识和物理学革命地发现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早有阐述。《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⑲,又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⑳,还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㉑。其中的第一句说明了“测不准”定理,第二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道理,第三句则说明了不仅量子纠缠,而且万物同源的必然。

人的多维一元有无数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微观与宏观的统一。现代物理学把微观与宏观分开,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这正体现出认识的局限性。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正说明了这种统一性和同一性。

从量子力学角度讲,第一,不管组成世界的物质多大多小,其都一直处于运动之中。不停运动就意味着位置不定,位置不定就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作用力量不定,受到的作用力量不定就意味着速度不定。即使你把某一实在位置固定,但你不可能将所有实在的位置固定,实际上哪怕你想固定大部分实

在的位置都是不可能的,这正像数百人甚至更多的人组成的群体,在你固定某一个人或某几个有限的人的位置后,由于其他所有人的位置你不能固定,那么,你所固定的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位置在这一群体中仍然是不固定的,或者只能是相对的。这时,你还可以用传统物理学解释说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位置没有变化,只是其他人的位置变化了,所以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相对位置变化了。但实际上,在一个微观和宏观世界中,比如在地球上,由于地球是动而不停的,不仅自转,而且还围绕太阳公转;不仅公转,而且随太阳在银河系运动,如此说来,你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位置固定在地球上的某一位置,但在银河系中恐怕也是不确定的,更不用说在更大的系统中了。这里说的是位置的相对性,还没有考虑能量的相对性。我们还回到数百人组成的群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变动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人的位置,大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力量就会发生改变,因为相邻的人之间可能有适应或不适应的情况;另外,即使我们不改变任何人的位置——这意味着所有人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如果我们改变一部分人的情绪,比如从无喜无怒的中性依次改变为喜、怒、哀、乐,尤其是大喜、大怒、大哀、大乐,你再观察这个固定人数、固定位置组成的群体,磁场还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所谓的粒子之间的干涉性与绕射现象。粒子不会因为波的正负波动而抵消,只会互相叠加。由于粒子的波动,任何已知的标准都不能对其测量,因为它与动能、位置、位能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既然万物归一,也即天人合一,人是“天”即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人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也具有所有客观实在的特性,同时与其他客观实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此情况下,“观者”的存在就不可能不对被观测者造成影响。中国文化一方面讲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谓酒逢知己,话需投机,饮茶对人,治病对时;另一方面要求认识主体即个人尽可能遵循中庸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体关系,反过来也表明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被观测的世界形成了某种相互关系。

第三,既然万物一元即同质,量子纠缠既是常规,光速就不是极限,意识才是速度的极限。传统哲学讲究因果联系,没有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

同因将有同果,同果必然同因。《大学》上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②《道德经》也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③中国民间文化也讲千处祈求千处应,都是同一道理。

所谓的现代科学,从好的方面讲,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从另一个方面讲,所有科学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西方认识经历了从地球中心到太阳中心的痛苦转变,现在认识到太阳也不是中心。再如在狭义相对论提出以前,西方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各自独立的绝对存在,牛顿经典力学和经典运动学只考虑了“空”而未考虑到“时”,也就是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次提出了时空的概念,认为时间和空间各自都不是绝对的,而绝对的是一个它们的整体——时空。显然,在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因素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不过,一方面,时空显然不只四维,而是与人的意识相应,有无数维;另一方面,这里的时间与空间相对于观者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外在的存在,而没有把观者与时空融为一体。这也可能正是相对论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在相对论中,虽然有了时空的合一,却没有把观者人合并到时空之中,没有把人也看成是一种“时空”的存在,没有看到观者与其他人的时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实际上,在这里,爱因斯坦所说的时空仍然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观者来说的。如果我们把观者也放进这一时空之中——实际上其本身就在这一时空之中,科学将会是另一种景象。

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既缺乏“反观”,更缺乏“通观”,而只具有“直观”。所谓“反观”,就是没有看到所有的研究都是人做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研究,都首先是解决人的认识问题,而所有问题的解决也都是人的认识提高的结果。所谓“直观”,就是只着力去分别所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的事物和现象,只是想去解释世界,而忘记了解释世界的目的是利用和改造世界,利用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人。我们很多人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连自己都改造不了,何谈改造世界?所谓“通观”,就是把

“观”的主体与客体融合起来,特别是要把主体的人融入客体的物和现象之中,同时把客体的物和现象与主体的人联系起来考虑。《大学》要求诚意正心,亦即知止,因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说明了人与物的统一。传统物理学既没有看到人自身,也没有看到人与物的交互作用。由于缺乏反观,所以不知道有通观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未发现有通观的作用,从而使人忘记了反观。量子力学的产生,使人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区别开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又是一个局限。宏观微观本来一体,也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但由于对微观量子世界和宏观宇宙的研究都浮于表面,所以只能发现一些与人现有的思维及模式相适应的相对现象和所谓的规律,而不能参透其本质。

三、认识的共性与普适性

在关于人的问题之中,认识是最基本问题之一。前面说过,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而从人的角度讲,现实中的所有问题既是物的问题,也是识的问题,因而既可以通过改变物而解决,也可以通过改变识而解决。但由于识是能动的,而物是相对稳定的,识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辨别包括识及物的存在及其规律性,从而使人的行为符合规律的要求,也使人本身逐步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正像《大学》开篇所告诉我们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可以说,现实中的问题表面看是物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表面看是人的行为(身体的)问题,需要改变人的行为(即修身)而解决,但从深层看都是人的认识问题,需要通过纠正和提高人的认识才能解决。解决了认识问题,了解了认识的特性和规律,也就解决了人的问题和物的问题。

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人的能力大体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能力,包括认识和分析外界问题的能力,以及认识和分析自我

即反省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二是动手操作即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认识和分析自我的反省总结能力很重要,也最缺乏,因为只有经常的自我反省,总结自己和他人的教训,学习他人的间接经验,才能不断地、尽快地提高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只有提高了自己认识问题的能力,才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认识是个人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事情。认识是对包括人的思维及客观事物的运行变化规律的认知和了解。虽然一棵树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各人的认识会有不同,但既然都是人,既然都是对人的思维及客观事物规律的认知,那么,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就会存在。因为认识作为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仅会随着个人反应的次数和时间而改变,更会通过学习和接受间接经验,经过长期的和众人的实践检验,通过自省和反观而发生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向,有的是自我升华,发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找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有的则是先入为主地强化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失去了对事物规律的把握和个人认识的升华的机会;还有的可能只是浅尝辄止,停留在原有的认识水平。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果一个人真的想了解并尊重事物的规律,这样的循环往复多了,再加上善于自省和反观,一般人都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使认识得到升华,规律得以把握。人通过认识升化发现的规律是反映事物共性的东西,因而也是具有普适性的东西(认识)。

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过程如此,人的认识及其规律亦如此。既然都是人,既然都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类社会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就必然具有一些让每个人都能承认并接受的共识。在认识论上,我们无需探讨那些客观存在的不同,而是要关注与这种客观存在相关的人们认识上的不同,以及由这种不同的认识所决定的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结果,进而分析是否能达成共识,如何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尽管人生来就有着种种的不同,特别是有着自然环境和条件、社会环境和条件、人种、肤色等的不同,我们也承认人与人、团体与团体(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的不同,但作为人这种有智慧的动物,仅仅承认不同是不够的,还要分析和探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和条件,进而要求同存异,

求大同存小异。我们不能因为那些客观存在的不同而掩盖或者忽视、无视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点。人都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权利。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和权利决定了我们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正是这种人所独具的智慧决定了我们能够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正是经过人类数千年考验和实践证明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基础。

文化是人类认识的总结,文明则是正确的文化。中国文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形式上的包容性,二是内容上的融合性。所谓形式上的包容性,就是中华文化既不排斥和拒绝任何外来观念,也不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礼记·曲礼上》讲“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内容上的融合性,就是中华文化具有的大、德、和、新、省五性。中华文化是“大”文化,即做大学问,立大志向,成圣成贤,以达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中华文化是“德”文化,即德被天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即通过求同而存异而达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意和同悦、利和同均、口和无诤;中华文化是“新”文化,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是“省”文化,即“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不仅要“一日三省吾身”,还要“慎独”“知止”。总体来看,“省”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和”),就能有所得(即“新”),“和”则共享、包容,“新”则进取、创新,最终实现对内和谐、小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讲技术竞争、知识产权而非文化融合、心灵升华的“新”,讲丛林法则、零和博弈而非求同存异、共享共赢的“和”,讲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而非仗义疏财、安贫乐道之“德”,讲统治世界、奴役人民而非止于至善、上善若水之“大”,这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特别是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实践和“碰壁”之后仍然存在这样的不同,西方仍然固执己见,是因为西方自私的发展模式造成利令智昏,而西方文化中又缺少“省”这一要素,不会自省、反观,只会转嫁和埋怨(别人),因而也就没有自我革命、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局限性,是其不能形成共识的根源所在,也

是导致个人分裂、社会对立、经济危机、文化冲突、政治无能、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与此相对比,中华文化秉持“大、德、和、新、省”的统一,绵延数千年屹立挺拔,就在于这“五性”反映了人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也正在于这统一的“五性”能帮助我们发现规律,达成共识,凝聚力量,形成统一的发展动力。体现这“五性”统一的文化,以及由此文化所决定的认识,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超越民族、种族与国家的界限,超越地域、性别与年龄的差异,成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共同方案,成为实现全人类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目标。

1988年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的《巴黎宣言》指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求智慧”;1992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没有任何中国人参加的宗教大会上,参会的6000人要确定一个全球人都遵循的黄金规则,大会最终找到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认为这条伦理原则可以成为被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

西方有系统理论,但缺乏系统理论的应用。根据系统论原理,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在整体上的性能和功能并不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相加,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也不是它的各个组成要素的随意凑合,而是按照一定规律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因此,系统理论一方面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团体(企业)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相关性,因而说明了不同国家、不同团体、不同个人之间有着必然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看问题要具有长远眼光和整体意识,既不能为眼前利益所迷惑,也不能为局部(个人、团体、国家)利益而晕头。

由此我们说,通过自省实现换位思考,通过换位思考达到互相理解,通过互相理解达成一定的共识,这正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的中国经济学,其生命力,其不同于历史上、国内外各种流派的根本,也在于此。

全球问题,大到全球治理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小到个人生存与发展、家庭与家庭之间的

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要靠人的方法去解决,靠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法去化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己所欲求也勿求于人。既要消除零和博弈的强盗式单赢思维,也要消除“行贿受贿”的腐败式双赢思维,秉持我你他、本地边缘异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赢”,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四、实践的能动性与有限性

实践是人类的日常活动。虽然在哲学上实践被定义为主观见之于客观,包括了客观对于主观的必然以及主观对于客观的必然两方面内容,又分为为满足人类生产而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实践、以调整 and 改革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为目的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以探索宇宙间普遍规律为有目的的科学实践三种具体的形式,但实际上,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无不在实践,无不是实践。

“实践”一词很热,这不仅是因为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彻底的、全面的改革开放,也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离开了实践也就失去了认识的源泉。不过,我们认为对“实践”的认识似乎还远远不够准确和完善。

第一,所谓的三种实践活动都是“物质的”实践活动,都是个人或人类对客体的活动,而缺乏人的自我实践,即中国文化讲的“慎独”和“吾日三省吾身”的通过反省而改变自我认识、改造自身缺点、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也是前述的只是“直观”,而缺乏反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的发展是单向的,只是从“外部”攫取,也必将随着外部资源和能量的枯竭而灭亡。

第二,实践是人能动的活动,因此是人有意意识的活动。不管过去所总结的三类实践活动是否全面,但包括这三类在内的人类所有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因而都是人类能动的活动,从是否开始实践、开始什么样的实践、如何进行实践、预期达到的目的等,都是人们事先设计好的,至于说能否完全按照预先的设计进行下去,特别是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则是另一回事,也是新的实践的背景和基础。既然实践是能动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意味着人是带着主观意识去活动的,人类的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意识(认识)基础之上的活动,因此可以说,

不仅不是实践产生意识和认识,反而是意识和认识首先指导实践。当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可能发现认识上的问题,引起认识的改变和修正,但无论如何,人在实践之前既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在一张白纸之上实践的。实际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仅包括上述三类,人生在世无不是在进行着实践,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是实践,科学研究是实践,日常的吃饭穿衣、睡觉学习也是实践,这些实践活动无不是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相统一的活动。既然实践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也就不存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问题。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认识的先天正确性,也不意味着人的认识是先天固有的,更不意味着人的认识是不能改变的。正像毛泽东主席所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显然,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只能从社会的实践中来。不过,我们要注意,毛泽东主席这里说的是“人的正确思想”,而不是人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与人的意识显然不是一回事,或者说,人的正确思想与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只有经过了实践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从最初起源以及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本来是一个统一体,不存在无物质的意识,也不存在无意识的物质。其中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人所能见到和认识到的最高等的动物,是物质与意识有效融合的典范。可能其他物质的意识,比如土石砖瓦,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其他更高等的动物,如不与人处同一时空的物种,以及外星人,我们人类还没有见到或认识到,甚至还可以说,或许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不一定正确。因此,实践活动既不是纯粹的物质活动,也不是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物质活动与意识活动的统一。当然这里也需要注意,哲学上的物质并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而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但不管其他物质是否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实践这一“物质”是不可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包括实践在内的所有物质都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

第三,人的实践活动是有限的,因此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有限的。实践之所以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实践是个人的活动,一般来说,任何个人的

实践活动都不可能穷尽全人类的实践活动,这决定了个人由实践产生和形成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其次是因为实践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活动,虽然历史是延续的,人类也是延续的,但一定时期的人类的实践不仅很难完全复制和体验前人的实践,也更难代替后人的实践,由此所产生和形成的认识也将具有局限性;最后,即便是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条件不同,背景和目的不同,所积累的认识不同,其实践的形式、效果特别是其产生的新认识也会不同。由此可知,由于人类的实践具有局限性,人类的认识也有局限性,实践对认识(真理)的检验也就是有限的:今天检验正确的东西明天不一定正确,这里检验正确的东西,放到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正确,个人检验正确的东西,别人不一定适用。

既然实践是有限的,既然我们不可能事事都经过实践,我们就要接受别人的实践经验,事实上我们也必须承认,前人积累和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文化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前人的实践不同于我们今人的实践,我们同样可以说今人的实践也不同于后人的实践,必要时我们也可以事事都实践一下,如果你有的是时间;如果不可能,那就只能接受。当然,这里的接受也不是盲目的接受,也不应该盲目地接受,我们在接受的同时也要实践检验,事实上我们的接受就是一种实践的检验,我们接受之后还可以进行专门或非专门的实践检验。

第四,实践是可以改变的。不仅实践的物质性活动可以改变,更重要的是,实践的意识性活动也是可以改变的,只不过这种改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被动的改变,是不得不的改变,是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的改变;另一个是主动改变,指通过自省之后的改变,也是通过反观而达通观之后的改变。如果说前者可能造成怨天尤人,听天由命,后者则是实现人的深化和升华,达到去凡入圣。

五、标准的统一与绝对性

前面说明,中国文化是一元论者,这不仅仅是万物一体,人、物同源,更是说做人、做事的标准要统一,不能人有人的标准,物有物的标准,更不能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标准。标准的统一性,首先在于标准对象的统一性。

相对于人类来说,既然都是人,都生活在这个

地球上,都是地球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不同的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会有不同,甚至有时差别很大,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智慧,就在于其能够智慧地处理问题和分歧,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反省,达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分歧看到同质,透过局部看到整体,透过当前看到未来。

所谓不谋一世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众多的所谓“古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得以保存至今,并继续展现出勃勃生机,很多人对此进行探讨,但始终如用管窥豹,不得实质。其实,文明就是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总结和结晶。凡是与人类生产生活紧密结合、正确反映人类生产生活规律、适应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才得以保留并延续;而那些不适应人类生活,甚至脱离人类生活的东西,即便在当时被封为“圣典”,也将是昙花一现。依此来看,古埃及“文明”以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为其象征,虽然狮身人面像代表了勇敢和智慧,但金字塔所代表的“阶层”和“统治(地位)”才是其根本;古巴比伦“文明”以汉谟拉比法典和空中花园为其象征,虽然其中的空中花园不乏建筑、生物、水利等文明成就,但汉谟拉比法典的严苛更代表了古巴比伦王国“统治”的残酷;古印度“文明”以婆罗门教和瓦尔纳种姓制度为其象征,虽然后期产生了佛教,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统治依然固——婆罗门教本身就是瓦尔纳制度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这三大古国虽有“古”之年代,但无“文明”之认识与境界,缺乏人的智慧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后人所称的“文明”只能算是统治方式或统治思想:或者是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如古埃及、古巴比伦,或者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统治方式,如古印度。既然是统治方式,由于其缺失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沃土滋润,导致了统治(者)是常变不定,因此,其方式也必然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变更,随着统治(者)的崩溃而灭失。与此相对照,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讲究平等,即“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于人”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提倡以德治国(家),辅之以法治(家规),即“为政者,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出发点是平等,基础是人类对其自身及其环境的正确认识,体现的是“人(人类)”的需

要,反映了维护“人(人类)”秩序的要求。因此,中华文明既非统治者统治的方式和思想,也非为统治者设计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既不是中华民族的孤芳自赏,也不是为中华民族编织的“皇帝的新装”,而是关于人的学说,是人的文明;是每一个个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反映,也是每一个“家(庭)”的需要和家规的基础,更是整个国家、人类的需要和持续发展的保证。中华文明由于其是关于人的文明,只要有人存在,就需要这种文明;只要人类延续,就会运用和发展这种文明。由此我们明白,中华文明既不是中国的文明,也不是中国人的文明,还不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而是全人类的文明,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需要,是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些人认为,现实世界纷繁复杂,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判断人的认识和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因此表现出为所欲为,无所不为,甚至无恶不作。实际上,这或者是由于利令智昏,或者是由于年少无知。中国古代圣人早就指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⑨,这是我们判断任何人的任何认识和行为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这里的“己”既可以理解为主体的“我”,也可以理解为空间的“本地”,还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当下”“当时”“现在”;这里的“人”既可以理解为客体的你和他(她、它),也可以理解

为空间的边缘和异地,还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过去和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是能够突破个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这三个纬度的“三赢”目标,即实现我你他、本地周边异地和过去现在未来共赢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而其他如单赢和双赢都是不正确的。

注释

- ①④⑤⑩②⑩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1-2、21、49、57页。②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https://news.163.com/20/0131/17/F481TDC5000189FH.html>, 2019-08-19。③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⑥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338-339页。⑦⑧⑨《论语》第2章“为政篇”。⑩⑪《道德经》第12章。⑫⑬《道德经》第3章。⑭⑮⑯《大学》。⑰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日报客户端2019-03-24。⑱⑲⑳《道德经》第1章。㉑《孟子》“尽心章句下”。㉒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2、147、162页。㉔《道德经》第2章。㉕《道德经》第25章。㉖《道德经》第42章。㉗《道德经》第47章。㉘《中庸》。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ics

Feng Yanming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al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o figure out human problems, to solve human problems on this basis, and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different ways of human activities signify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als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ways and results of economic operation. Therefore, economics that studies human activitie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should not leave the subject of human beings. Given th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ics can be attributed to human beings. People in Chinese economics are multi-dimensional and unitary. Man is the unity of existence and thinking, reality and ideals,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t is the unity of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Human understanding can be unified, but human practice has limit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the behavior is correct or not should be unified.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ics; Human Economics; Chinese Culture

(责任编辑:晓 力)

【区域协调发展】

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若干重大问题*

陈晓东

摘要: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及其政策经历了从以公平效率到协调安全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变迁,充分反映了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影响。党的十九大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国际发展环境使得中国发展战略的安全价值取向越来越突出。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就是要以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以更高质量、更加协调、更加安全为发展导向,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协调东中西平衡、统筹南北方发展,促进要素配置合理、流动通畅;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为核心,建立充分照顾流域上中下游和流域间发展利益的体制机制,打造不同层次的区域增长极。在确保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形成优势互补、功能突出、特色明显、人民共享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安全稳定;统筹发展;优势互补;新格局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39-10 **收稿日期:**2021-03-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8VXK002);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学科登峰计划(产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基础研究项目“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状况评估研究”(2020G04)。

作者简介:陈晓东,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 100836)。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区域统筹发展关系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断调整生产力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正在形成。当然,工业化推进的不平衡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东部地区已经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和现代化道路;相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尤其是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发展相对滞后。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明显,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突出。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

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如何正确看待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构建。

一、辩证看待区域发展中的东西失衡与南北差距

任何一个国家的区域政策一般都有两个目标:效率与公平。对于这两个政策目标,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政策选择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民族众多,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具有高度异质性。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其区域政策不仅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客观上

还有安全与秩序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具有悠久中央集权传统的大国,中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多的是体现安全稳定与秩序井然的前提下实现国内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到了近现代,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弱肉强食,造成中国积贫积弱,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制约下,中国更加侧重于国内发展,在经济政策上则更多地表现在实现区域平衡,体现出更多的国防安全、国家安全、发展机会公平等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下决心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体系的时候,国防安全压力看似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百万大裁军和军费大幅压缩,以牺牲一定程度上的国防安全来换取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可以忍受的生态环境安全为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发展;采取梯次发展战略,将有限的资源和力量主要集中在发展条件更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加快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并力图使增长态势向后发地区延伸。这种非均衡的激励政策表现出区域政策的效率选择取向,这一历史选择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集聚资源、握紧拳头在很短的时间里打造出经济发展高地,而且所形成的溢出效应与扩散态势越来越显现出强大的带动中西部地区及北方地区经济腹地发展的能力。

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现代化。而作为主要资源输出地和生态保护源头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在生态保护方面付出了代价、牺牲了宝贵的发展机会,其实际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与回报,因而在客观发展上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却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时期,欠发达地区尤其是生态保护地区在经济理性与迫切发展的压力下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可能会造成生态破坏甚至难以修复。这不仅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奈。但既然是以牺牲环境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因此,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不管是保护还是发展,都要以整个流域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生态系统来考察,必须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客观差异,充分照顾各个

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一概而论采取一样的发展模式和政策措施。而长江以北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当前的发展速度也远落后于南方地区,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南北差距越来越大,主要体现在整个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其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才集聚、营商环境等方面远不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珠江流域。因此,客观地看,东西失衡的本质是政策公平问题,即要把中西部地区在生态保护的努力与付出以及牺牲当前发展机会的价值充分地体现出来,把绿水青山及其维护的努力与付出都要转化为生产力;而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北方地区需要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解决发展落后的问题。总体来看,东西失衡与南北差距都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较为突出的矛盾,我们仍需要以辩证的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发展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发展仍是第一要务。这些问题与矛盾产生于发展过程中,我们仍需要依靠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尤其是以高质量发展来解决这些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

不平衡是普遍存在的。有的可能还会长期存在,我们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推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发展上设立同样的目标,并一起达到同等发展水平。一刀切解决不了发展问题,也难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应该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现实制约条件,合理分工,优化发展,分进合击,最终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战略构想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全面落地的行动。以国家力量推动的方式来解决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在2020年年底实现在现有标准条件下所有贫困地区脱贫摘帽,这是实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的第一步,更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做出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地区人民所做出的

政治承诺。进入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时期,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在空间上必然表现为区域间巨大的不平衡性。工业化不可能表现为所有地区在同一时期内实现同步发展,加之大国在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方面的差异就更加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发展有先有后,甚至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表现出巨大的速度差距和成就落差。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所采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分析范式难以客观描述中国现实发展成果及区域发展差异,一方面,由于其范式本身的缺憾,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空间经济学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广阔的地域、丰富的实践,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分析范式难以把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的现实精髓,与分析范式的很多所谓公理性结论难以吻合,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第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诸多非经济因素作为治理的第一价值取向时,其很多研究结论难以与中国发展现实契合而使其分析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以工业化推动的现代经济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域观经济过程,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微观—宏观抽象研究的经济过程。所以,无论是在理论描述上还是在现实区域战略与制度安排上,都不能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简单地视为微观—宏观结构的抽象,具体区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必须体现域观经济的特质,即所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此,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根据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排序,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综合国力等现实情况来确定区域战略和具体政策安排。

当前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着重解决区域之间的公平发展问题,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其核心是要逐步解决东西失衡和南北差距问题。实现东西协调、缩小南北差距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前缩小区域差距的战略与政策更多地着眼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失衡,随着南北发展差距的逐步加大,解决东西部地区、南北方地区的协调发展,更需要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并将其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使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西部地区

与北方地区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发挥欠发达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不仅解决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国家总体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

二、从注重区域平衡到全面协调发展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且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占全国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6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唐地区、以青岛为中心的胶济铁路沿线和广州。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外重重困难,国家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这一决策非常符合当时的国情,但由于受苏联平衡配置生产理论的影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平衡发展论述的理解尚处于探索过程中,这一阶段的工业生产力重新布局大都以实现平衡发展为特征,区域政策主要体现在为备战备荒而将国家投资和重点项目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和布局,出现了工业生产力在“一五”计划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两次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挺进。1958年,国家设立七大经济协作区,明确提出根据中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特点,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1964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加强内地建设;8月,他强调工业过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沿海各省份都要搬家,包括工业交通部门、学校、科学院、设计院,加强二线、三线的工业建设。随后,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西安、成都、兰州、昆明等地的高校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培育和储备了大量人才并一直延续至今。同时,毛泽东主席又指示将成昆、滇黔、川黔、湘黔等铁路修好。这些铁路建成通车彻底改变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内地工业化基础不断加强,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提高到

1978年的39.1%,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工业布局极端不平衡的状况。这一时期的区域政策不仅落实了国家安全战略,而且在发展机会上体现了公平,使得内地和沿海的差距大大缩小。同时,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布局得到了优化,大量新兴工业城市在中西部地区迅速崛起,与沿海地区老工业城市一起,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经济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引入了以微观—宏观分析范式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其中的梯度转移理论与中国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并对1949—1979年中国的平衡发展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由于很多投资和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客观上使得东部沿海地区投资明显减少,增长也出现明显下滑,上海及华北地区一些老工业基地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也并不高,使得东西部地区差距在得到一定程度缩小之后反而逐步攀升。因此,过去那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平衡发展指导思想 and 区域政策难以为继。在重新探讨了生产力布局原则之后,中国的经济工作把增长效率放到了第一重要的位置,经济布局 and 区域发展战略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区域发展向非均衡态势转变。在此战略和政策指导下,政策与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六五”“七五”计划时期,中国区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八五”计划开始注重地区之间的公平问题,提出“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原则,尤其是突出了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从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2003年开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05年中东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2008年,东部沿海地区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率先转型升级。至此,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四大板块战略全面落地实施。各个板块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扬长补短采取各不相同的区域战略和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表现突出,创新成为率先

发展的新引擎,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东部沿海地区还将优势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融合,加快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十三五”时期提出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加快发展;不断提高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目的就是要促进地区间的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加快破除地区间的藩篱,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和实现生态补偿机制,最终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强调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地带间的协调发展,同时特别注重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和一体化发展,注重南北方地区统筹协调。2020年,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十四五”规划的主基调,强调了四大板块的协调发展,加快老少边等地区的发展,兴边富民,稳固边疆;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推动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坚持陆海统筹,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四五”规划把促进东中西部地区更加平衡和南北方地区共同发展、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东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能否与发达地区协调发展,南北差距能否缩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总体水平和发展前景。

三、以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抓手 缩小南北差距

中国南北方地区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属于北方地区,以南属于南方地区。从经济发展角度上讲,可以将黄河流域一线及其以北地区视为北方地区,主要包括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而长江流域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属于南方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独树一帜,拥有当时亚洲闻名的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加强国防安全

的三线建设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黄河流域及西北地区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不仅解决了中西部地区工业从无到有的问题,并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平衡的生产力布局,也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一起,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时的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薄弱,在考虑国防安全和国家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将本已有限的资源和捉襟见肘的财力较为分散地在全国进行布局,尤其是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在当时来看既正确又略显无奈,但客观上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改革开放以后制造业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在非均衡化战略和梯次开发理论的指导下,区位较好、条件较为突出的南方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东北老工业基地、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工业基地城市逐渐衰落,目前正处于艰难的转型升级之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国家层面非均衡性的激励政策外,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有一个共性就是当年更多的是承接国家的指令与计划,加上这些地区煤炭、矿石等资源丰富,具有比较典型的生产靠国家、资源靠采掘的特点;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还有集中连片的牧场、森林和良田,生活上靠大自然恩赐的特点十分明显;而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手工业一直较为发达,市场交换更多地体现在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当中;加上历史上几次因北方地区战乱而人口和生产力向南方地区迁移,“聚而为市,筑而为城”,南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南方地区也一直是历朝历代的“钱袋子”和“粮袋子”。这种传统和北方地区的一样都流传至今,深刻地影响着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南方沿海地区眼光向外,瞄准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吸取外延式发展的深刻教训,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创新发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因而在“十三五”期间的发展速度相对于转型升级的北方地区而言就显得非常迅速。对于进入新时代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缩小南北差距而言,北方地区要着力于建立与完善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融合发展。让创新成为引领

发展的动力,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尤其是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让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比重与贡献率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产业链抗风险的强度,加大数字经济对实现产业链补链、扩链、强链和承接国际创新链转移的作用力度;在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不断增强现代金融和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大数据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真正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对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不断突出人力资源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东北振兴战略早已在国家层面确立,国家也给予了东北地区巨大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但实施效果未达到预期目标。尽快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成为实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解决南北差距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对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直接关乎国家的发展大局。当前,东北振兴要实现突破、实现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要切实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做实改革举措,释放改革活力,提高改革效能,有效破除阻碍东北地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新时代东北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保障。东北振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敢闯敢干敢拼,这样才能促进东北地区的发展找到新思路,实现新突破,展现新作为。充分利用东北地区在亚洲的地理位置和国内的区位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勇于探路,力争在国内和国际竞争规则衔接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挖掘和利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努力在实现产业链现代化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数字化硬件设施的高端化发展,加快形成产业链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与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高数字化软件服务的质量,着力畅通产业链的循环协作,确保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在构建数字化软件服务领域全方位开放体系方面敢闯敢试,实现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强链并承接国际创新链转移。在东北振兴的突破实践中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实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采取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降低营商成本,为更多企业创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使优势产业更好地发挥作用,在锻长板的同时加快补齐短板。积极突破“卡脖子”等关键核心技术,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加大对现有科技人才队伍的激励与挖潜,大力推广“揭榜挂帅”制度。进一步加大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对东北地区关键核心技术、高新技术、共性基础技术的保护力度。大力支持企业、产业技术联盟建设服务平台,加快发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科技咨询等服务。加强对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加强科研基地建设。放宽民营企业的准入领域和采购范围,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项目,组建产业与技术创新联盟。加大金融支持东北地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力度,选择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城市做好现代金融和科技金融的试点。大胆尝试、稳步推进东北地区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践中检验改革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积极创新人才供给机制,用好东北地区雄厚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

另外,解决好黄河流域的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人才集聚、科技创新等问题,建立黄河流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加快缩小南北差距同样重要。而作为整个国家战略屏障和战略纵深的西北地区 and 西南地区,其发展就不仅仅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缩小南北差距和协调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问题,而是统筹于国家层面的全局性战略安排,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和向西南方向的实施与发展、对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深远意义。

四、以“碳中和”为核心确立统筹机制 实现东西协调发展

中国地形复杂,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向。因此,大江大河基本上也是发源于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或者南方地区汇入大海,最著名的就是西部地区的三江源地区了。如何在保护大江大河上游地区尤其是源头地区生态环境的同时,兼顾上游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统筹考虑与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之间的协调

发展、协同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共同发展的愿望出发,我们希望各地区发展水平尽可能接近,但受要素禀赋差异影响,各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是难以完全消除的。特别是在受自然条件影响、生存成本和发展成本很高的地区或在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上负有重要使命的地区(如大江大河的源头地区等),如果难以通过扩大经济总量缩小发展差距,就要考虑向区外移民的路径,使实际人口密度与地区人口承载力趋近。这种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难题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也一直在争论“到底是先保护还是先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9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党的十九大上,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进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年3月,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这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各地区在流域内部和流域之间进行“碳中和”交易、完成减碳目标与实现协同发展的指导原则。

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保护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当前中国国民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迫切任务,也关系到中国的繁荣昌盛与永续发展。很多问题不是我们认识不到,而是受所处阶段、所用技术和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就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先污染后治理也是情非得已。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通过供给、生产、交换和消费等活动表现了出来。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生存与发展资料,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人类在不断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类,如此循环往复。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生态危机主要是人类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消耗约占同期全球消费总量80%的能源与资源而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工业

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条件与精神享受的同时,也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地下水系破坏、气候变暖等问题。而中国用了7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2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快速的压缩式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环境越来越难以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必然。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既对立又统一,只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其互相转化实现统一。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认真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大江大河的上游多以提高水源涵养能力为主,中游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注重保护河流生态系统和提高生物多样性。同时,沿河沿江地区还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保护与发展成为一件既要尊重自然规律又要讲究社会效益的实践艺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上中下游保护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中国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上已经初步取得了可观的生态效益、良好的经济效率和巨大的社会效应。作为一个闭合的整体系统,未来流域内生态补偿的前提与关键就是要充分照顾上中下游有关利益主体的利益,确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补偿额度,调动相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及其之间的协作性,建立充分反映不同流域实际生态价值、代际补偿、资源稀缺程度的有偿使用生态补偿机制,使为流域生态做出不同贡献的地区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这是一个实现大江大河上中下游联动、统筹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有力的制度安排。

另一个有效统筹流域及其不同地区之间协作的新政策是“碳中和”。“碳中和”是指,生产和生活等过程中所释放的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当,这样大气中总的二氧化碳含量就不会增加。作为一个以煤为主要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大国,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比重偏大,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结构偏重、综合能源效率偏低等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世界上许多国家认为碳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并积极开展碳排放交易。中国已经明确在2030年前力争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不仅是大国责任的体现,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实现中国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流域内部和流域之间实现碳排放交易的指导原则,并最终实现从减碳到零碳排放。因此,“碳中和”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新时代的新发展机遇,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其政策约束是刚性的,实际执行也会付出很大代价。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57%左右,其作为中国能源的兜底地位和保障作用还将会存在较长时期。简单地说,这个“煤袋子”必须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上,能源才是安全的。中国煤炭资源“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特点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呈逆向的分布特征,在历史上形成了著名的“西煤东运、北煤南调”格局。随着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等老煤矿区资源的渐趋枯竭,山西、陕西、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煤炭产量比重不断提高。同时,中西部地区很多煤炭转化项目产品为化工原料,仍需运到东部地区加工成制成品再转运回来以供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如汽车和飞机零部件等。数字经济为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联动提供了巨大的基础条件,关键是要做好让各参与方通过这种跨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实现要素聚合、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因此,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要紧密结合中西部地区的航空航天、汽车等制造业实际发展情况,突破煤炭产业边界,构建上下游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现以煤炭资源上下游产业链聚合,打造相互连接的产业体系,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各要素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产业集群,构建煤炭全产业链、全要素协同发展新格局。

当然,减少碳排放,本质上还是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随着风电、光伏等发电成本的下降,其市场竞争力也在不断提高,要进一步推动风光电建设,充分发挥西北地区、华北地区等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干旱少雨风大、长江流域的风多雨急、华南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暴风骤雨等特点,促进风光电的大中小、分散与集中、内陆与海上开发相结合,加大东中西部地区协同与南北方地区统筹发展,建立保障性的风光电消纳市场需求,扩大风光电输送和消纳区域,提高风光电利用率。鼓励资源

使用企业充分利用荒山、沙漠地区植树造林,增加森林碳汇规模。建立健全碳交易市场化机制,确定各方都能接受的碳排放配额和交易规则,构建合理有效、合作竞争、共享共赢、东西联动、南北统筹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形成区域协同、能源互补、空间均衡的零碳经济新格局,为力争按期完成“碳达峰”与“碳中和”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五、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导向打造区域增长极

由威廉·配第提出的增长极经弗朗西斯·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而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增长极理论,主要是指产业集聚在某一空间并给该空间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的现象。根据弗朗西斯·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沿海港口、主要城市、交通要道、资源富集地等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首先出现经济增长,这些就是经济空间的中心,即增长极。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扩散效应等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带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不仅在其欠发达地区实施增长极计划,而且也在发达地区实施增长极计划,如美国的硅谷。硅谷是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产业基地,其成功既得益于以创新实用为导向的大学文化,也得益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推动。除一般性的法律规制和面向中小企业的支持外,政府的特殊作用集中体现在政府采购、支持研发和制定明确的产业发展计划。联邦政府通过军事订单扶持硅谷的发展。在硅谷发展的初期,其订单有四分之一来自政府;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的军事订单达到硅谷产品销售额的40%;20世纪60年代,在集成电路开始发展的时期,美国政府购买集成电路产品的数量一直占硅谷企业全部产量的37%—44%。联邦政府在加利福尼亚州设置了70多家联邦实验室和研究发展中心,直接提供的资金占加利福尼亚州研究资金的60%。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层面有明确的科技政策和扶持微电子产业发展的计划,对州立大学在有关微电子业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活动提供公共资金。印度班加罗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印度积极发展软件产业的政策。1986年,印度政府提出把软件作为战略性产业来发展,在班加罗尔建立软件技术园。为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还鼓励外国企业持有软件企业75%—100%

的股份并给予税收优惠。这些优惠的投资政策促使许多外国公司将印度作为设计、生产软件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微软公司就在印度的海得拉巴建立了软件研究和开发基地,这是微软在海外兴建的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软件发展基地。日本在促进北海道发展时也曾使用过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发现有些国家的增长极战略实施效果比较好,而有些国家的增长极战略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巴西通过迁都巴西利亚,有效地带动了巴西中部地区的发展;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开发也比较成功。但也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如意大利对南部重点地区的扶持,法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分散巴黎的功能,在巴黎周边地区规划的反磁力中心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不再全面采用增长极战略,而采取针对具体问题在重点地区实施扶持增长极发展的策略。世界各国采取增长极战略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包括支持经济增长停滞地区的发展、促进经济活动的分散化、改善国家的城市体系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部分区域面临着较多的发展问题。早期的制造业中心由于交通区位的变化出现了衰落,原来的矿业城市或区域由于资源枯竭而缺乏发展后劲,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锈带”地区。

从国际上的实践来看,增长极的另一个大的应用就是促进活动分散。为构造一个良好的空间经济结构,增长极被用来建立大都市的反磁力中心,如卫星城,也就是通过建设一个“规划的”增长极,使其具有一定的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规模,从而达到分散大都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目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城市发展得比较快,但中等规模的城市发展得比较慢,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和中小城市直接流向大城市,既给大城市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发展动力。通过规划和其他政策的引导,人口、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集中到有一定规模的增长极中,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从增长极的发展历史与经验可以看出,政府积极有为是增长极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政府还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保证所有参与的市场主体的有序竞争。而做到有序竞争,首先要保证微观领域要素流动的畅通、微观利益主体(企业)之间合作

竞争而非恶性冲突,其关键在于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或者区域政策来引导与规范。因此,不仅要充分调动并积极引导地方和企业参与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还要规范地方政府执行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的行为。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政府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也是无法替代的。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在不同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丰富实践,准确把握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域观特质,才能解开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之谜,解释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性,为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铺设学理之路。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所形成的秩序体系,不仅增强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还提升了其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作为有中央集权历史又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秩序、稳定与安全一直是中国政策取向最突出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将打造最安全和最畅通的经济秩序,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中国不仅具有观念上的政策目标安全取向,而且有条件成为最安全的国家。高水平的安全环境可以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最基础性的条件,让经济运行更畅通,使内在活力得以充分释放,从而实现更合意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2020年5月,国家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体现了战略价值取向的变化,也体现了规则博弈的纵深化表现。其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态势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比较封闭,基本上是内循环体系,进出口比重很低,国际资本很少。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开始发展国际大循环,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外资和技术,进出口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都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在2006年前后已经开始出现。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也都实行较自

由的市场经济。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市场经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具有增长的无限性。世界各国由市场经济主导,无限地追求交换价值,其逻辑结果和现实表现就必然是市场经济具有扩展至全球的内在冲动。那么,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然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发展,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增长。国内国际双循环既然是一个趋势性事实,那重点就应该在新发展格局上。经济学最关心的是效率,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可以提高效率。另一个关切点是公平。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公平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不确定性、风险性等,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大多归结到效率。

当强调新发展格局时,实际上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变化。这是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的假定,即没有安全就没有市场经济。这虽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瞬间凸显甚至超过了效率与公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宁可牺牲效率与公平,也要保证安全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安全成为经济思维和战略取向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使我们看到,国内的规则空间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比国际的规则空间更可控和更好一些。所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保证更大程度的安全。这也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都会考虑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环节控制在自己手上。这是考虑到产业供求关系的安全性,希望能够在国内构建更加安全和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国际循环。相反,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所有的环节都有必要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才是安全可靠的。文化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经济也是非匀质的,各国经济更是非同构的。随着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首先崛起,导致曾经由英国和美国主导的发展逻辑已经不再适用,已经西方化很多年的全球规则必须面对不同国家,面对适应新的规则要求以及规则空间的衔接问题,这才是新发展格局。因此,各国之间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既要承认制度规则的域观特性,又要实现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这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的艰难历程。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进入了以城市群为主

导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因此,要积极引导各地城市空间布局,特别是要注意城市与城市群产业合理布局与升级,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积极促进低端要素向周边地区或其他地区转移,加快吸引高端要素集聚;强化优势产业部门,通过不断向外输出来拓展市场容量;构建合理有序的增长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加快在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培育一批支撑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有新发展动能的增长极、增长带与增长轴,推动形成全国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建设不同层级的增长极,一方面,积极发挥原有城市群的增长极作用,按照市场规律与机制对各级、各类城市群增长极进行整合建设,形成整体结构合理、聚集功能与带动功能良好的国家增长极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增长极之间的彼此关联协调,加快形成点、线、面、网的发展格局,发挥先进生产力在行业与空间上的聚集—扩散—带动作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导向下,统筹协调全国各级、各类区域,实现安全稳定、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金碚.继往开来的西部大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旷世之举[J].区域经济评论,2020(5).
- [2]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
- [3]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修订版)[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 [4]陈晓东.从域观经济学范式认识中国奇迹[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1).
- [5]陈晓东,杨晓霞.数字经济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吗?——基于1987—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面板数据[J].南京社会科学,2021(2).
- [6]陈晓东.深化东北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改革的六大着力点[J].经济纵横,2018(5).
- [7]陈栋生.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嘉兴学院学报,2005(1).
- [8]刘云中.发展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国际经验[J].发展研究,2011(7).
- [9]张可云.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内容与创新方向[J].区域经济评论,2019(1).
- [10]金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开启中国经济新征程[J].区域经济评论,2021(1).
- [11]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en Xiaodong

Abstract: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y and its policies have undergone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o coordinated security,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tter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pecially after COVID-19 epidemic in 2020,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makes the security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tak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roughout, take higher quality, more coordination and more security a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s the goal, coordinat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East, the West and the East,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smooth flow of factors. In order to achieve carbon target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as the core, we should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that fully takes care of the development interests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basin and between the river basins, and create regional growth poles at different levels.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 new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prominent function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people's sharing will be formed.

Key Word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verall Development;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New Pattern

(责任编辑:张 子)

【区域协调发展】

“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思考^{*}

成 长 春 刘 峻 源 殷 洁

摘 要: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的引领下,在环境改善、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经济稳健发展、思想意识改变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体现在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大、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仍需优化、中心城市间分工不尽合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而协调性均衡是解决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重要指导原则。解决上述问题,基于协调性均衡发展理论,“十四五”时期需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通过提出协同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新思路,畅通双循环主动脉,助推双循环、协调发展新路径,贯彻系统思维,提升流域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使长江经济带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双循环建设,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49-05 **收稿日期:**2021-0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研究”(17JZD024)。

作者简介:成长春,男,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通 226019)。

刘峻源,男,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通 226019)。

殷洁,女,南通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南通 226019)。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具综合优势与发展潜力的资源带、产业带、经济带之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长江经济带面临的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之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

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本文围绕新时期我国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和战略谋划,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为引领,以区域协调性均衡发展理论为支撑,旨在为着力破解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建言献策,以促进双循环建设,实现长江经济带全面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一、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内涵

目前,长江经济带正经历着“低水平均衡→非均衡→高水平均衡”的“倒U型”动态过程,在均衡与非均衡、协调与不协调矛盾中不断螺旋上升(CHENG & YANG, 2020; 成长春, 2015)。国内区域发展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是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空间上的投影,既有时代的共性,也有区域的个性。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型经济地域,其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状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长江沿岸省市传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岸线粗放利用仍然突出,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导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二是长江经济带跨行政区务虚合作较多,流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重复建设、无序竞争仍然存在。

协调性均衡理论是解决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重要指导原则。所谓协调性均衡发展,是指以推动区域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节作用,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同时推动各地区经济、人口、生态三者关系协调与空间均衡,最终形成各地区公共服务大体均等、生活条件与水平大体均等、经济和人口分布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的状态(CHENG & YANG, 2020; 成长春, 2015; 孟越男、徐长乐, 2020)。随着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的改变,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应当从注重“均衡、非均衡”研究转向注重“协调、不协调”研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正在成为新时代我国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和政策工具。协调性均衡发展理论基于上述认知,把“协调发展”与“均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科学揭示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平衡、不协调状态的症结,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成就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5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1. 生态环境改善明显,流域水质提升显著

着力推进生态治理、绿色发展,全面整治长江岸线,关停沿江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城镇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比2015年提高60.7%。长江流域优良断面比例从2016年的82.3%

提高到2020年的96.3%。长江流域劣Ⅴ类水质比例由2016年的3.5%下降至2019年的0.6%,2020年首次实现消除劣Ⅴ类水体^①。

2. 综合运输通道加速建成

沿江高铁规划建设有序推进,一批枢纽机场项目加快实施。截至2020年11月,长江经济带铁路通车里程达4.37万千米、高铁通车里程达1.54万千米,分别比2015年增加9120千米、7824千米;高速公路里程达到6.37万千米,比2015年增加1.55万千米。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功能也持续提升,长江干支线高等级航道里程达上万千米^②。

3.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

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015年的42.3%提高到2019年的46.5%。新兴产业集群带动作用明显,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程度更高,2019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③。

4. 各级领导思想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和有关部门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实践。

5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在上述方面均有突破,但由于所处区位、发展背景等的差异,不同流域、不同省市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这种不平衡是趋于下一阶段平衡发展的必经阶段,在长期战略中既矛盾又统一,即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

三、长江经济带不平衡不协调的现实问题

长江经济带实现了调整中的趋衡发展,并正在迈向高水平、高效率、共生性的协调性均衡发展新阶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经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非均衡、不协调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矛盾,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态资源利用缺少系统性严格管理,全域环境压力大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长江经济带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节能降耗和提

升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2019年,长江经济带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继续下降,各省市单位GDP用电量均保持下降,总体上,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但区域差异较大(尚勇敏、海骏娇,2020)。此外,水土流失、生物资源量急剧下降、局部环境质量问题突出、灾害频发的状况仍需进一步严防严控,工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对自然承载能力和环境生态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性和系统性依然不足。

2.多种运输方式分布不均,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发展不协调

以长江流域港口为核心的现代联运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特别是上中游地区,铁路枢纽集疏运能力没有明显提高。公路枢纽基本上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枢纽,各种运输方式缺乏有效衔接,综合交通的整体效率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长江航运潜能尚未充分发挥,高等级航道比重不高,中上游航道梗阻问题突出,高效集疏运体系尚未形成。

3.经济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尚待进一步优化

长江经济带下游已整体迈入工业化高级阶段,中上游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流域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三次产业构成提升至6.9:41.3:51.8,但农业与非农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值占比差距亦在持续扩大之中。从整体看,流域内产业地域组织结构松散,省际、区际产业发展各自为政,关联度、产能合作程度低。

4.城市群融合、协作不足,不同流段城市定位模糊

长江经济带“三大两小”城市群中,一些城市功能定位模糊不清,致使城市自身优势和城市群整体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三大流段之间城市发育程度差距明显,城市化水平各异。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间分工不合理,区域内中心城区能级偏低,“小马拉大车”现象严重。

5.整体意识不强,相关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长江经济带缺乏综合性的国家管理机构与系统性的政策支撑,综合发展规划覆盖不全,同一地区规划之间缺乏衔接。单一部门、单一要素的管理方式依然主导,条块的分割和交叉比较严重,区域与部门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地区间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

四、推动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协调性均衡推动长江经济带走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前列,迫切需要加快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新旧动能转换,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优化顶层设计,强化流域治理。按照“打造区域协调的样板的目标要求”,遵循协调是均衡与非均衡的统一原则,要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整合,促进上中下游、江河湖海、左右岸干支流协同发展,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守好、用好流域生态本底,协同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一是统筹推进流域自然资源开发。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文件精神为契机,汇总、整合各省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构建全流域自然资源监管体系,统一界定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及配套委托代理制度,破解分割治理、多头治理难题;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严格管控限制开发区域的开发强度,提升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资源环境、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相协调的空间格局,促进大流域协调性均衡发展;在共抓大保护理念指引下,深入研究长江文化,推动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创新利用。

二是创新流域生态共治共享制度。积极探索流域内生态屏障生态贡献货币化机制、重要农产品补偿机制、重要资源利益补偿机制,加快推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和绿色发展示范经验,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步伐,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示范带;加快推广武汉碳交易中心和碳金融中心平台建设经验,推动跨省节水量、排污权等交易平台对接,统筹中央、地方、民间资金,成立流域绿色发展银行,为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产业绿色转型等提供资金保障;加强国际基础设施、重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企业“走出去”,服务产业园区建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筑基“双循环”发展格局。

三是推进流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体制机制。全流域统一防治标准,全面落实沿江城镇污水垃圾、化工污染、船舶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尾矿库治理全覆盖;强化干支联动、上下游联动、水岸联动保护机制,全面落实流域绿化行动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全面落实干支岸线保护和修复,全面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实现保护与修复全流域覆盖;强化长江水系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建立、健全跨省市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切实推进资源和信息共享;全面整治“化工围江”、岸线乱占问题,加快扭转沿江生态环境严峻形势。

2. 统筹综合交通一体化建设,畅通双循环主动脉

统筹长江黄金水道软硬件建设,提升港航运营管理水平。围绕“3+1”航运中心和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加快推进长江中游“645”航道疏浚工程、南京以下深水航道水深维护、三峡集疏运能力提升工程,继续优化长江航运“硬环境”;以提升长江航运、水利、生态综合效益为目标,整合沿江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提升航道运营管理水平,推动上中下游港航一体化,持续优化长江航运的“软环境”。

以强枢纽、织网络为抓手,提档升级长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提升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立体化发展水平,实现各交通方式无缝对接;加快推进北沿江高速铁路和普通货运铁路建设;加快国际性航空枢纽建设,强化区域航空枢纽功能,完善干支航线网络,依托高铁网络,建设“轨道上的机场”,提高流域东中西部主要城市间航班密度,增加国际运输航线;统筹油气运输通道和储备系统建设,合理布局沿江管网设施,加强长江三角洲向内陆地区、沿江地区向腹地辐射的原油和成品油输送管道建设;推进南北跨江通道、海陆江通道建设,推进跨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交通网密度和便捷度,打造功能互补、衔接顺畅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集装箱新出海口,切实加强双循环建设。

3. 推动城市群融合、产业园区共建,找准定位、协调发展

各城市群、中心城市明确定位,推进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一是放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交通设施跨省联通、功能对接,推动各城市就近对接、集群发展。二是上

海、武汉、重庆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和商务区域物流航运中心找准定位,加快推进开放门户、全球城市建设;持续推进上海自贸区经验推广与空间扩容,强化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全球创新城市等功能,继续疏解非核心功能,推动上海大都市圈联动发展,协同建设全球城市,引领东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昆明对接、辐射南亚、东南亚的能力;推动成都、重庆中欧班列、航空枢纽联合运营,协同打造我国中西部面向全球的航空门户枢纽、陆港物流枢纽,提升辐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能力,协同打造西部国际开放门户;提升武汉中部门户枢纽功能,引领中部更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筑国内国际双循环。

推进创新引领、绿色高效的新型工业化,以产业园跨省市共建、平台联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各省市应加快推广“飞地经济”经验、苏州工业园区跨省共建经验,打破省内外的“行政区经济”,打通要素流通或明或暗的边界,通过产品输出方式或通过产业转移方式进行产能移位,实现流域内产业园区间、平台载体间的跨省市对接,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成效;流域协调治理协调机构应强化产业链规划,以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为抓手,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龙头企业为支撑,加快整合长三角、中三角、成渝产业链条,实现由单项产业技术创新向全产业链创新转变,在流域内逐步形成创新链、服务链、资金链、孵化链、产业链、价值链“六链联动、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实现流域内产业有序转移、产业链对接,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新经济体。

4. 树立系统融合思维,提升流域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强力推进《长江保护法》贯彻落实。整合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等中央部委派出机构的相关职能,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治理常态化,强化流域整体规划功能。以“放管服”改革、自贸区建设及复制自贸区试点经验为契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解决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落实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大通关改革为契机,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通关协作,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推进流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完善政府间对接协调机制,构建多层次、专门化的对话机制,增强区域合作的长效性、互利性和制度性。二是健全跨域规划职能对接,积极推进流域内或相邻省份合编发展规划,加强规划数据平台对接,加快实现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三规协调”。三是完善长江经济带省际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资金长效投入机制和流域治理成效评估机制,保障流域上下游发展权利的相对均衡性。四是加大行政执法职能对接力度,加强联合监管。建立联合执法体制机制,统一执法标准和流程,协同完成执法监管职责。五是建立跨域利益共享机制,对流域内跨省市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科技成果转化、招商引资异地落户等项目实施地区间财税分成。

注释

①赵展慧: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日报》2021年1月6日。

参考文献

- [1]Cheng Changchun, Yang Fenghua. Toward A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M].Singapore:Springer, 2020.
- [2]成长春.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战略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 [3]赵超.韩正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任务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0-12-02.
- [4]孟越男,徐长乐.区域协调性均衡发展理论的指标体系构建[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 [5]尚勇敏,海骏娇.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报告(2019—2020)[EB/OL].(2020-12-23). <https://cyrdebr.sass.org.cn/2020/1223/c5775a100923/page.htm>.
- [6]田豆豆,孙秀艳,范昊天,等.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N].人民日报,2020-11-17.
- [7]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17).

Thinking 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eng Changchun Liu Junyuan Yin Ji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focusing on great protection instead of great developmen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made stage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stea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deological change. However,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and un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still prominent,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the pressur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need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unreasonabl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central cities,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 coordinated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iver basin.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we need to strive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y proposing new ideas of synergistically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unblocking the dual circulation aorta,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ity clusters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arrying out systematic thinking,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watershed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o mak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circulation,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be promoted, and mak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ecome a new highland lead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oordinated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贺灿飞 王文宇 朱晟君

摘要:世界秩序重构、技术革命驱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变化莫测,影响到中国原有外向型发展模式。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针对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空间布局问题,应将不同尺度价值链与产业空间相结合,构建新时期中国产业空间优化策略——“全球—地区—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的价值链体系。其中,四大城市群是实现“双循环”相互反哺和有效对接的关键节点:其内部根据垂直价值链和水平知识链构建创新产业地域综合体,其他城市群根据功能定位予以辅助,形成多元、互补的国内循环体系;四大核心城市群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构建吸收知识、技术的“全球通道”,并参与全球竞争,边疆城市群融入地区价值链,获取战略性资源,形成国际循环体系。

关键词:双循环;产业空间布局;价值链;城市群;知识链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54-10 **收稿日期:**2021-05-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Foundation: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731278]。

作者简介:贺灿飞,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王文宇,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1)。

朱晟君,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北京 100871)。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显著提高。近年来,世界秩序重构,技术革命驱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变化莫测,影响到中国原有外向型发展模式。在这一特殊发展时期,中国产业发展不仅需要“三期叠加”压力之下实现平稳过渡,还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做出重大调整。以现在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规模,要继续在全球产业体系中攀登,必须靠创新驱动来实现转型升级,在产业链上不断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扎扎实实实

现经济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念提出后受到专家学者广泛关注,对于新发展格局的发展预判方面,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刘鹤(2021)指出双循环的核心要求是为解决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突破“卡脖子”问题和核心科技,强调内循环为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并通过强化合作开放来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李国杰(2020)从技术创新角度,认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发展上游产业和基础产业,培育可控的技术生态系统,从而形成中国自身的技术体系。黄奇帆(2020)从政策工具角度出发,认为需要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如新基建、数字赋能、培养增

长极等,并以加快自贸区发展、价低关税、提升国际营商环境等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林毅夫(2021)从国际产业比较优势角度,认为在结构性改革下可以继续挖掘发展潜力,传统制造业的“长板”仍然具有增长潜力,而新产业具备东亚经济体追赶阶段的超车换道优势。姚洋(2020)认为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创新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可以用结构调整来挖掘内需,保持适度储蓄来保障创新和技术研发。

现有文献对国家尺度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对于中国未来新发展格局的空间格局研究仍然不够清晰,尤其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不够。在地区尺度上,周绍东和陈艺丹(2021)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应该从空间产业分工出发,构建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地理路径,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供需对接路线有四个,分别是“一带一路”两条主干线和东北亚、亚非“海陆联动”大循环路线。金凤君和姚作林(2021)提倡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网络。实际上,地区尺度的分工合作即构建地区价值链,但是上述分析都没有说明国内各区域如何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部分学者从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围绕着核心城市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是促进国内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张可云等,2021;王玉海和王鹏飞,2021;张倩肖和李佳霖,2021)。双循环需要重新调整中国原有产业空间和生产力布局格局,而现有研究并没有涉及此类话题。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高技术产业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升(胡鞍钢和任皓,2016),而现有研究并不能回答不同技术和生产环节的产业在空间上如何分工。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体系构建过程中,本文认为价值链是构建双循环的核心。价值链是链接双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要求在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同时,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球化和区域差异化背景极大程度重塑了中国的产业空间(He et al., 2008),而不同尺度的因素也通过互动改变着中国产业空间重组和产业转移(Zhu and He, 2014)。中

国广阔的国土空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优势,将不同尺度的价值链与中国地理空间相结合,可发挥中国地理腹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中国目前产业空间整体布局存在若干问题:人口、资源、经济集聚在空间上存在错配;国家价值链短,区域间分工不清晰,联系不紧密;产业集而不群,相互联系弱,韧性不足;发达区域“向外看”重于“向内看”,没有很好地承担国家价值链“链主”的责任。为应对产业空间布局问题,塑造新发展格局,本文将不同尺度价值链与产业空间相结合,提出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空间优化策略——“全球—地区—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的价值链体系。

一、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三大方面的挑战。

1. 外部环境动荡,全球经济深陷“长期性停滞”格局,外向型经济主导的产业布局需要调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出现持续性下滑。尽管在各国大规模扩张性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全球经济曾经出现短期反弹,但随着刺激性政策效果的逐渐递减,经济增速再次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速下降还引发了日益严峻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典型代表如美国退出多边国际机构、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贸易战等,由此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性停滞”,这背后反映出传统以提升广度、扩大规模为主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正面临着极限约束。截至2019年底,WTO的成员已达164个,基本囊括了全球主要的大型经济体。当前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逼近零下限,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边界的空间已极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之后,全球关税水平已经显著降低。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已经从1994年的8.6%下降至2017年的2.6%,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更是从1994年的8.7%下降到2017年的2.1%。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商品贸易而言,未来的贸易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而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由于带有更强的“境内开放”属性,比商品贸易市场的开放更加艰难。因此,从整体来看,进一步通过贸易自由化政策来释放全球化的红利将变得愈

发困难。

从中国角度出发,中国经济发展对外依赖逐渐下降,经济发展更大程度依赖以消费为主的内需挖掘。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赖程度不断下降。顾佰和等(2021)对中国经济内循环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内循环程度由74.4%逐步上升,到2015年提升至83%。2006年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高值65.17%。此后,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并在2013年之后长期保持在35%左右。2013年以来,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持续走低,最终消费支出对于中国经济贡献程度位于三大需求之首,由此看出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此背景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激发国内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有效平衡和降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影响。然而,中国原有产业空间布局主要注重外部循环的挖掘,对内部市场和供应链条关注有限,导致出现“沿海强、内陆弱”的产业发展格局。未来要挖掘中国地理腹地优势,补齐国内循环的短板。

2. 中国产业受到全球双面夹击,科技创新受到外部环境挤压,创新产业布局破碎化影响全球竞争力

未来中国产业全球化发展不仅要在高端制造业领域面临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还要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面对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发展的压力。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中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化强国都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以及新材料等作为未来进一步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的重点领域,而这些产业与中国重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高度重合。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的不断升级、自主创新能力与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不断动员欧洲盟国支持其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链采取全方位的市场封堵措施,试图以此压制中国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进程,并由此阻滞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

进而消除中国在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对美国全球霸权构成的威胁。因此,未来中国高端制造业势必将面临其他制造业强国的激烈竞争。

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当前中国产值能耗水平较高。根据《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3.7吨标准煤/万美元,是2015年世界能耗强度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1倍,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2.4倍,德国的2.7倍,英国的3.9倍。另外,以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将发展纺织服装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和电子产品零部件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进一步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的重点发展领域。这些产业大都是当前中国在全球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升,中国在相关产业拥有的比较优势会逐步缩小,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压力则会随之增加。

3. 科技进步和外部趋势改变区域空间关系,区域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发展将进一步加快

由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和高铁等交通技术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社会巨变,信息、技术、资本和人才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城市通过交通系统形成的物理联系和通信网络系统形成的虚拟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物、资金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紧密连接在一起。城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功能通过复杂多样的动态“流”来体现。科技进步同时,全球经济活动区域化特征逐渐凸显,基于单一国家形成的区域价值链格局已基本形成。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2000到2017年,基于价值链贸易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正逐渐由多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格局转变为以中、美、德三国为中心国家的区域价值链格局。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缓解全球性冲击对本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提升本国产业体系韧性,通过国家内部产业分工形成的国家价值链开始成为各国产业布局的重点工作。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和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旨在分别从吸引中低端制造业回流,夯

实制造业基础和构建国家先进制造业创新网络,增强美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两方面重构国家价值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预测,2020年新型肺炎疫情对于全球贸易水平的冲击或将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因此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或普遍下降,全球价值链将进一步缩短,各国产业向区域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布局的速度将加快。在此环境下,中国产业区域价值链的构建过程或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而建立国家价值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由此提升。因此,要充分考虑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大量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转移对中国未来产业空间格局的重塑。“流空间”既对我们现有的发展策略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我们打造新型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有利于我们构建“全球—地区—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的价值链体系。恰恰是新技术的兴起和“流空间”的日益重要,为我们构建上述体系提供了支撑。因此,应当因势利导,大力推动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以有效促进不同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之间的联通。最终目标则是利用“流空间”构建“全球—地区—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的价值链。

二、中国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产业布局存在以下三大方面的问题。

1. 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空间错配

产业布局中的空间错配指产业生产过程相互紧密关联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供需不匹配。空间错配问题的出现导致在一些地区产业生产资源过度冗余而造成浪费,而在另一些地区产业生产资源供不应求而效率低下。具体来看,当前中国产业布局存在三种空间错配现象。

人口资源与经济集聚空间错配:具体表现为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低于经济的空间集聚程度,地区人力资源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与当地产业发展需求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进而导致地区产业的实际产出严重偏离人口资源最优配置状态下的最优产出。

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错配:具体表现为一些地区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消耗强度超过了所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该地区出现资

源过度开发 and 环境污染的情况。而在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的地区,则因为相关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导致本地生产资源未能充分开发。

土地与集聚经济空间错配:具体表现为一些内陆地区大量新建工业园区和产业新城,但缺乏足够数量的企业入驻使得新建园区内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甚至出现“鬼城”或“空城”。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用地供给不断收紧,导致大量企业的用地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2.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不高,产业集而不群

近年来,在集约化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产业集群的集聚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水平的提升却未带来预期的规模效应,暴露出当前中国产业集群存在的新问题——集而不群。以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例,2014—2018年,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水平不断提升,集群内平均企业数量从180多家上升到200多家。但是集群空间集聚水平的提升却导致产业集群内部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但在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水平增加的同时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出口额和授权专利数却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由此看出集而不群已经从生产效率、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降低了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水平。

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集而不群问题存在的原因在于,各地在建立产业集群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用地效率的提升,而忽略了对于产业集群内部知识链的建设。对知识链构建的忽视使得产业集群内部所集聚的企业间在创新、研发、生产过程中缺乏互动联系基础和共享信息平台,即空间距离的邻近并没有促使企业间知识交流与生产互动更为便利和有效。产业集群内部相互邻近的企业却依旧单打独斗,导致规模效应难以形成。

3. 地方竞争影响区域协同发展和国内循环

地方竞争即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而在税收、土地等方面开展的空间竞争。长期以来,地方竞争被认为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为地方竞争机制的引入显著提升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有效调动了各地内部资源。但是,现阶段地方竞争机制引导下的地方发展战略不再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诉求,因为地方竞争所形成的过度竞争和国内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协同格局的形成。

地方竞争会导致同级政府间出现过度竞争,降低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在地方竞争的作用下,各地会通过重点产业政策优先扶持本地优势产业发展,为争取得到重点产业政策扶持及其配套的产业基金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支持,各地辖区内的下级政府间会争相布局发展优势产业,从而降低各地的产业资源配置。受此影响,各地因难以得到充足的资源发挥本地比较优势,使得各区域空间节点无法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地方竞争所形成的国内制度壁垒会增加生产要素空间转移成本,降低生产要素空间转移效率,阻碍国家循环有效运转。在地方竞争的影响下,各地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出现以邻为壑的现象,从而增加生产要素在不同辖区间的转移成本,生产要素在国内各地间的低效转移会从根本上降低国内循环的运作效率。

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布局的新思路

应以综合区域发展定位为基础,以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建构城市群,形成多中心链条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多中心链条化空间发展格局的建立,可以实现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区域分工,从而提升资源在空间上配置效率与促进城市职能在空间有机组合。结合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多中心链条化的空间发展格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大都市区(大都市圈或大都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最为合理的空间结构,并被世界主要大都市区发展所倡导,例如伦敦大都市圈、巴黎大都市圈、日本首都圈等。

目前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四大核心城市群为顶点、相邻区域的连线为通道合围成的菱形结构。现有发展规划已经对四大核心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分工和协调进行了大量的指导和讨论。在未来,高铁网络的逐渐完善,5G等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在更大空间尺度范围内实现区域分工提供了可能。所以应该进一步探索研究四大核心城市群与周边地区,四大核心城市群之间,四大核心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之间如何实现分工,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协调发展。

最终目标是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想,在四个地理尺度上形成价值链战略思维。国内循环给中国四大城市群提供了进入高端环节担任“链主”

的机会和平台。一方面,通过国际循环,从全球获取产业发展所需的国家先进知识、市场、技术、能源和原材料,助力本国内部各城市群的升级。另一方面,后者可以在国内循环中获得从事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经验,进而在国际循环中更好地竞争和实现价值链升级。因此,通过构建“全球—区域—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价值链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反哺将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关系。

1. 积极推进国内循环,构建国家价值链和城市群内部的价值链和知识链

在城市群尺度,基于城市群内部的垂直价值链和水平知识链构建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在四大核心城市群内,将核心城市打造成创新中心、研发中心、金融中心,聚焦先进制造上游和科技研发等,致力于实现从0到1的突破和攻克“卡脖子”技术。中国未来需要重视和建立有竞争力的基础性技术创新(詹剑锋,2019),同时要重视企业家在创新转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Guo et al.,2016),这一过程只能在核心城市群实现。城市群其他城市则着力搭建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聚焦先进制造的中下游,以就近将核心城市的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保证制造端和研发端的地理邻近及有效交流,进而在每一个城市群内部形成研发和先进制造有机互动的垂直价值链分工。该地域综合体一定是国家价值链的领导者和治理者,也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接口;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应该具有若干先进产业知识体系基础上的技术体系,进而演化成相关多样化的产业体系,打造基于垂直价值链和水平知识链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

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力求发展不同但是知识本底相互关联的行业,形成多样化但是相关产业的水平知识链。城市群内部,知识相关、相近且多样化产业结构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衍生出新的产业(Howell et al.,2016;He et al.,2015;He et al.,2017),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创新活力。先进制造业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本质特点是不同先进制造业之间在技术、知识、资源等方面的紧密关联,因此需要在城市群内部着力发展一系列知识本底相似的不同行业,城市群也可以基于其知识本底向外逐渐衍生出新行业。水平知识链的搭建一方面促进了

城市群内部不同行业间的知识联通和协同发展(Zhou et al., 2019);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群可以基于其知识本底发展不同行业并在不同行业间转产,也极大增强了城市群整体抵抗外部冲击的韧性。垂直价值链保证了知识在研发端和制造端的流动,水平知识链推动了知识在不同但相关联行业之间的流动,双链叠加形成了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其他区域型城市群则采用相似方法基于传统制造业和少量先进制造形成小规模的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

在国家尺度,打造不同区域协同发展的国家价值链:通过高铁和航空等网络实现城市群之间、城市群与其他非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联通。一方面,四大核心城市群内部突出多元、相关和互补的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形成核心城市注重创新和研发、其他城市专注于先进制造的分工结构。而具有相同内部分工结构的不同城市群之间则既有交流,也有竞争。通过推动不同城市群之间高端知识、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有效流动,进而实现不同城市群之间,尤其是核心城市之间的知识溢出、相互学习、乃至良性竞争,最终会给每个城市群更强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区域型的城市群保持和四大核心城市群的联系,主动承接从四大核心城市群转移出去的传统制造业以及少量先进制造业的中下游,形成专业化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以及联通四大核心城市群和区域城市群的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

首先,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将不同区域串联起来,形成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清晰分工和紧密联系,进而纠正资源的空间错配和实现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其次,目前基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形成的产业发展模式下,很多区域“向外看”重于“向内看”。未来需要通过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形成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清晰分工和紧密联系,进而延长国家价值链。最后,现在很多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存在“集而不群”的问题,产业只是地理集中而并无紧密的合作联系,更没有产生有效的集聚效应。传统产业群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城市群内部忽视了水平知识链的打造,没有基于一个核心的知识本底打造一系列相关联的行业。因此将城市群真正塑造成垂直价值链+水平知识链的创新型产业地域综合体体系。

2. 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构建全球和地区价值链

通过国际循环,国内需要从全球获取产业发展所需的国家先进知识、市场、技术、能源和原材料,助力本国内部各城市群的升级(Zhu et al., 2017)。因此,在全球尺度,四大核心城市群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取高端知识和技术,参与全球竞争:将中国尤其是中国四大核心城市群放置在全球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网络中,以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为目标,充分考量四大核心城市群如何参与全球竞争并在高端产业上走向世界领先地位,避免就中国论中国式的发展方式。四大城市群在国内循环中扮演着“链主”的角色,借此充分了解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内部的分工协作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学习,还可以有效促进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助力中国各区域尤其是四大核心城市群在全球尺度上的竞争和产业升级。

在地区尺度,构建跨国的地区价值链:鉴于当前全球环境的变幻莫测,中国还应当主导建设若干地区性价值链,如和东亚、东南亚、中亚地区等结成贸易和生产的联系,以缓冲全球价值链震荡带来的潜在冲击。应当从天山北坡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胶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发力,主动打通和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地区甚至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通,构建跨国的地区性价值链。一方面,天山北坡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胶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滇中城市群作为传统制造业生产基地,未来可以直接面向东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市场,也可以作为面向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中转站。中国各个城市群参与中亚和东南亚等相对落后地区组成的跨国价值链时,相对竞争力更强,更有机会进入价值链上游扮演“链主”,并借此主导这些地区的生产系统,更好地实现“走出去”。

另外,国际循环还可以为中国提供未来发展所需的巨量能源和原材料。但是,过度地依赖澳大利亚、沙特、巴西等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会使得中国的发展很容易受到全球化波动的影响,因此应当多样化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渠道。东北亚、中亚、东南亚等市场具有巨大能源和原材料储备,因此天山北坡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胶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滇中城市群还需要作为能源和原材料从外进入中国的门户、中转站甚至能源和原材料的深加工基地。多元化的地区价值链可以有效缓冲全球尺

度网络波动带来的冲击,还可以充分带动四大城市群之外区域城市群的发展。总之,中国未来的能源和产业原材料不仅应当通过全球网络实现,还应当着力构建地区价值链,在地区尺度实现能源和原材料的获取,形成全球和地区两个尺度的能源和原材料传输网络,以有效确保能源和原材料的安全性。

3.通过交通网、物流网、信息网等建设促进不同组团间要素流动和产业布局优化

随着互联网和交通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同区域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需要充分考虑“流空间”下的交互作用对中国不同区域发展的影响。大力推动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以有效促进不同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之间的联通。同时,也只有加强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才能有效降低区域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借助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间信息流、人才流、物质流、资本流畅通无阻。

总之,中国产业空间布局总体策略为构建“全球—地区—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的价值链。多层级价值链的构建让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获取参与各层级价值链分工带来的发展红利。同时各层级价值链间既相互嵌套又相互独立,在协同发展的同时又可以避免对单一层级价值链产生过度依赖,从而整体提升中国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

构建“全球—区域—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价值链的目的是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反哺。中国绝对不能因为全球化出现动荡就关闭国门,国际循环依然重要。应当坚持通过国际循环,从更大空间尺度范围内获取产业发展所需的国家先进知识、市场、技术、能源和原材料,助力本国内部各城市群的升级。目前,中国四大核心城市群和其他城市群在国际循环中仍然处在中低端位置,缺少从事高端环节的经验,而国内循环恰恰给它们提供了进入高端环节的机会和平台。各大城市群可以通过在国内循环中担任“链主”的经验,更好地参与国际循环,进而实现在国际尺度的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

构建“全球—区域—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价值链的关键是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效对接。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都市圈等四大城市群和其他区域性城市群建

设为国内国际循环的衔接枢纽。通过充分发挥城市群的集聚能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建立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各层级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提升城市群尤其是城市群核心城市对生产要素的控制和分配能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对接。

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构建“全球—地区—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的价值链来实现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与开放式的产业空间布局,支撑“两带四极”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国家价值链龙头,聚集科技研发、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发展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价值链和产业链,培育知识链集群和产业链集群,积极联系西部内陆开放带,推动价值链国内分工,统筹东中西产业协同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竞争。西部内陆开放带:首先要积极参与国家价值链,聚焦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发展少量相对独立的区域价值链,培育产业链集群,同时开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四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布局若干创新型产业综合体和国家制造业中心。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利用产业基础优势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价值链,联系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利用市场可达性优势加入国家价值链);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辨识国家制造业中心和创新性产业地域综合体。

4.基于“双循环”的产业布局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多层级价值链体系,首先,应当打破传统的东中西部的划分思路,形成以四大核心城市群+若干区域型城市群为基础的产业布局体系,通过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促进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之间的联通,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将不同区域串联起来,进而纠正资源的空间错配和实现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其次,目前基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形成的产业发展模式下,很多区域“向外看”重于“向内看”。未来需要通过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形成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清晰分工和紧密联系,进而延长国家价值链。最后,现在很多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存在“集而不群”的问题,产业只是地理集中而并无紧密的合作联系,更没有产生有效的集聚效应。传统产业集群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城市群内部忽视了水平知识链的

打造,没有基于一个核心的知识本底打造一系列相关联的行业。因此,将城市群真正塑造成垂直价值链+水平知识链的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

围绕双循环嵌套价值链体系的关键节点四大城市群,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且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意味着效率高、韧性强、转型能力强、创新性强。在城市群尺度,基于城市群内部的垂直价值链和水平知识链构建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专注于创新、研发和制造业上游,城市群其他城市则聚焦制造的中下游,在一个城市群内部形成研发和制造业互动的垂直价值链分工。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力求发展不同但是拥有相似知识本底的行业,形成多样化但是相关产业的水平知识链。垂直价值链和水平知识链的叠加形成了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该体系内部亦包含了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

在国家尺度,则打造独立完整的国家价值链,将价值链的不同片段放置在不同城市群,进而将不同城市群串联起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垂直价值链保证了知识在研发端和制造端的流动,水平知识链推动了知识在不同但相关联行业之间的流动,双链叠加形成了创新型地域产业综合体体系。在多层级价值链体系中,四大城市群成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中心,着力攻克“卡脖子”技术。而其他区域型城市群则成为专注于传统制造业以及少量先进制造业的国家级制造业中心。同时,为了保证国家价值链具有全球竞争力,四大核心城市群必须还要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承担起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连接节点,从外部吸收先进知识和技术,注入国家价值链,进而提升国家价值链的全球竞争力。

基于双循环产业布局方案,将生产布局的原材料、传统制造、先进制造、科技研发等各个环节在全国尺度实现空间统筹。科技研发和先进制造的上游作为最高端、知识最密集、科技要求最高的环节,必须集聚在少数中心,并且服务全国范围。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多层级价值链体系下,高端的科技研发和先进制造业的上游主要集中在四大核心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将其打造成创新中心、研发中心、金融中心,对内服务全国范围,对外链接全球价值链获取外部先进知识。四大城市群的其他城市着力搭建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聚焦先进制造的中下游,就近将核心城

市的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实现制造业和研发端的地理邻近及有效交流,进而在每一个城市群内部形成研发和先进制造有机互动的垂直价值链分工。

其他区域型的城市群保持和四大核心城市群的联系,主要负责从四大核心城市群转移出去的传统制造业以及少量先进制造业的中下游,形成服务特定区域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原材料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则主要布局在区域型的城市群,不仅服务当地市场,同时尽量就地获取原材料和能源。另外,一些边境区域型城市群如天山北坡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胶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可以建立和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地区甚至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紧密联系,扮演能源和原材料从外进入中国的门户、中转站甚至能源和原材料的深加工基地。

四、结论与展望

新发展格局将重塑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在全球价值链层面,四大城市群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区,承担起高端产业全球竞争的使命。四大城市群需要继续从国际市场获取产业发展所需的先进知识、市场和技术,助力本国内部各城市群的升级,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攀升。国内高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策略离不开国家价值链的支持。四大城市群应当在国内高端产业价值链中担任“链主”,协调全国各个区域,整合国内的资源和生产能力配合其发展,补齐国内高端产业的价值链,借此提升四大城市群在高端行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而更好地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升级。高端产业的高端环节需要继续在四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布局,充分利用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其他价值环节逐步转移到四大城市群中心城市都市圈内,使高端产业尽量在四大城市群内部完成,高端产业中标准化产品生产环节和低技术水平环节可以迁出四大城市群。

地区价值链层面,中国应主导建设若干地区性价值链,与周边地区结成贸易和生产的联系,以缓冲全球价值链震荡带来的潜在冲击。目前形成的地区价值链已经在劳动密集型等制造加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全球产业技术驱动转型的背景下,仅仅依靠原本的劳动力成

本优势等无法维持长期竞争力。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通过技术转型、人才引进和创新研发等手段积极引导和培育传统产业升级转型,这种升级转型既可以是原有产品的质量提升,也可以是研发新产品,扩大产业布局范围,发展多样化经济。另外,在现有重点发展城市群中,西部边疆城市群和东部沿海城市群拥有发展资源型布局的天然优势,有利于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资源和陆路运输、海运运输网络进行大宗货物运输。因此,可以考虑在滇中、哈长、天山北坡、辽中南、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布局资源性产业,尤其是矿产资源加工业,承担起中国对外资源输入门户的功能。

国家价值链层面,四大城市群应成为国家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聚焦高端行业和其他行业的研发、设计、生产者服务等,内陆地区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和可达性优势,聚焦一般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生产,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和移植科技资源。明确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分工,四大城市群从事高端行业和被“卡脖子”的重点行业,可以在产业间分工有所雷同,但城市群内部城市在价值环节进行分工。以这四大城市群为价值链支点,撬动其他区域型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四大城市群布局的国家产业链可以类似,区域城市群需要与四大城市群布局的产业有所区别,积极承接四大城市群溢出的产业,形成产业互补同时又有所竞争的发展格局。通过推动不同城市群之间高端知识、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有效流动,进而实现四大城市群之间的知识溢出、相互学习乃至良性竞争,推动四大城市群支持区域城市群的创新成果转化和扶植,最终给每个城市群更强的发展动力。

城市群内部层面,城市群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的“大脑”,推动城市群产业升级。在四大核心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打造成创新中心、研发中心、金融中心,聚焦先进制造业上游和科技研发等。城市群其他城市则着力搭建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聚焦先进制造的中下游,以就近将核心城市的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保证制造端和研发端的地理邻近及有效交流,进而在每一个城市群内部形成研发和先进制造有机互动的垂直价值链分工。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力求发展不同但是知识本底相互关联的行业,形成多样化但是相关产业的水平知识链。先进制造业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本质特点是不同先

进制造业之间在技术、知识、资源等方面的紧密关联,因此需要在城市群内部着力发展一系列知识本底相似的不同行业,城市群也可以基于其知识本底向外逐渐衍生出新行业。

综合全球价值链、地区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城市群内部和核心城市的产业空间分布和战略布局,得到基于双循环多层级嵌套价值链体系的全国产业空间总体布局分布。其中,长三角、成渝、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创新产业地域综合体,成为内循环的主要核心和外循环的主要接口。高端的科技研发和先进制造业的上游主要集中在四大核心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四大城市群对内服务全国范围,对外链接全球价值链获取外部先进知识。四大城市群中其他城市着力搭建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聚焦先进制造的中下游,配合四大城市群将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城市群,也承担部分国家制造业基地的功能。这部分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专注于创新、研发和制造业上游,城市群其他城市则聚焦先进制造的中下游,在一个城市群内部形成研发和制造业互动的垂直价值链分工。其他城市群作为传统产业城市群,需要能够充分利用地方优势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普遍布局在边疆城市群和内陆普通区域城市群中。其中,边疆城市群需要扮演能源和原材料从外进入中国的门户、中转站甚至能源和原材料的深加工基地。一些内陆区域型城市群如山东半岛、中原、关中、长株潭、长江中游城市群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的优势生产资源以及运输条件,建设地方特色的制造业生产基地。

参考文献

- [1]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
- [2]李国杰.经济内循环为主条件下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9).
- [3]黄奇帆.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J].企业观察家,2020(9).
- [4]林毅夫.双循环的深意与落实中的关键点[J].中国中小企业,2021(2).
- [5]姚洋.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秘书工作,2020(12).
- [6]周绍东,陈艺丹.新发展格局与需求侧改革:空间政治经

- 济学的解读[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 [7]金凤君,姚作林.新全球化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对策[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1).
- [8]张可云,肖金成,高国力,杨继瑞,张占仓,戴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21(1).
- [9]王玉海,张鹏飞.双循环新格局的实现与增长极的跃变——兼议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价值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21(1).
- [10]张倩肖,李佳霖.构建“双循环”区域发展新格局[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1).
- [11]胡鞍钢,任皓.中国高技术产业如何赶超美国[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12).
- [12]He C , Wei Y D , Xie X .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hina [J]. Regional Studies,2008,42(7).
- [13]Zhu S , He C. Global, regional and local: new firm 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s apparel industry[J]. GeoJournal,2014,79(2).
- [14]顾佰和,石彪,孔令斯.基于DIIS理论方法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循环发展建议[J].科技促进发展,2021(1).
- [15]詹剑锋.论中国如何发展自主可控和开放的科技产业[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6).
- [16]Guo Q, He C, Li 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The role of localisation and urbanisation economies [J]. Urban Studies,2016,53(12): 2584-2606.
- [17]Howell A, He C, Yang R, et al.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nd asymmetrical firm productivity gains under market reforms in Chin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016,9(3): 499-515.
- [18]He C , Yan Y , Rigby D .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China[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6,97(2): 173-198.
- [19]He C, Zhu S, Yang X. What matter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dynamic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J].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2017,2(1): 71-90.
- [20]Zhou Y , Zhu S , He C . Learning from yourself or learning from neighbours: knowledge spillovers,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firm upgrading [J]. Regional Studies,2019:1-13.
- [21]Zhu S , He C , Zhou Y . How to jump further and catch up Path-breaking in an uneven industry spa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7(3):3.

The Industry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in the New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in China

He Canfei Wang Wenyu Zhu Shengjun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 a shrink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by rising protectionism and COVID-19, China needs to adjust the original export-oriented outward development model and establish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plays a leading role whi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remains its extension and supplement.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Spatial layout problem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value chain in different dimension with industrial space, builds Chinese industrial spati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at is the multilayer nested value chain system of global-regional-national-local. The four major urban clusters are the key nodes to realize the mutual feedback and docking of ‘Dual Circulation’, which is built into the regional complex of innovation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vertical value chains and horizontal knowledge chains.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implements a diversified and complementary system by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major urban clusters that lead the innovation industries and other urban clusters that are assisted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is buil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four major urban clusters that are likely to ‘the global pipeline’ to absorb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through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frontier urban clusters that integrate into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to obtain strategic resources.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Industrial Spatial Layout; Value Chains; Urban Clusters; Knowledge Chains

(责任编辑:晓 力)

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及路径研究*

李新安 李慧

摘要:制造业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基于构建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投入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实证测算后发现:在变动趋势上,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协同效应较为明显,总体水平基本呈稳定增长态势,整体差异性趋于缩小,且东部和中部省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提升趋势要相对快于西部省份。从省际空间上制造业绿色发展变动来看,存在多数省份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和个别省份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并存的趋势特征。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相互依赖性,表现出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和水平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均相对集中,总体上呈现双高型HH聚集和双低型LL聚集两种较为明显的分异性演变格局,而这种发展格局则对中国制造业的区域绿色协调发展形成制约。因此,需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并通过优化区域制造业要素禀赋结构、完善制造业绿色化区域协同机制等,着力消除制造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阻滞因素。

关键词:绿色发展;区域要素禀赋;区域差异;污染防治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64-10 **收稿日期:**2021-04-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绿色制造视角下中国OFDI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碳减排效应研究”(418712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嵌入视阈下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的碳减排机制研究”(U170413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碳减排机制研究”(17YJA790050);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河南省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优化研究”(202400410041);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全球价值链视阈下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的碳减排机制及政策研究”(21A480001)。

作者简介:李新安,男,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区域产业创新与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主任(郑州 450046)。

李慧,女,通讯作者,河南省区域产业创新与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研究人员(郑州 450046)。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建立起了完整、独立的制造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党的十

九大以来,“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双赢的重要发展理念被加以贯彻实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从“十四五”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远景目标高度将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置于重要位置。制造业绿色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结构优化升级中意义重大,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是建设制造强国和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随着全

球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中国通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制造企业多数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专业加工组装环节,并因这些环节多使用资本密度高、排放强度大的技术,而陷入“低端高碳锁定”,成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问题的关键来源,从而使中国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却急剧增长。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正面临周边国家“低端产业吸纳”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双重挤压”。据《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报告》(2018),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仍过多依赖资源能源消耗。《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也显示,2018年中国的EPI总得分为50.74,位居所有参与评估的180个国家与地区的第120位。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加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并针对“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部署。在中国制造业所处“双重挤压”态势下,综合考虑资源环境及技术工艺环境效应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正日益引起各界关注。学者Zkara和Atak(2015)将制造业的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土耳其26个细分制造行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测算;Ramli等(2015)则采取类似的思路,将制造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和销售收入分别被作为不良产出和期望产出,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生态效率进行考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目前各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清洁与绿色制造,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国内学者则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和经济质量提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张振刚等,2014;李新安,2020)。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破解“三高”难题,实现生产模式资源耗费降低、污染控制与治理的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杨汝岱(2015)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中国30个制造细分行业的能源效率进行研究,发现行业间的能源耗费差异非常明显;Qu等(2017)通过对中国30个制造细分行业的绿色增长率测算,发现中国制造业绿色状况呈逐年向好态势。“中国制造2025”则从实现

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要求方面,提出要构建清洁高效、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等都进一步对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2019年在河南考察调研时强调:“全球制造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把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就是围绕提升制造业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将产品设计、生产等全生命周期阶段对环境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促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获得经济、生态与社会综合效益最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化转型的深入实施,制造业作为一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迫切需要通过提升其绿色发展效率,以实现自身的绿色增长。在此背景下,通过对相关研究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多围绕制造业的绿色生产效率测算展开,但从省际空间层面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研究则较为鲜见,且缺乏从动态演化视角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剖析。为拓展相关研究,本文采用SBM模型从省际空间和全国四大地区层面,来衡量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效率,在明晰制造业绿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剖析,以发现制约其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探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推进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这将进一步为政府在制定及实施环境政策,优化制造业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等方面提供参考。

二、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

在综合考虑制造业投入产出变量的前提下,本文借鉴Tone(2001)和Jahanshahloo等(2012)的做法,采用同时将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纳入生产可能性集合的Super-SBM模型,并以此对中国各省份2006—2019年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最后结合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演化格局进行考察。

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基础上,基于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依据文献Zkara和Atak(2015)、Ramli和Munisamy(2015)及杨汝岱(2015)等对投入产出要素指标进行选择。

参考张江雪等(2018)、韩晶等(2020)的做法,选取R&D投入、R&D人员数量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投入来衡量绿色发展研发投入,将折算成标煤的能源消费总量来代表制造业各种能源消耗投入。产出要素包含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借鉴刘耀彬等(2017)的相关成果,选取制造业总产值、实际GDP、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理想发展中的期望产出;参考Tone(2001)和屈小娥(2014)的做法,在综合考虑“三废”排放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对各省的环境污染指数加以计算,以此作为非期望产出;考虑到绿色发展效率与非期望产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借鉴陈诗一等(2017)的做法,通过将非期望产出视作投入纳入正向化变量研究框架,进行处理测算。采用以2006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所有涉及的变量进行平减。具体说明如下:

R&D人员投入。劳动要素投入尤其R&D人员数量投入对制造企业的绿色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选择规上制造企业R&D人员数量来衡量。

财力资源投入。选取规上制造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来表示,相关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取。

能源消耗投入。制造业发展中需要各种能源消耗,选取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耗投入类型,折算为标准煤的能源消耗总量来衡量。

期望产出。以实际GDP、新产品销售收入、制造业总产值与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理想产出。

非期望产出。该指标代表了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状况。借鉴Tone(2001)、屈小娥(2014)做法,通过利用工业“三废”和粉尘计算各省的环境污染指数,并以此作为非期望产出。

考虑相关评价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依据制造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通过对所有涉及的工业企业相关指标进行折算,将其转换为制造业的对应指标,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以中国30个省(区、市)(因西藏和港澳台的部

表1 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阶段	类别	指标含义及单位
投入	绿色R&D投入	X ₁ :规上制造企业内部R&D投入(万元) X ₂ :规上制造企业R&D人员数量(人) X ₃ :新产品开发经费投入(万元)
	能源消耗投入	X ₄ :折算为标准煤的能源消耗总量(万吨/标准煤)
产出	期望产出	X ₅ :实际GDP(亿元) X ₆ :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X ₇ :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X ₈ :制造业总产值(万元)
	非期望产出	X ₉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X ₁₀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X ₁₁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 X ₁₂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资料来源: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分数据缺失,暂不考虑)2006—2019年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相应的空间格局演变研究。主要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与各省份统计年鉴。

2.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趋势及区域特征分析

从平均水平来看,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绿色发展效率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2006—2019年,中国制造业在绿色发展方面表现出良好的上升势头,绿色发展效率由0.695上升到0.812,增长了16.83%(见表2)。尽管河北、天津、山西等少数省份有所下降,但大多数省份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值都呈增长态势,总体增长趋势明显,该研究结果与Qu和Appolloni等(2017)对中国制造业30个细分行业的绿色发展效率的分析结论大体相同。

根据图1所示的全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可看出,2006—2019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从0.695上升到0.846,其均值为0.782,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通过对表2中各省份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主要省份的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提升趋势要相对快于西部省份。全国四大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较为明显,由高到低分别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均值在2006—2019年分别为0.912、0.807、0.783、0.736,从图1看四大区域整体均呈波动上升趋势。

结合表2和图1中国各省份及四大区域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间序列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

表2 各省份制造业主要年份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值

省份	2006	2009	2012	2015	2018	2019	省份	2006	2009	2012	2015	2018	2019
北京	0.871	0.884	0.896	0.925	0.978	0.982	湖北	0.551	0.524	0.549	0.631	0.883	0.892
天津	0.896	0.883	0.861	0.847	0.852	0.873	湖南	0.496	0.527	0.613	0.727	0.851	0.873
河北	0.976	0.892	0.774	0.817	0.853	0.874	广东	0.723	0.697	0.836	0.795	0.835	0.876
山西	0.782	0.756	0.743	0.731	0.772	0.756	广西	0.736	0.802	0.739	0.765	0.684	0.752
内蒙	0.952	0.967	0.949	0.961	0.987	0.962	海南	0.786	0.891	0.896	0.913	0.676	0.718
辽宁	0.869	0.894	0.92	0.893	0.872	0.865	重庆	0.626	0.681	0.689	0.718	0.965	0.93
吉林	0.627	0.649	0.735	0.729	0.738	0.756	四川	0.624	0.673	0.742	0.819	0.713	0.826
黑龙江	0.597	0.578	0.625	0.634	0.645	0.672	贵州	0.678	0.681	0.692	0.791	0.883	0.852
上海	0.961	0.972	0.98	0.977	0.985	0.989	云南	0.814	0.826	0.739	0.836	0.851	0.871
江苏	0.899	0.981	0.973	0.895	0.883	0.891	陕西	0.543	0.634	0.677	0.725	0.764	0.785
浙江	0.739	0.697	0.817	0.792	0.851	0.884	甘肃	0.637	0.625	0.713	0.764	0.796	0.783
安徽	0.657	0.683	0.725	0.816	0.835	0.852	青海	0.769	0.857	0.894	0.877	0.896	0.882
福建	0.513	0.629	0.592	0.657	0.684	0.684	宁夏	0.638	0.661	0.68	0.679	0.718	0.735
江西	0.528	0.653	0.67	0.654	0.676	0.713	新疆	0.783	0.797	0.819	0.854	0.895	0.879
山东	0.811	0.913	0.921	0.946	0.965	0.958							
河南	0.657	0.674	0.649	0.696	0.713	0.736	全国	0.695	0.769	0.745	0.783	0.812	0.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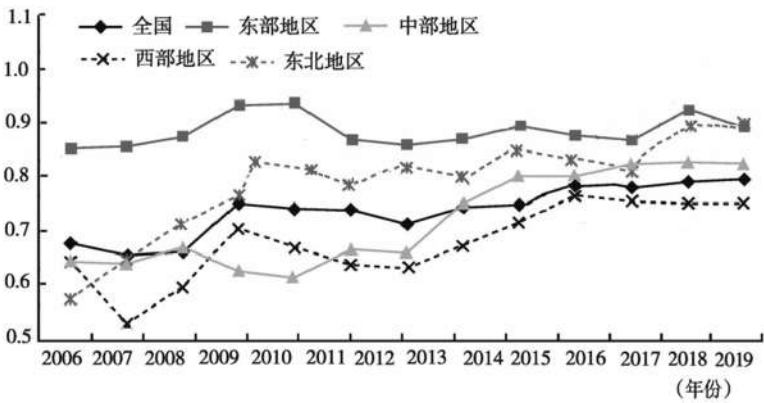


图1 2006—2019年全国及各区域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

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总体平均水平均呈现出一定的增长态势,区域间的整体差异性逐渐缩小。这表明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并表现出初步的区域协同效应。

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测算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程度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其可能原因为:东部地区是中国资金、人才、信息、市场等重要的交融地区,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条件,经济水平始终优于中西部地区,绿色R&D投入也远高于其他地区,创新能力比较强,形成了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而中西部地区自然区位、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等整体上落后东部地区,企业创新投入能力较弱,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相对不足。

3.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演变特征

其一,空间格局的全局演变特征。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可反映各省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在整体空间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具体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衡量,计算公式为:

$$\text{Moran's 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Y_i - \bar{Y})(Y_j - \bar{Y})}{S^2 \sum_{i=1}^n \sum_{j=1}^n W_{ij}} \quad (1)$$

其中, $S^2 = \frac{1}{n} \sum_{i=1}^n (Y_i - \bar{Y})^2$ 、 $\bar{Y} = \frac{1}{n} \sum_{i=1}^n Y_i$ 。 Y_i 、 Y_j 分别表示第*i*与*j*个省区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值, $\bar{Y}$ 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平均值,*n*表示考察的省市数总和,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空间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全局Moran's I指数在(-1,1)之间变动,指数为正表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为正,反之为负;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空间关联

程度越深,为0则表示地区之间无关联。

运用式(1)可计算出全局 Moran's I 的值,计算结果见表3所示。从表中数据可知部分主要年份全局 Moran's I 指数都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反映出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相互依赖性,表明这些年份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在省域空间上表现出聚集特征。

表3 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全局 Moran's I 空间自相关检验

年份	Moran's I 值	Z 值	P 值
2006	0.247	2.098	0.014
2009	0.216	1.932	0.027
2012	0.185	2.367	0.007
2015	0.159	2.493	0.016
2018	0.172	2.671	0.01
2019	0.183	2.569	0.012

其二,空间格局的局部演变特征。由于局部空间的异质性差异并不能通过全局 Moran's I 空间自相关反映出来,因此需采用局部 Moran's I 对中国各省份间的局部空间关联程度进行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较之全局空间自相关,更能直观反映各相邻省份绿色发展效率间存在的局部空间关联和差异程度,相较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也更能准确判断各省份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集聚性和异质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可用局部 Moran's I 指数来测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Local Moran's I=
$$\frac{(Y_i - \bar{Y})}{S^2} \sum_{i \neq j}^n W_{ij} (Y_j - \bar{Y}) \quad (2)$$

其中, $S^2 = \frac{1}{n} \sum_{i=1}^n (Y_i - \bar{Y})^2$ 、 $\bar{Y} = \frac{1}{n} \sum_{i=1}^n Y_i$ 。Y_i、Y_j分别表示第 i 与 j 个省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值,̄Y 为绿色发展效率的平均值,W_{ij}表示空间经济权重矩阵。关联程度通常用局部 Moran 散点图来展示,考虑到文章篇幅原因,这里以 2019 年空间权重矩阵下局部 Moran 散点图为例来分析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似的省份在空间上的聚集性,具体见图 2 所示。

图 2 的横轴表示各省区之间的经济距离,纵轴表示绿色发展效率值。从图 2 中可看到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都分布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这说明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距离的变化是同向的,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将局部 Moran's I 散点图中各象限的省份进行列表分析,具体见表 4。

分析各省份象限内的分布情况,中国制造业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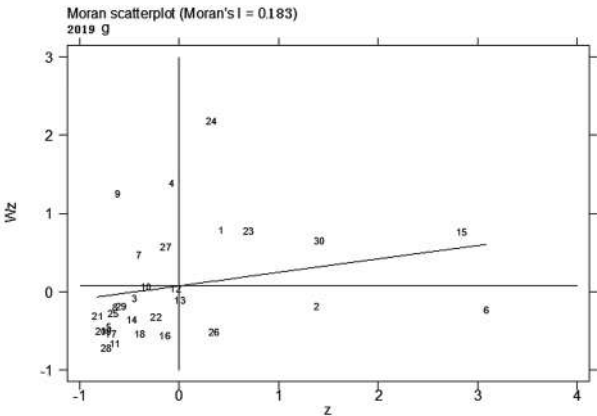


图2 局部 Moran's I 聚集散点图

色发展在空间上存在差异,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从表 4 可以看出,中国大多数省份 2019 年的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位于双高聚集区域第一象限的为北京、江苏、山东、上海、浙江等省市;位于第二象限的是福建、辽宁、内蒙古、天津等省市;位于双低聚集区域第三象限的为重庆、甘肃、广西、河北、黑龙江等省市;位于第四象限的是安徽、贵州、海南、四川等省份。跨越了两个象限的省份分别为一四象限的广东和二三象限的河南、湖北。总体来看,全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形成 HH 集聚和 LL 集聚分化的空间格局,处于双低区域(第三象限)内的省份数量远多于双高区域(第一象限),且这种现象长久存在。其中,双高区域的省份主要聚集于长三角地区,双低区域的省份多处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中国各省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所呈现的时空格局演化分异特征,说明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累积效应已成为绿色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这种在空间分布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特点,其原因可能与各地区所处发展阶段有关。一方面,位于双高聚集区域的经济发达省份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资本、技术创新等高端要素的聚集有助于制造业的绿色发展;而位于双低聚集区域的经济落后地区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端要素的聚集不足导致了其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长期出现低值集聚的局面。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较高的经济水平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资金支持等一系列的支撑作用(李新安,2019);同时由于贸易往来和产业资金跨地区转移产生的技术溢出,也有利于推动地区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升;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金融市场发达,高新技

表4 中国省际制造业绿色发展的Moran's I空间分布

第一象限(H—H)	第二象限(H—L)	第三象限(L—L)	第四象限(L—H)	跨界省域
北京、江苏、山东、上海、浙江	福建、辽宁、内蒙古、天津	重庆、甘肃、广西、河北、黑龙江、湖南、江西、吉林、宁夏、青海、陕西、山西、新疆、云南	安徽、贵州、海南、四川	跨一四象限:广东
				跨二三象限:河南、湖北

术人才密集,交通便利、科技研发水平投入产出转化率高等优势造就了该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高于其他地区(梁圣蓉、罗良文,2019;黄磊、吴传清,2019)。

三、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制造业发展的演进规律来看,在工业化的前期乃至中期阶段,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以数量扩张为主。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步饱和,数量扩张日益受到市场需求以及外部各种约束条件的制约,迫切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制造业门类齐全、生产能力强,但不少产业的产能进入了相对过剩阶段,急需推进制造业向产业结构低碳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能源资源利用高效化的绿色制造方向发展。就区域层面而言,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1.各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不平衡

推进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有助于实现制造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共存。但对中国大部分省份而言,一方面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时期,尚未摆脱传统的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发展模式,制造业高物耗能耗的“重型化”结构特征明显,制造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存在较大冲突,绿色增长点较为欠缺。另一方面中国各区域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区域差异性较为显著。从四大板块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上看,东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制造产品的“智能化”“轻型化”和高附加值化较为突出,制造业领域的数字化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其次,东北地区较差,西部地区总体最差。通过前面对不同时间节点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效率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的增速突出,东北地区的增速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相对差

距减小,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变大。尽管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缩小,但仍存在着较大的绝对差距,东北老工业基地更是面临制造业绿色化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中国各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所处不均衡的分布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各区域只有实现制造业绿色化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

2.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不足

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以技术创新为根本动力,而中国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滞后成为制约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尽管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效率近年来在不断提升,但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双低型集聚,表明大多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多处于低端生产加工环节,整体技术层次和绿色化水平较低已成为绿色转型的短板。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导致关键核心技术、自有品牌等较为缺乏,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具有较高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则主要在于中国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源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但随着近年来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全球各大经济体争相在高端制造领域建立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在面临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困境下,再次转型绿色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中国多数地区对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实现绿色转型缺乏足够认识,宁愿花钱买技术,用市场换技术,也不愿持之以恒地投入巨额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源等去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进企业进行科技研发,造成这些地区大部分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对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形成制约。此外,中国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人才培训教育体系不够完善,使得制造业人力资本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短缺,进一步阻碍了这些地区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主要表现

为学术型人才丰富而工程型和技能型人才短缺,特别是高端技术创新型人才及高级技能人才十分缺乏,与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需求和制造领域的人才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缺口。按照中国制造业发展目标要求,至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人才供给存在2986万人的严重缺口(邹晓东,2019),而新能源汽车、绿色节能及新材料等领域人才缺口更大,这也成为中国大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巨大障碍。

3.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协同机制有待完善

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涉及面较广的特点,要求在区域空间上形成相应的评价监管体系、认定标准、激励政策和组织协调机制。实证分析中各省区制造业绿色发展,在空间分布上所表现出的较大差异性特征,尤其双低聚集区域省份远多于双高聚集区域省份,也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各地区间在环境规制等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区域相关政策及协调机制不完善条件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高环境规制的地区将会促使污染产业在国内不同地区间转移,从而对邻近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李新安,2021)。这样一地区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将部分高污染产业就近转移到其他地区,近邻地区的污染治理成本就会加大,给绿色创新投入带来阻力。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经济高发展水平的地方政府更有财力对绿色技术创新实施补贴,其向市场传递的积极信号,则可能吸引邻近地区的商业资金,导致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融资减少,抑制邻近省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尽管在国家工信部指导下,已组建中国绿色制造联盟,但目前仍未形成政府、协会和企业等各主体参与的统筹管理机构与组织协调机制,联盟的功能作用尚未很好发挥。因此,需要逐步构建并完善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体系(Jaffe等,2002),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跨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制造企业、行业和区域链接的共生与协同利用,增强区域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调性、联动性、整体性,构建绿色发展产业链,实现区域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

四、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及路径

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与中国加快绿色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形成历史性交汇,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中国制造业应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面向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开展绿色清洁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强化制造业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推进产业绿色协同链接,并以数字信息技术等高端要素优化区域制造业要素禀赋结构,完善制造业绿色化区际协同机制,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现行业资源能耗减量与质量效益提升的绿色发展转型。

1.以技术创新增强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绿色制造”是中国乃至国际发展的趋向,绿色创新的驱动力不足是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层次和绿色化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创新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制造强国建设目标要求,推动制造业以绿色创新驱动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和向高质量发展。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长期占据高端的经验也表明,技术进步和持续创新是其制造技术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的根本动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将技术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发挥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混合型的绿色创新。第一,构建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绿色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努力进入到创新型国家行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尤其要提升重点高耗能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注重基础研究、基本技术的发展;尽快提高绿色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能力,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进行环境管理。第二,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产品质量和价值链攀升,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创造良好的万众创新环境,促进中小微企业加强对传统制造行业进行绿色改造创新,推进对资源能源高依赖和高污染排放的相关制造行业向低碳环保转型。第三,完善以企业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竞争政策的作用机制,鼓励制造企业将绿色技术推广与股份投资收益结合,联合创办科技企业与创新企业的工程。建设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于创新者赚钱效应形成最有效的创新激励,激发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其对

颠覆式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此外,要注重对技术创新人才、技术产业化应用人才、先进制造业技术工人等绿色制造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加大对基础性研究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可借鉴德国的“二元制”职业教育体制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实验室等人才培养机制,基于中国实际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偏向性制造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和工业实验室,建设更多的校企合作工业实验室,强化职业教育,构建功能强大的专业性培训市场,为培养技术创新人才和产业化应用人才提供制度保证和良好载体。

2. 优化区域制造业要素禀赋结构,夯实绿色发展的内生基础

新时代“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为中国在“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制造业的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技术创新与信息技术等高端要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多数地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仍居于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较低,其相对规模的扩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甚至还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实现结构转型是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最佳模式,它能够使经济体获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并提供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要想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前提是升级目标行业(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能够产生比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高的生产率和附加值。因此,在创新驱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多数地区应结合本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国家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开放政策,有意识地引导、推动高端要素集聚,以高端要素集聚推动全社会不断改进区域生产函数,加快本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变迁。绿色化发展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在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加大建设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服务平台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技术密集型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尤其要吸引高端要素对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进行优先、重点突破。

中国广阔的地域面积、制造业行业差异较大的禀赋状况,决定了在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前提下,具有更大的结构调整空间。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围绕技术密集型领域的重点行业,积极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在一些优势领域的关

键技术环节,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增材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涉及的关键共性技术、成果产业化等进行重点攻坚,重塑高端要素禀赋结构。同时各区域要抢抓全球经济发展机遇,用信息化改造企业价值链,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通过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全球采购等方式,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外溢等方式对技术创新进行整合,实现要素结构的跨越式提升,推动制造业由中低端生产环节向价值链中高端和高端攀升。此外,各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要节能降耗,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在实现要素禀赋结构资源配置能力转换过程中,推动中国制造业技术变革与绿色转型发展。

3. 完善制造业绿色化区际协同机制,淘汰落后过剩产能

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应通过强化区域间的重大政策对接,形成跨行政区、跨区域板块的协同合作,以提升制造行业的资源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为目标,对体量庞大的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中国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相较于高技术产业具有更大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内升级空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传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升级,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强化各地区绿色技术投入,着力推进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在制造企业中大力引入先进绿色技术,破解制造业现有的高能耗和高排放等技术难题,以现有资源环境为基础,积极推行绿色制造。推广应用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数字信息技术,吸收采用现代化生产和管理方式,以实现关键工序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提升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运营效率,重塑传统制造业。第二,控制各地区过剩产能和污染排放的。对电力、煤炭、钢铁等高污染、高消耗行业进行落后产能的淘汰,化解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传统行业以及光伏、多晶硅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过剩产能。因此,在产能过剩领域严禁新增产能项目的前提下,各地区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行业退出机制,实施差别性和惩罚性的水价、电价,引导僵尸企业和绝对过剩产能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产业组织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主动、有序地退出市场。另一方面,要通过税收抵扣和减免、制定税收分享比例等措施以及共享机制的实施,本着少破产清算的原则化解过剩产能。第三,通过促进各地区制造业生产链条

等重点环节绿色改造,对高耗能、高污染制造行业的工艺流程进行技改整合,重构绿色产品及价值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最后实现全行业绿色增长。

4.加强政策工具引导,进一步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能力急需改变末端治理的管理模式,要通过完善制造业绿色发展政策工具倒逼企业发展模式及方式变革,实现资源能耗及减排管理的全过程控制。第一,政府要根据本地具体情况构建差别化、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体系,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制造业整体发展。紧密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通过政策引导,完善绿色发展生态。实施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推广应用低碳技术,鼓励制造企业以材料替代、清洁生产等绿色生产方式开展绿色化改造。第二,通过政策引导,加大绿色资金投入。通过出台“绿色贷款”政策,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实行低碳资金政策,充分发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的作用,加大对绿色制造的资金投入,引导资金流向高效、节能、环保等制造行业。同时要利用好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支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绿色技术研发,尤其是高技术行业中的基础研究和共性知识的开发,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共享,对共性薄弱环节提供资源配置和支持,以强化行业整体绿色升级。第三,各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应该根据制造业生产特点及转型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通过强化监管力度,做好绿色信用评级工作,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节能及清洁生产等方面技术的研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探索建立全国性环境权益的碳排放权与排污权等交易市场,并不断加强和完善各类交易制度及平台建设。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宏观目标要求,构建合适的制造业绿色发展环境标准、生态标准和考核评估体系等,搭建制造企业污染排放、环境违法违规记录等信息共享平台,加强环境管制,有效制衡企业的污染行为,以减少资源的扭曲浪费,确保环境保护法规切实落实。

参考文献

[1] Zkara Y., Atak M. Regional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Electricity Saving Potentia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urkey[J]. Energy, 2015(93).

[2] Ramli N.A., Munisamy S. Eco-Efficiency in Greenhouse Emissions am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Range Adjusted Measure[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47).

[3] 张振刚,白争辉,陈志明.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协整关系研究——基于1989—2011年广东省数据[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10).

[4] 李新安.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驱动作用研究[J]. 区域经济评论, 2020(2).

[5] 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经济研究, 2015, 50(2).

[6] Qu Y., Yu Y., Appolloni, A., Li M., Liu Y. Measuring Green Growth Efficiency for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Sustainability, 2017(9).

[7] 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130).

[8] Jahanshahloo G.R., Vakili J., Zarepisheh M. A Linear Bilevel Programming Problem for Obtaining the Closest Targets and Minimum Distance of a Unit from the Strong Efficient Frontier[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2(29).

[9] 韩晶,陈曦.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J].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1).

[10] 张江雪,张力小,李丁.绿色技术创新:制度障碍与政策体系[J].中国行政管理, 2018(2).

[11] 刘耀彬,袁华锡,封亦代.产业集聚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J].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8, 37(2).

[12] 屈小娥.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研究[J].经济学家, 2014(7).

[13] 陈诗一,陈登科.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 2017(4).

[14] 李新安,李慧.基于节能减排的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策略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15] 梁圣蓉,罗良文.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人力资本视角[J].技术经济, 2019, 38(4).

[16] 黄磊,吴传清.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8).

[17] 邹晓东,李拓宇,张炜.新工业革命驱动下的浙江大学工程教育改革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1).

[18] 李新安.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与区域绿色技术创新[J].经济经纬 2021(3).

[19] Jaffe A B, Newell R G, Stavins R 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22(1-2).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 Xinan Li Hui

Abstrac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is empirically measured by using the input-output Super-SBM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ional synergy effect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relatively obvious, the overall level basically presents a stable growth trend, and the overall difference tends to narr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s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most provinces is improving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some provinces is decl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obviously interdependent and shows obviou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provincial space shows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and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n the whole, there are two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patterns of double-high HH aggregation and double-low LL aggregation, which restric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liminate all kinds of blocking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factor endowment and improving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gr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Regional Factor Endowment; Regional Differences;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责任编辑:平 萍)

精选千家报刊 荟萃中华学术



《复印报刊资料·管理科学》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
编辑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复印报刊资料·管理科学》杂志致力于展示科学的管理方法、发掘优秀的管理实践,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专业编辑与管理学界专家、学者共同精选荟萃而成。

本刊坚持以学术创新为目标,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理论体系;强调管理科学的学科内涵,侧重以科学方法应用为基础的各种管理决策理论和方法;关注管理科学的学术前沿,提倡学术研究的学理性与学术问题的实践性;注重管理科学内容的适用性,努力为大专院校师生及各类专业管理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主要栏目: 决策分析、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知识管理、服务与运作管理、风险与不确定性管理、应急管理、交通运输管理、项目管理等。

《复印报刊资料·管理科学》为月刊,大16开,160页,每期定价:38.00元,全年定价:456.00元,刊号:CN 11-4249/C,ISSN 1007-0591。

订购地址: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市场部 全国各地邮局 邮编:100872

订购电话: 010-82503412, 82503440, 82503029

邮局汇款: 收款人: 市场部 地址: 北京9666信箱 邮编: 100086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户名: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账号: 344156031742

官方网站: <http://zlzx.ruc.edu.cn>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评价及优化建议*

何泽军 姬一帆 张朝辉

摘要:基于绿色生产力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聚类法考察2009—2019年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变化特征及其推动因素。研究发现:2009—2019年,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具有“北高、南低、中低”的区域布局特征,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且呈现出“东快、北慢、南慢”的发展态势;北部、西北、中部、东部、西南等不同地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变动的推动因素分别为产品安全和产出高效、环境友好和产出高效、资源节约和产出高效、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环境友好和产出高效。优化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的重点在于实施北部地区养殖规模化、西北地区农牧一体化、中部地区产销一体化、东部地区绿色标准化、西南地区特色品牌化等“五化”行动。

关键词: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F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74-08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战略研究”(2020-XZ-19);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粮食安全背景下河南农业绿色发展问题研究”(HNKJZK-2021-31C)。

作者简介:何泽军,男,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郑州 450046)。

姬一帆,女,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生(郑州 450046)。

张朝辉,男,通讯作者,河南农业大学讲师(郑州 450046)。

一、引言

绿色生产力是兼顾生产力提高与环境保护,全面持续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策略。发展绿色生产力就是要坚持从绿色属性出发,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改进资源利用模式、重视资源循环利用、强化环境补偿与治理。区域布局优化通过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结构、功能、策略等调整,达到资源充分利用、优势充分发挥、最终实现绿色生产力整体提升的目标。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力布局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

中国畜牧业在满足人们蛋白质消费需求、促进农民就业、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贡献巨大,但粗放式经营也给农村环境造成较大污染。据《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污染源。中国畜牧业已经进入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不断增强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现有关于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及其评价的研究较少。关于畜牧业生产力布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生猪产业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区域布局,而较少关注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其中,生猪产业布局研究侧重于“南猪北养、西进”的合理性、影响因素,以及该布局所带来的环境不公和污染转移问题;而畜牧业生产力布局研究则在环境承载和资源禀赋测度的基础上,对品种结构的区域布局进行探讨,指出布局现状及优化方向。关于绿色生产力评

价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农业(种植业),而较少关注畜牧业。农业绿色生产力评价主要是构建农业绿色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等对中国不同省(区、市)的农业绿色生产力水平进行评价,通过评价指出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现状与优化方向。

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评价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并探讨其优化路径,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现有畜牧业绿色生产力评价相关研究成果,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为畜牧业绿色生产活动提供借鉴或参考。本文基于绿色生产力内涵构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演化特征,分析演化的驱动因素,提出布局优化建议,以期为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实践提供启示或借鉴。

二、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是个综合性概念,在明晰其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评价。

1. 畜牧业绿色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生产力源于绿色发展。畜牧业绿色生产力的内涵与绿色发展的内涵相同,都是同时注重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只不过前者更加注重发展的结果。畜牧业绿色发展从属于农业绿色发展范畴。农业绿色发展,“农业”是主体,“发展”是核心,“绿色”是方式与目标。农业绿色发展包括去污(农业生产过程的清洁化)、提质(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增效(绿色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3个层次。根据绿色发展内涵,一定产出下投入资源较少既是“发展”(效率高且经济效益增加),又是“绿色”(投入节约促进排放减少),资源节约是绿色发展的应有之义;产业发展要求产出的废弃物排放尽可能少,对环境损害尽可能小,环境友好是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产出的产品尽可能安全、优质,是产业的社会价值体现,产品安全是绿色发展的价值所在;产业结果表现在人均占有产量增加、产值增加、成本利润率增加,是“发展”的核心要义,产出高效是绿色发展的目的所在。基于此,本文认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是指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不断趋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品安全、产出高效等目

标,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策略。

依据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内涵,根据科学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统一、可比性与可靠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包含资源节约(B1)、环境友好(B2)、产品安全(B3)和产出高效(B4)等4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资源节约主要涉及劳动力、饲料、资产等资源集约利用状况,反映畜牧业生产投入过程的绿色理念实施状况。相关指标包括:养殖用工数量,用养殖每单位畜禽产品所花费的时间(日)来衡量;饲料转化率,用消耗一单位饲料所产出畜产品的增重量来衡量;资产利用率,用生猪出栏率来衡量^①。

环境友好反映畜牧业生产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要求生产方式清洁化、废弃物处理无害化或利用资源化,降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相关指标包括:污染物排放量,用化学需氧量、氮、磷排放量来衡量。根据张藤丽等(2020)的研究,对各畜种废弃物排放量进行测算与汇总,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地区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与治理强度;用单位耕地面积载畜量反映环境对畜禽的承载能力^②。

产品安全要求减少有害物质在畜产品中的残留量,强调产出品适应绿色、健康、营养的品质安全需求。相关指标包括:规模化饲养率,用规模化养殖户占全部养殖户比重来衡量。由于不同畜种规模化饲养率不同,用生猪规模化饲养率代表畜牧业状况;用畜禽防疫费用率反映畜禽养殖过程中的用药状况,该费用率用每单位畜产品所花费的防疫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进行测算;用生猪防疫费用率代表安全产品认证量,用绿色食品认证数量来衡量。

产出高效反映畜牧业产出效果状况。相关指标包括:畜产品人均占有量,代表畜产品产量满足人们需求状况。由于畜产品涉及不同种类,借鉴赵昕蕊(2020)的研究,用不同畜产品蛋白质含量比将其他畜产品折算为猪肉产量。对于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从产值角度衡量畜牧业产出状况反应畜牧业产出的价值。对于成本利润率,从单位成本下畜产品产出价值反映经营成果发展状况,文中用生猪成本利润率来代表。

2. 布局评价方法

研究采用熵权法这一客观赋权评价方法避免

表1 畜牧业绿色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计量	指标含义	性质	权重
A 畜牧业 绿色生产力	B1 资源节约 (0.271)	C1 养殖用工数量	每头生猪用工工时(日)	劳动力节约状况	-	0.170
		C2 饲料转化率	生猪增重量/饲料重量	饲料资源节约状况	+	0.551
		C3 资产利用率	生猪出栏数量/期初数量 (可用上期末数代替)	畜牧业集约生产能力	+	0.279
	B2 环境友好 (0.176)	C4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粪便排放总量* 化学需氧量排放系数	畜牧业水体污 染物减排状况	-	0.189
		C5 氮磷排放总量	粪便排放总量* 氮磷排放系数	畜牧业大气、固体 污染物减排状况	-	0.209
		C6 单位耕地载畜量	牲畜养殖单位数 (猪单位)/耕地面积	耕地畜禽承载强度	-	0.082
		C7 环境污染治理 投资占GDP比重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总量	畜牧业环境治理强度	+	0.520
	B3 产品安全 (0.336)	C8 规模化饲养率	生猪规模化养殖 户数量/养殖户总量	畜牧业安全养殖状况	+	0.516
		C9 防疫费用率	生猪防疫费用/生产成本	养殖过程减药状况	-	0.073
		C10 绿色食品认证数量	当年绿色食品获证数量	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	0.411
	B4 产出高效 (0.217)	C11 畜产品人均占有量	畜产品产量/总人口数	畜产品产出量状况	+	0.329
		C12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 产值比重	畜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	畜牧业产值地位状况	+	0.311
		C13 成本利润率	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畜牧业经营成果发展状况	+	0.36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研究需要整理和计算得到。
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并采用聚类法对绿色
生产力结果进行区域布局分类。

熵权法基于信息熵原理确定权重,是一种客观
评价方法。传统熵权法缺少对时间序列的分析,为
提高结果合理性,本文借鉴方大春和马为彪(2019)
的研究,对熵权法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熵权法评
价模型如下:

首先,对数据运用归一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异常值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将
标准化之后的值均向右平移0.0001个单位。其
次,确定各指标权重,建立初始矩阵 $X=(z'_{i,j})_{m \times n}$,其
中 $m=11 \times 30, n=13, i, j, t, m, n$ 分别表示指标、省份、
年份、样本观察量和指标数量;计算贡献度 $P_{i,j}$,
 $P_{i,j} = z'_{i,j} / \sum_{j=1}^m z'_{i,j}$,熵权为 $E_i = -k \sum_j P_{i,j} \ln P_{i,j}$,其
中 k 为常数, $k=1/\ln m$,根据 $d_i=1-E_i$ 得到信息熵,最终
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w_i = d_i / \sum_{i=1}^n d_i$ 。最后,根据各指标
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法对各地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
进行计算 $Z = \sum_{i=1}^n w_{i,j} \times z'_{i,j}$,其中 $z'_{i,j}$ 代表 j 地区第 i 项指
标标准化之后的值。

聚类分析法是根据不同个体的特点,按照距离
远近,将距离相近的变量先聚成类,距离较远的变

量后聚成类,直到每个变量都归入合适的类中。本
文采用组间连接聚类方法,以平方Euclidean距离为
度量标准,进行系统聚类中的Q型聚类分析。

3.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9—2019年全国30个省
(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不包含西藏自治区
与港澳台地区。原始数据源于EPS数据库以及
2009—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畜牧兽医
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汇编》《中国品牌农业年鉴》《中国饲料工业年鉴》
《绿色食品统计年报》《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
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业农村部网
站。采用趋势平滑法处理原始数据缺失值。

三、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特征及
推动因素

依据上述方法,将相关数据代入计算,得出全国
30个省(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评价结果,并据此
分析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特征与推动因素。

1.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特征

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用综合评价指数法
对各指标加权求和,得到2009—2019年中国各省

(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及其均值;运用SPSS21.0分别对2009年、2012年、2016年和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并将结果由高到低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四类,得出不同省(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09—2019年全国各地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评价结果

地区	2009年		2012年		2016年		2019年		均值	
	评价结果	所属类别	评价结果	所属类别	评价结果	所属类别	评价结果	所属类别	评价结果	所属类别
全国	0.328	—	0.325	—	0.348	—	0.419	—	0.338	—
北京	0.513	高	0.501	高	0.516	较高	0.375	较低	0.475	高
天津	0.492	高	0.539	高	0.608	高	0.487	较高	0.507	高
河北	0.347	一般	0.393	较高	0.354	一般	0.495	较高	0.391	较高
山西	0.237	一般	0.331	一般	0.438	较高	0.578	高	0.386	较高
内蒙古	0.409	较高	0.394	较高	0.475	较高	0.511	高	0.430	较高
辽宁	0.391	较高	0.319	较高	0.329	一般	0.404	一般	0.348	一般
吉林	0.388	较高	0.369	一般	0.368	一般	0.424	一般	0.384	较高
黑龙江	0.387	较高	0.376	较高	0.363	一般	0.441	较高	0.382	较高
上海	0.350	一般	0.286	较低	0.344	一般	0.444	较高	0.308	一般
江苏	0.307	一般	0.271	较低	0.319	一般	0.442	较高	0.313	一般
浙江	0.322	一般	0.265	较低	0.251	较低	0.403	一般	0.288	较低
安徽	0.317	一般	0.326	一般	0.380	一般	0.463	较高	0.355	一般
福建	0.263	较低	0.302	一般	0.363	一般	0.404	一般	0.333	一般
江西	0.261	较低	0.304	一般	0.251	较低	0.429	一般	0.282	较低
山东	0.321	一般	0.318	一般	0.341	一般	0.403	一般	0.332	一般
河南	0.290	较低	0.225	较低	0.244	较低	0.440	较高	0.273	较低
湖北	0.295	较低	0.247	较低	0.324	一般	0.353	较低	0.305	较低
湖南	0.312	一般	0.244	较低	0.275	较低	0.398	较低	0.280	较低
广东	0.286	较低	0.340	一般	0.258	较低	0.333	较低	0.279	较低
广西	0.266	较低	0.282	较低	0.288	较低	0.387	较低	0.289	较低
海南	0.277	较低	0.269	较低	0.332	一般	0.331	较低	0.262	较低
重庆	0.266	较低	0.311	一般	0.314	一般	0.454	较高	0.318	一般
四川	0.269	较低	0.264	较低	0.240	较低	0.345	较低	0.262	较低
贵州	0.345	一般	0.223	较低	0.208	较低	0.386	较低	0.275	较低
云南	0.296	较低	0.262	较低	0.334	一般	0.343	较低	0.282	较低
陕西	0.313	较低	0.303	一般	0.358	一般	0.441	较高	0.316	一般
甘肃	0.228	较低	0.249	较低	0.245	较低	0.327	较低	0.265	较低
青海	0.312	一般	0.287	较低	0.374	一般	0.365	较低	0.337	一般
宁夏	0.328	一般	0.471	高	0.352	一般	0.506	高	0.389	较高
新疆	0.449	高	0.466	高	0.609	高	0.469	较高	0.509	高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研究计算结果统计整理。

第一,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呈现“北高、南低、中低”的区域布局。北部地区的绿色生产力较高。新疆畜牧业的绿色生产力水平最高,2009—2019年的平均指数值为0.509;天津、北京、内蒙古、河北、宁夏、吉林和黑龙江等北部省(区、市)平均绿色生产力指数都在0.38以上。南部与中部地区省(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最低。2009—2019年,南部地区

的广东、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区、市)以及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市)的平均指数值低于0.3。

第二,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整体呈现不断提升的发展态势。全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从2009年的0.328上升到2016年的0.348以及2019年的0.419,上升了27.5%。2019年与2009年相比,畜牧

业绿色生产力为“高”和“较高”水平的省(区、市)数量增多,由7个增加为10个,其中较高水平集聚类型的省(区、市)数量从4个增加为7个。

第三,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增长呈现“东快、北慢、南慢”的演变特征。江西、安徽、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东部地区省(区、市)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增长较快。江西2009—2019年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从0.261增长到0.429,增长了64%;安徽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同期增长46%。北京、天津、新疆、青海等北部地区省(区、市)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增长较慢。北京、天津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出现负增长,新疆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增长率仅为4%,青海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指数增长率仅为17%。广东、海南、广西、四川等南部与西南地区省(区、市)的绿色生产力提升较慢,广东的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在2009—2019年仅提升16%,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2. 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变化推动因素

从畜牧业绿色生产力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品安全和产出高效4个维度分析中国不同省(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差异产生的推动因素,结果如图1、图2所示。

第一,北部地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水平始终较高的原因在于产品安全和产出水平较高。东北地区的规模化饲养率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019年东北地区的平均规模化饲养率是全国平均规模化率的2.4倍;2019年,东北三省的绿色产品认证数量占全国认证总量的10.5%,产品安全水平高。同时,东北部地区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畜产品人均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4倍,产出高效水平较高。

第二,西北地区的环境友好水平和产出高效水平推动畜牧业绿色生产力提升。西北地区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环境承载力较高,其单位耕地载畜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环保投资占比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环境状况整体较好。西北地区的畜产品人均占有量和畜牧业产值比重均远高于其他地区,人均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产出高效水平较高。

第三,中部地区资源节约和产出高效水平不断提升,推动绿色生产力持续提升。中部地区各省(区、市)的资源利用效率较高,饲料转化率较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生猪出栏率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畜牧业生产集约化程度较高,畜牧业产值和利润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出高效水平较高。

第四,东部地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逐渐提高主要由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水平提升驱动。东部地区水网密集,养殖用地资源匮乏,自2017年原农业部颁布《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以来,东部地区的畜牧业养殖数量大幅度减少,环境治理投资不断提高,环境友好水平上升。保留下来的养殖场以规模化饲养为主,规模化饲养率是全国平均的2.5倍,使得资源节约水平较高。

第五,西南地区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增长乏力的原因主要在于环境友好和产出高效水平较低。随着“南猪北养、西进”的持续推进,西南地区畜禽养殖量增大,但其相应的环保投入没有随之提升,使得污染物排放量多,其污染物排放量高出全国平均72%;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仅为全国平均占比的80%,环境友好水平较低。该地区畜产品人均占有量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且成本利润率较低,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产出水平较低。

四、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优化行动及政策建议

根据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状况及其推动因素,结合各地区畜牧业发展资源环境特点和经济基础,提出如下布局优化行动方向以及政策建议。

1. 区域布局优化行动

重点推动畜牧业由东南、华南地区向东北、西北地区转移,建设东北、西北地区畜牧业绿色生产优势区,建设华北、中东部地区潜力增长区,建设西南地区畜牧业适度发展区。对此,提出以下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优化行动:

第一,在北部地区开展“养殖规模化”行动。北部地区草地和饲草料资源丰富,但经营管理粗放,适宜通过开展“养殖规模化”行动,进一步巩固产品安全和产出高效优势。一是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对中小养殖场进行规模化、集约化改造。依靠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促进土地流转和设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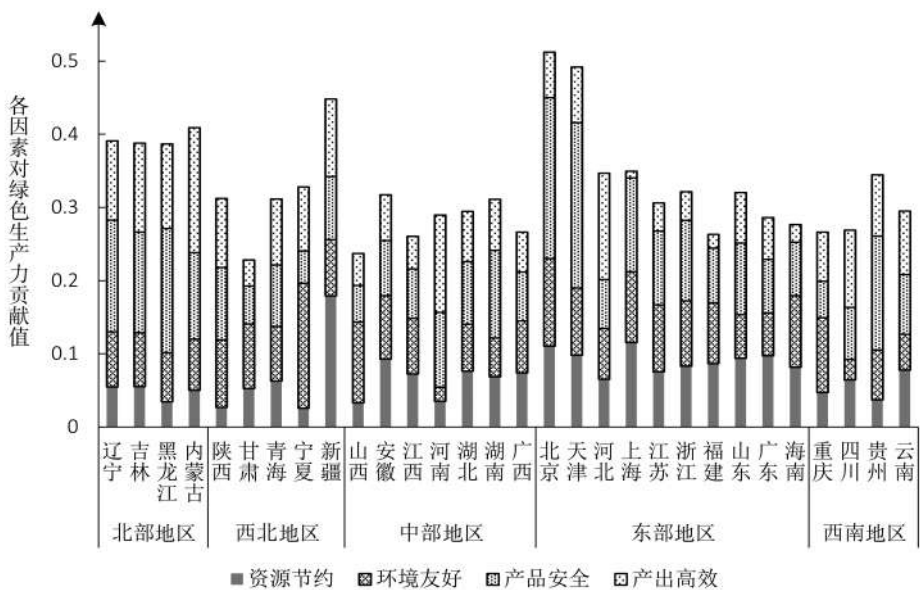


图1 2009年四类因素对各省(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的贡献值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研究计算结果统计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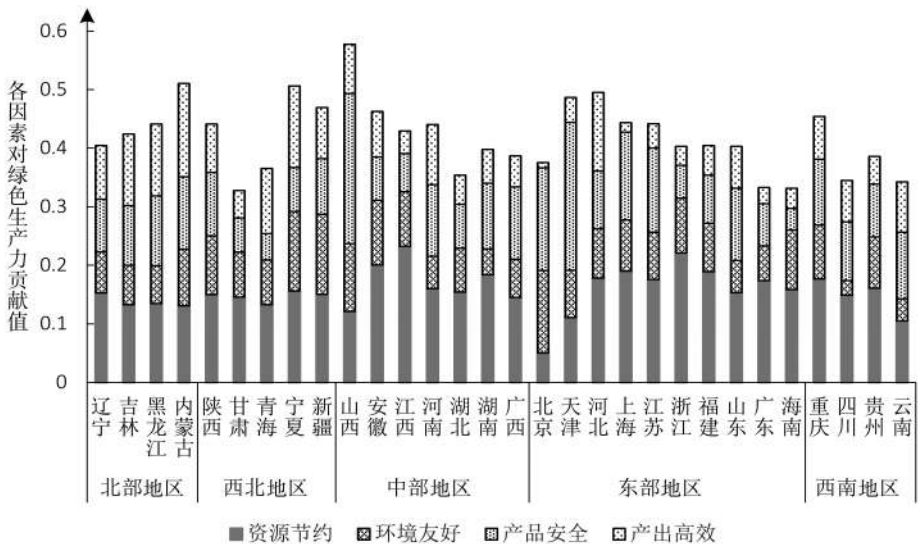


图2 2019年四类因素对各省(区、市)畜牧业绿色生产力的贡献值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研究计算结果统计整理。

造,形成规模养殖优势,改善经营管理并提高畜禽养殖效率。二是大力发展“公司+家庭牧场”养殖模式。提升家庭牧场养殖规模,更新技术装备,形成劳动力优势和合作优势,提高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效率。三是支持智能化技术应用,提高畜禽养殖智能化率。在规模化养殖基础上,加强畜禽养殖绿色化、技术化和自动化,以及智能化养殖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提高畜禽养殖设施化水平,加强废弃物自动化处理程度,加强环境污染智能化防控,提高畜禽绿色生产水平。

第二,在西北地区开展“农牧一体化”行动。西

北地区发展畜牧业有雄厚的资源基础和较强的环境承载能力,但饲养方式粗放,适宜通过开展“农牧一体化”行动,进一步巩固该地区环境友好和产出高效优势。一是促进农牧循环,以养带种,以种促养。依据环境承载力,坚持种养配套,根据种植业品种分布,合理规划畜牧业养殖布局 and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布局,实现畜禽粪污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二是深入推进“粮改饲”改革,调优“粮食—饲草—畜产品”结构。发挥土地资源优势,支持地区优质饲草料种植,合理布局饲料用地,稳定种养结合关系,积极推广生态种养循环模式。统筹推进畜产品结构、畜产品与农产品结构布局,提升饲料转化率与畜产品利润率。

第三,在中部地区开展“产销一体化”行

动。中部地区人口密集,市场广阔,但养殖用地资源匮乏,适宜通过“产销一体化”行动巩固其资源节约和产出高效优势。一是促进畜牧业生产向企业化运作转变。依靠政策、经济和技术优势,发展规模化养殖的同时,促使养殖场向企业化经营转变,引导养殖企业更精准地捕捉市场动态并及时改变经营战略,克服畜牧养殖盲目从众特性,保障养殖利润。二是产销并重,打造“种养加”一体的绿色畜产品产业链。突破资源环境瓶颈,进行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畜禽养殖附加值。依靠市场优势,公开透明化产加销各环节,增进消费者信任,

做到养得好、产得好、卖得好。

第四,在东部地区开展“绿色标准化”行动。东部地区饲料丰富、养殖历史悠久,但环境承载力有限,适宜通过开展“绿色标准化”行动巩固产品安全优势。一是制定畜牧养殖场建设标准,加快推进“美丽牧场”建设。以畜禽粪污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重点,严格把控畜禽废弃物排放流程,推动畜牧业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推广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和设备,加强废弃物排放监管。二是加快畜禽养殖全过程绿色标准化行动。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田园综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种养结合能力,坚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提高饲料质量检查力度,确保养殖投入品的安全健康,提高畜产品质量。

第五,在西南地区开展“特色品牌化”行动。西南地区畜禽品种多样,养殖户养殖经验丰富,但规模化养殖程度较低,养殖方式传统,环境友好和产品安全水平较低,适宜通过“特色品牌化”行动提高其绿色生产力。一是根据环境承载力,合理规划养殖数量和区域布局,开展适度规模养殖。基于地貌特征和畜种特点,规划区域养殖模式,提高龙头企业对传统养殖户的带动能力,鼓励养殖户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提高养殖效率。二是大力推进“三品一标”(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安全食品、地理标志食品)认证工作,建设一批特色畜产品品牌。依托现有地方品种品牌优势,有计划地推动畜产品认证工作,打造一批绿色畜产品高端品牌。以产品安全为卖点,依靠网络平台开展养殖直播,向消费者展示绿色化饲养全过程,大力推广优质特色畜产品,将西南地区的畜产品推向全国、全球。

2.政策建议

为保证各区域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布局优化行动顺利开展,在技术、规划、政策、监管等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设立畜禽绿色生产养殖重大科技专项,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畜禽绿色生产技术研发与试验。支持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支持规模化养殖场引进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加强新技术推广,做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养殖场户培训,引导养殖户创新并推广新型养殖模式,提高绿色生产技术的普及率。

第二,强化规划引领,合理布局畜禽养殖。根据地区种植业结构合理布局畜禽养殖,缩短农牧结合距离,降低养殖物资和废弃物运输成本,提高种养结合效率。根据各地区畜禽养殖生产能力,支持以县为单位整合屠宰加工企业,扶持重点加工企业,提高畜产品加工深度,提高畜产品储存和运输能力。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扶持物流企业发展,降低畜禽产品运输物流成本。构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优质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网和物流配送网,加强产销衔接。

第三,加强绿色生产政策支持,引导绿色行为。加强对龙头企业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使用的土地与金融政策支持,发挥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引领作用。加强绿色养殖标准的培训和宣传,提高养殖场绿色技术的使用能力。加大对绿色生产技术和设备采用的资金补贴,提高绿色技术和设备普及率。加大对养殖场标准化舍饲改造、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绿色生产行为的政策支持,强化相关政策的落到实处。

第四,建立健全绿色生产监管体制机制。构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从上到下,层层落实,严格畜产品质量监管流程。构建畜产品生产追溯体系,落实生产各环节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饲料、兽药中违法添加剂和药品的检测,定期公布检测结果,严厉打击违法添加行为。加强畜产品生产过程质量监管,提高抽检率。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监管,简化认证流程,降低认证成本,强化认证后的过程监管,切实提高产品安全。

注释

①由于生猪产业是畜牧业的主体部分,本文用生猪产业效率、安全方面的相关指标值来代表畜牧产业。出栏率反映畜牧业资金周转利用状况。②根据《畜禽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不同畜禽种类养殖场和养殖区的养殖规模,可将其其他畜种养殖量换算成猪的养殖量,换算比例为:30只蛋鸡折算成1头猪,60只肉鸡折算成1头猪,3只羊折算成1头猪,1头奶牛折算成10头猪,1头肉牛折算成5头猪。

参考文献

- [1]任保平,李梦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生产力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3).
- [2]李靖,张正尧,毛翔飞,等.我国农业生产力布局评价及优化建议——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

- 题,2016(3).
- [3]王明利.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畜牧业发展:成就、经验及未来趋势[J].农业经济问题,2018(8).
- [4]韩冬梅,金书秦,胡钰,等.生猪养殖格局变化中的环境风险与防范[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6).
- [5] Bai Z, et al. China's Pig Relocation in Balance [J].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19(10).
- [6]张振,乔娟.中国生猪生产布局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8).
- [7]杨子刚,毛文坤,于海朋.中国畜牧业生产区域布局演变分析[J].中国畜牧杂志,2012(10).
- [8]侯麟科,仇焕广,崔永伟,等.环境污染与畜牧业空间布局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2).
- [9]胡明文,黄峰岩.鄱阳湖周边经济区生态畜牧业空间布局与发展模式[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9(5).
- [10]邓国取.我国农区畜牧业产业布局战略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
- [11]王国刚,杨春,王明利.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地域分异特征[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12]孙炜琳,王瑞波,姜茜,等.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与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
- [13]金赛美.中国省际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评价[J].求索,2019(2).
- [14]郭蓓,李婷君,魏东雄,等.北京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推进方向[J].农业展望,2018(2).
- [15]张乃明,张丽,赵宏,等.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J].生态经济,2018(11).
- [16]焦翔.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农业经济,2019(7).
- [17]金书秦,牛坤玉,韩冬梅.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及其“十四五”取向[J].改革,2020(2).
- [18]辛岭,蒋和平.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6).
- [19]陆文聪,张宁,西爱琴,等.浙江省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的基本判断及综合评价[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20]戴健,刘晓媛,苏武峥,丁建国,陆朝晖.现代畜牧业指标体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7(2).
- [21]王勇,李海英,俞海.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10).
- [22]高红贵,赵路.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12).
- [23]张藤丽,焉莉,韦大明.基于全国耕地消纳的畜禽粪便特征分布与环境承载力预警分析[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20(5).
- [24]蒋和平,黄德林.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定量综合评价[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
- [25]张艳荣,王玉新.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凉州区畜牧业效益综合评价[J].湖南农业科学,2009(1).
- [26]姜法竹,张涛,王兆君.效益型畜牧业发展评价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 [27]方大春,马为彪.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时空特征[J].区域经济评论,2019(2).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on Region Layout of Animal Husbandry Green Productivity in China

He Zejun Ji Yifan Zhang Zhao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buil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analyze the regions layout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riving factors about green productivit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9, with using the methods of Entropy weight and Cluster. It was found that from 2009 to 2019, the green productivit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presented a regional layout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and middle”,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green productivity wa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with a development trend “fast in the east and slow in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driving factors of green productivity change in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north, northwest,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western regions are product safety and high output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high output efficiency,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high output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high output efficiency. To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livestock green productivity in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implement “five projects”, such as large-scale breeding in the northern,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northwest,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n the central, green standardization in the eastern, and characteristic branding in the southwest.

Key Words: Green Productivity; Region Layout; Animal Husbandry

(责任编辑:齐 双)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的路径研究*

冉净斐 曹静 刘清峰

摘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一期正式通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产业发展和生态平衡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大多处于欠发达地区,许多地区刚刚摆脱贫困,面临着乡村振兴和环境保护的双重难题。在此情况下,产业生态化转型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只有实现产业生态化,水源地才能完成产业的优化升级,而且,产业发展应该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要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能够有效地保护环境,保护水源地的环境和生态安全。

关键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82-13 **收稿日期:**2021-05-2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激励和路径研究”(2020BJJ068);上海高校智库项目“上海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研究”(ZK2021-1-3-761)。

作者简介:冉净斐,男,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郑州 450001)。

曹静,女,上海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上海 200235)。

刘清峰,男,上海健康医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 201308)。

一、引言

2021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南水北调工程后期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指出“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持续抓好输水沿线区和受水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早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而在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过重要指示,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战略基础设施。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水源

地属于典型的生态敏感区,涉及陕西、湖北、河南、四川和重庆的40余个县(区)市,面积9万多平方千米,人口1200多万人。整个水源地国家级贫困县曾有26个、省级贫困县曾有8个。该区域产业生态化转型的成败既关系到南水北调水质的安全,也关系到水源地区域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发展。

面对中线工程对水源地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双向影响,水源地必须迎难而上,采取有效措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有效措施,确保水源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作为我国的一项战略性基础设施工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这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南北配置、东西部互利、形成合理的配置模式、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水距离长,受水面积大,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中线工

程水源地极易受到人类不当发展活动造成的生态负面影响,属于典型的生态敏感区。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水质安全直接关系到南水北调工程的质量和水平。从现实情况看,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既是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淡水资源库,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因此,提高水源地的生态安全 and 经济发展水平,既关系到南水北调工程的效果,又关系到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成效。在此背景下,南水北调水源地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问题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产业生态化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生态化通过绿色循环生产管理技术的开发使用,模仿自然生态自循环和自净化的过程,将生产对环境的干扰降到尽可能的低值;产业生态化是对自然规律的服从和尊重,在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同时,为自然资源的恢复和再利用留下空间。所以,产业生态化必须既要考虑产业自身的优化,又要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

1. 产业生态化的基本内涵

产业生态化是从产业组织管理的角度出发,进行生产流程的生态化改造,引入环境友好型新技术,借助各种资源的回收再使用,一方面使产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使生态环境能够保持较好的效益。产业生态化实质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实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共生与质地的共同提升。最早提出产业生态化概念的是经济学家罗伯特·弗罗什和尼古拉·斯盖洛普(1989)。他们提出可以通过生产方式的革新来减少产业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并首次运用“产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由此开始了学界对生态化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艾尔斯(1997)、费伊·杜钦(1998)和苏伦·厄克曼(1999)阐述了工业系统生态调整的主旨和作用,他们认为,生态重建会变成产业系统演化的重要路径。T.E.Gradel(1993)和Braden R.Allenby(2005)提出了产业生态系统演化的三个阶段和产业生态系统三级演化理论,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涵盖了要素开发者、要素加工者、消费者以及废物回收者。斯波塞的三级生态系统理论成为产业生态系统演化的

重要理论基石。

产业生态化的实践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丹麦卡伦堡工业园(Kalundborg, Denmark)。该工业园区内部有多种不同业态的企业,如动力发电厂、生物化学制药厂、石膏板材厂、石油冶炼厂、自来水厂以及养殖场等,这些企业天然形成了一个产业代谢的循环交换系统。这种特殊的产业集聚区,产生了类似自然的生态捕食链,上游企业的产品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材料,这使要素成本得到节约,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对环境的污染也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由于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企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所以在决定交换物质数量的企业规模上可以达到最优化的匹配。

20世纪90年代,生态产业园(Eco-Industrial Parks, EIP)概念被正式提出,同时,随着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绿色产业、环境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快速传播,一些发达国家借鉴丹麦卡伦堡工业园的模式,开启了生态产业园区的实践。1992年,加拿大政府对Burnside工业园区实施了生态化的改造,建设了大型集中的清洁生产中心,实现了1200多个企业的绿色化生产;三年后加拿大又在全国推进了工业园区的整体生态转型和改造计划,目前已有超过50个产业园区已经实施了产业生态化转型。与此同时,美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产业园区的产业生态化改造。美国20多个城市开始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并且设立了Fairfield、Cape Charles、Brownsville和Chattanooga等4个生态产业园示范区项目;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还资助了两个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项目。法国运用PALME计划,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敦促企业之间的废弃物和废弃能源之间的相互利用,对通过PALME计划的产业区发放生态认证标志。1995年,日本启动Kokubo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重点推广零排放为主的计划,通过日本通商产业省和环境厅的帮助,川崎零排放工业园2001年正式运作;目前日本大约有100多个生态产业园区已经正式运行。

2. 产业生态化的目标

从产业生态化的内涵可以看出,产业生态化的目标是:通过产业生态化的实施,实现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即产业自身质量能够得到提升,生态环境在产业提升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好的改善,最终达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产业生态化的目的不是为了降低产业效率,而是为了在生态发展的前提下,产业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产业素质能够得到更大的改进。Labys 和 Waddell(1989)提出,物质量减少标志着与发展良好工业有关的低水平材料会被高水平或技术更加进步的材料所代替,并进一步指出,物质量缩减是促进工业发展的基本措施之一。通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可以促使制造企业更好地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出消费者满意、技术上可行的产品。从企业角度来看,大量使用能源和污染严重原材料,一方面会使企业背上沉重的成本包袱,因为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减少,这些能源的供给成本会越来越大,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排放的废水、废弃物过多,就会引起政府的强烈监管,企业可能面临巨额罚金,企业潜在的经济损失也不小。不仅如此,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觉醒,消费者会对非环保产品从心里面产生厌恶感,从而使企业的产品失去部分市场,造成了企业的市场份额丢失。所以,企业进行产业生态化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企业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通过产业生态化转型,一方面使企业的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也能够融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为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更为关键的是,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生态产品,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满意度和忠诚度会大为提升,从而有利于产品的市场开拓。总之,产业生态化对企业本身、政府、消费者都有好处,既实现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又赢得了政府的支持,还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从而使制造业的产业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产业生态化最初的起因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在人类大量的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界或多或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现代产业,开始之初,就使用了大量的自然能源,向大自然排放了很多废弃物。时间长了,引起了大自然的报复。如伦敦酸雨事件、厄尔尼诺现象,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惩罚。这些事件迫使人类必须认真思考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必须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制造业的角度看,其产业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的发展为前提,即产业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所以,产业生态化应运而生。因此,产业生态化的第二个目标是生态环境也必须得到改善。即在制造业发展的同时,不能破坏生态环

境,而且还要使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和发展。只有这样,制造业发展才能有一个持续良好的外部自然环境,社会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如 Audra(1998)认为单向线性物质和能量流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容忍度。因此,必须采取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规制,通过产业流水线的变化,来满足整体生态环境的自然运转。艾尔斯(1997)、费伊·杜钦(1998)和苏伦·厄克曼(1999)阐述了工业系统生态调整的主旨和作用。他们认为,生态重建会变成产业系统演化的重要路径。

3. 产业生态化的要求

要想达到产业生态化的两个目标,在产业生态化过程中,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一是实现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实现产业生态化的主要路径。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运用全面预防的手段,降低或者消除生产及产品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同时又能够满足生产需要,使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综合最大化的一种生产模式。具体方法包括:持续改进产品设计;运用清洁的能源以及原材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与设施设备;改进企业管理;实现废物综合利用,从源头降低污染,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尽量减少生产、服务以及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清洁生产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德克·J.A.(1998)、阿伦·J.巴苏(2001)等人把工业生态学理论和企业实践相联系,并运用清洁生产理论,提出工业生态化程度对企业的清洁生产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二是构建产业生态集聚区。前已述及,构建产业生态园区是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实施产业生态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构建产业生态园,使众多有相互关联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实现产业之间的互联互通,使产业之间形成一个类似自然的生态圈,从而可以更快地促使产业生态化转型。在产业集聚区,可以设立一个清洁中心,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产业生态化的效率,促使企业的生态化转型。Lowe、Warren(1997)等人最早提出了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来实现产业生态化的模式;吴群英、王少华(2006)提出了促进生态发展的具体产业集聚运作模式,运用制革工业的案例,从企业个体层面、产业集群层面和系统制度层面分析了产业集群生态发展的有效路径。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在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的产业生态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些国家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给企业或者产业园区以补贴,提高了企业产业生态化的积极性,推动了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法国政府通过设立PALME标准,规范了企业生态化的要求,使企业进行产业生态化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从而大大推进了产业生态化进程。Thomas(1998)运用一个扩展的生产者责任制度,提出政府必须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内,规范生产者具体的环保责任,以此作为产业生态化的微观手段。F.Boons, W.Baas(1997)提出,在关联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借助财政和金融支持等系列手段,厘清自然资源和公共产品的产权和定价,使生态工业生产方式具备可持续性。E.Kituyi(2004)认为,产业生态化应用的最大障碍是缺失政策、制度以及法规的统一和正确的连续支持。Wonstn(2005)等学者认为,一方面要为企业创造强制性的监管环境,另一方面要为企业营造健康的市场秩序和提供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以使企业在利润的推动下主动展开生态化生产。

三、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实证研究——基于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是衡量一个区域生态承载力的重要指标,是产业生态化的基本要素。通过对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足迹的计算,可以使我们了解该区域产业生态化要素的基本具备情况,把握生态承载力对产业生态化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产业生态化的外部背景。

1.生态足迹的基本含义和计量模型

生态足迹,也称为生态占用,是指为了维持一定数量的人口消耗的资源 and 吸收同类数量的人口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基本的生产用地的总面积。为了维持生存,人类必须消耗各种资源、产品及其相关服务。根据生态足迹理论,人类的每一种最终消费的数量都能够从提供该项生产活动所消耗的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用地进行追溯。因此,从理论上讲,人类系统的所有消耗量均能够转化为同样的生产用地面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生物生产的生产用地面积是维持人口在一定的物质消费水平下可持续生存所必需的生态足迹。它不仅是一定数量

的人口在既定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条件下对环境的影响轨迹,而且也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既定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条件下生存下去对环境的需求。生态足迹理论认为生态承载力是一个区域能够为人类提供的生物生产用地的总面积。生态赤字(或者生态盈余)是把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相互比较,如果一个区域的生态足迹高于其生态承载能力,就表现为生态赤字,否则就会出现生态盈余。

地区人均生态足迹计算的核心指标是人均消费品数量。依据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统计数据,能够得到该地区各个消费项目的总消费数据,然后除以该区域的总人口,能够取得人均消费值。计算生态足迹数据包括五个部分:一是生活资料消费量,包括植物产品、动物产品、副食品、服装产品和家庭耐用消费品5种;二是生产资料消费量;三是建筑材料消耗量;四是能源消耗量;五是区域面积总量。

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是:

$$EF = N \times ef = N \times r_j \times \sum a_i = N \times r_j \times \sum (c_i / p_i) \quad (i=1, 2, 3, \dots, n; j=1, 2, 3, \dots, 6) \quad (1)$$

式(1)中,EF为某一区域的总的生态足迹;ef为区域内的人均生态足迹;

N为人口数; a_i 是第*i*种产品的人均占有的生物生产面积;

c_i 是第*i*种产品的人均消费量; p_i 是第*i*种产品的世界平均生产能力; r_j 是平衡因子;*i*是消费物品和投入的种类;*j*为生物生产面积的种类。

2.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生态足迹的计算

第一,计算生态足迹的生物资源账户。根据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淅川县2017年的统计数据,将生物资源的消耗分为5类: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水果和林木。

第二,计算生态足迹的能源账户。能源消耗主要有煤炭、焦炭、燃油、汽油和电力等。为了回避重复计算,能源账户中不包括热量和原油的消耗。

第三,生态足迹的贸易调整。因为贸易的存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生态足迹可以越过区域边界,所以,在能源以及生物资源的消耗中应当考虑贸易的调整。增减部分主要是把贸易对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的对现实消费的影响进行调动。出口为负,进口为正,然后算出净消费量。淅川县2020年进出口总额为3230万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2671万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82.69%,由此可见,

浙川县的生态足迹需求低于计算值,生态足迹根据进出口比例进行调整(见表1)。

表1 2020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浙川县生态足迹需求汇总

土地类型	人均面积 (公顷)	均衡 因子	产出 因子	人均均衡 面积(公顷)
耕地	0.321200519	2.19	1.21	0.72929138
草地	1.833192987	0.48	0.19	0.927932631
林地	0.007298381	1.38	0.91	0.007811762
化石燃料用地	0.318184599	1.32	0	0.386294737
建筑用地	0.000617466	2.19	1.21	0.001880732
水域	0.3759670916	0.36	1	0.092948154
合计				2.146159396
贸易调整之后				0.912128806

数据来源:作者通过计算得出。

3.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浙川生态承载力的计算

因为耕地、草地和林地等的生物生产力在单位面积上变化很大,为了将计算结果换算为可比标准,将平衡因子(权重)乘以每一生物生产面积,将其变换为同一可比的一个标准。平衡因子是从世界各地的生态足迹的研究报告中选出的。目前使用的平衡因子为: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 1.38,耕地和建设用地 2.19,草地 0.48,水 0.36。特别是在对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时,因为同一生态生产土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一生态生产用地的实际面积不能拿来直接比较。

产出因子是将不同国家和区域同类生态生产用地转变成可比参数面积。它是一个国家和区域某种土地的平均生产力和国际平均生产力的比例数值。通过对浙川县 2020 年平均粮食产量和世界平均粮食产量的比较,得出浙川县耕地产出因子系数为 1.21。这意味着,浙川县耕地的生物产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 1.65 倍。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高产的耕地,其产值与耕地相当,所以产出因子也采用耕地因子。根据中国生态足迹的数值,可以计算出其他土地类型的产出因子。草地、林地、水域面积产出因子分别为 0.19、0.91 和 1。对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时,可将当前物理空间面积乘以对应的平衡因子和区域的产量因子,世界平均生态承载力和世界平均产量就可以正确地进行估算。不仅如此,依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文件,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面积予以专项扣除 12%(见表2)。

表2 2020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浙川县生态承载力账户

土地类型	人均面积 (公顷)	均衡 因子	产出 因子	人均均衡 面积(公顷)
耕地	0.1192	2.19	1.21	0.3789676
草地	0.0005	0.48	0.19	0.3261234
林地	0.1341	1.38	0.91	0.1130125
CO ₂ 吸收	0	1.32	0	0
建设用地	0.0316	2.19	1.21	0.1269142
水域	0.0125	0.36	1	0.0070692
总供给面积				0.5823241
生物多样性用地				0.0721432
生态承载力		均衡 因子	产出 因子	0.5318723

数据来源:作者通过计算得出。

4.结果与分析

通过计算发现,2020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浙川县人均生态足迹为0.9121公顷,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5319公顷,人均生态赤字为0.4145公顷,表明浙川县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通过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浙川县的各种生物生产用地占生态足迹的比例进行比较,能够发现,不同类别土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差别非常明显。按比例所占大小依次是:草地(43.36%)、耕地(37.10%)、化石燃料占地(17.26%)、水资源(3.78%)、林地(0.34%)、建筑用地(0.09%)。这体现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浙川县居民的产业生产和消费结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草地、耕地、化石燃料用地所占比例大,说明第一产业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主要经济生产要素,第二产业消耗更多了更多的能源,第三产业对资源的消耗比例相对较小。同时也说明了在保证基本食物需求后,对动物性食物需求占到了居民消费的大部分。

通过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各种生态足迹的产需比较,能够发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供给超过需求,尤其是建设用地的生态过剩量最多。而耕地草地、水域和化石能源占地求大于供,特别是草地出现的生态赤字量居于首位。这种自然资源供求结构状况与浙川县人口数量关系密切。由人口压力带来的对粮食和动植物需求提高、对能源的需求增加。浙川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其年平均占用的生态足迹为2.13公顷,比我国的平均水平要高。这说明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浙川县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物生产的产出率偏低,反

映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

生态赤字的生产意味着一个地区自然资源的消耗超过了该地区当前自然资源的产出能力,这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必须由自然资本的存量来填补赤字才能获得生态平衡,因此,会导致生态环境的变坏。然而,如果一个区域是开放经济,那么,恰当的贸易往来也可以补充生态赤字的数量,因而能够减轻一个区域环境变坏的状况。2017年浙川县的进口总额比出口总额高出559万美元。可见,发展贸易流通对增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的生态承载力起到了提升作用。

由此可见,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水源地产业结构难以进行生态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产业发展需要超出了区域资源的供给能力。水源地生态保护区的原有产业发展就比较滞后,转型的任务艰巨。随着国家对水源地生态保护要求的提高,水源地企业不能负担这些“特殊”成本,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以浙川、西峡两县为例,根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安排,两县需要承担关停和搬迁的企业“特殊”经济费用,而这些费用和成本是这两个县根本无法负担的。为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深度建设,西峡县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停产、改产、搬迁、整治众多企业,造成县域全部经济损失近30多亿元,仅仅给农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0亿元以上,使地方财政年收入直接减少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降低1000元左右。一些长期在国有林场从事林产品加工业的2万多名工人被迫失去工作,林业加工业的停产损失超过1.5亿元。

二是依靠市场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方式难以奏效。由于生态资源本身是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无成本地消费它们,如果仅仅靠市场的力量,就会产生公共土地效应。所以,在近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必然会出现对资源使用的无限需要。这些年,核心水源地浙川县在有关部门的督促下,曾一度关停多家非法冶金企业。但是,部分非法冶炼厂转向水源涵养区的上游部分县市继续进行非法开采。因此,可以看出,市场对推进产业生态化转型的效果是不太明显的。

三是落后的生态观念制约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以过度消耗资源为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较多的生活污水。在传统农业结构和经济效益的驱动

下,农民无可选择地使用化肥、农药。农药、化肥难以被作物完全吸收,很多通过地面径流和地下渗漏带来二次污染。不仅如此,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深入推进,水源地人地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水源地的群众往往把自己当作最大的利益受损者,生态环境的质量高低并不能使他们看到明显有价值的回报,因此,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难以得到认同。由于生态环境收益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如果一个生态环境保护做得好的区域,无法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该区域居民就会产生一种与己无关的回避心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就难以产生内在的推动力。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滞后、以农业为主的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地尤其如此。当环境保护以减少耕地、拒绝采伐为代价而放弃当期的物质利益时,地方政府和普通百姓就会失去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涵盖丹江口水库提供水源的各个上游区域。这些水源地作为国家具有特别意义的重要资源承载区,肩负着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双重任务。水源地在产业生态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水源地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在此背景下,要想实现产业生态化转型面临着不少困难。

1. 南水北调水源地在产业生态化方面的具体做法

第一,重视生态环境对产业发展的基础作用,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林业。在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的前提下,水源地首先发展了生态农业和生态林业,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提供了基础。水源地对生态农业非常重视,提出了规模、景观、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进“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满足农民愿望。持续促进土地流转,建立水源地生态农业产业带。大力推广柑橘和湖桑、金银花等传统农副产品,促使产业生产基地逐渐变成景区,对生态产品进行深加工处理和仓储式保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进一步加强了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的建设。对高标准粮田进行持续投入,促使优质农产品上市销售。对“三品一标”产品及其基地进行科学认证,进一步提高水源地生态产品的美誉度

和品牌化水平。许多地区建立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机构,组建了相关的生态产业协会,实施技术培训,提高生态农业的发展能力。做大生态林业,培育示范林业基地,对环丹江口水库的生态走廊、景观线路和环路生态带进行重点培养,对石漠化加强治理,推进人工造林,使消落区的生态隔离带更加完善,合理进行生态持续修复,对经济林、景观林进行成片建设,保障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了水质保护,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把污水收集管网的建设作为突出重点,覆盖了核心水源地的全部内河。对大气和水源、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深度治理,推进了湖泊清洁化,加强了对小流域的深度治理。

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的丹江口市,从2017年起,全市对270万亩的山地进行了封山育林,对39.1万亩的土地实施了退耕还林。在山坡、田、水、林等区域开展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建成了18060亩的坡改田,水土流失的防治面积达到了886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由39.3%增加到52.5%。100多家污染企业被关停、30多家企业被环保整改,共投资了3.4亿元环保处理资金。水源区遵照“节水第一、治理后调水、保护后调水”的理念,提出并修订了一套加强和保障生态发展的工作规章,力图使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成为“绿色廊道”和“清水轮廓”的标杆。严格落实排污总量控制的制度,对减排目标落实责任制,重点抓好城市的污水处理以及大范围的畜禽养殖污染源监管,进一步推进水污染防治的深度化,使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数量分别减少了1%、2.5%、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减少了0.5%。目前,丹江口水库的整个水质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地表水的Ⅱ类标准。

在治理非点源污染方面,提倡农民采用有机肥、运用生物防治技术来产出生态农产品。为了进一步高效率地使用资源,提升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源地下大力气建设设施农业,在核心水源地初步建成了核桃和柑橘、茶叶与中药、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并重的“百万亩特色生态农业基地”。农产品加工园区进一步扩大,水产业特色园区得到加强,建成了一批100亿元的农产品深度加工区域。依据“生态自然、休闲观光、产业提质”的基本原则,丹江口市全面建成了以“武当花鼓”为中心的“生态休闲观光农业走廊”。遵循“环境生态第一、产业上规模、市场化经营、基地变景观、产品上品

牌”等理念,构建了丹江北岸的“百里生态农业发展片区”。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中心城镇、特色城镇、脱贫示范村的建设,使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全面有序改善。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新亮点。

第二,初步建立了适应水源地特色的产业结构体系。水源地进一步加速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大力推进产业模式转变,努力建立结构合理、科技领先、生态环保、清洁高效的产业发展体系。丹江口市细化了对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和新材料项目的支持,对汽车零部件、冶金与农业三项“百亿产业”提供了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对于水资源开发、生物制药、信息电子等3个“五十亿”产业也制定了符合实际的产业发展政策。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比为8.7:52.8:38.5,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丹江口市作为水资源比较丰裕的区域,大力促进生态水产品生产加工业的发展,提高饮用纯净水、猕猴桃等果汁饮料、葡萄酒等行业的生产能力。截至目前,以农夫山泉为龙头的一批生态水产品加工企业嬗变为税收增长的重要来源。

淅川县通过选取主导产业,加快转型发展。淅川精选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县域的主导产业,延长产业发展的链条、构建产业集聚区。淅减公司依托科技和名牌优势,抓住市场发展窗口期,实现战略性提升,领先行业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步入稳定发展轨道,淅川产业集聚区被遴选为全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示范区。产业发展层次不断增加。福森药业贯彻“以医药为主,多行业,稳步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连续多年成为全县第一纳税人。林吉特和顺隆弹簧等发展迅速,成为淅川县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项目带动区域发展的效果显著。新建和扩建了如福森新能源等30多个相关产业项目,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所占比重日益提升,产业发展结构进一步提高和优化。对困难企业进行专门帮扶,引导区域内的金融机构采用助保贷、银团贷+封闭运行等信贷变化形式,支撑企业发展。培育区域股权市场,促使时兴农业等15家企业在股权市场上市,挖掘了企业进一步的发展潜能。不仅如此,淅川产业集聚区的质量和效能也大为提升,成为河南省新型工业化的典型产业示范区、独具特色的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被评为河南省“二星级”的产业集聚发展示范区。

第三,重视生态旅游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水源地高度重视生态旅游业对于水源地产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大力倡导旅游品牌化的发展理念。核心水源地淅川县以丹江湖5A景区的建设为主要支撑点,促进了水源地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从2012年到2017年,全县接待的游客总数和旅游的全面效益继续上升,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以上,已经发展成为南阳旅游的重要标杆。水源地提出了凝聚旅游发展资源、整合主要景区的旅游业发展思路,高质量编制了建设方案。丹江大观苑的投资资金数量、年接待游客人数高居南阳所有风景名胜区的首位。香严寺已升格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八仙洞、禅谷风景区的旅游品味逐年提升。乡村旅游得到合理发展。以九重陶岔、仓房磨沟等旅游示范村为引领,促进了农家乐、采摘园等农家旅游业态的发展,超过3星级的酒店达到9家以上。重视宣传对生态旅游的推动作用,积极发挥央视和对口协作单位的帮扶优势,开展了众多推广推介活动,精心创作了系列提升旅游形象的宣传片以及宣传歌曲,有些景点变成了全国影视指定的拍摄重点基地,开始申报丹江湖国家风景名胜区,加快了该景区5A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淅川旅游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得到大幅提高。

丹江口市发挥“武当山”和“核心水源地”的两大优势,凸显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依据全域全景的文化理念,重点打造了风景旅游示范区。第三届武当国际运动会、第四届中国摩托艇联赛在丹江口市举办,提升了水源地旅游的知名度。首列北京“南水北调源头”旅游专列的开行,使得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丹江口”的形象得到良好展现。全面提升五龙宫的旅游品质,组建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利用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区、武当国际旅游港的影响力,对全域旅游进行辐射带动。沧浪海旅游区、武当峡谷漂流风景区被批准为4A级旅游景区。吕家河民歌村、吴家沟故事村等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的典型村。旅游网络营销平台逐渐建立和完善,吸引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在丹江口市建立分支机构。2017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300多万人,旅游总收入73亿元。

2.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应该看到,尽管水源地在产业生态化方面取得

了不少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第一,大量重要的生产要素被水淹没,削弱了水源地产业发展的基础。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将破坏当地大量的基础设施,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仅核心水源地的淅川县,工程建设淹没当地11座桥梁、22个码头、168个泊位、156.6千米10千伏以上的输变电路、194.7千米的电信线路、356.2千米的广播电视线路、1个水电站、193个泵站。农业和工业生产赖以生存的支撑点已经被破坏。农业产业的生产运输成本增加,软环境信息被阻塞,风险系数增大,利润空间缩小,生产成本增加。重建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无疑增加了当地的生产成本。

耕地林地和果用地面积的绝对数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产量,降低了农民收入。随着大坝的加高和蓄水能力的增加,水域面积平均库容增加,这使大量的可耕地被淹没在水库之下。丹江口市的被淹可耕地面积超过20万亩,而且水库淹没的土地主要是高产区和高产园,给当地带来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害,对水源地企业的利润也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水库淹没区原有的大量的企业必须停产或被迫搬迁。一些大型企业,即使在具备在资源可开采和可选择的替代资源存在的条件下,也至少需要5—6年才能完全恢复原有生产产能;如果条件不充分,就永远不能实现重建、恢复原有生产产能。这毫无疑问会对水源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人才流失也会对水源地产业发展造成威胁。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库区的多次移民,导致大量人才外流。以淅川县为例,工程共搬迁了26万名移民,23万多人迁往其他县。在搬迁的23万多人口中,有大量的药材种植、旅游开发、二三产业管理等方面的地方科技人才流失外地。这些人力资本的多次外流,使水源地经济发展失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降低了水源地产业发展的人才保障度。

第二,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惯性对产业生态化产生了较大的阻尼。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利于水源地的产业生态化。水源地很多土地比较贫瘠,农民大量使用化肥来提高粮食的产量,水产养殖业严重污染,是核心水源地总氮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化肥的过度使用会造成农业废物只有1/3被植

物吸收,1/3可以扩散到大气之中,剩下的1/3则会渗入土地之中。伴随着水土流失的加剧,这些污染物进入丹江口水库,对水源地的优质供水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水产养殖业污染也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网箱养鱼的饵料也成为水源地水质污染的又一诱因。生产加工黄姜也会导致另外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在采收阶段会使土地表层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导致土壤流失。在皂素的加工生产过程中,会同时生产出浓度较高的有机废水,这些高浓度有机废水会对水源地的水质造成严重污染。

现有制造业生产对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威胁。水源地的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普遍水平不高,处理能力较低,处理过程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环保技术的政策要求。治污水平较低,难以达到废水的标准排放。一些企业的违法建设还长期存在。还存在一些非法采砂、采矿的问题,直接带来水源地的面源污染。不仅如此,区域产业结构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造纸、酿造、化工制药等企业的碳排放比例较高。

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对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影响。目前,丹江口水库附近的两个大型度假中心产生的污水、几十艘游轮和渡轮给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带来了新的污染。

第三,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生态集聚区。水源地要想实现生态化转型,必须建立起一个引领产业生态化转型的产业生态园区。通过产业生态园区的示范作用,使水源地的企业对产业生态化的方向能够树立清晰的产业生态理念,从而加速产业生态化转型。不仅如此,通过产业生态园区的建设,可以使水源地大多数企业在产业园区内运行,这样就会大大提高产业生态化的效率,推进整个水源地的产业生态化发展。目前,水源地大多数地区的产业生态集聚区还处于一个逐渐形成阶段,由于水源地大多交通不便,地处偏僻,很难吸引有实力的规模化企业入驻园区。原有的地方企业实力不足,相互关联性不高,即使进入产业园区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生态循环,所以延缓了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步伐。

以核心水源地淅川县为例,该县目前建设了上集产业集聚区,园区内的企业主要有汽车配件、食品酱类生产、生物制药等企业类型,这些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不高,所以短时间内还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产业生态链,企业的产品和废水废料还难以成为

其他企业的原料和半成品,因此,产业生态园区的内部企业之间差别较大,联系不高。根据势科学和信息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在差别既定情况下,联系不够,产业园区的生态势也不会很高。

第四,政府的支持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的产业生态化实践证明,要想提高一个地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必须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产业生态化的发展,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制定相应的产业生态化的标准,促使企业进行产业生态化转型。水源地政府大多级别不高,缺乏制定地方产业生态化方面法律法规的权力,不仅如此,由于水源地大多是脱贫之前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区域,因此,财政底子薄弱,难以拿出较多的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发展;即使实施乡村振兴,大多数资金主要投向了农村,而产业发展资金相对不足。所以,水源地政府的支持产业生态化转型方面的力量还非常不足,这使得水源地企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更加艰难。

五、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的路径选择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是否成功,既关乎该区域企业未来的发展之路,也关系着当地的环境保护能否成功。特别是南水北调水源地作为供水区,国家对其生态环境的要求比其他地区更严格,所以既要兼顾当地的产业发展,又要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于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的路径必须合理规划。

1. 重组生产要素,为产业生态化转型提供有效资源保障

水源地由于供水的需要,众多的土地被淹没在水库之中,一些效益好的企业或关停、或搬迁,一些有技术的人才流失到其他地方,使水源地当地的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技术、人力资源都受到较大的损失,产业发展的基础被削弱。为此,必须采取措施,重组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为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打下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合理进行产业的空

间布局。产业发展必须依赖一定的土地。水源地在大量土地被淹后,土地资源有限,加上耕地红线的刚性约束,使得产业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更加稀缺。为此,必须加强土地的合理使用,适当分配出一些土地用于当地的产业发展。可在县城的周围布局一些重要的大型无污染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一些重要集镇布局一些高附加值的食品加工企业和中小型制造企业。以淅川县为例,可在县城布局汽车配件、电子元件等制造业,在香花、九重布局香菇酱等食品加工业,服务业主要布局在县城附近,在重要集镇设立分支机构。

二是合理发挥现有人才优势,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后,很多居民进行了异地搬迁,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人才外流。水源地的产业发展在人才资源方面出现了缺失。因此,水源地必须更加合理地利用好当地的人才资源,促进产业生态化转型。因为当地人才对产业发展和区域情况比较熟悉,加之在当地工作学习多年,区域认同度较高,所以能够更快地作为人力资源要素,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转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利用水源地山青水美的优势,借助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吸引外来人员来水源地建功立业,投入到产业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转型的事业中去。为此,可采用柔性引进、技术入股等方式引进高端人才。

三是积极引进区域外的先进绿色制造企业。南水北调要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但并不意味着就要牺牲水源地产业发展。为改善水源地产业结构,促使水源地产业生态化转型,可以引进区域外的先进绿色制造企业。这些企业的进入,一方面可以提高区域的产业发展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地企业树立一个绿色发展标杆,促使当地企业尽快实施产业升级和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具体方式有区域外先进绿色制造企业直接迁入、先进绿色制造企业帮扶本地企业、先进绿色制造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等。

2.改造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逐步形成适应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模式

水源地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表现为资源利用效率低,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及其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其他污染物对水源地水质有重要的影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破坏。比如养殖业,对丹江水质

起着非常大的破坏作用,大量的养殖饲料威胁着丹江水的水质安全;采矿企业众多,非法采矿时有发生,对汉江上游的水土保持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大量柴油船只的航行带来了新的污染。所有这些,要求水源地必须摒弃原有的、粗放型的产业发展模式,转到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具体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一是取消水源地的养殖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养殖业的特点,造成了它对水质污染的必然性。因此,水源地必须全面取消养殖业,只有这样,才能使丹江的水质稳定在国家Ⅰ类水质的标准上,才能保障受水区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对养殖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资源,可以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的方式进行转移。比如,淅川县近年来全面取消了鱼类养殖,分流的人员投入到生态农业的工作中去。通过对这些分流人员的培训,使他们学会了种植石榴、金银花、板蓝根等生态作物,实现了人力转移和产业的生态化。

二是对污染较大的企业进行关停,大力发展清洁型企业。由于水源地地处秦巴山区,很多地方矿藏丰富,这也就成为采矿业的重要集聚地。以淅川县为例,淅川县伏牛山地区蕴藏着钼矿、石英、大理石、金矿等多种矿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淅川钼矿、淅川金矿、淅川大理石等多个采矿企业,这些采矿企业在采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生态资源,而且对水质也产生较大的副作用。所以,必须关停这些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厂房设备等资源转型,为无污染的高新企业或者精密零件加工业服务,促进企业的清洁化。

三是对因为发展生态旅游而造成的新的污染,采用改造旧设备或使用绿色运输产品的方法。水源地区域为了发展生态旅游,购买了大量的轮船,但这些轮船的燃料大多是柴油,这又会造成对水质新的污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13日视察丹江口水库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责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时解决柴油船改电船的问题。因为柴油在燃烧过程中,由于燃烧不充分,会对水质和大气造成新的污染。发展生态旅游,本身是产业生态化的主要内容,但若缺乏对运输工具的合理选用,也会造成二次污染。因此,必修选用清洁型电动船只,避免新的污染出现。

3. 建立完善产业生态园区,促进产业生态化集聚发展

由于水源地大多位于山区,企业比较分散,要想实现产业生态化的快速转型,必须建立产业生态园区,通过产业集聚的方式实现产业生态化的协调发展。在产业集聚区内部,可以把众多不同类型、相互有上下游关联的企业布局在一个空间区域内,彼此之间既互相分工,又相互协作,可以极大地节约资源和减少浪费,同时对排放的污水和废弃物可以再利用。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产业生态健康起来,促进产业生态化的快速转型。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打造核心企业,围绕核心企业建立产业生态化集聚区。选取本区域的核心企业,以核心企业为龙头建立为核心企业配套服务的产业生态园区。比如淅川县以龙头企业淅川配件厂为核心,建立了汽车配件产业生态园。在这个园区内,集聚了几百家与汽车配件有关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废水排放、环保清洁统一由淅川汽车配件厂负责处理,其他企业主要为配件厂提供各种零件加工、物流运输、原料供应等业务。通过核心企业的这种专门化处理废水废气方式,使其他企业专心本领域的加工和生产,大大提高了产业效率,同时也避免了小企业的污水废气的无序排放,保护了生态环境。

二是按照产业关联关系,把相关企业集聚在一起,建立统一的清洁中心。水源地企业可以按照本区域企业的产业关联关系,把相互关联的企业放在一个区域内,然后统一建立该区域的清洁中心,产业关联企业由于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一个企业的产品可能就是另一企业的原材料,这就节省了运输成本;同时,区域内清洁中心把废弃物统一进行处理,甚至有些废弃物通过回收再利用,成为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原料。所以,这种方式可以使产业的生态化水平得到大幅提高,避免废水废气直接排放到丹江水内。

4.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资金和政策上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

水源地政府虽然大多级别不高,话语权不大,但是由于供水关系,得到了国家以及北京市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以来,国家累计向水源地投入了大量资金,北京市也援建了多个项目。所以,可以借助国家以及北京市的力量,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来支持水

源地的产业生态化转型。具体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争取国家环保资金,支持水源地企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水源地企业大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强,如果再加上环境保护的压力,很多企业可能就因为承受不了高成本而倒闭。实施产业生态化转型,必须加大对产业和设备绿色化的改造力度,必须增加环保设施和设备,而大多数企业只靠自身财力无法做到。作为一个县级或者地市级的、财政收入不高的水源地地方政府,这些支出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利用南水北调国家对供水区的资金支出,专门划拨成立产业生态化转型基金,用于支持区域内企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对于企业采用环保设备、进行环保生产的,给予适当的财政资金支持,促使企业更快地走向产业生态化。

二是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水源地企业的产业生态化转型顺利进行。水源地政府可以利用供水区这一地理优势,向国家申请专门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生态化政策,用于支持企业的生态化转型。如通过申请税收减免政策和贷款贴息政策,对企业购买的环保设备进行贴息,对生产环保型产品的企业进行适当的税收减免。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调动当地企业产业生态化的积极性,使这些企业乐意进行生态化转型。

三是加强政府监管,使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要及时制定有关水源地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法规,提升法治建设水平,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检查。水源地政府应当规定和颁布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政策措施,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充分支持,构建和优化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期监督体制和机制。加强环境保护,修缮技术标准体系,提高监管能力。加快能源环境相关标准的制定和进一步完善,对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分类管理,达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物排放的目标。生态环境部门还要进一步提高监督能力,落实督查责任制。建立良好的企业环境保护评价和监督体系,发挥社会、媒体等各个层面的监督积极性。增加企业违反生态环境法律的成本,敦促企业自愿控制污染,减少环境污染面源。

5. 建立水资源补偿机制,促进水源地产业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公平原则既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遵循

的基本原则,也是度量社会文明与发展的重要标准。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利益共享的水源地与受水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公平原则的主要路径。生态水资源补偿机制的本质是合理确定生态资源与水权的合理转移水平及其相应的利用补偿方案。完善生态资源与水资源补偿机制,是促使水源地生态资源与水资源调整配置的主要经济措施。这为水源地生态资源和水资源的科学经济利用提供了方法和路径,有利于为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筹集大量资金,为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污染治理、水土保持和生态林业建设等环保项目需要巨额的、持续性资金投入。但是,大部分水源地属于经济发展落后、财政相对困难的深度贫困地区,经济实力和财政投资水平不能保证水源地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而受益区大多是发达城市,如北京、天津等,这些地区人口稠密,产业发达,金融实力雄厚。所以,根据“谁受益,谁赔偿”的基本原则,受水区有义务和责任帮助负担水源地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支出的一些资金成本。因此,构建生态水资源补偿机制,对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水源地生态水资源补偿机制必须科学合理,法制透明。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科学界定补偿的方式、范围和内容,来引导水源地正确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应当制定南水北调中线引水工程的生态、水资源保护和相应的补偿法规,科学确定合理的补偿区域和补偿标准,采取正确的补偿方法步骤,加强对补偿资金的科学管理,建立责任明确的监督机制,使补偿资金全面用于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水源地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受水区政府和企业可以在水源地投资建设小流域生态清洁项目,以实施间接性补偿,或者充分利用城市优势,帮助输水区争取更多的产业生态化的发展项目和国家投资。

参考文献

- [1] Amartya K S.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 Sabina A, James F.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 476—487.
- [3] Awan M S, Waqas M, Aslam M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in Pakistan: Provincial Analysis[J]. Nôesis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Humanidades, 2015, 24(48): 54—71.
- [4] Alkire S. Choosing Dimension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7, 76(5): 89—119.
- [5] Alkire S, Santos M E. Acu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 New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s, 2010(HDRP-2010-11).
- [6] Tsui K 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ices[J]. Social Choice & Welfare, 2002, 19(1): 69—93.
- [7] 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M].夏善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8] 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 [9] 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M].侯艳芳,杨晓燕,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 [10] 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3).
- [11] 刘国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 [12] 曾晓文,刘金山.广东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战略与路径[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6(5).
- [13] 颜建军,徐雷,李扬.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的湖南省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J].经济地理, 2017(6).
- [14] 付德申.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 2017(3).
- [15] 张亚明,陈宝珍.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产业生态化效率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 2016(12).
- [16] 张云,赵一强.环首都经济圈生态产业化的路径选择[J].生态经济, 2012(4).
- [17] 张昊楠,秦卫华,周大庆,等.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活动现状[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6(1).
- [18] 熊鹰.生态旅游承载力研究进展及其展望[J].经济地理, 2013(5).
- [19] 陈长.省域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发展理论、实证——以贵州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 2019(8).
- [20]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内容简介[EB/OL]. (2003-08-25). http://www.nsbdl.gov.cn/zx/gcgh/200308/t20030825_195165.html.
- [21] 曾鹏,韩晓涵.中国城市群产业生态化及其空间特征[J].统计与决策, 2020(8).
- [22] 谷树忠.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理论思考[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10).
- [23] 程莉,孔芳霞,文传浩,等.流域产业生态化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金沙江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 [24]高建中.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补偿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 [25]刘海,武靖,殷杰,等.丹江口水库动库容估算及其变化[J].应用生态学报,2018(8).
- [26]赵晓丹,李长新.丹江两支流遭毒钒污染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N].法制早报,2005-05-16.
- [27]刘则渊,王贤文.生态经济学研究前沿及其演进的可视化分析[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8(8).
- [28]方时姣.西方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J].学科流派,2012(6).
- [29]戴君虎,王焕炯,王红丽,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框架与生态补偿实践[J].地理科学进展,2012(7).
- [30]Wang Yaju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y in Western China: A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21, 12(1): 68—79.
- [31]白钰,曾辉,魏建兵.关于生态足迹分析若干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6).
- [32]谭伟文,文礼章,仝宝生,等.生态足迹理论综述与应用展望[J].生态经济,2012(6).

Study on the Path of Industr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Source Area in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Ran Jingfei Cao Jing Liu Qingfeng

Abstract: The Middle Route Project of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is an important large-scale project involving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first stage of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officially open to wate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water source area in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have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Most of the water sources in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are located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Many areas have just got rid of poverty and are facing the dual proble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is case, industr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solve this problem. Only by 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can the water source area comple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source industry in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should be able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ater qualit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while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h to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The Core Water Source Area; The Industr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高质量发展】

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

摘要:基于2001—202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并辅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首先,对中国的研发投入状况进行了描述,并通过马姆奎斯特指数对研发投入绩效进行了测算;其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出发,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进行测度;最后,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变系数模型,探究研发投入对中国整体及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大体上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整体上的显著影响,但各省(区、市)的差异性较大,非均衡性较为突出。

关键词:研发投入;研发绩效;经济发展质量;马姆奎斯特指数;面板变系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095-12 **收稿日期:**2021-02-15

***基金项目:**“河南省中原千人计划”(ZYQR201810077)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课题组负责人:刘定平,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教授、院长(郑州 450046)。

课题组成员:张安然,张雪燕,杨旭,刘岳泽。

一、引言

目前,中国正处在由经济增长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时刻,若要在全世界发展的洪流中奋勇争先,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还要看创新发展的能力及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研发投入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助推中国经济发展攻坚战中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容小觑。而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虽逐年保持较快增长,但却存在着诸如研发投入强度及质量不够、区域间研发投入差距显著等问题,这使得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各地区间存在差异。本文旨在探究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通过识别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以期发现未来经济发展中应特别关注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使政策制定更加有的放矢。

“高质量”本是一个较为泛化的术语,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高质量”的时代内涵。詹新宇(2017)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一级准则层,研究发现绿色和共享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而创新、协调和开放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产生阻碍作用。在此基础上,朱卫东等(2019)增加了效率、质量、结构、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要素,组成10个维度的指标对中国高质量发展进行计算,提出了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应放在改善经济结构等方面。

研发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研发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发重要。王璐(2007)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均衡的增长是知识积累促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的结果。谢兰云(2013)研究了中国省域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空间相关性,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来看,一个省份的研发投入能够通过四条途径作用于

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巫强(2020)着眼于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能直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观点。

二、中国研发投入分析

本文从研发投入总体情况、省(区、市)研发投入差异以及研发投入绩效3个层面出发,对中国研发投入进行描述及分析。

1.中国研发投入总体情况

研发投入总体情况主要从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研发人员是指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

员,本文以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研发人员投入规模的衡量指标,以研发人员中研究人员所占比重作为研发人员投入的质量指标;R&D经费内部支出是指调查单位在报告年度用于内部开展R&D活动的实际支出,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最主要的指标之一,本文以R&D经费内部支出表征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以R&D经费内部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指标。

由于2001—2009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未统计研发人员中研究人员所占数量,因此选取相应年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代替研究人员数量。2000—2019年全国研发人员及研发经费投入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19年全国研发投入情况

年份	人员投入		经费投入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研发人员投入质量(%)	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万元)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2000	922133	75.38	8956645	0.92
2001	920837	78.10	10424855	0.98
2002	1051773	79.03	12876446	1.09
2003	1065243	78.99	15396346	1.14
2004	1152611	80.36	19663285	1.20
2005	1364835	81.97	24499731	1.24
2006	1502474	81.45	30030966	1.30
2007	1734789	81.99	37102420	1.35
2008	1965361	81.02	46160218	1.41
2009	1954933	58.94	58021068	1.59
2010	2553858	47.41	70625775	1.62
2011	2882942	45.72	86870093	1.67
2012	3246845	43.24	102984090	1.79
2013	3532822	42.01	118465980	1.88
2014	3710579	41.08	130156297	1.90
2015	3758850	43.07	141698846	1.96
2016	3878060	43.63	156767484	2.01
2017	4033598	43.15	176061295	2.08
2018	4381445	42.59	196779294	2.15
2019	4625848	40.85	221435774	2.25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研发经费的投入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上升,但二者的增速并不一致,投入强度的上升速度略低于投入规模的上升速度。在研发人员投入方面,研发人员投入规模在研究时段内持续上升,但无论是以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是研究人员数量计算出的研发人员投入质量,其发展态势均不甚明朗,呈现出明显

的波动甚至下降态势。

2.全国各省(区、市)研发投入差异

相比于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更能准确、全面地代表整体研发投入的情况,所以本文从研发经费角度出发,对全国各省(区、市)的研发投入现状进行分析。以2019年为例,全国各省(区、市)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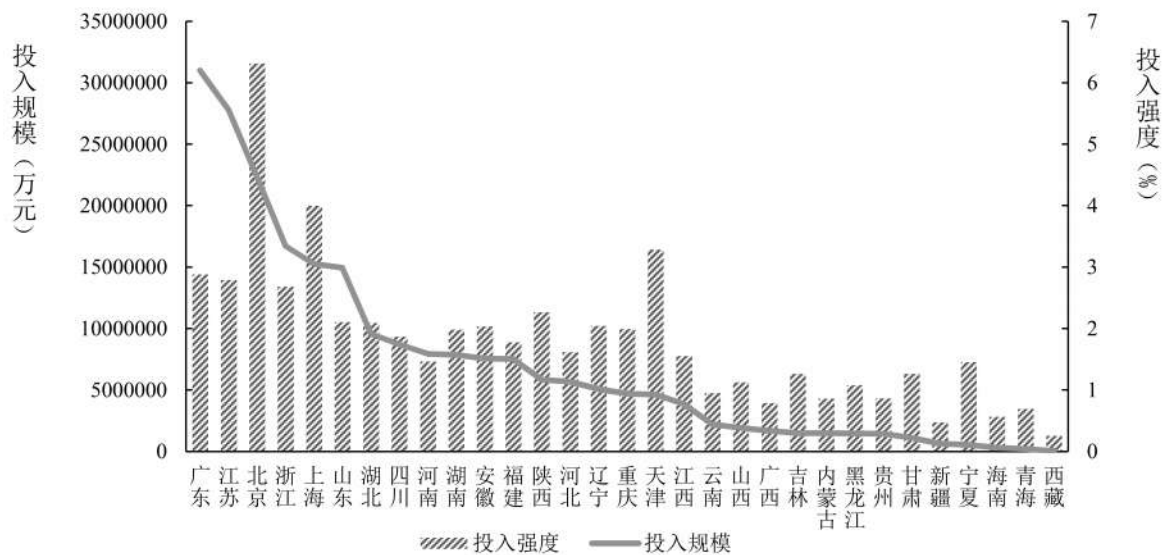


图1 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研发经费投入状况

如图1所示,全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的两级分化较为明显,且分布不均。2019年,广东省的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在全国居于首位,远远大于排名最末的西藏自治区,但其经费投入强度却并非第一,存在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与强度不匹配的现象;而天津市虽然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表现的不甚理想,但其投入强度在全国排名第三;新疆、海南、青海、西藏四地则在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因此,对部分研发投入表现不理想的地区未来应加大政策倾斜程度,尽可能使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均衡发展,同时适当缩小各省(区、市)间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的差距。

3.中国研发投入绩效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测定的经典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DEA),后又发展成为马姆奎斯特指数,也就是本文对研发投入绩效进行测度所采用的方法,在对马姆奎斯特指数进行计算时,所选取的投入及产出方面的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研发投入绩效测度指标

指标类型		变量名称
投入指标	人员投入	各省(区、市)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各省(区、市)研发人员中研究人员比例
	经费投入	各省(区、市)研发经费投入(万元)
		各省(区、市)研发经费投入/生产总值
产出指标	科技产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GDP比重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

投入方面的指标选取依旧从人员及经费两方面出发,包含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人员中研究人员比例、研发经费投入以及研发经费投入与生产总值之比四个指标。研发产出主要包括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两方面,其中直接产出大多以专利、科技著作和论文等来表示;间接产出是指研发成果的市场化。衡量研发投入的产出指标较多,考虑到测度的全面性及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取各省(区、市)新产品销售收入占GDP比重、各省(区、市)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以及各省(区、市)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这三个指标代表研发投入的产出情况。

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在2008年后才开始统计研发人员中研究人员所占数量,因此本文仅选取2009—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发投入绩效的测度。考虑到研发投入与产出之间所存在的滞后期问题,本文将产出指标滞后一年进行计算。

第一,各年研发绩效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动指数分解。2009—2019年,中国研发投入绩效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马姆奎斯特指数及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不难看出,2009—2019年,中国研发投入绩效整体增幅不大,仅为0.43%。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上升最多,这表明除扩大研发投入规模外,全国研发绩效的上升还离不开近年来国家对技术改革和创新的扶持,也离不开国家经济发展方略的转变。整体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一系列创新政策、技术进步以及政府扶持等非生产

表3 2009—2019年中国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及分解结果

年份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指数	规模效率指数	马姆奎斯特指数
2009—2010	1.041	1.096	1.021	1.019	1.141
2010—2011	1.043	1.016	1.024	1.019	1.06
2011—2012	1.132	0.904	1.139	0.994	1.023
2012—2013	0.967	1.039	0.971	0.996	1.004
2013—2014	1.003	0.971	1.011	0.992	0.974
2014—2015	1.035	1.095	1.028	1.007	1.133
2015—2016	1.031	0.961	1.039	0.992	0.99
2016—2017	1.033	0.978	1.039	0.994	1.011
2017—2018	1.051	1.075	1.038	1.013	1.13
2018—2019	0.966	1.013	0.958	1.008	0.978
均值	1.029	1.013	1.026	1.003	1.043

性因素的助推下,我国的研发投入绩效在大部分年份都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

第二,各省(区、市)研发投入绩效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2009—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及分解结果

省(区、市)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指数	规模效率指数	马姆奎斯特指数
北京	1.000	1.022	1.000	1.000	1.022
天津	1.000	1.014	1.000	1.000	1.014
河北	1.082	0.992	1.067	1.015	1.074
山西	1.061	0.984	1.060	1.001	1.043
内蒙古	1.062	0.997	1.038	1.023	1.059
辽宁	1.015	1.039	1.012	1.002	1.054
吉林	1.000	0.966	1.000	1.000	0.966
黑龙江	1.073	1.013	1.080	0.993	1.087
上海	0.98	1.031	0.985	0.994	1.010
江苏	0.985	1.127	0.985	1.000	1.109
浙江	1.000	1.055	1.000	1.000	1.055
安徽	1.057	1.004	1.051	1.005	1.061
福建	1.039	1.019	1.000	1.039	1.058
江西	1.124	0.984	1.123	1.001	1.106
山东	0.988	1.047	0.985	1.003	1.035
河南	1.048	1.009	1.042	1.005	1.057
湖北	1.056	1.027	1.058	0.998	1.085
湖南	1.031	0.979	1.028	1.003	1.010
广东	1.000	1.128	1.000	1.000	1.128
广西	1.033	0.939	1.015	1.018	0.970
海南	1.044	0.976	1.000	1.044	1.019
重庆	0.971	0.971	1.000	0.971	0.943
四川	1.045	1.016	1.045	1.001	1.062
贵州	1.056	0.970	1.055	1.001	1.024
云南	1.023	1.001	1.021	1.001	1.024
西藏	1.000	1.064	1.000	1.000	1.064
陕西	1.093	1.019	1.094	1.000	1.114
甘肃	1.005	1.048	1.003	1.001	1.053
青海	1.000	1.013	1.000	1.000	1.013
宁夏	1.000	0.991	1.000	1.000	0.991
新疆	1.054	0.981	1.069	0.986	1.034
均值	1.029	1.013	1.026	1.003	1.043

数据显示,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中有27个省(区、市)的研发投入绩效呈增长态势,可见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绩效提升之间的关系。但是,技术进步等非生产性要素在对研发投入绩效的提升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在宁夏、广西等研发投入绩效呈下降态势的地区。由表4中数据可见,中国有12个省(区、市)的技术进步指数表现不佳,因此,想要研发投入绩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就需在技术创新方面下足功夫。由于全国仍有部分地区技术进步情况并不理想,整体研发投入绩效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因此,未来应在提高研发投入的同时,切实做好技术提升工作,大力鼓励技术创新。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国内一些学者基于新发展理念对国家及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基础性研究,并建立了一些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由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因素存在多元性,所以本文在对以往指标体系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尝试构建了符合中国发展情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创新产出、协调发展、绿色生活、对外开放、成果共享5个方面出发,建立包含5个一级指标、34个二级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及各指标的单位 and 属性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创新产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GDP比重	%	正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	%	正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	件	正
	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数	件	正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项	正
	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正
协调发展	城乡消费比	—	逆
	城乡收入比	—	逆
	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	正
	第三产业比重	%	正
	城镇化率	%	正
	工业化率	%	正
	二元对比系数	—	正
绿色生活	万元工业产值SO ₂ 废气排放量	千瓦时/万元	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正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
	森林覆盖率	%	正
	万元GDP电耗	千瓦时/万元	逆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
	万元GDP水耗	立方米/万元	逆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	正
	城市燃气普及率	—	正
对外开放	对外贸易依存度	—	正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	%	正
	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经济占比	%	正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	人	正
	外商投资企业数	个	正
成果共享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	辆	正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正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	个	正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正
	医疗保险覆盖率	%	正
	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	个	正
	人均教育经费	元/人	正

创新产出中二级指标的选取从形成专利和创造收入两个角度入手,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占GDP比重、有效发明专利数等6个指标;协调发展中二级指标的选取主要基于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包括城乡消费比、城镇化率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等7个指标;在绿色生活方面,本文从资源消耗、环境质量,以及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采用万元GDP电耗、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以及燃气普及率等9个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基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利用外资和人员交流两个方面选取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和接待国际旅游人数等5个指标作为其二级指标;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本文通过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教育经费等7个指标,对中国的成果共享方面进行考察。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部分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由于各指标之间存在着数量级和量纲的不一致性,因此采用Max-Min归一化方法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作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j) - \min(x_j)} \times 0.9 + 0.1$$

逆向指标:

$$x'_{ij} = \frac{\max(x_j) - x_{ij}}{\max(x_j) - \min(x_j)} \times 0.9 + 0.1$$

3.传统熵值法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

常用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由于熵值法可以通过实际数据得到指标的最优权重,能够较为深刻地反映指标信息熵的效用价值,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对中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的过程如下:以m个年份为评价对象,计算第j个指标中第i个评价对象的比重

$$y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进而得出第j项指标信息熵 $e_j = -K \sum_{i=1}^m y_{ij}$

$$\ln y_{ij},$$
最后得到第j项指标权重 $w_j = \frac{1 - e_j}{n - \sum_{j=1}^n e_j}$ 。

将二级指标权重按一级指标合并后得到创新产出、协调发展、绿色生活、对外开放和成果共享所占权重,如表6所示。并计算出质量指数 $U_i = \sum_{j=1}^n y_{ij} w_j$,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6可知,绿色生活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这说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创新发展在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约为0.18,这也从实证的角度说明

表6 高质量发展五大指标所占权重

	绿色生活	成果共享	协调发展	创新产出	对外开放
权重	0.251	0.201	0.198	0.179	0.171
排序	1	2	3	4	5

表7 2000—2019年中国高质量发展五大指标质量指数及综合质量指数

年份	创新产出	协调发展	绿色生活	对外开放	成果共享	综合质量指数
2000	0.0083	0.0614	0.0552	0.0206	0.0458	0.0803
2001	0.0013	0.0545	0.0475	0.0174	0.0580	0.0751
2002	0.0115	0.0424	0.0209	0.0229	0.0145	0.0450
2003	0.0163	0.0394	0.0300	0.0283	0.0247	0.0561
2004	0.0227	0.0507	0.0595	0.0457	0.0339	0.0873
2005	0.0199	0.0546	0.0784	0.0505	0.0399	0.1014
2006	0.0233	0.0534	0.0895	0.0648	0.0424	0.1136
2007	0.0280	0.0633	0.1158	0.0745	0.0558	0.1411
2008	0.0381	0.0742	0.1349	0.0928	0.0691	0.1702
2009	0.0371	0.0738	0.1578	0.0848	0.0780	0.1820
2010	0.0439	0.0830	0.1737	0.0982	0.0804	0.2016
2011	0.0617	0.1016	0.1858	0.1080	0.0967	0.2313
2012	0.0762	0.1157	0.1948	0.1111	0.1079	0.2522
2013	0.0863	0.1439	0.1816	0.1064	0.1165	0.2622
2014	0.0941	0.1461	0.2156	0.1089	0.1240	0.2868
2015	0.1027	0.1565	0.2214	0.1126	0.1307	0.3008
2016	0.1185	0.1583	0.2249	0.1191	0.1390	0.3145
2017	0.1335	0.1500	0.2294	0.1296	0.1508	0.3272
2018	0.1589	0.1523	0.2407	0.1361	0.1556	0.3471
2019	0.1781	0.1587	0.2501	0.1417	0.1670	0.3677

了把创新作为发展主要驱动力的准确性。

由表 7 可知,近 2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及其在创新产出、协调发展、绿色生活、对外开放、成果共享五个方面的发展态势良好,均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指数却偏低。

从绿色生活方面来看,其所占权重最大,指数的增幅也最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中国越来越注重“绿色经济”的发展,在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破坏、提高污染治理力度、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成果共享指标的权重仅次于绿色生活,但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拉动作用却相对较弱。中国长期致力于发展独具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共享经济,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均付诸较大投入,但基数庞大的人口也间接导致发展成果难以惠及到每一个人,因此,中国在成果共享领域依旧需要付诸更多努力与实践。

协调发展指标的权重略低于成果共享,但其指数持续攀升,增幅明显,表明中国在经济发 展进程中注重区域以及产业间等的协同发展,在解决城乡差异等阻碍均衡发展的问题中取得了显著成果。

创新产出指数的增长虽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但与其余 4 个指标相比,创新产出指数在大部分年份均处于末位,这大大地抑制了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增加。且从前文的研究结果可知,中国研

发人员投入质量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也是创新产出指数无法取得较大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外开放指标所占权重在五大指标中处于末位,虽然开放发展质量指数较低,但相对早期发展状况,其已取得较大攀升。尽管 5 个指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所差异,但 5 个指标指数总体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表明中国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进程中稳步前进。

4.面板数据熵值法测度全国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

对全国各省(区、市)的质量指数进行测度时,计算方法与传统熵值法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归一化和信息熵的计算两个方面。归一化处理时将第 j 个指标中第 i 个评价对象比重的计算调整为 $y_{pij} = \frac{x'_{ij}}{\sum_{p=1}^q \sum_{i=1}^m x'_{ij}}$,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调整为 $e_{pj} = -K \sum_{p=1}^q \sum_{i=1}^m y_{pij} \ln y_{pij}$,据此计算可以得到全国各省(区、市)基于时间序列的综合质量指数。

根据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可将全国 31 个省(区、市)通过 K-Means 聚类分为 4 个梯队,聚类结果、所属地理区域及 2019 年全国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如表 8 所示。

从 2019 年全国经济发展质量来看,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四地的经济发展质量以显著优势领跑其他省(区、市)。

依托江苏省、浙江省等发展主力的引领,华东

表 8 2019 年中国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情况

所属地理区域	省(区、市)	经济发展质量	聚类结果	所属地理区域	省(区、市)	经济发展质量	聚类结果
华东地区	上海	0.20443	第一梯队	华南地区	广东	0.27857	第一梯队
	浙江	0.23075	第二梯队		海南	0.16656	第三梯队
	江苏	0.23604	第二梯队		广西	0.16339	第三梯队
	山东	0.20197	第三梯队	东北地区	辽宁	0.18479	第三梯队
	福建	0.18859	第三梯队		黑龙江	0.17117	第三梯队
	安徽	0.18381	第三梯队		吉林	0.16579	第三梯队
华北地区	北京	0.21559	第一梯队	西北地区	陕西	0.17199	第三梯队
	天津	0.17624	第二梯队		新疆	0.15475	第四梯队
	河北	0.17821	第三梯队		宁夏	0.15392	第四梯队
	山西	0.15925	第三梯队		青海	0.15080	第四梯队
	内蒙古	0.16743	第四梯队		甘肃	0.14492	第四梯队
华中地区	湖北	0.18053	第三梯队				
	江西	0.17858	第三梯队				
	湖南	0.17545	第三梯队				
	河南	0.17226	第三梯队				

地区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首都北京市近年来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高质量发展势头正旺,华北地区通过北京带动周边省(区、市)发展,与华东地区各省(区、市)形成带状的高、中端经济发展质量地区;而处于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三省经济发展状况则稍显逊色,未能充分利用优势促进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地理等因素的影响,较低经济发展质量区则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

从聚类结果来看,中国多数省(区、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均处在第三及第四梯队,也就是经济发展质量中等偏下的等级,这也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综合质量数值偏低的重要原因。为探究制约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源,本文分别选取北京市、广东省、河南省和甘肃省作为经济发展质量4个等级的代表,并通过雷达图对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创新产出、协调发展、绿色生活、对外开放、成果共享五个方面进行强项和弱势的相关分析。

由图2可知,处于较高经济发展质量区的北京市在成果共享、协调发展及绿色生活3个维度均达到较高水准,其中,绿色生活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最大,而创新产出则呈现较低的发展态势,相较于其他4个方面而言,对外开放的发展情况欠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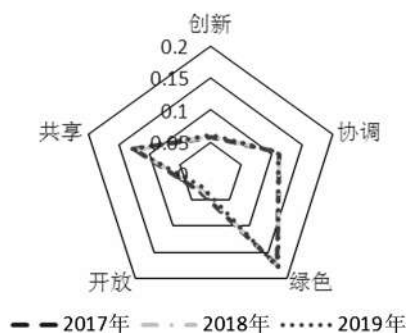


图2 北京市经济发展质量雷达图

由图3可知,处于经济发展质量区第二梯队的广东省在创新产出和绿色生活方面存在较大优势,其中,创新产出指数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成果共享、协调发展及对外开放的发展状况则欠佳。

由图4可知,河南省在成果共享、协调发展以及绿色生活方面的发展较好,而创新产出和对外开放则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直接成为经济发展质量第三梯队地区的两大短板。

由图5可知,处于较低经济发展质量区的甘肃



图3 广东省经济发展质量雷达图



图4 河南省经济发展质量雷达图



图5 甘肃省经济发展质量雷达图

省在绿色生活、成果共享及协调发展3个方面呈现显著优势,但同时,其创新产出和对外开放也呈现出显著的劣势,这使得甘肃省的经济发展质量未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总体来看,中国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根据等级差异存在不同的“城市短板”。但无论处于哪个等级,创新产出和对外开放均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四、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于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进一步建立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及变量选取

相较于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更能代表研发投入的状况,因此在下文的研究中,选取研发经费投入作为研发投入的衡量指标。为实证检验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y_{it}=\mu_i+\varepsilon_{it}+\beta_0x_{0it}+\beta_1x_{1it}+\beta_2innovate_{it}+\beta_3coordinate_{it}+\beta_4green_{it}+\beta_5open_{it}+\beta_6share_{it}$$

其中, x_{0it} 与 x_{1it} 分别代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研发经费投入规模, β_0 与 β_1 是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系数, $\beta_2-\beta_6$ 是创新产出、协调发展、绿色生活、对外开放、成果共享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系数。

为探究研发投入对中国整体及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分别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和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由于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有滞后作用,因此,将研发投入滞后一阶进行回归。

2.指标诠释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2000—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前文的计算。

本文解释变量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其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可通过计算研发经费内部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得到,它是世界范围内认可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通过熵值法在前文经测算得出。

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在全要素的环境中综合形成的,不能孤立地去计量其贡献,因此,本文将创新产出、协调发展、绿色生活、对外开放、成果共享5个分量指数均纳入模型中,将它们作为5个环境变量。

3.数据甄别

对拟定的8个统计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具有平稳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统计建模。

4.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计算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与5个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发现,无论是研发投入规模,亦或是研发投入强度,其与创新产出间的相关

表9 统计指标的单位根检验

统计指标	检验统计量	P值	检验结果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9.52	0.00	平稳
研发投入规模	10.53	0.00	平稳
研发投入强度	9.09	0.00	平稳
创新产出	10.17	0.00	平稳
协调发展	8.98	0.00	平稳
绿色生活	8.44	0.00	平稳
对外开放	7.63	0.00	平稳
成果共享	7.73	0.00	平稳

系数均在0.6以上,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在下面的研究中将创新产出进行剔除,同时对研发投入规模进行取对数处理。

对建立的面板模型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得出统计量 $H=86.87$,相对应的 P 值为0.00,检验结果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由于研发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着明显的滞后性,所以对研发投入强度及研发投入规模滞后一阶进行回归,其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统计指标	系数	标准误	t	P> t
研发投入强度	0.00696	0.001	10.20	0.00
研发投入规模	-0.00004	0.001	-0.06	0.95
协调发展	0.26020	0.037	6.95	0.00
绿色生活	0.46783	0.019	24.27	0.00
对外开放	0.4340	0.036	12.02	0.00
成果共享	0.58483	0.024	24.69	0.00
常数项	0.00105	0.005	0.21	0.84
$F(6,552)=3973.62$			Prob>F=0.00	

由估计结果可知,协调发展、绿色生活、对外开放、成果共享4个环境变量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均为正向,且在统计上显著。

在控制了环境变量后,研发投入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于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投入规模这两个解释变量来说,研发投入强度避免了经济总量的变化对研发投入的绝对影响,更能合理地度量全国各省(区、市)研发投入情况,因此,本文在下面的研究中仅保留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解释变量。为进一步探寻研发投入对中国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选择按个体变系数模型进行面板回归,观察各省(区、市)研发投入强度对其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5.变系数模型

在通过变系数模型进行面板回归之前,必须确认系数的变化是否与个体有关。本文采用斯瓦米(Swamy)检验进行判断,通过Stata 15.1计算的斯瓦

米统计量 $\chi^2=5831.76$,相对应的P值为0.00,所以拒绝斜率与个体无关的原假设,选择斜率随个体随机变化的面板数据模型。

对所建立的面板模型按个体进行变系数回归,同时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进行滞后一阶处理,其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变系数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个体	自变量系数	标准误	t	P值		个体	自变量系数	标准误	t	P值
自变量系数显著	广东	0.0309	0.0006	45.58	0.00	自变量系数不显著	江西	0.0053	0.0011	2.01	0.05
	江苏	0.0169	0.0008	16.72	0.00		福建	0.0012	0.0015	-1.18	0.25
	浙江	0.0138	0.0006	19.23	0.00		西藏	0.0005	0.0032	-0.79	0.44
	安徽	0.0101	0.0004	17.36	0.00		辽宁	0.0039	0.0011	0.75	0.46
	湖北	0.0066	0.0006	5.79	0.00		协调发展	0.3372	0.0498	6.77	0.00
	山东	0.0063	0.0007	4.75	0.00		绿色生活	0.5148	0.0150	34.39	0.00
	湖南	0.0061	0.0009	3.43	0.00		对外开放	0.2258	0.0525	4.30	0.00
	河南	0.0061	0.0007	4.38	0.00		成果共享	0.4719	0.0392	12.05	0.00
	河北	0.0058	0.0006	4.86	0.00		常数项	0.0014	0.0030	0.48	0.64
	上海	0.0030	0.0004	8.11	0.00						
	黑龙江	0.0008	0.0006	-3.54	0.00						
	重庆	0.0006	0.0007	-3.20	0.00						
	天津	0.0004	0.0010	-2.68	0.01						
	陕西	-0.0013	0.0018	-2.41	0.02						
	云南	-0.0014	0.0014	-3.17	0.00						
	山西	-0.0019	0.0015	-3.31	0.00						
	广西	-0.0021	0.0018	-2.86	0.01						
	甘肃	-0.0022	0.0023	-2.29	0.03						
	北京	-0.0029	0.0006	-9.34	0.00						
	吉林	-0.0029	0.0015	-4.08	0.00						
	贵州	-0.0033	0.0028	-2.21	0.04						
	新疆	-0.0037	0.0013	-5.01	0.00						
	青海	-0.0041	0.0012	-5.73	0.00						
	宁夏	-0.0051	0.0027	-3.00	0.01						
	内蒙古	-0.0078	0.0029	-3.72	0.00						
	海南	-0.0129	0.0029	-5.43	0.00						

由回归结果可知,4个环境变量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与变系数模型下的回归结果均为正向,且在统计上显著。

观察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系数的显著性可知,有27个省(区、市)的研发投入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其中,广东省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为江苏省。结合前文对全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聚类结果可知,经济发展质量处于第二梯队及以上的6个省市中,有5个省市的研发投入系数显著,且系数显著的27个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均处于第三梯队及以上,而全国31个省(区、市)中,仅有4个省(区)的研发投入系数表现不显著,这些省(区)均处于较低经济发展质

量区,这说明经济发展质量越高的城市,研发投入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显著。这是因为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中的创新部分及其相关产出而言十分重要,不仅能够促进相关部门的研发活动,使创新产出大幅增加,还能破解其在改善环境及能源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通过观察研发投入系数的正负可知,有13个省(区、市)的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为负。结合前文对各省(区、市)研发投入绩效测算进行研究,发现这13个省(区、市)中,有10个省(区、市)的研发投入绩效小于全国均值,这导致了这些省(区、市)的研发投入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并且这些省

(区、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也普遍较低。由于经济发展质量较低,这些省(区、市)的资金投入会更多地用于扩大经济规模,尤其是区域中的各企业,其研发投入存在名实不符的可能,特别是研发经费中的政府投入资金部分,由于其实际用途和使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使得部分政府研发投入被企业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研发资金的浪费,而企业规模的过分扩大也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状态,使得研发活动投资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从而研发投入绩效表现的不甚理想,所以研发投入反而会阻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全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对其研发投入与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研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在研究时段内,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均迅速增长,但研发人员投入质量却并未得到显著提升,甚至在部分年份呈现出下降态势;除此之外,不同省(区、市)之间,研发投入的差异较大,且存在研发投入规模与质量不匹配的问题。

第二,中国各省(区、市)近10年的马姆奎斯特指数显示,研发投入绩效在研究时段内保持了一致的较小幅度的增长。其中,技术效率的贡献较为突出,纯技术效率贡献次之,但在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上的贡献不足。

第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出平稳的增长态势,研究时段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9%;从五大发展理念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来看,各因素贡献的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绿色生活、成果共享、协调发展、创新产出、对外开放;受各省(区、市)地理因素等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虽不同发展等级的地区在发展弱项上有所差异,但无论处于哪个等级,创新产出和对外开放均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四,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中国大部分省(区、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影响,且各省(区、市)间差异性较大,非均衡性突出。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系数显著的地区,其经济发展质量也

较好,而研发投入影响不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则较差;研发投入影响为负的省(区、市),不仅经济发展质量较低,其研发投入绩效也不甚理想。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持续提升研发人员投入。研发人员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方面,而中国的研发投入绩效之所以增长甚微,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力不足,因此,促进研发人员投入规模及质量的提升、增强技术的先进性是创新和提升研发投入绩效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制定合理人才政策来保留并吸引高端人才的加入,尤其是高科技、高技术人才的引进计划。

第二,持续提升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对于创新产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应结合各地区发展实际,保证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的持续增长,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研发投入的规模效应;同时对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以此提升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第三,强化创新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创新产出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贡献度居于第四位,但创新产出却是中国各省(区、市)的普遍发展弱项。创新的首要领域是工业企业,因此,要想在创新产出方面真正得到发展,技术创新是必然之道。

第四,大力促进全国经济质量均衡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可以明显地聚群为四类,且在地理上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因此,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在创新及研发投入上给西部各地区一定程度的倾斜,并充分发挥广东、北京等经济发展质量较高地区的辐射作用,以点带面,逐步提升全国经济发展质量。

第五,根据全国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对研发投入相机决策。有关部门应根据各省(区、市)经济发展质量所处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研发投入相关政策。比如,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地区应更注重提升研发强度和质量;而对于经济发展质量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地区来说,应在保持谨慎的研发投入下,对该地区的研发投入效率进行监督管理,避免替代效应,同时合理布局研发投入经费和人员结构。

参考文献

[1]郭克莎.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J].经济研究,

- 1996(1).
- [2]史丹,李鹏.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国际比较[J].东南学术,2019(5).
- [3]陈怡.依靠科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J].经济管理,1995(12).
- [4]詹新宇,王素丽.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J].当代财经,2017(4).
- [5]朱卫东,周菲,魏泊宁.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J].武汉金融,2019(12).
- [6]王璐.国内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时代经贸,2007(8).
- [7]赵立雨,师萍.政府财政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基于1989—2007年的数据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2).
- [8]谢兰云.中国省域R&D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途径的空间计量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3(9).
- [9]李苗苗,肖洪钧,赵爽.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市面板数据[J].中国管理科学,2015(2).
- [10]巫强,张金华,郑江淮.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实体经济发展[J].财政问题研究,2020(2).
- [11]孟青青.河南省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D].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17.
- [12]马建东.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 [13]王思雨.我国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统计分析[D].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 [14]吕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评价研究[D].云南大学,2019.
- [15]孙豪,桂河清,杨冬.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J].浙江社会科学,2020(8).
- [16]王雪峰,曹昭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及要求[J].中国国情国力,2020(6).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D Investmen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earch Group of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from 2001 to 2020, supplemented by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c.,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R&D investment situation of China, and measures the performance of R&D investment through the Malmquist index. Secondly, it constructs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five aspec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Finally,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variable coefficient model are establish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D investment on the overal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we put forward som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generally strong in the east but weak in the west, R&D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s a whole, but the differences among provinces are large and the imbalance is prominent.

Key Words: R&D Input; R&D Performanc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lmquist Index; Panel Variable Coefficient Model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高质量发展】

我国居民消费的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

傅娟

摘要:在国内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消费俨然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我国消费虽整体持续稳步向好,但在地域分布、消费模式、消费领域等方面却呈明显分化态势。面对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意愿下降和消费便利度低下的三大现实困境,应继续增强居民消费意愿,积极引导新型消费发展,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拓展城乡消费渠道,以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关键词: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107-09 **收稿日期:**2021-05-09

作者简介:傅娟,女,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4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治理矛盾日益凸显。从国际外部环境来看,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外部环境变化带来新矛盾新挑战,导致我国外需增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环境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以及扩大开放所带来的投资及出口的持续增长,保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的同时,消费作为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不及另外二者,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逐渐从外贸和投资主导转向内需和消费主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5月,习

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首次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强调“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这些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也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但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而且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推动了经济发展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变。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上,我国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在提供巨大国

内市场和供给能力的同时,支撑并带动国际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居民消费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学术界对其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关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以及如何提升居民消费的策略研究。关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均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方面,现代经济学家们基本都将消费和投资、出口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认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与居民消费率呈正相关,在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期,消费更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消费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如刘东皇等(2010)和王子林(2017)借助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均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进而提出“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与必然选择”的观点。李晖和唐志鹏(2018)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我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金砖国家,同时指出扩大居民消费对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上升空间。

关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学者们也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分别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等视角探寻提高居民收入继而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政策举措。理论上,无论是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还是持久收入假说,抑或是生命周期假说,无不充分说明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密切关系,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社会保障水平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关于如何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学者们主要从提升消费能力、增加消费意愿和丰富消费模式等方面展开研究,具体的政策举措主要体现在“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完善消费环境,拓展新型消费领域”等方面。此外,还有学者根据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变动特征,进一步考察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状况。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中利用消费的即时数据来

对我国消费总体特征展开研究的并不多,主要是运用传统的统计数据来分析。本研究通过对人口流动数据、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数据3000余万条即时数据展开大数据分析,发现疫情后我国消费虽整体持续稳步向好,但在地域分布、消费模式、消费领域等方面却明显呈分化态势。因此,急需突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意愿下降和消费便利度低下的三大困境,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二、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度出现过净出口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于2007年达到7.50%的峰值后,总体趋势不断下降,2019年降为2.94%。出口占GDP比重的峰值于2016年达到35.36%,2019年降为17.39%。由此看出,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表明内需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实现自我循环,因此,扩大内需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扩大消费。衡量消费水平有很多指标,例如CPI,但CPI是用来反映价格水平的。在一般讨论中对于“国内消费水平低、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水平高”的直观印象指的是消费的总量或人均消费水平,而非价格因素,因此,我们以最终消费率^①和居民消费率^②来衡量消费水平。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大(图1)。2011—201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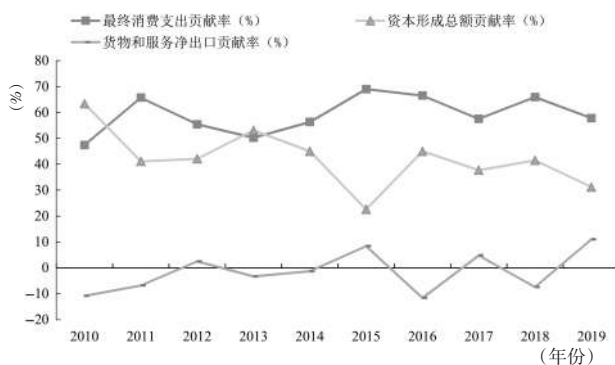


图1 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53.4%,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按支出法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6万亿元,

最终消费支出为55.2万亿元,最终消费率为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③为54.4%,连续7年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2010—2019年为60%左右,如果和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国际仍有较大差距,我国最终消费率低于高收入国家10—20个百分点,低于低收入国家15—22个百分点,我国最终消费率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反映出我国内需不足,消费增长缓慢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在2019年的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为38.6万亿元,居民消费率仅为38.8%,不仅远低于美国(67.9%)、英国(64.9%)、德国(52.3%)、日本(55.2%)、中国香港(68.4%)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低于印度(60.2%)和巴西(64.9%)等发展中大国,甚至不及孟加拉国(69.0%)、柬埔寨(69.4%)以及马来西亚(59.8%)等小国^④。由此看来,我国居民消费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后疫情时代我国国内居民消费的发展态势

后疫情时代,尤其是进入2021年,我国国内居民消费发展态势总体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快速上涨,2021年一季度涨幅明显,居民消费信心不断修复,已接近疫前水平,消费领域小微企业活力逐渐恢复至疫前水平。

1.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快速上涨,2021年一季度涨幅明显

进入2021年,我国虽然出现一些局部疫情,但疫情防控形势总体较好,经济社会继续稳步恢复发展,消费恢复有利条件明显增多,我国消费总体处在恢复向暖通道之中。一是自2020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开始由负转正。2021年1—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达10.52万亿元,同比增长33.9%(图2),两年平均增长4.2%,2020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尤其3月份,复苏态势进一步增强。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4.2%,增速比1—2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6.3%,比1—2月份加快3.1个百分点。商品消费较快增长,既彰显出我国

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又反映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强势恢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4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7%,较2019年4月份则增长8.8%,两年复合增速4.3%。“五一”长假期间,我国消费市场恢复火爆行情,全国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38.1%,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6.3%,重点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清明假期增长32.1%,但我们应注意到,虽然消费实现快速增长,但是仍低于疫情前水平。三是从当前同比增速来看,消费恢复弱于工业,略好于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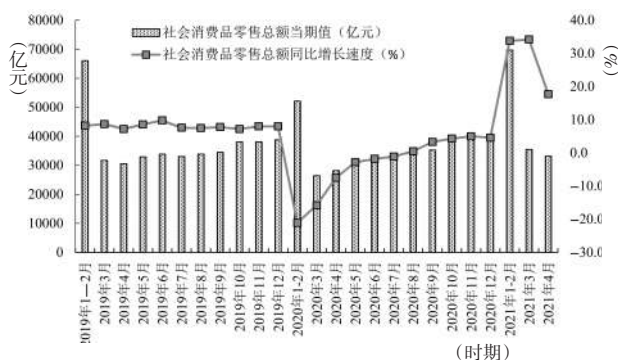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2. 居民消费信心不断修复,已接近疫前水平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机制不断完善,消费环境明显改善,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满意度都呈现出回升态势。自2020年8月始,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消费者预期指数^⑤均开始回升,2021年2月已全面超过2019年最高水平(图3)。预计随着新冠疫苗的大范围接种,扩大内需政策的进一步发力,就业形势的逐步改善,居民消费信心会不断得以修复,2021年或将成为消费水平快速恢复的消费大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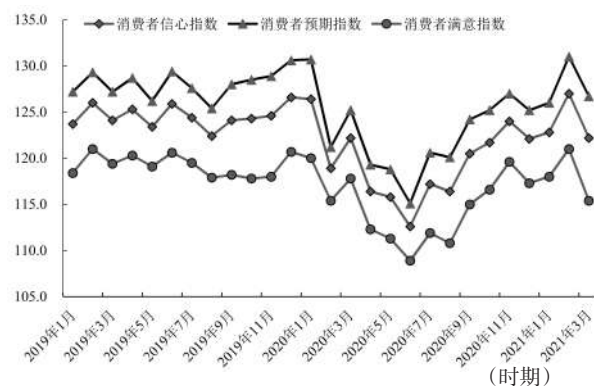


图3 2019年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3. 消费领域小微企业活力逐渐恢复至疫前水平

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为企业纾困解难的税费优惠政策,对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领域小微企业的新注册和注销数据表明,消费领域小微企业的活力正在逐渐恢复。一是从居民主要消费行业的新注册情况来看,批发和零售业新注册个体工商户自2020年2季度始一直保持同比正增长,尤其是2020年4季度和2021年1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高达30%、35.37%;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消费行业的新注册小微企业自2020年2季度以来均保持同比增长,3个季度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28.78%、28.05%、27.23%,2021年1季度,住宿餐饮和文体娱乐行业新注册企业的同比增长分别高达75.35%、67.25%。二是从居民主要消费行业的注销情况来看,2020年经营批发零售、文化体育和娱乐及住宿餐饮等消费行业的小微企业注销总量低于2019年。综合新增与注销情况,可见主要消费行业的企业经营活力已逐渐恢复至疫前水平,并呈向好的发展趋势。生活服务业是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较为集中的行业。基于美团线上生活服务业(包括餐饮、休闲娱乐、住宿、旅游等)消费数据,通过对比疫情前后的消费规模变化,构造了生活服务业复苏率^⑥指标。结果显示,全国生活服务业消费水平于2020年7月已回升到疫情前状态,进入2021年消费复苏率进一步抬升,3月已接近150%,生活服务业领域1季度经营活力是疫情前的1.5倍。

四、从地域看我国国内居民消费的表现特征

从地域层面,北方消费恢复弱于南方,一线城市消费回暖较好。手机信令(signaling)数据应用于城市间的消费现状对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能测度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的联系流向、联系流量;通过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在区域内各个城市之间或者各商圈的出行轨迹、出行频率,以人员流动方向和数量表征城市或者不同商圈的出行情况,能反映地域、城市之间或者商圈之间人口消费的真实情况,并且这一数据具有及时性、真实性等优点。

1. 南方地区消费韧度高于北方

2020年2月以来,南方和北方地区城市商圈人

流量增速均呈平稳上升态势,2020年12月达到峰值,随后出现明显回落。相比较而言,一是自2020年5月始,南方城市商圈日均人流量增速持续大于北方城市;二是2021年1—3月,南北分化态势明显,其中,2021年1月南方城市商圈日均人流量增速为25.6%,而北方城市商圈日均人流量增速为-8.5%(图4)。由此可见,南方城市经济活力较强,消费韧度更高,整体消费复苏情况明显优于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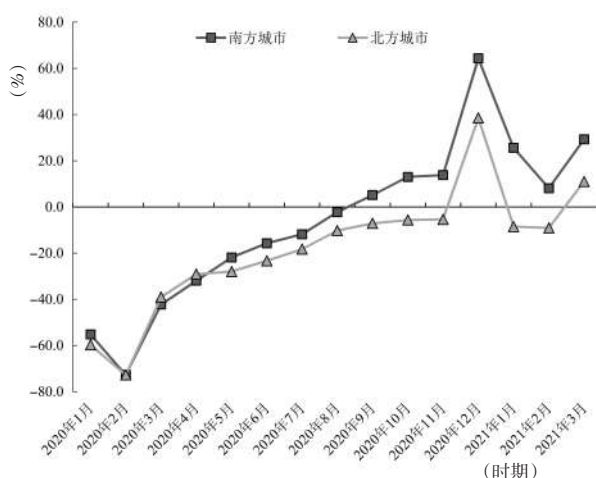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区域城市商圈日均人流量增速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个推)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2. 一线城市消费回暖好于二三四线城市

选取一二三四线城市代表性商圈作为观测样本,通过对比其人流量变化,以反映不同级别城市线下消费回暖情况。疫情之前,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在升级,但一线城市消费乏力;疫情之后,一线城市人均消费还在增长,二三四线城市的人均消费在快速下跌。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商圈日均人流量同比增速自2020年5月开始由负转正,明显高于二三四线城市(图5)。截至2021年3月,一线城市商圈日均人流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高达171.4%,二线城市增长26.7%,三四线城市增长20.2%。由此可见,一线城市消费回暖增速远高于二三四线城市,消费复苏弹性更强,表明目前制约消费反弹回暖的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复苏程度远低于高收入群体。另一证据是京东物流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不少人收货地址从一线城市转移至三四线城市,其中超过50%为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疫情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低收入群体就业受冲击明显。餐饮、酒店、家政、维修、影院等高接触性服务业受影响最大,不少企业倒闭、停业,而这

恰恰是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集中的就业岗位。疫情之后,他们可能会继续留在农村,相较于一线城市,这部分人的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严重影响消费的反弹与回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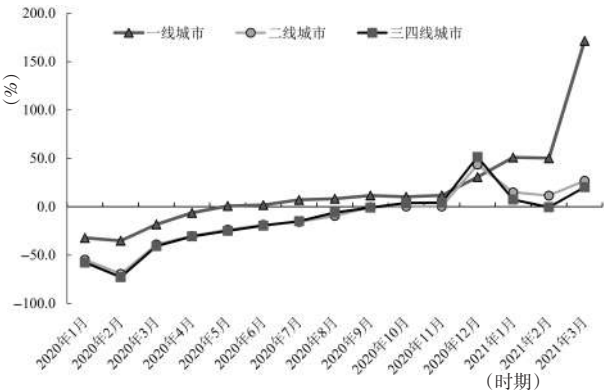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等级城市商圈日均人流量增速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个推)提供的数据测算而得。

五、从消费类型看我国居民消费的特征

从产品消费类型看,我国居民消息线上消费好于线下,非接触类消费与服务好于接触类消费。

1.线上消费急速扩张,线下消费复苏缓慢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带动数字技术强势崛起,引领线上经济蓬勃发展和新型线上服务消费兴起。由于疫情影响,线下消费经历寒冬,在此期间,“非接触经济”成为疫情期间新的消费增长点,以“宅经济”为主的线上消费需求急速扩张。数据显示,2021年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较2019年同期增长25.1%,但整体商品零售额较2019年同期仅上涨了9.0%;但进入3月份以来,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较2019年同期增长99.1%,整体商品零售额较2019年同期仅上涨了12.9%(图6),表明当前线上消费已实现快速增长,但线下消费复苏仍然较为缓慢。此外,龙头电商平台持续向农村市场等下沉,“全国消费促进月”等促消费活动加快开展,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巩固消费回升向好势头。

2.非接触生活服务类消费高速增长,与出行强相关类消费仍显低迷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大量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线上线下不断融合,因抗疫需要非接触型经济,如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远程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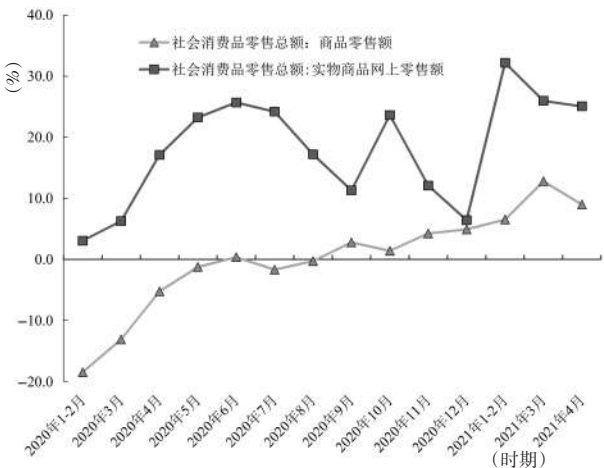


图6 商品零售额及实物商品网上当期零售额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以2019年为基期。

疗等得到广泛应用,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和消费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期间,在线餐饮、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非接触生活服务类消费高速增长,旅游、文娱和家装等与出行强相关的领域消费降幅虽有收窄,但仍显低迷。基于对线上消费数据分析显示,2021年3月,在线教育网上零售额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速高达111.8%;在线医疗的患者咨询数同比增长率高达97.7%,而与2019年同期相比,在线旅游和在线文娱等领域消费下降明显,回暖速度较慢(图7)。由于疫情的严重冲击,家装店铺数在经历了2020年1—3月短暂的增长以后迅速下降,且下降幅度持续扩大,2021年3月同比下降达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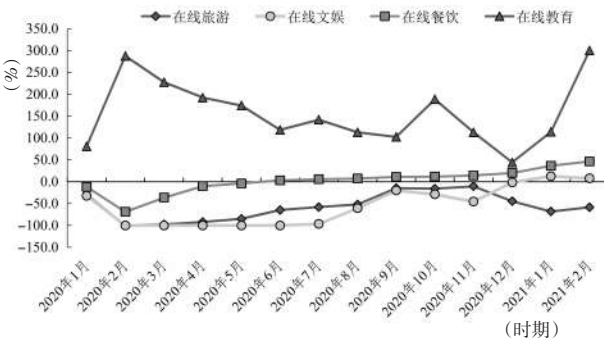


图7 各类消费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
注:以2019年为基期。

随着2021年疫情稳定,经济快速复苏,居民消费信心逐渐提升,汽车消费需求逐渐释放。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商用车消费复苏程度整体快于乘用车,2021年1—3月商用车销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26.9%,乘用车销量下降3.6%。

六、现阶段居民消费面临的三大困境

居民消费面临“不愿消费、不敢消费和不便消费”三大困境。

困境一：民众消费观念转变，消费意愿下降。在消费者行为学中，消费意愿是指消费者个体发生消费行为的主观概率或可能性。受疫情影响，居民的安全意识和预防动机增强，居民们更愿意选择储蓄以“防患于未然”，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消费行为更加理性，消费意愿下降。一是居民预防性动机增强，储蓄意愿上升。中国人民银行的季度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城镇储户选择“更多储蓄”的比例分别为53%、52.9%、50.4%、51.4%和49.1%，较2019年同期大幅提高，而城镇储户选择“更多消费”的比例明显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且反弹速度较慢(图8)。2020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据某金融机构测算，2020年上半年居民储蓄率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个到12个百分点。受此影响，金融机构新增存款快速增加，受此影响金融机构新增存款快速增加，2021年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8.35万亿元，同比多增2844亿元。二是消费观念变化，更理性、更注重性价比。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经营普遍承压，涌现出一批“精研型消费者”，这类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中变得更为理性，除品牌之外，还会从品质、渠道、价格、售后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索，更加理性地选择高性价比、实用的商品，品牌溢价开始被淡化。艾媒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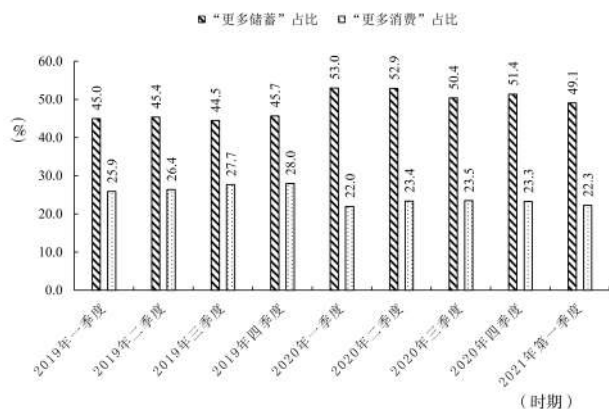


图8 城镇储户储蓄意愿、消费意愿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2021年1季度，68.7%的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价格和喜好度因素。

困境二：收入信心指数低下，消费能力不足。受实际收入增速放缓、房价高企等的影响，居民收入信心指数低下，民众消费能力不足。一方面，居民预期收入下降抑制消费意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4%，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但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上升0.2个百分点，疫情造成了低迷市场就业环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预期目标，年末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2%，与上年同期持平，但疫情时期调查失业率统计数据或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实际失业、隐形失业人数应大于统计数据。加之疫情期间不断有企业倒闭、歇业、裁员或者减薪等各类情况，表面上工作岗位仍在但实际收入减少的现象也不容小觑，影响民众对收入的预期和信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放缓到2.1%，同比减少3.7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1季度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仍然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图9)。另一方面，学区房高温不下，变相炒房挤出消费进一步加剧。近十几年来，伴随着我国房价的不断上涨，城镇居民居住支出消费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了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居民的住房消费占比持续提高，刚性的居住生活成本攀升。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0.93的水平。其中，有负债家庭的债务收入比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1.6。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逐步降低。其中，对消费影响最大的还是房价上涨过多，导致家庭部门债务负担过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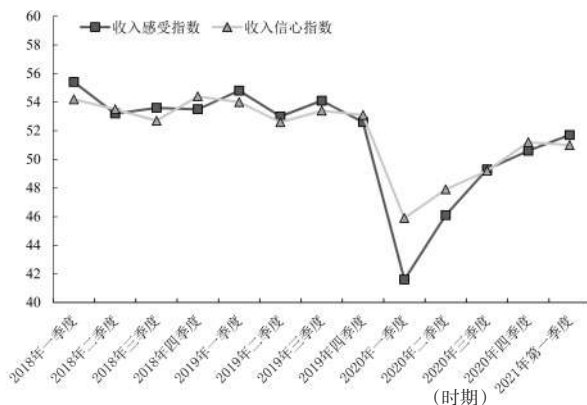


图9 2018—2020年居民收入感受与收入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大大抑制了消费。例如,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0.7%,2020年这一数据上升为24.2%。2021年初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对违规挪用经营贷炒房的行为展开了“围堵”,查处房屋交易中介机构涉嫌炒作“学区房”概念、借机哄抬房价、代理未经房主书面授权委托房源等违规行为。但也有专家表示,单纯地严查“学区房”炒作恐怕只会引起表面降温,实际成交依旧火热,房价增长对消费挤出效应已远高于创造的财富价值。据国家统计局3月70个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显示,新房方面,62个城市环比上涨,较上月增加6个。二手房方面,58个城市环比上涨,比上月增加3个。

困境三:疫情防控常态化,消费便利度低下。目前,国内疫情基本实现动态清零,但个别地区零星病例时有发生,部分防疫措施不可避免地趋向常态化,而许多生活性服务业涉及面对面服务,无法向线上转移。

一方面,聚集性、群体性活动受限导致餐饮、演出等接触性消费低迷。2021年年初,北京顺义区要求停办线下聚集性商业活动,禁止集体性聚餐、年会等活动,暂停开放影剧院、游泳馆等人员聚集场所,直接导致演出、餐饮、食品等行业陷入淡季。《中国经济时报》报道称,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餐饮行业反弹很快,1—3月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75.8%,但是消费额仍然低于2019年,近两年平均增速为-1%,说明餐饮消费还是受到局部地区的聚集性和散发性疫情影响,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

另一方面,跨区域出行受限导致交通运输、旅游酒店消费疲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区域间人员流动被大大限制,再加上多地绿码不互认、不通用,各级政府隔离政策层层加码等因素,导致交通运输、旅游酒店等消费疲软。根据飞常准APP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2月以来北京首都机场航班数量锐减,2020年首都机场航班数同比下降了56%,航空业务受到重创。“就地过年”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因返乡人数大幅下降,经济欠发达和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春节消费明显被削弱。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全国营业性客运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58.7%。此外,2020年至今,旅游消费较2019年同期持续下降。

七、增强消费拉动作用的策略

增强消费拉动作用,就要继续增强居民消费意愿,积极引导新型消费发展,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拓展城乡消费渠道。

1. 继续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联动。在做好“六稳”、落实“六保”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保障就业和民生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蓄积微观经济活力。通过国资投资、并购民企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增强市场主体抵御风险能力;通过政府采购、“以工代赈”等方式带动社会投资,有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应继续加大各项纾困政策的精准性、时效性和落实力度,出台相关配套措施,从成本、物流、产业链等多方面实施帮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增强各项政策落地转化效率,实现救助合力,最大程度地缓解企业经营发展的困难,为扩大消费和促进消费释放回补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稳定消费预期和信心。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国内消费者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人的储蓄习惯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封国、封城措施的实施,避免了印度封国措施半途而废的尴尬。实践证明了中国人的储蓄习惯在应对风险时的有效性,试图改变国人的储蓄习惯,不现实且无必要。在风险预期一定的情况下,如要降低居民储蓄增加居民消费,唯有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抵御风险能力,从而影响居民消费、储蓄比例。应进一步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完善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完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使更多人民群众更好地享有社会保障。应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发展,整合城乡居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动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增强基金统筹调剂功能。应建立健全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应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支撑和保障。具体到应对疫情,

应确保前期为应对疫情影响的收入保障政策、消费政策的延续性,通过社会救济、生活补助金等多种方式加大基本民生保障,稳定消费者和市场主体预期。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更多中低收入者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机制调节财富在社会中的二次分配,改善劳动者收入,不断健全灵活就业者保护制度,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2. 积极引导新型消费发展

一是打造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加快“线上+线下”新型消费模式的发展步伐,鼓励在线教育、互联网健康医疗、餐饮外卖等新型服务消费加快向线上转移,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支持传统线下百货零售和电商平台、支付平台、数字技术企业加快合作与融合。

二是培育新型消费示范点。充分发掘国务院《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政策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城市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和领先企业。依托有区位优势、资源整合有优势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建成几个新型消费的区域消费中心,辐射带动周围城市建成功能完备、服务完善、各具特色的梯队城市。通过完善的体系、优良的服务,提升新兴消费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努力营造便捷、安全的消费新环境,从而提高新消费模式对各年龄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宣传普及性、体验友好性和使用便利性。

三是提高国内市场的高端消费能力。经过疫情,人们更注重健康消费和生活品质提升,消费升级仍是长期趋势。因为疫情,更多的消费群体愿意“不出境、买全球”,事实上形成了高端消费回流。应抓住消费回流机遇,推动免税市场创新发展,提高国内市场对高端消费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建议适度提高市内免税店免税额度,延长免税购物有效期,对免税商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扩大免税商品范围。获得免税经营牌照的企业也需扎实练好“内功”,避免整个产业走向低水平发展。

3. 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开始遭遇瓶颈,经济增长的模式由

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型集约增长。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居民食品消费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明显下降。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居民消费已经逐步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因此,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对现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首先,应大力支持国产品牌发展,鼓励国产品牌加快数字服务能力建设,积极扶持精品国货,鼓励利用多种新消费渠道培育品牌、拓展市场。推动国产替代从“卡脖子”领域向全领域发展,鼓励居民选择“物美价廉”的精品国货,打通经济“内循环”。其次,应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推动汽车和家电消费转型升级,鼓励各地出台促进老旧汽车置换政策,推进主要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路侧停车位设施升级改造等建设。支持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电更新消费。再次,应提升消费类服务的品质,积极发展住房租赁消费,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稳步推动影视娱乐、旅游恢复,提升国内服务供给质量。最后,应改善消费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一方面可以使潜在消费变成现实消费,另一方面也可激发新消费需求的同时助力产业升级。尤其是要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农村现代商贸流通渠道,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一步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4. 大力拓展城乡消费渠道

造成国内城乡居民消费偏低的主要原因除了源于居民们对未来的预期支出深感担忧和对未来的个人预期收入的增加缺乏足够的信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居民的消费渠道比较单一。因此,为了有效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除需采取有力措施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优化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外,还需大力拓展城乡居民的消费渠道。

一方面,城镇居民消费构成我国国内消费的主要来源,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国内整体消费水平,因此,需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结合城市群、都市圈重要发展规划,统筹布局建设若干国家消费中心、区域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消费中心,加快形成梯次发展、衔接互动、优势互补并覆盖全国大市场的消费地区格局。另一方

面,农村居民是多元化消费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着力构建和完善现代服务业体系,引导现代化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促进农村现代化服务消费健康发展,提升农村现代化服务水平,因此,需要重点打通农村消费的堵点,充分发挥我国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客车等农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优势,充分利用我国传统快递物流业——中国邮政网点,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信息化发展对其进行技术支持,加快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物流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进而通过不断夯实电商、快递进农村的供给和交通基础,为健全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创造坚实的技术基础。

注释

①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按支出法)。②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按支出法)。③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增量/GDP增量(按支出法)。④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⑤消费者信心指数,该指数通过对城市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由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负责调查统计,以1997年底为基期,动态反映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变化。指数数值越高,表明消费者信心越强,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消费者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消费者预期指数是指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预期。一般不对半年以下做预期。⑥生活服务业复苏率=2020年以来近7日日均消费订单数/2019年同期近7日日均消费订单数 $\times 100\%$ 。低于100%

表示未达到疫情前水平,高于100%表示超过疫情前水平。

参考文献

- [1]陈昆亭,周炎.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20(4).
- [2]任保平,苗新宇.新经济背景下扩大新消费需求的路径与政策取向[J].改革,2021(3).
- [3]刘东皇,孟范昆.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研究:1952—2009[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7).
- [4]王子林.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型模式的转变[J].经济研究参考,2017(27).
- [5]李晖,唐志鹏.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因素分析——基于WIOD数据库的国际比较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8(6).
- [6]公茂刚,王学真.山东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J].东岳论丛,2013(12).
- [7]毛章勇,江剑平.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8]任君,黄明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2021(4).
- [9]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及增长点分析——基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J].经济学动态,2021(2).
- [10]任杲,宋迎昌.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研究——基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统计数据[J].兰州学刊,2021(3).
- [11]张可云,肖金成,高国力,杨继瑞,张占仓,戴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21(1).
- [12]江林,马椿荣,康俊.我国与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的比较分析[J].消费经济,2009,25(1).

Realistic Dilemmas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Resident Consumption

Fu Juan

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ing the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of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and building a new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consumption has become the biggest one engine driving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As the domest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lthough my country’s consumption has continued to improve steadily as a whole, it has shown a clear divergence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consumption fields. Faced with the thre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insufficient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residents, decline in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and low consumption convenience, we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consume, active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nsumption,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vigorously expand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channels to enhance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Resident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Double Loop

(责任编辑:晓 力)

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阶段的研判与推进*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都市圈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高地和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形式。但从我国发展实际来看,东部发达地区都市圈发育较早,发展相对成熟。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相对滞后,基本处于前期加速成长阶段,据此要从交通网络、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生态建设、城乡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加快构建都市圈的支撑体系,并着力发挥规划、制度、文化的引领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西部地区;郑州都市圈;发展阶段;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116-11 **收稿日期:**2021-04-2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郑州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区研究”(2019ZDW02)。

作者简介:课题组组长:王建国,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州 450002)。

课题组成员:王新涛,左雯,易雪琴,彭俊杰,郭志远,金东。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一批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正在加速形成,并逐步取代单个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平台和重要载体。2019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但从我国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东部发达地区都市圈形成相对较早、发展较为成熟,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相对滞后,大多数都市圈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本文将对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的发展阶段和趋势进行研判,并据此提出推进中西部地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阶段和趋势研判

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我国都市圈所

处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地区都市圈的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市圈需要从产业分工体系、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协调发展关系等方面对其发展阶段和趋势进行具体研究。

1. 中国都市圈发展阶段的划分及特征

国内研究机构对国内主要都市圈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构建了以都市圈发展水平、中心城市贡献度、都市圈联系强度和都市圈同城化机制为主要评价内容的都市圈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我国29个都市圈的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按发展水平划分为成熟型都市圈、成长型都市圈和培育型都市圈三个层级;戴德梁行通过构建“都市圈综合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把全国26个都市圈按发展成熟度划分为成熟型都市圈、赶超型都市圈、成长型都市圈和培育型都市圈四个层级。依据《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时序要求,梳理总结相关文献和国内外都市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将都市圈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形成培育

阶段、加速成长阶段、调整优化阶段和成熟稳定阶段,其主要特征见表1。

表1 都市圈发展阶段划分及特征内涵

	形成培育阶段	加速成长阶段	调整优化阶段	成熟稳定阶段
空间结构	规模较大的城市或者发展趋势明显的中心城市;呈现出以中心城市扩张为主、周边城市缓慢拓展的总体特征	都市圈范围迅速拓展,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快速成长,新城和小城镇大量出现	都市圈扩张逐渐停止,中心城市发展边界得以明确,新城建设加快,次级中心优化调整,副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崛起	各城市间形成立体化和网络化内部联系,内部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
城市功能	中心城市极化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都市圈内部竞争大于合作	中心城市极化效应与辐射效应并存,都市圈城市体系逐步成型,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形成	中心城市呈现出积极的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以中心城市及其周边为核心、各次级中心城市为纽带和支点的城市体系,以及中心核—紧密圈—辐射圈的圈层	竞争与合作更加充分
要素流动	资金、人口等要素流动主要向中心城市集聚	发展要素向都市圈集聚,高端要素和产业主要向中心城市集聚,一般要素和产业主要向都市圈中小城市集聚	高端要素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一般要素继续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流动受到限制	完全打破都市圈行政壁垒和阻碍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商品和要素可以在都市圈内高效自由流动
产业分工	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与向周边区域扩散并存	高端产业主要向中心城市及其周边集聚,制造业和一般产业主要向中小城市集聚	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在都市圈中心城市及其紧密区进一步集聚提升;一般产业加快向周边疏解扩散并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格局形成
交通网络	都市圈公路网基本形成,城际公交开通,近郊班线公交化加速推进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轨道交通建设大力推进;公路网优化,城市间的通达便利性增强	“四网融合”的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市、周边城市(镇)、新城新区等轨道交通实现有效衔接、便捷换乘	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基本形成
公共服务	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向中心城市周边区域布局	都市圈内政务服务联通互认,社会保障接轨衔接	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	公共服务在区域、城乡间均衡发展
生态环境		生态网络共建和环境联防联控		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自行概括。

2.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阶段的总体判断

按照《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定义,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据此,我国目前有35个都市圈,其中东部地区10个省份有13个都市圈,东北地区3个省份有4个都市圈,中西部地区18省份有18个都市圈。

从表2看出,中西部地区都市圈数量相对较少,凸显其发展相对落后,基本处于都市圈发展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后期和第二阶段中期。其中,武汉、成都、重庆、郑州、长沙、西安、合肥等7个都市圈处于加快成长的中期阶段,突出表现为:城市人口加快集聚,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功能持续完善提升,城市流日益加密加快,一些产业逐步向外转移,存在

着明显的聚集和扩散并存的现象,即一方面相对低端的生产要素跨越城市行政边界向周边疏散,另一方面高端要素亟待加快集聚。贵阳、乌鲁木齐、银川、呼和浩特、西宁、南宁、洛阳等7个都市圈则处于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突出表现为:都市圈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有待提升,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水平不高,城市之间的关联关系还不紧密,广阔的都市圈腹地发展相对落后。南昌、太原、兰州、昆明等4个都市圈处于加快成长的前期阶段,发展水平介于前二者之间。

这里以郑州都市圈为例,对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的发展阶段作具体分析。作为郑州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郑州的辐射效应和极化效应并存,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中期阶段,其阶段判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依据。

表2 2021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都市圈所处发展阶段

都市圈	中心城市	空间范围*	隶属城市群	发展阶段
武汉都市圈	武汉	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	长江中游城市群	加快成长中期
重庆都市圈	重庆	重庆主城区、渝西地区	成渝城市群	加快成长中期
成都都市圈	成都	成都、德阳、眉山、资阳	成渝城市群	加快成长中期
郑州都市圈	郑州	郑州、开封、新乡、焦作、许昌	中原城市群	加快成长中期
长沙都市圈	长沙	长沙、湘潭、株洲、益阳、岳阳	长江中游城市群	加快成长中期
西安都市圈	西安	西安、宝鸡、商洛、铜川、渭南、咸阳	关中天水城市群	加快成长中期
合肥都市圈	合肥	合肥、淮南、六安、蚌埠、桐城	长三角城市群	加快成长中期
南昌城市圈	南昌	南昌、九江、抚州、宜春、上饶	长江中游城市群	加快成长前期
太原都市圈	太原	太原、晋中、吕梁、忻州	山西中部城市群	加快成长前期
兰州都市圈	兰州	兰州、白银、定西(临洮县)、临夏、武威	兰西城市群	加快成长前期
昆明都市圈	昆明	—	滇中城市群	加快成长前期
乌鲁木齐都市圈	乌鲁木齐	—	天山北坡城市群	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
贵阳都市圈	贵阳	—	黔中城市群	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
银川都市圈	银川	银川、石嘴山、吴忠、宁东基地	宁夏沿黄城市群	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
呼和浩特都市圈	呼和浩特	—	呼包鄂榆城市群	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
西宁都市圈	西宁	—	兰西城市群	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
南宁都市圈	南宁	—	北部湾城市群	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
洛阳都市圈	洛阳	洛阳、济源、焦作、平顶山、三门峡	中原城市群	形成培育与加快成长交汇期

*仅指划入都市圈内的地跨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从空间结构看,郑州都市圈以郑州为核心,包括郑州市域和开封、新乡、焦作、许昌4市中心城区,以及巩义、武陟、原阳、新乡、尉氏、长葛和新乡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形成“1+4”空间发展格局,中心城市(郑州)和四个次级城市(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发展逐步超越原有边界,处于加速成长阶段。

从城市功能看,郑州都市圈的城镇规模较为合理。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郑州都市圈包括郑州1个特大城市,开封中心城区、新乡中心城区、焦作中心城区、许昌中

心城区等4个大城市,中牟、巩义市、荥阳、新密、新郑、登封、武陟、原阳、新乡、尉氏、长葛、新乡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12个小城市。城镇体系较为完善,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基本形成,处于加速成长阶段。

从要素流动看,以人口流动为例,郑州都市圈人口流动呈现“双集聚”态势,一是人口向都市圈集聚,从图1可以看出,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逐年递增,2014年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达到1612.01万人,2018年进一步增至到1854.3万人,郑州都市圈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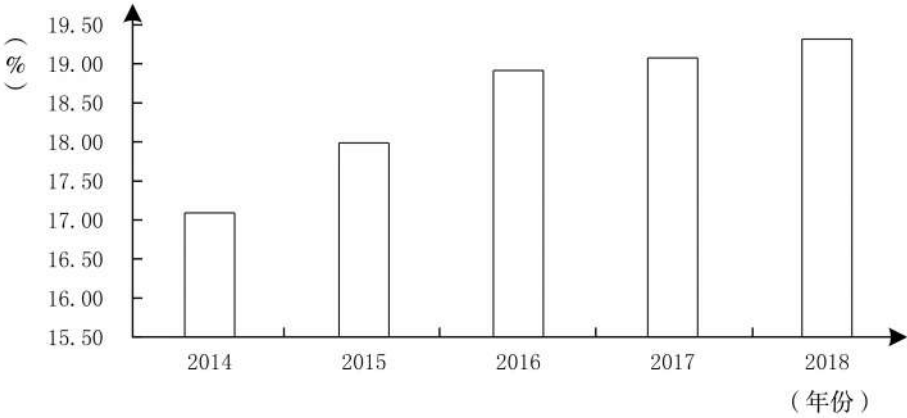


图1 2014—2018年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2015—2019)汇制。

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例由2014年的17.08%上升到2018年的19.31%。二是人口向郑州和郑州中心城区集聚。2016—2018年,郑州常住人口占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的比重由53.95%上升到54.66%(见图2),郑州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的比重由26.24%上升到26.79%(见图3),均

呈上升趋势;同期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四个次级城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的比重由28.24%下降到27.99%。可以看出,在人口流动上,郑州都市圈处于形成培育阶段向加速成长阶段过渡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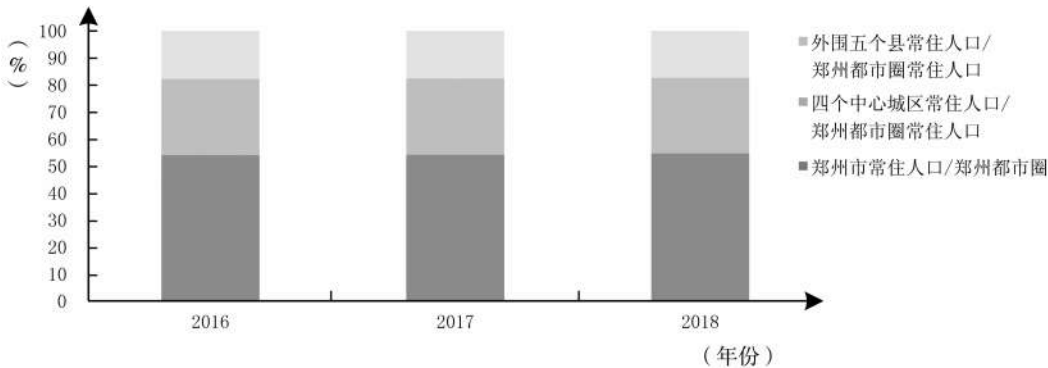


图2 2016—2018年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2015—2019)汇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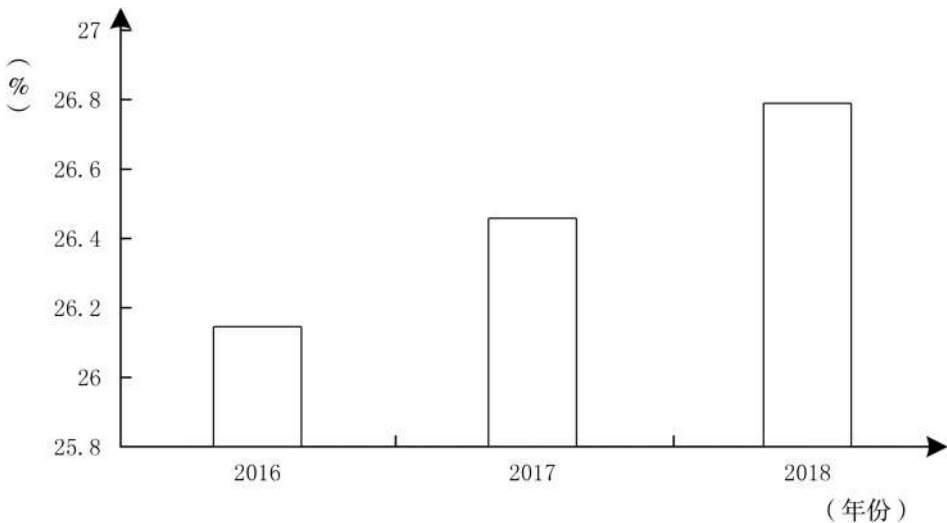


图3 2016—2018年郑州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郑州都市圈常住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2015—2019)汇制。

从产业分工看,中心城市的一些非核心功能逐步向外扩散。郑州已经完成“退二进三去一”,郑州产业结构近年来一直呈现为“三二一”状态,2019年三次产业比重为1.2:39.8:59。郑州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主要体现为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扩散的过程,如大量的工业企业跨河落户新乡和焦作;一些大型批发市场由中心城区转向周边新郑、新密、中牟等地,处于加速成长阶段。

从交通网络看,已经形成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县乡公路等都市圈多层次公路网,城际公交、近郊

班线等城际客运网络基本形成,焦作、新乡等城市对豫A牌照车辆免收部分高速路段或桥梁通行费。轨道交通建设正在加速推进,郑焦城铁、郑汴城铁、郑机城铁已经通车运营。截至2020年底,郑州地铁运营线路7条,运营线路总长208.86千米;规划建设22条线路。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前期硬件设施建设阶段,轨道交通路网还没有全面形成,整体来看处于加速成长阶段。

从公共服务看,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和郑州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集聚作用早已形成,如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为亚洲最大的医院,吸引着全省甚至周边省份的患者前来就医;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实验中学、郑州市第一中学等,集聚了周边城市大量的优质生源。同时,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正在向周边扩散,郑州外国语学校平原校区已经建成招生,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在中牟建设新院区。都市圈内实现了居民身份证、普通护照、机动车驾驶证异地申领等政务服务联通互认。整体来看,正处于形成培育阶段向加速成长阶段的过渡时期。

3. 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的发展趋势

从人口流动看,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的人口流动趋势表现为“单向集聚”:从各省区全域范围看,人口向都市圈集聚;从都市圈内部看,人口向都市圈中心城市范围集聚。未来一段时期,中西部地区都市圈人口将呈现为“多向流动”趋势。一方面,都市圈仍将是各省区人口集聚的核心区域。另一方面,从都市圈内部人口流动趋势看,中心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将持续增强,人口将在持续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同时,随着低端要素资源和产业向周边城市疏散、中心城区房价较高、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人口将由都市圈中心城市向次级中心城市和小城市流动。

从都市圈产业分工看,在都市圈内部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产业分工体系过程中,中心城市以其科技、资本和产业的的优势,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通常起着先导作用,如果中心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都市圈区域产业层次不能拉开,竞争大于合作,产业将出现同构现象,区域就难以形成合理高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从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现状看,不同城市产业发展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竞争问题,更为细化的分工协作关系尚未形成,产业结构总体上还不够协调合理,如郑州都市圈的郑州、许昌、新乡、焦作均提出发展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目标和任务,都有整车生产计划等。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心城市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密度,增强高端服务功能;小城市将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依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制造业,进而在都市圈范围内形成错位分工、优势互补、特色突出、链式关联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分工逐步由“同而不和”转向“和而不同”。

从都市圈城镇体系看,中西部地区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正在经历向外拓展和轴向延伸的发展过程,与区域及周边城镇的空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呈现出“城市—区域”的都市圈化特征。如综合分析郑州都市圈经济发展、人口和交通联系,郑州与东南部城镇联系强于西北地区;从现状用地和规划土地开发情况看,郑州与开封、许昌之间已形成空间上的连绵化,尤其是郑州和开封之间几乎连绵成片,构筑都市圈域空间格局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各类城市正在从“各自为战”的发展阶段加速迈向都市圈“整体联动”发展新阶段。

从中心城市集聚辐射看,中西部地区都市圈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也将从“全面虹吸”转向“吸高疏低”,即高端要素和高端产业不断向核心地区聚集,低端要素和制造业向相对边缘地区流动。如郑州作为郑州都市圈的中心城市,2020年经济总量超过12000亿元人民币,人口超1200万人,市域建成区面积达到1181.51平方千米,其中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为651.35平方千米,人均GDP超过10万元,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不断加快,一些非核心功能向外转移,但郑州最大的短板是高端要素集聚乏力,创新能力偏弱,带动能力不强,未来在外溢低端要素的同时,要大量吸引高端要素集聚。

从中心城市发展导向看,中西部地区都市圈既是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地区,也是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未来,要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城市将共建都市圈绿色生态网络,推进关键领域污染联合防治、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使生态环境质量同步提升,城市和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都市圈更加美丽。如郑州都市圈、西安都市圈、银川都市圈、兰州都市圈等作为黄河流域重要都市圈,都要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都市圈内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城市进行统筹谋划,协同推进黄河大保护大治理,沿黄生态环境将更加优美,促进中心城市由“生产经营空间”向“生态宜居空间”的转变。

二、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都市圈支撑体系建设

立足中西部地区都市圈所处的发展阶段,遵循国内外都市圈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着眼于破解

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从快速交通网络、产业分工体系等方面构建中西部地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系统。

1. 树立全通勤时间理念,加快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

目前,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网络,各中心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正在加快规划建设,如郑州都市圈的郑汴、郑焦、郑许等中心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先后建设并投入运营,但是这些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还不够紧密,各种交通枢纽大多独立、分散建设,还没有形成换乘便捷、连接通畅的综合交通枢纽;同时,都市圈内部次一级中心城市主要考虑与中心城市的双边对接,缺乏基于多边对接的交通规划与建设,已经成为都市圈构建快速交通运输网络的短板。未来要以打造“45分钟”全通勤圈为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坚持以客带货,推进交通连接方式由双边向多边转变。如郑州都市圈,要着力打造都市圈“3+3+4”向心交通体系结构,即郑州与开封、新乡、焦作、许昌等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综合交通运输通道,至少包括高速铁路、普通铁路、城际铁路等3条轨道交通,包括3条高速公路和4条国省干线道路,逐步实现都市圈中心城市与次一级中心城市间由“互联互通”走向“直连直通”。

一是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优先补齐都市圈快速轨道交通的短板,强化城际轨道交通与国家干线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之间的高效衔接,强化铁路、公路运输的高效换乘,按照人流、物流的密度和强度,依次加密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二是畅通都市圈公路网。实施城际公路畅通提标工程,加大干线公路升级改造力度,提高城际干线公路通行等级。探索创新都市圈内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和年票、季票和月票等优惠套票政策。三是提升都市圈物流运行效率。如郑州都市圈要围绕郑州国际航空物流园区、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郑州国际陆港、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为等载体,打造“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实现物流体系的高效运行。四是完善重要生命线布局。统筹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建设,在中心城市周边打造若干个“微中心”,推动都市圈城市生命线从“树枝状”向“树藤状”转变,塑造和谐完备的都市圈公共空间和

生存环境,增强都市圈应对生态灾难、重大疫情等不确定性事件的韧性。

2. 树立分工协作理念,促进城市产业错位发展、互补发展、链式发展和特色化发展

培育现代化都市圈需要良好的产业作支撑,伴随着产业的外溢转移和空间重构,成熟都市圈的产业大多呈现跨行政区转移发展的态势,其关键就在于通过准确定位各个城市的产业发展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解决好区域间产业同构化问题,降低因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产生的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内耗和外流,形成协作紧密、集约高效的产业板块,从而释放产业空间集聚效应、重组效应和溢出效应,一方面要坚持链式发展,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为基础,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主体,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产业生态体系;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布局,避免资源重复浪费。

一是促进城市功能互补。要推动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非核心功能向次级中心城市以及新兴增长中心、重点镇疏解,推动中小城市按照交通指向性规律,依托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和重要的枢纽场站,加快形成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园区,加快承接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体系,从而构建起都市圈内部完善的产业分工协同体系。二是增强先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聚焦制造业发展前沿方向和新兴领域,加快实施前沿引领型重大项目,发展壮大新一代智能终端、电子核心基础部件、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智能电力及新能源装备、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生物医药、智能传感器及仪表、节能环保等优势制造业集群,培育形成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智能物联网、通信与信息安全等新兴产业集群。以科技研发、工业设计、金融服务、文化创意、商务会展等为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以现代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是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按照“特色鲜明、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原则,大力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坚持全产业链整体引进与布局,加强中心城市与次级中心城市,以及新兴增长中心之间的多向产业联系,形成都市圈产业网络化联动格局,提高最终产品本地配套率。整合都市圈各类产业园区,推进项目、

企业、产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集群从原料、成品到设计、销售的纵向延伸,促进产品多样化、创新化、融合化的横向拓展,提升区域产业关联度,建设一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集群品牌。

3.树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有效缩小公共服务圈层落差

都市圈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中于中心城市核,并呈现出圈层化逐级递减趋势。在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过程中,要着眼于提高公共服务总体供给能力,缩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圈层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差,努力推进四个一体化。

一是推动教育服务一体化。在中小城市教育资源配置上,向中心城市靠拢;在乡村教育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区域靠拢。设立都市圈民办教育专项资金,在保障基本教育需求的基础上,提供高标准、有特色的网络教育服务,满足居民多层次、个性化和高品质的教育需求。二是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优化都市圈内省级综合医院——市(县)级综合医院——乡镇(社区)卫生院三级配备,推动梯度化发展。推动在都市圈内部以省级医院牵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卫生和健康合作,加强学术交流培训、医生联合培养,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合应对机制,推动医学检验检查结果跨地区、跨机构互认。三是推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服务一体化。坚持就业优先发展,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市、县(区)、乡镇(街道)和用人单位四级信息网络,建设统一的就业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收集并公布就业信息,实现都市圈域内和城乡间的劳动力资源信息共享。打造都市圈社会保险一体化合作平台,拓宽社会保险工作的合作空间,调动群众参保的积极性。四是推动文化体育服务一体化。按照设施所覆盖的人均规模均等的标准,增加文化体育设施的数量和分布密度。加大文化馆、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美术馆等省级、市级大型场馆建设在都市圈空间范围内的统筹规划力度,推动博物馆、剧院、体育场馆等共建共享。

4.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建山清水秀美丽宜居都市圈

都市圈既是经济相对发达和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也往往是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区,急需通过生态网络共建和环境联防联控,推动

都市圈城市功能由“生产空间”向“生态宜居空间”转变。

一是加强都市圈“绿廊”建设。中西部地区都市圈要抢抓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充分依托沿江河湖、沿交通线自然山水,着力打造生态廊道,加快都市圈“绿廊”建设。如郑州都市圈要以沿黄河流湿地公园群和引黄湖泊湿地公园群为支撑,以城市生态安全屏障和沿黄生态文化风光带为一体,以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防洪固堤林四条宽防护林带为协同,构建“一核引领、两群支撑、三位一体、四带协同”的黄河生态廊道体系,真正把黄河生态廊道建设成为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的绿色生态长廊,黄河流域极富魅力的“千里画廊”。二是加强都市圈“绿环”建设。要依托都市圈周边的主要河流和交通线,因地制宜开展规模造林、道路绿化,结合都市农业圈建设,构筑中心城区生态隔离绿环;依托山地丘陵生态区以及平原农田开敞空间、森林、水系,构建融生态保护、文化景观、现代都市农业生产、休闲游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圈生态外环。三是加强都市圈“绿心”建设。依据自然条件,系统配置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等生态空间,建设都市农业园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国际品质的都市生态绿心。加强成片森林、郊野公园建设,大幅度增加蓝绿空间,优化林种树种结构,提升森林景观,推动形成集生物廊道、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生态文化风光带于一体,具有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游憩展示等功能的综合型城市生态走廊。

5.树立协调共生理念,构筑功能互补的城乡融合体系

从国内外成熟的都市圈发展经验来看,多极支撑、功能互补的城乡体系是都市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趋势。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在沿主要交通干线进行拓展的过程中,中心城市和其他大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交通通达性日益增强,未来要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的优势,推动城镇体系由“中心——外围”向“节点——网络”转变。

一是全面推进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目标,强化高端要素集聚、创新示范引领、文化教育服务、国际交往门户等核心职能,加快非核心职能

的有机疏散,建设具有创新活力、人文魅力、生态智慧、开放包容的国家中心城市。二是强化次级中心城市承载能力。顺应多中心、多圈层、强联系的都市网络化发展趋势,着眼破解中心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和规模报酬效率持续下降难题,积极推动次一级城市发展成为承担都市圈部分核心职能的综合性城市。三是提升重点城镇集聚能力。提升主要县市、产业新城等新兴城市区域的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完善城市居住、游憩、就业、交通等功能,促进人口和产业上规模;支持一批综合经济实力较强、人口规模较大的重点镇进行镇改市试点,促进重点镇突破转型,向城市管理型体制转变。

6.树立自由流动理念,营造统一开放、标准互认、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完善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做法,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区域市场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一是推动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消除都市圈内的户籍壁垒,促进人口围绕城镇功能定位、产业构成等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有机融合。推进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逐步实现都市圈人口信息整合和共享。健全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确保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建立统一的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及时准确向社会提供各类劳动力市场信息,并实现专业技术资格互认、岗位资格证书通用、信息共享。二是推动技术市场一体化。推动在都市圈内合作建立科技研发、中试基地,加快建立健全各城市政府联合出资支持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共享机制,加快应用型科研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建立都市圈科研与技术开发协作网络、技术信息交易网络,发展跨区域知识产权交易中介服务,完善以专业高效服务为支撑的技术市场体系。三是推动金融服务一体化。支持鼓励各商业银行设立中西部地区都市圈一体化推进分支机构,构建一体化的业务联动服务体系,打造一体化的金融特色工具箱,加快实现存取款、存贷款、授信、融资抵押、风险防范等金融服务同城化。四是推动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通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市场化交易、地方政府磋商合作等方式,探索实行跨区域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符合规划、保护耕地的前提下,推进新增建设用地向跨区域重大

项目和合作共建功能区倾斜,向集约用地程度高、发展潜力大、吸纳人口多的都市圈核心区域倾斜。五是健全和规范各类市场交易平台。以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为平台,建立统一的排污权、碳排放、水权等交易市场。以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为骨干,大力发展各类综合商品市场、专业商品市场和大型物流市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发展区域信用服务市场,建立和完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建立健全都市圈执法联动和协作机制,加强重大维权活动和查处侵权案件的联动与合作。

三、加快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不是简单的空间再扩张或政策再叠加,而是要创造性地解决好区域发展空间受限、能力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推动整个区域共同利益实现最大化。同时,都市圈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核心城市的“独角戏”,而应是区域内城乡的“大合唱”。中西部地区都市圈要在做强核心城市的基础上,从规划体系、项目协同、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共同平台、文化融合等方面着力推进一体化发展,从而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

1.完善发展规划体系

以都市圈空间规划为引领,加强各类规划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构建动态的、可操作性强的都市圈规划体系,有效降低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成本,破解各个城市之间“貌合神离”困扰,为加速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提供保障。

一是加强规划与国家重大战略政策衔接。以功能布局、载体平台、重大项目、政策机制等方面为重点,推动都市圈规划与国家重大战略有机衔接,积极创造条件争取省级乃至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从而自上而下形成合力,发挥出优势叠加效应。二是引导各市发展规划与都市圈规划协同。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修编为契机,构建都市圈空间规划引导机制,重点从发展定位、底线管控、战略引领、产业分工、设施布局、配套政策等方面指导各级城市主动对表“大图”画好“小图”,修订完善自身相关规划,解决好上位规划与城市发展“两张皮”的问题,确保都市圈规划要求能够落地实施。三是编制都市圈重大专项规划。聚焦黄河生态协同发展示范区、华夏文明协同发展示范区、内陆生

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点区域建设以及都市圈不同城市交界地区等跨界地区发展编制专项规划。同时,加快汇总国土、林业、交通、水利、环保等部门专项规划,建立统一空间坐标系的规划数据库和统一分类标准的多规协调平台,推动各项规划指标和要求实现有效的层级传导。四是建立健全规划管理长效机制。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等专业资源,建立都市圈统一的规划管理信息平台 and 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管理系统,逐步构建统一编制、联合报批、共同实施的规划管理体制,推动都市圈各级各类规划成果统筹衔接、管理信息互通共享,实现对都市圈规划体系的动态监控和进程评估。另外,还应借鉴国内外发达都市圈建设经验,加快都市圈层面立法工作,从区域层面提高规划体系的权威性、强制性和可实施性。

2. 创新项目管理制度

以都市圈建设项目为载体,构建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创新项目绩效激励机制,探索建设一批示范合作重大项目,不断增强规划体系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为推动都市圈形成协同互补共生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一是构建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加快统一都市圈项目准入标准,探索制定统一的都市圈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构建统一的项目审核、储备、接续及动态管理机制,打造一体化的项目投资管理平台,推动跨区域重大项目统一审批、统一监管,提高项目流程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探索率先启动统一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管理,在土地指标、环境容量、行政审批等方面实施“一章对外”、分层联动。二是创新项目绩效激励机制。借鉴京津冀城市群、深汕(尾)特别合作区等地区发展经验,打破原有靠税收优惠政策来抢夺招商资源的模式,创新区域产业项目绩效激励机制,探索对都市圈内企业迁入地和迁出地实施GDP分计、成本共担、税收分享机制,通过建立财税共享机制,推动各项优惠政策在中心城市和各类中小城市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三是打造重大项目示范合作平台。借鉴上海、江苏的外高桥—启东合作园区等地方经验,探索采用股份合作、飞地自建、托管建设等模式,谋划实施一批异地园区共建共管项目。如郑

州都市圈要开展诸如武陟—平原示范区—原阳战略合作区、大嵩山地区战略合作区、平原地区生态合作示范区等相关的试点建设,推动园区共同规划、投资、开发和管理,按照项目参与情况推动利益共享,从而实现都市圈产业发展协同和互动共生。

3.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以用地审批政策改革为契机,探索建立更加合理的都市圈土地利用制度,进一步优化都市圈土地利用格局,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都市圈空间差异化有序发展。

一是构建城乡建设用地跨区域调剂机制。把握好国家对用地审批权限进行改革的政策窗口期,建立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调剂和有偿使用平台,加强对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等分类精准施策,探索将都市圈内需要保护的基本农田从大城市郊区置换到小城市郊区,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从而为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腾出更大发展空间,有效缓解都市圈内发达区域的土地供需矛盾,解决农村大量土地空置问题,提高都市圈土地利用的规模效应和产出效率。二是探索实施土地利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探索在都市圈核心区开展先行示范,聚焦总量、增量、存量、流量、质量开展土地利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统一的资源利用绩效标准,增强都市圈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和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积极利用重大事件助推土地利用格局优化。积极争取一些国际国内重大会议、赛事、展览等活动在中心城市落地,依托重大事件契机推动建设国家级或区域性的基础设施,以此推动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同时提升中心城市承载力、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推动都市圈圈层式土地混合利用开发。坚持TOD与SOD相结合的发展理念,沿轨道交通紧凑布局,分内圈层和外围圈层对土地进行不同程度的混合利用开发,发挥空间邻近效应、同城化效应和一体化效应,推动形成更加合理的空间布局、人口布局和产业布局。

4. 构建多元协调机制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手段,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区域协调机制,破除跨区域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推动都市圈共同开发、共同享有、共同治理,充分激发区域合作内生动力。

一是建立都市圈科学决策机制。建立由省有关领导任负责人,由中心城市一把手以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共同组成的都市圈建设领导小组或协调发展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相关工作,分年度审议提出都市圈建设发展重大事项。同时,完善都市圈重大事项决策咨询机制,建立由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都市圈建设专家委员会,健全都市圈重大事项决策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机制,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二是健全重大领域协同联动机制。聚焦基础设施共建、区域产业转移引导、公共服务共享、数据信息开放、生态环境共治等重点领域,设立如专业执行委员会等都市圈协调组织,按照都市圈建设领导小组分年度确定的重大事项,以具体项目为抓手,协同推进都市圈规划实施,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到实处,并向决策组织提出下一年度拟实施的重点任务。三是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多元的信息反馈与沟通渠道,引导企业、市民、民间组织等主体积极参与都市圈一体化进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都市圈建设与运营,增强都市圈内社会各方的认同感和积极性,营造区域跨界融合发展的良好氛围。支持重点行业企业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产业、技术、创新、人才等合作联盟,实现信息汇聚和互通,创建多方谈判机制,以民间交流降低各市合作交易成本,汇聚形成共同参与和支持都市圈建设的强大合力。建立健全都市圈发展第三方评估考核机制,鼓励非政府组织、智库专家、企业组织等共同参与都市圈规划建设的监督和发展质量考核评估。四是构建都市圈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相应的财税减免、转移和重点项目的倾斜政策,聚焦共同的生态治理目标,探索在都市圈实施跨区域、多元化的生态建设投入与补偿机制,推动形成受益者补偿、破坏者赔偿的都市圈生态共保共治格局。

5. 优化协同发展平台

以协同平台建设为重点,设立都市圈建设发展基金,聚焦土地、排污、用水、用能、产权等重点领域,打造要素资源综合管理平台,优化都市圈政务服务平台,努力打破各自为政的传统发展模式桎梏,寻找资源配置平衡点和效率最优点,破解区域要素资源“聚集不经济”的路径依赖。

一是设立都市圈建设发展基金。以往一些都

市圈的“市长协调会”“部门联席会议”等协调组织之所以出现功能疲软,是因为没有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没有形成对区域内各利益主体的“硬约束”。因此,在建立决策协调组织基础上,区域内各级各类城市有必要根据功能定位、经济规模、财政收入、人口规模等方面差别,让渡一定比例资源、资金和管理权限,共同设立都市圈建设发展基金,以优化转移支付的方式为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加大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工作力度,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政策,创新投融资模式,探索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公司,受都市圈决策协调组织委托,负责基础性开发、重大设施建设和核心功能塑造。二是打造要素资源综合管理平台。以都市圈核心区为先行试点,加快整合各类要素资源交易平台,统一异地市场准入制度与考核标准,打造集土地使用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用水权、用能权、产权、技术、人才、资金等数据信息于一体的综合性管理平台,在数据集成基础上设立多个专业特色子平台,推动要素资源跨区统一管理、配置和交易。比如,探索建立都市圈重点排污企业监测数据库及排污权交易平台,在监控都市圈污染总量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排污权的合理配置;组建都市圈用水指标管理平台,按照依水而定、量水而行的原则建设水权交易平台,探索建立都市圈水权分配和使用权流转制度,综合调控都市圈水资源和用水指标;打造科技资源共享及技术交易市场一体化平台,建设跨区域知识产权交易大数据中心,提高都市圈科技研发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质量;建立“共享用工”“周末人才”等供需平台,通过柔性引才引智方式满足都市圈各类企业在解决个性难题上的人才需求等。三是优化都市圈政务服务平台。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依托省政务服务网,加快构建都市圈政务服务数据信息开放机制,制定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和开发办法,建设都市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打造都市圈统一的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和开发平台。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的做法和经验,以税收征管一体化、民生档案异地查询联动、户口迁移、证照办理等民生事项为突破口,加快优化都市圈跨行政区政务服务审批流程,逐步推动都市圈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密等外的政务服务事项纳入统一平台办理,有效提升都市圈政务服务同城化水平。

6. 发挥文化融合作用

突出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脉相通特点,发挥区域文化对都市圈发展的润滑和黏合作用,加快完善文化交流平台载体,推动区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增强都市圈发展的包容性,促进各利益主体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基础和自下而上的发展合力,提升相互协作的认同感和发展意愿。

一是完善文化交流平台载体。整合都市圈文化资源,完善各级各类学术交流、文化交流、节庆、展演、展览等平台载体,开展关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共同研究和阐释,定期举办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专家学者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出谋划策、宣传发声,支持都市圈内各行业、企业协会举办展会、联谊会、推介会等,联合打造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巡回演艺项目和节庆活动,营造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推动区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整合都市圈旅游资源,以文化旅游融合为目标,以重大水利工程、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大遗址考古公园、精品博物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各类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为重要节点,以都市圈河流以及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国省干线等各类交通干道为空间轴线,联合打造一批高品质文化旅游景区、研学基地和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探索构建都市圈统一的文化旅游标识体系,实施都市圈统一的旅游优惠政策,通过旅游带动形成更加频繁和密切的人文交流,形成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 [1] FOX K. Metropolitan American: Urban Life and Urba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80 [M]. Stark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 [2] 姜长云.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J]. 区域经济评论, 2020(1).
- [3] 尹稚, 叶裕民, 卢庆强, 等.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J]. 区域经济评论, 2019(4).
- [4] 张学良. 打造现代都市圈 推进新型城镇化[N]. 经济日报, 2019—02—28.
- [5] 范恒山. 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要抓好五个着力点[N]. 经济日报, 2020—02—13.
- [6] 肖金成, 马燕坤, 张雪领. 都市圈科学界定与现代化都市圈规划研究[J]. 经济纵横, 2019(11).
- [7] 翟国方. 构建现代化都市圈体系的重要意义及实现路径[J]. 人民论坛, 2019(19).
- [8] 安树伟, 孙文迁.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及其提升策略[J]. 改革, 2019(5).
- [9] 仇保兴. 关于城市群与都市圈规划的三点思考[J]. 住宅产业, 2019(4).
- [10] 陈洋.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都市圈发展与规划响应[EB/OL]. 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230527. 2019-12-13/2020-03-01
- [11] 陶希东. 中国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面临的问题及创新策略[J]. 城市问题, 2020(1).
- [12] 张学良, 林永然. 都市圈建设: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J]. 改革, 2019(2).
- [13] 王晓玲. 高质量城镇化: 外部推动、内在需求与实现路径[J]. 城市, 2019(9).

The Judg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esearch Group of Hen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s has become the highland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ain spatial form of urbanization. But in our country, the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eastern regions developed areas developed relatively mature,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relatively lag. Therefore,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traffic network, industrial 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urban and rural system and market environment, and focus on the leading role of planning, system and culture, an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land collaborative use and other measures.

Key Word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Zhe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 平 萍)

【城市经济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史育龙 潘昭宇

摘要:重庆、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两个城市历史渊源深厚,经济社会联系紧密,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互动显著,是改革开放以来内陆地区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新时代优化全国区域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在深入分析成渝地区空间结构和联系特征的基础上,按照尊重客观规律、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统筹把握历史和未来的总体要求,以“双城驱动、两翼突破、轴带拓展、极点支撑”的思路优化空间结构,形成优势互补、全域共兴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127-08 **收稿日期:**2021-05-22

作者简介:史育龙,男,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45)。

潘昭宇,男,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北京 100045)。

成渝地区人口密集、城市众多、经济联系密切,是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开放水平提升最快的地区之一,在南北差距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对于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交汇区域,成渝地区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战略决策。2020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为成渝地区明确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战略定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深入分析成渝地区的空间结构和联系特征,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演进方向,以空间布局优

化促进功能提升,形成优势互补、全域共兴的发展格局。

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结构的特征分析

成渝地区所在的西南地区作为国家的战略后方,曾在许多重要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成渝地区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承接全球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和战略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成渝地区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持续增强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内陆地区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作为长期对外输出劳动力的欠发达地区,2014—2019年,成渝地区常住人口净增长超过500万人,显示出巨大的发展后劲。总体来看,较好的劳动力、土地、水和能源等资

源保障,高铁、公路、机场、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奠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促进了成渝地区空间结构的加速成型。

1.成渝地区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成渝地区土地面积18.5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9600万人,但区域内部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重庆主城和成都“双核”及其辐射形成的两个都市圈具有显著优势,是双城经济圈的“龙头”。2019年,两个都市圈常住人口4759万人、经济总

量4.05万亿元,分别占成渝地区的49.6%和64.3%(见表1)。处在两个都市圈之间的成渝中部地区、沿长江处于重庆都市圈上下游的经济圈南北“两翼”地区、成都都市圈南北两侧的乐山、雅安和绵阳,以及渝东南的黔江等(见图1)区域的人口密度和发展水平都显著低于“双核双圈”,大部分都是人口外流区域。即使如绵阳这样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四川第二位的省域副中心城市,2019年年底的常住人口也比户籍人口少43.59万人。

表1 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分区域主要指标统计

区域	常住人口 (万人)	GDP (亿元)	土地面积 (万平方千米)	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人均GDP (万元)
重庆都市圈	2352	19430	3.50	672	8.26
成都都市圈	2407	21067	2.90	830	8.75
成渝中部地区	1492	5541	2.73	547	3.71
成渝北翼地区	1121	5046	2.92	384	4.50
成渝南翼地区	1182	6112	2.99	395	5.17
绵阳	449	2728	1.14	394	6.07
雅安、乐山	461	2486	2.23	207	5.39
黔江	49	229	0.24	202	4.73

注:重庆都市圈包括重庆主城、璧山、江津、长寿、南川、綦江、永川、荣昌、大足、铜梁、潼南、合川、涪陵和四川广安。成都都市圈包括成都、德阳、眉山和资阳市雁江区。成渝中部地区包括南充、遂宁、内江和资阳市乐至县、安岳县。成渝北翼地区包括达州、开州、万州、云阳、梁平、忠县和垫江。成渝南翼地区包括泸州、宜宾、自贡。按照成渝城市群规划确定的范围,绵阳市北川县和平武县、雅安市天全县和宝兴县、达州市万源市不在其中。

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2020》《四川统计年鉴2020》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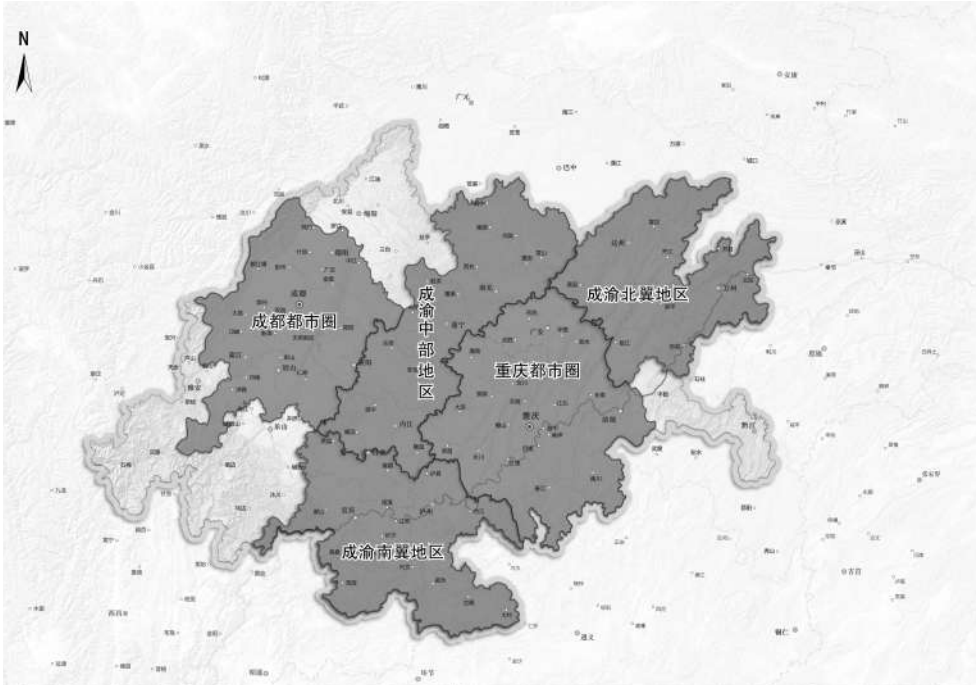


图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示意图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2.成渝“双核”仍处于集聚发展阶段

重庆主城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是成渝地区的“双核”，人口和经济总量大，产业基础雄厚，高端要素聚集，创新能力突出。2019年，成渝“双核”人口数量占成渝地区的26.7%，经济总量占成渝地区的41.8%，发明专利授权占成渝地区的72.3%。2014—2019年，成渝“双核”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达7.6%和7.9%，常住人口均保持每年20万人左右的增长速度，增量占成渝地区的37.5%。重庆、成都两大国际性枢纽承担了成渝地区的主要对外联系功能，2019年，成都双流、重庆江北两大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9位。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入运营，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2019年年底，成都、重庆的城镇化率分别为74.4%和66.8%，其中重庆市辖区的城镇化率为71.8%，均处于城镇化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成渝两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经济总量不到北京、上海的一半，重庆主城、成都人均GDP均为10.3万元，仅为北京的62.8%、上海的65.5%。总体而言，成渝“双核”具有很强的要素吸引力，城市发展仍处于集聚发展阶段。

3.成渝中部地区“塌陷”突出

2019年，成渝中部地区常住人口1492万人、经济总量5541亿元，分别占成渝地区的15.5%和8.9%，人均GDP为3.71万元，不到成渝“双圈”的一半，属于成渝之间的发展“洼地”。成渝中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49.1%，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成渝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交通条件较好，高速公路密度达到5.14千米/百平方千米，处于较高水平。成渝中部地区地处川、渝交界地带，距离成渝“双核”100—150千米，受成渝“双核”辐射带动作用有限，产业发展以食品饮料、冶金建材、纺织服装等为主，但优势不明显，主导产业不突出。由于成渝中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滞后，人口依然处于外流状态。截至2019年年底，成渝中部地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额扩大到238.87万人。据成渝中部地区各市2018—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目前4市转移到省外的农村劳动力总量约150万人。2014—2019年，成渝中部地区常住人口减少6.27万人，生产总值占比也由10.2%下降至8.9%，“塌陷”态势仍在继续。

4.成渝“两翼”战略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大

成渝北翼地区地跨渝东北长江干流沿线和川东北大巴山区，承担着维护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安全、支撑川渝陕鄂跨省交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也是渝东北和川东北地区东出、北上的重要门户。成渝北翼地区能源资源富集，拥有全国三大气田之一。成渝北翼地区距离成渝“双核”200—400千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高速公路密度3.1千米/百平方千米，在成渝地区最低，受空间距离及地形阻隔等影响，成渝“双核”辐射带动作用有限。2019年年底，成渝北翼地区常住人口占成渝地区的11.7%，经济总量只占成渝地区的8.0%，且近年来经济增速低于川渝地区总体水平。成渝南翼地区地处川渝滇黔接合部，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也是成渝地区通往北部湾港口群最便捷的集结点。成渝南翼地区距离成渝“双核”120—220千米，机场、港口条件较好，但铁路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发展的短板。与成渝北翼地区一样，成渝南翼地区的经济比重显著低于人口比重，但不同的是，年均经济增速在成渝地区各版块中最高，2014—2019年经济年均增速8.7%，白酒、能源、化工、纺织等产业具有较强优势，同时，依托沿江港口和铁路通道发展的电子信息、商贸物流等产业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5.成渝地区县域数量多，有望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极点

成渝地区县级单元众多。除成渝“双核”外，还有122个县级单元，其中市辖区51个、县(市)71个。71个县(市)常住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成渝地区的43.3%和28.4%，这些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近的县级单元，是未来双城经济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重要载体。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不少县城人口规模已达数十万人，具备了承载一定规模人口、经济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邻近的县(市)，如嘉陵江沿岸的阆中、苍溪和南部等县(市)自发推进一体化发展，重庆的垫江、梁平和四川的开江、大竹等县(区)也在谋划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等，有望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极点。

6.成渝地区对外联系方向集中，内部联系强度差异大

目前，成渝地区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客流占比

约为45%、30%和25%,不含公路运输的货运量占比约为27%、60%和13%,表明对外联系主要集中在向北和向东两个方向。与主要通过西成、宝成、兰渝、襄渝等通道向北联系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以及通过长江水道和沿江铁路向东联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个主要方向相比,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联系云南、贵州、广西等3个省(区)并延伸至中南半岛的南向联系,目前由于与沿江通道有一定替代性,还没有形成规模。在成渝地区内部,联系主要以成渝“双核”为

中心展开。从客流来看,以成渝、成德绵眉乐、成都—达州和重庆—万州等联系最为密切。2017年成渝之间联系强度高达1460万人次/年(见图2),高于距离相当的济南—青岛之间1350万人次/年的联系强度,达到上海和南京间联系强度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距离成渝“双核”更近的成渝中部地区,与成渝“双核”之间的联系强度并不高,大多保持在500万人次/年以下,进一步印证了成渝中部地区的“塌陷”短板。



图2 2017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强度示意图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优化的目标和要求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全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普遍得到巨大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加速带来的分布变化日益显著,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也由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逐步转向人才、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驱动。在人口和经济不断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同时,城市和区域间的分化现象日益显著,竞争与合作关系也更趋复杂。为

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格局优化既要充分考虑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轨迹,也要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顺应未来发展趋势;既要尊重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积极塑造新格局。

1.空间格局优化的目标

成渝地区已经形成了显著的双中心结构和以向北、向东为主的对外联系特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战略的不断推进,向北、向东的联系还会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南快北慢态势明显、内需市场重要性不

断上升的情况下,南北方联系的重要性会日益凸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优化就是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面向“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聚焦成都都市圈和重庆主城都市区、区域中心城市和支点城市等面临的关键问题,通过构建现代化都市圈,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通过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进成渝中部地区崛起、南北“两翼”振兴,通过促进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实现优势互补,构建中心城市引领功能彰显、基础设施体系完善高效、区域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城乡经济联系密切的空间结构,不断提升区域功能和发展能级。

2. 空间格局优化的要求

第一,尊重客观规律。一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这种经济总体效率提升,反映的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优化空间结构,就是根据各地区、各城市的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在充分考虑市场竞争力和技术进步因素的基础上,配置相应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并通过调整各类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促进这些功能的实现。

二是尊重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规律。城乡区域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与区域之间的互动作用是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的动力,这种互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各类要素的集聚和扩散。城市空间扩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就单个城市而言,每个城市的空间扩展方式受城市所处的地形地貌、交通条件、人口分布和产业联系等因素影响。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教授认为城市空间扩展方向主要取决于其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既是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畅通循环的过程,也是在中心城市带动下,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和扩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先导作用以及随要素集聚和扩散形成的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塑造了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成渝两地直线距离约270千米,在区域经济空间自组织规律的作用下,处于两大中心城市辐射末梢的成渝中部地区逐步被边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布局

要发挥好成渝“双核”的引领作用,带动解决成渝中部地区的“塌陷”问题。

三是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以存量和流量形式存在的各类要素空间组合关系。在现阶段,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保障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生产要素集聚,具有明显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优势地区指向,近年来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作用日益突出的产业链、创新人才和金融等专业服务,除原有的集聚指向外,也出现了特定的自然生态和产业生态指向。近年来,随着5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步伐加快,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悄然崛起,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创新要素向以应用场景为代表的市场空间集聚态势明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把破除资源流动障碍放在首要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第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要求。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渝地区地处内陆,常住人口接近1亿人,有很大的消费市场需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成渝地区要发挥市场优势,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通过空间格局的优化,拓展市场空间,着力打通经济循环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二是坚持一体化发展,打造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唱好“双城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布局要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兼顾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为交通基

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空间载体。

三是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以点带面、均衡发展。2020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成渝地区要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着力提升重庆主城和成都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以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边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布局要着眼于协调中心和区域的关系,强化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市的协同与带动作用,既要有利于优化提升成渝“双核”发展能级,又要有利于成渝“双核”更好地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缩小中心和区域之间的差距,积极改善人均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地惠及成渝地区。

第三,统筹把握历史和未来。一是立足历史和现实。从发展历史来看,成渝地区一直强调“极核”和“轴带”的布局关系,重庆主城和成都的“双核”特征显著,成德绵、成绵乐、成内渝等轴带发展态势良好。城市规模和行政层级都是影响城市要素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因素,规模越大、行政层级越高的城市,对于政策红利、优势产业、流动人口等的吸引能力强,越易形成集聚优势,导致中心—外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成都、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发展水平较高,外围腹地县域单元经济产业薄弱,次级节点能级不足,城镇体系不完善。同时,沿江、成南(遂)渝等发展带尚未发育成型,成渝中部地区、达万地区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区之间发展差异大。

二是着眼趋势和未来发展。从发展趋势来看,重庆、成都两地均已进入都市圈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成灌铁路、成渝中线高铁、重庆市域(郊)铁路渝合线、璧铜线等的加快建设,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城市群1小时交通圈加快形成,促使成渝两地中心城市的产业和功能外溢态势初步显现。环中心城区的外围地区成为人口和经济的高增长地区,重庆中心城区向主城新区外溢显著,开始形成环重庆工业快速增长区域,而成都呈现中心集聚与区域外溢并存的现象。以重庆科学城、成都东部新区为代表的城市新区建设,进一步加快了外围地区承接中心城市的功能扩散转移。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格局优化的思路

2011年5月,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出“双核五带”空间格局,即重庆、成都双核,沿长江发展带、成绵乐发展带、成内渝发展带、成南(遂)渝发展带、渝广达发展带。2016年4月,国务院批复《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了构建“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空间格局,即提升重庆和成都的核心功能,打造成渝发展主轴,培育沿江城市带,优化成德绵乐城市带,培育川南、南遂广和达万城镇密集区加快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出了“一轴三带三圈”的空间结构,即成渝发展轴和成绵乐、长江、嘉陵江三个城市发展带,以及重庆、成都和南充三大都(城)市圈。笔者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在强化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基础上,补齐成渝中部地区的发展“短板”,提升绵阳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增强对西北方向的引领带动作用,强化万州和宜宾—泸州在东、南两个方向上的集结门户地位,形成沿成渝、成南达万、沿江和成德绵乐自宜4条发展轴带布局的“双城驱动、两翼突破、轴带拓展、极点支撑”空间格局(见图3)。

1. 增强“双城动力源”

一是做优成渝“双核”。优化重庆主城和成都功能布局,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辐射功能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培育发展现代产业集群,全面提升成渝“双核”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国际枢纽机场、国际铁路港及中欧班列等比较优势,完善立体大通道体系,高效联通国际国内主要市场。通过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级战略平台布局,提升重庆主城、成都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工程研究能力,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等创新服务,塑造创新生态体系,打造高等教育、医疗等国家级公共服务区域分中心。

二是做强成渝“双圈”。加快编制实施重庆、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培育发展成渝两大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和县(区)高质量发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顺应产业升级、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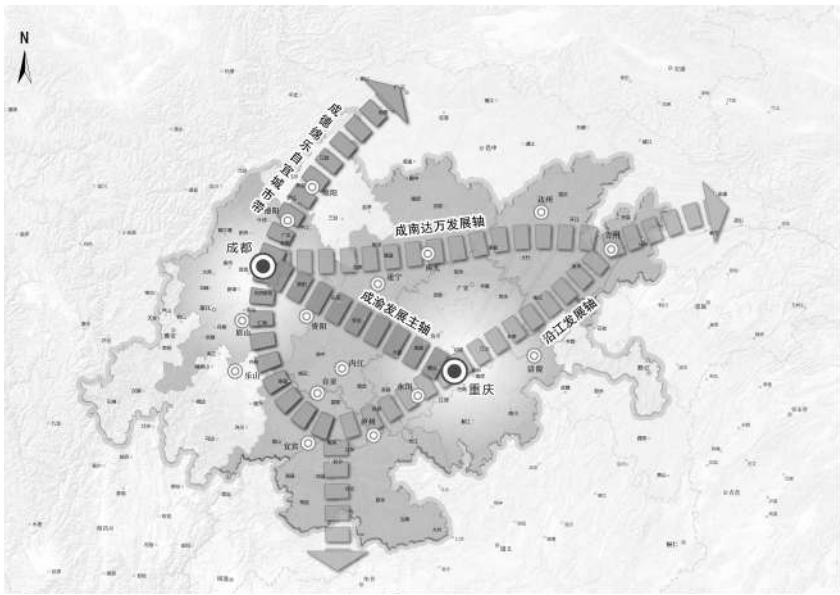


图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轴带示意图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流动和空间演进趋势,适度疏解成渝主城区非核心功能,创新合作方式,共同建设区域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新型产业发展平台,推动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协调推进机制,以轨道交通为重点健全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探索建设跨行政区的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有序规划建设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推进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向周边城镇合理延伸,实施“断头路”畅通工程和“瓶颈路”拓宽工程,畅通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发展的通道,加快构建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

2.提升成渝“两翼”战略地位

一是振兴成渝北翼地区。发挥万州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出门户枢纽的区位优势,建设重庆市域副中心城市,促进万州与达州、开州等县(区)协同发展,合作开发利用优势资源,建设东出北上综合交通枢纽、巴蜀文化传承创新和旅游发展高地。加强成渝北翼地区与成渝“双核”联动,积极承接产业和人口转移,打造带动三峡库区、渝东北、川东北及川渝陕鄂交界地区发展的区域增长极。完善联系腹地的基础设施,强化铁路、港口协同联动,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区域等级公路建设和升级改造,加强高速公路、普通国道和省道、农村公路和航道等有效衔接。共建长江上游地区绿色生态屏障,探索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规则,统一保护标准和环境准入政策。

二是做强成渝南翼地区。抓住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以宜宾、泸州为重点,以对外开放和产业平台为纽带,协同长江岸线保护开发,加快推进长江上游区域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向开放门户,谋划衔接服务“一带”与“一路”、带动川滇黔渝交界地区发展的区域增长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成自宜高铁、渝昆高铁等,加密高速公路网络,提升水运航道通行能力和区域支线机场运载能力。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协同承接产业转移,统筹规划建设省级新区,打造产业和人口优势承载地。加大空间资源供给,优化功能布局,完善城市配套功能,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3.推动轴向拓展

一是加密成渝间的轴向联系。除成渝主轴外,依托成南达万铁路和沿江通道在北部和南部布局两条新的轴线,进一步加强成渝“双核”和成渝“双圈”之间的联系,强化中心城市对成渝中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促进沿江城市协调发展。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渝昆高铁、渝万高铁等,发挥重庆辐射带动作用,形成重庆至成渝北翼地区、成渝南翼地区的沿江发展轴,带动永川、泸州、宜宾、涪陵、万州等沿线城市发展,探索建立沿江城市间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和旅游、港口等资源协同开发的市场化机制。三是促进成南达万发展轴成型。依托成南达万高铁、达成铁路、达万铁路等综合交通网络,

形成成都至万州的成南达万发展轴,建立成都平原到长江“黄金水道”的便捷联系通道,辐射带动遂宁、南充、达州、万州等城市发展。四是完善成德绵乐自宜城市带。依托西成高铁、宝成铁路、成贵高铁、成自宜城际铁路和成绵、成乐、成自泸高速公路等构成的综合运输通道,发挥成都辐射带动作用,带动绵阳、德阳、乐山、眉山、自贡、宜宾等城市发展,形成若干个区域中心城市,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次级支撑。

4. 丰富“极点支撑”

一是补齐成渝中部地区“短板”。以南充、遂宁、潼南、资阳、内江为重点,着力破解发展动力不足、成渝“双核”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的困局。加强机场、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布局,搭建川渝毗邻地区产业合作发展平台,推动遂宁—潼南、资阳—大足等一体化发展,主动承接成渝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强化为成渝“双核”配套服务的能力,完善城乡融合试验区相关政策,建设成渝中部产业聚集区。二是支持绵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依托中国(绵阳)科技城,适当疏解成都的教育、医疗和科技服务,发展电子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增强区域服务功能。三是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以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促进县城(县级市城区)完善基础设施,增强要素承载能力,集聚更多人口,扩大市场规模。四是支持具备一定合作基础的

邻近市(县、区)抱团发展。支持内(江)自(贡)同城化、阆苍南一体化、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等先行先试,形成多极点共同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
- [2] 周一星.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J].城市规划,1998,22(2).
- [3] 尹虹潘.成渝城市群空间经济格局与城际经济关联[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3).
- [4] 肖金成,汪阳红,张燕.成渝城市群空间布局与产业发展研究[J].全球化,2019(8).
- [5] 李凯,刘涛,曹广忠.城市群空间集聚和扩散的特征与机制——以长三角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例[J].城市规划,2016,40(2).
- [6] 姚作林,涂建军,牛慧敏,等.成渝经济区城市群空间结构要素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7,37(1).
- [7] 胡锡琴,张红伟.空间经济视域下城市群FDI、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成渝城市群的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
- [8] 张学良,张明斗,肖航.成渝城市群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6).
- [9] 杨任飞,罗红霞,周盛,等.夜间灯光数据驱动的成渝城市群空间形成过程重建及分析[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7,19(5).

Study on Spatial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Shi Yulong Pan Zhaoyu

Abstract: Chongqing and Chengdu are important central c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close economic and social ties, and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central c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y. They are one of the fastest developing regions in inland area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build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nd create an important growth pol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a major strategic plan for optimizing the national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in the new era and a major measure for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conn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engdu-Chongq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engdu-Chongqing is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respecting the objective laws,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rasping the history and future as a whole, with the idea of “driving by two cities, breaking through by two wings, expanding the axis, and supporting by poles”, so as to form a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whole region.

Key Words: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Spatial Patter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责任编辑:张 子)

【城市经济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张合林 申政永

摘要: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调发展,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在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路径,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如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衡配置机制、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机制和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等。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路径;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135-10 **收稿日期:**2020-12-1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软科学研究计划)“河南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20A790023)。

作者简介:张合林,男,郑州大学商学院河南省二级教授,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郑州 450001)。

申政永,男,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经济学硕士(郑州 450003)。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远滞后于城镇化水平。城市强大的极化效应使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发展的落后。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体会到和城镇居民同样的幸福感。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体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耦合发展、平衡发展。2019年5月,《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并重,探索实现两大战略的耦合及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城镇和乡村是国民经济两个密不可分的基本经济单元,二者的关系不是分割的,而是互相联动、相辅相成的。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20世纪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城乡融合作为未来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模式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共同目标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重大理论、认识、理念、方法和道

路问题。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举措和重要途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一起抓,两个轮子一起转,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调发展,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将决定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和未来。

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现状分析

中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现状主要表现在城乡经济、社会和生态耦合协调发展等方面。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包括城乡产业发展、居民收支、政府财政收支、要素流动等;社会耦合协调发展包括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基层治理等;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包括城乡生态环境及人居环境建设等。

1. 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在城乡产业发展方面。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8.65万亿元,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70473.6亿元、380670.6亿元、535371.0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7.1:38.6:54.3^①。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5%。但是,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依旧存在较大差距,第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6239元/人、181256元/人、145484元/人,中国二元对比系数^②偏低,表明城乡二元结构仍比较明显。

在城乡居民收支方面。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较上年均有大幅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缩减至2019年的2.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较于前些年有所缩小,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尽管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仍只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收入的37.8%,扣除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可供农民实际消费的可支配收入更低。

在政府财政收支方面。中国财政实力不断提升,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奠定了

物质基础,201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190390.1亿元,比上年增长3.8%;国家财政总支出为238858.4亿元,比上年增长8.1%。但是,财政支出在城乡分配上仍有偏斜。根据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关数据,农业、林业、水利支出为22862.8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9.6%。并且除农业、林业、水利、南水北调和扶贫等财政支出外,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综合改革支出仅为288.8亿元和1644.3亿元,仅占前述总支出的0.12%和0.69%^③。

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要素流动加速,城乡联系逐步加强。但是,从城乡和工农固定资产投资看,201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551478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投资为163070亿元,比上年增长3.2%;第三产业投资为375775亿元,比上年增长6.6%。第一产业投资为12633亿元(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29%),比上年仅增长0.6%,增长率最低且呈放缓态势。此外,2019年农林牧渔行业的投资增速仅为1.4%,表明资本仍然集中于城镇而非农村,主要在城镇寻找增值机会。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资金仍在持续大量外流,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58.6万亿元,但是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仅为35.19万亿元^④,表明大量资金没有用到农村地区的发展当中,而是转移到他处寻找增值机会,获取增值收益。农村地区的人才仍持续外流,缺乏人才引领的农村地区“造血”能力差,内生动力不足。

2. 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村庄内道路长度全年新增113882.8千米,全年更新改造101909.4千米,全年硬化道路1634591.4千米。城市建成区面积为60312.5平方千米,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13.99万千米、公路里程为501.25万千米、高速等级公路里程达14.96万千米^⑤。在城市加快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综合性能的提升,努力打造环境优美的海绵型城市,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但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不足,城市边界逐渐外延,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逐渐下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赶不上城市拓展的速度。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集中供水乡的个数为8544个,虽然已经占全部乡总数的90.15%,但仍然存在没有

集中供水的乡。部分地区存在行政村建设没有经过合法村庄规划,相当数量的行政村没有开设综合服务站,没有设立电子商务配送点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全国持续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推行居住证制度,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医疗、教育、福利资源。推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待遇,城乡居民参保率达到95%以上^⑥,基本实现全民医保。持续提升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能力,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在全国设立县级以上文明村,在行政村中设立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农民开展业余文化活动。截至2019年年底,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1481.8元/人,占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的11.1%,比重较上年持续上升,设立乡镇文化站40747个^⑦,表明乡村更加注重教育和丰富精神生活,农村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体育、文化等城乡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基层治理方面。行政村村干部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现象,大专以上学历占比不到5%,高中学历占比不到20%,初中以及初中以下的学历占大多数,严重缺乏年轻化、知识化的村干部。同时,由于城乡基层公务员岗位待遇和晋升体系差距较大,应聘城镇公务员的人数远多于乡村,“农二代”中的大学生也倾向进入城镇公务员体制,导致乡村基层组织人才不足,无法充分支撑带动乡村发展。基层各个治理主体中,主要发挥作用的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民间组织和普通村民对基层治理的参与程度不高,作用较少。“选调生”“挂职干部”在农村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乡贤能人”在引领农村发展和参与基层治理方面表现优秀,但数量较少。在基层治理中,治安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民众较高的评价,但是在农技服务的供给上仍存在较大缺口,农村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偏低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干部的留用、晋升机制不完善导致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不高,配套资源投入不足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较

大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政策执行的效果。

3.生态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城乡环境统筹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有所提高。2019年,全国化肥施用折纯量和农药施用实物量分别为5403.6万吨和139.17万吨,均有大幅下降。此外,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大力推行的厕所革命和农村户用厕改造,使农村使用卫生厕所的户数显著增加。2019年,全国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的乡有3156个,占全国乡总数的33.3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3.2%^⑧。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和处理工作稳步推进,2019年,生活垃圾清运总量为24206.2万吨,无公害处理厂共计1183座,城市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能力为869875吨/日,城市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量为24012.8万吨,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9.2%。与此同时,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环境更加优美,生态保护明显加强。2019年,全国城市公园数量为18038个,比上年增长7.79%;全国公园占地面积为50.24万公顷,比上年增长1.6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4.36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7.13%。2019年,全国城市绿化覆盖面积为228.5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41.5%,比2014年增加46.5万公顷,绿化覆盖率提高1.3个百分点,城乡生态耦合发展态势趋好。

三、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要素配置失衡,城乡产业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城乡空间布局不合理等方面。

1.城乡要素配置失衡

由于城市的集聚效应及资本、劳动力等因素的逐利性,使得农村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大量向城市转移,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农村地区则没有得到明显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区域发展滞后已经影响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如人才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户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2019年分别占全

部农村居民家庭户主的32.5%和50.8%,而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仅占2%,全国农村缺乏高文化水平居民已经成为普遍问题^③。除此之外,大量青年劳动力及人才流向城市,多数学生在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生活,还有一部分年轻人进城务工或者创业,成为离土不回村的“农二代”,农村宅基地及房屋闲置现象比较严重。

2.城乡产业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在长期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产业发展落后,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不少农村地区缺乏产业支撑,传统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经营,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村地区的资源利用意识不强,传统的古村落和文化习俗不能让其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产业难以体现特色,也缺乏资金支持;经济发展落后与大量人口外流现象较为突出。农村产业融合存在产业链纵向延伸不长、生产技术落后、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横向扩展不足,多数农村对当地农业功能连接广度不够,缺乏农业与休闲、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不足成为制约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融合主体带动能力较弱,部分新型经营主体结构单一、管理粗放,经营能力不强,产业融合能力差。部分农村经营主体缺乏创新能力,同时,基础政府对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视程度不够,不能很好地匹配市场需求。此外,由于城乡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度较低,农产品本身附加值较低,农村居民从事农业生产收入甚微。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但由于其整体文化水平和技能较低,致使进城务工人员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体力劳动,收获的劳动报酬较少,且就业难度较大。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劳务市场监管机制不完善,许多用工方并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农民工无法获得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基本保障性待遇。

3.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比较严峻,农村居民及农业转移人口未能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均等的教育、就业、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配置

不均衡问题较大,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农村教育资源短缺,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在医疗卫生方面,2019年,全国卫生人员总数为1292.83万人,而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为84.23万人,仅占6.52%;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总数为880.70万张,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136.99万张,仅占15.55%,农村每千人拥有的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1.48张,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25%^④。虽然农村居民新农合作医疗保险覆盖率大幅提高,但其保障作用仍低于城市。在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依旧存在城乡不均衡,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农村居民的养老参保意愿不高,且由于老龄化问题,农民参保年龄高,参保级别低,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数额较少,养老更多还是依靠土地和家人。此外,农村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农田水利条件较差,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也影响了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以及资本等要素向农村的转移。比如,2019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为31450.53万户,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为13477.33万户,后者仅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30%。在污水处理上,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的乡仅有3156个,仅占乡总数的33.30%^⑤,而城镇污水处理率已经达到95.1%。在自来水普及上,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83.2%,而城市基本已经实现全覆盖。在生活用电方面,农村电网检修效率较低,部分地区线路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且供电可靠性较低。目前,电商行业在城镇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部分农村还没实现互联网覆盖,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发展。

4.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城乡空间布局不合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⑥,城乡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较低,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农村承包地及宅基地流转不顺畅,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农村多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致使大量耕地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同时“空心村”大量出现,农村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据中国科学院统计测算,中国“空心村”土地整治增地潜力近1.14亿亩,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可达到1.49亿亩。城乡规划体系尚未完善,1.3万个村庄的建设没有经过规划,出现住房布局不合理、耕地大量占用、居民生活便利程度低等问题。

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 路径选择

城乡间交易效率的差异是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城乡间的交易效率能够实现较高水平的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提高城乡交易效率首先要消除城乡市场中的界限,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注重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建设。由于中国农业生产体系比较薄弱,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因此应注重打造城乡产业间优势互补、共同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通过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第一、二、三产业高效融合,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注意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使城乡居民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让农村居民享有等同于城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乡村振兴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必须因地制宜,统筹利用城乡空间,其中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特征之一,推动中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宜居城乡。

1. 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

在市场导向的城乡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和政策空间的作用。政府通过对约束个体、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城乡发展的障碍性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发展能力,在市场原则的约束下,自主地选择参与方式。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流动中的作用,促进城乡间各种要素资源按照市场价值规律进行配置,政府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及时弥补“市场失灵”,为要素流动创造顺畅的交互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高城乡交易效率。加快健全土地要素市场,着力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完善相关配套设施,盘活城乡存量建设用地,对低效利用的土地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使用权调整,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推进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一方面,调整地区落户政策,继续大力推行人才引进政策,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提高人才的待遇水平,加强对失业者的帮扶,消除地域、性别歧视,使城乡劳动者享受平等待遇,优化营商环境,适度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推动金融业发展,建立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城市对人才、资金的吸引力,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加大城市在人才、资金、科技等方面对农村的支持力度,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为资本、技术、劳动力下乡创造条件,充分体现各种要素的价值,使其落地生根,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动力;改革农村金融体系,运用城市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建设。

2. 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第一、二、三产业高效融合

通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有机结合。土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过程的必经之路,但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能够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充分体现农产品的价值,使农业生产获得合理的增值收益。此外,在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上,一方面,可以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形式为农地流转中的各个主体提供法律保障,规避纠纷;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各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经营主体提供现代农业技术、经济服务,为其生产提供便利条件。

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需要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同时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将其与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制造业相结合。一是从农产品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入手,拓展农业产业链,深度挖掘农业产业价值。通过设立农村农产品加工企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精细加工和综合生产协调发展,建立农产品直销店,借助网络进行农产品销售,加强供需对接,发挥农业合作社及基层组织的作用,发展产销衔接,实现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的一体化发展,将农产品的增值环节更多地

保留在农村,充分发挥地方龙头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带动作用,发展地方产业集群,将其作为农业产业链延伸的重要主体,设立大规模、高质量、绿色环保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更加注重经营收入在企业与农户间的合理分配。通过政策支持和科技创新提高地方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打造地方知名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扩大产品影响力,进而延伸农业产业链的覆盖范围。二是顺应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趋势,充分挖掘农业的生态价值、观光价值,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通过发挥农业农村在生态涵养、健康养老、文化教育、休闲旅游的多功能性,充分挖掘农业农村的价值,弘扬乡村文化,推动乡村各种资源整合,实现多元化增值,为农村实现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契机。三是促使城市工业链条向农村延伸,将工业生产中的一般加工环节、零部件和原材料生产环节放在农村,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增加农民就业机会。通过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产业兴旺”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结合。

3.加强城乡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

通过交通网络覆盖面的扩大、通信设备的现代化、供水送电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使城镇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得以有效发挥。一是建立城乡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快城乡之间公路、铁路、水运等建设,完善交通相关设施,便捷的交通是连接城镇和乡村的基础条件,建设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极大地缩短城镇与周边乡村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城乡要素的商品流动更加便捷高效,为实现空间融合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完善城乡供水、供电体系,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地区差异大,供需矛盾日益加深,必须提高节水供水能力,科学有序地开展大中型灌区、水库等水利设施建设,完善城乡供水体系,推动节水设施改造,为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提供保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可以通过构建大中小微相结合、骨干和田间相衔接、节水效率高的农地灌溉网络,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保障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可以提高电信网络的覆盖率,建设现代化的通信网络,推进城乡实现信息化,加强城乡互动,提高城乡的科技应用能力,为城乡信息交

流提供顺畅的渠道,也为实现数字乡村战略、智慧农业等重大工程奠定基础,使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等服务更好地惠及农村和农民。

在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一是完善城乡公共卫生体系,补齐农村教育短板,及时更新城乡地区基础医疗、教育设施,加大农村地区医疗、教育人才团队建设,着力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推进低保制度统筹城乡发展,强化对城乡居民困难人员及特殊人群的照顾与帮扶。二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首要是政府,政府要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也要创新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政府领导,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三是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在进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及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时,充分考虑农民诉求,让农民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与尊重。四是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基层公益事业支出比例,增加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出比重,尤其是要注重公平原则,加大对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加强监督,严查贪污腐败,确保资金用在实处,充分发挥转移支付资金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中的作用。

4.因地制宜、统筹城乡空间

一是依照地区特点完善规划体系,在充分理解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按照城乡“整体定位、功能侧重、有机融合、同样美好”的理念,统一编制城乡发展规划,在编制规划时要通盘考虑城乡发展中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对地区内各城镇和乡村进行整体功能定位。二是充分发挥城市群、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对周边乡村地区的带动作用。对于区位优势优良的乡村,可以采取就地城镇化的方式,使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对于比较偏远、环境恶劣的乡村,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下,进行整体搬迁、合并、置换;对于有地方特色、存在浓厚民俗文化的村镇,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建立特色鲜明、充满魅力的小镇和小城镇。三是统筹布局城乡发展空间,优化各市及县城的空间结构,完善城区规模结构和管辖范围,提高存量土地利用效率,利用多种方法、结合社会力量加快旧城改造项目和新

区开发建设进程,完善环境卫生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条件,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承载力。与此同时,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促进主要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将乡村生产逐步融入区域性产业链和生产网络,引导服务业向县城和乡镇的产业集聚区、生产园区集中。

5.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宜居城乡

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宜居城乡。实施城乡环境统筹发展,充分认识和发挥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的保障作用,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为城乡环境治理提供法律保障,严格执法,明确法律执行中的主体、程序和客体,做到公正执法。根据各地情况,科学地确定政府职责和权利,从整体上对城乡生态环境进行统筹,优化城乡产业布局,打破现行城乡环境分割治理模式。通过制定并施行绿色税收和税收优惠政策,对有利于提升城乡生态环境的企业减免一定的税收,对破坏城乡环境的企业适当增加税收,让高污染、低效能企业尽快退出“历史舞台”;实施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修复的重大工程,开展大范围土地绿化,推进污染地区生态修复工作;加强对城乡居民环保意识的培育,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逐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鼓励发展绿色生产,通过改良育种技术及生产模式,减少对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加强城乡公共空间的卫生管理工作;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生态环境修复,在经营主体完成一定规模修复工程及符合土地使用条件的情况下,允许其利用部分土地进行旅游、养老、体育等产业的经营;允许农村集体依托地区自然资源开展相关经营,加强经营过程管理,严防生态环境破坏。

五、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

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包括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衡配置机制、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机制和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机制等。

1.完善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机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地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近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回流效应,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回报率差异的影响下出现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入的现象。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必须要完善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流动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城乡要素顺畅流动的政策环境,引导扩散效应的发挥,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实现由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的转变。一是建立完善的人口管理制度。一方面,健全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完善就业制度,建立公平的就业环境,打破户籍、性别等因素在就业中的限制,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市民化,提高中小城市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增强财政支持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力度。另一方面,建立人才下乡激励机制,制定财政、金融、社保政策吸引各种人才回到农村进行建设,建立城乡人才合作交流机制,鼓励城镇教科文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定期服务乡村,加强基层人才到城镇学习,完善农村人才引入及留用机制。二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科学的征地管理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严格限定征地范围,规范政府征地程序,建立健全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和多元的保障机制,充分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注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价格调控机制和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市场客体公平交易机制,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健全城乡建设用地规划体系和交易机制,有效扼制滥用稀缺土地资源行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促进承包地有序流转,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制度,严格控制未利用

地开垦,落实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建立土地规范流转管理体系,实现土地与农村产业和农业科技的高效匹配,切实提高土地经营效率和效益,在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同时,稳步提高农户收入。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激活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三是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和金融服务体系,建立资本和技术向乡村流动的引导机制。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建设力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念,增加对农业和财政支持力度,建立重要农产品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引导更多城镇资本流向乡村。加强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完善乡村金融服务,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建立支持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金融服务机制,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农村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2. 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

一是完善城乡产业发展规划体系。在尊重发展规律和各地区禀赋差异的基础上,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体制机制带来的阻碍,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产业用地供给、基础设施供给等方面积极推进机制和制度创新,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保障。二是完善政府引导机制,构建产业融合引导体系。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深度挖掘农村地区的内在发展潜力,支持农村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健全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健全行政管理体系,建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完善相关保障。三是加速推动农产品生态化、规模化经营,建立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将农业生产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逐步提升农产品生产质量和效率,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体系建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发展绿色农业,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鼓励绿色、集约生产,积极探索绿色农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城乡生产与消费的有机衔接,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完善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闲置资金入股等形式入股企业,实现

土地变股份、资金变股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建立农户与企业间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增值收益。四是建立创新创业激励机制。鼓励新一代有知识、有才干的农民子弟在农村创新创业,适度放宽创业过程中用水、用地标准,激发各类人才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五是建立健全农村新兴产业发展的长效支持体系。建立乡村文化保护利用机制,深度发掘乡村独特的文化元素,整合利用地方和民族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发展独具特色、风格各异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乡村地区观光农业、休闲度假、养老等产业,从而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良好态势,实现城乡双向互动、协调发展。

3. 建立城乡公共服务均衡配置机制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方面,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统筹规划城乡教育资源,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通过完善乡村教师选拔机制,逐步提升待遇,推动职称评定等向乡村教师倾斜,吸引教育资源走向农村。加强城乡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运用新技术,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增强信息传播深度,完善教育信息化发展机制,进而实现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二是完善城乡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改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条件,建立城镇医疗人才下乡激励机制,组织优秀的卫生人员定期定点支援农村,增强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岗位的吸引力,加强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实行差别化医保支付政策,一方面推动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知识,帮助农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降低患病率;另一方面从医疗卫生体系入手,让农民病有所医,病得好医,提高城乡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三是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基本养老保险金发放与货币购买力相匹配的调整机制,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标准。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对城乡特困人员、残疾人群等低收入人群的救助,加强低保评定体系的监督工作,动态调整低保发放标准。四是完善城乡

基层治理制度。健全基层公务员和选调生的选拔体系,鼓励有知识、有才干、有魄力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调整城乡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打破因循守旧的基层管理体制,将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有效地运用到基层治理中。构建社区居民、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农村事务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作用,通畅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保障城乡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4. 建立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规划机制,健全城乡统筹规划制度。厘清层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在各级政府间建立联动机制,以往的规划制度采用城市与乡村分别规划,城乡空间管理系统内部上下联动性不强,但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城乡关系日益密切,原有的规划制度已经不再适用。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强城乡统一规划的研究、编制和实施,建立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机制,对城乡发展进行统筹谋划,注重增强城乡空间协调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一是合理统一、规划布局城乡之间的交通干线,将城市和乡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实现城乡互联互通。以便利的交通条件加快要素流动速度,增强农村地区对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的吸引力,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的高效融合,在城乡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二是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改革,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建立健全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及宅基地有偿使用机制,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加强乡村地区规划,逐步扩大基础设施的覆盖面。三是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科学编制市县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城乡空间布局,优化城乡空间结构体系,充分考虑城乡演变规律、分布状况、功能定位及发展前景,城镇仍要以第二、三产业为重心,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纽带作用,促进城镇空间的集约利用,乡村地区以第一产业为主,同时要注重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在科学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对全国各地、各种形态的乡村进行重新定位,对村镇的去留、整治、规模等情况进行充分考察和论证,因地制宜,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吸引力和加强农村生态宜居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5. 建立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生态环境耦合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重要方面。通过构建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完善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实现工农业污染防治并重,进而形成从规划、治理到监督考核的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健全城乡规划体系,适当扩大城市绿地、公园等基础设施面积,完善农村空间布局规划,限制对林地和耕地的非法占用。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生产废物排放,实现以科技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城乡环境长效整治机制和科学管理体系,探索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付费处理制度,建立政府和居民共同投入机制。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包括提高标准、健全法规、开通渠道,从而构建规范合理、有效可行的生态补偿体系,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提高城乡居民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此外,还应进一步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探索生态资源价值评估方法,合理确定生态资源价值,为生态补偿提供相应的资金来源;健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建立城乡居民环保意识培育机制,提升居民整体素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完善生态监管和定期调查制度,健全政务考核体系,建立绿色GDP考核机制,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两手抓。

注释

①文中数据除另有注明外,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0)》、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或作者根据其数据计算而得。②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系数成倒数关系,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也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反映了两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52—0.86;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则二元结构越明显,2019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为0.23,表明城乡二元结构仍比较明显。③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或作者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数据计算而得。④2019年涉农贷款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pbc.gov.cn/>发布的数据。⑤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⑥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和《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⑦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官方网站<http://www.mnr.gov>。

cn/发布的数据或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参考文献

- [1]陈锡文.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J].农村经营管理,2018(5).
-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R].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14).
- [3]王承哲,王建国,等.以高质量城镇化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4]郑永扣,樊红敏.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张海朋,何仁伟,李江苏.脱钩视角下河南省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耦合协调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0(2).
- [6]杨亚楠,陈利根,龙开胜.中西部地区农村宅基地闲置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甘肃的实证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4(2).
- [7]安虎森.新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 [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0-04-10.
- [9]韩长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J].农村工作通讯,2018(23—24).
- [10]周凯,雒海潮,刘荣增.城乡统筹环境保护的问题与对策[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
- [11]车冰清,陆玉麒,王毅.江苏省城乡空间融合的形态演化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7).
- [12]孙久文,施晓丽,肖春梅.城乡协调的制约因素及实现途径[J].兰州学刊,2011(7).
- [13]全华信.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探析[J].农家参谋,2018(12).
-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
- [15]刘合光.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16]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0-09-24.
- [17]郝锐.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水平评价与实现路径[D].西安:西北大学,2019.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Zhang Helin Shen Zhengyong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upling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choice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mechanism of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of resources,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the mechanism of balanced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 and the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tc.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 Mechanism

(责任编辑:齐 双)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综述

肖金成 沈体雁 梁盛平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9月18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明确部署和要求。2020年12月13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八次专题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交流,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空间优化等方面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145-07 **收稿日期:**2021-05-21

作者简介:肖金成,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 100038)。

沈体雁,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北京 100871)。

梁盛平,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科技集团研究员(北京 100033)。

一、引言

2020年12月13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八次专题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和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荣誉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曹文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范恒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副秘书长刘以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

员魏后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张大卫,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建清,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晓东,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常委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教授、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筹)副院长余东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社会

科学院原院长张述存,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山东省副省长凌文院士主持,山东省省长李干杰致辞,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荣誉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讲话,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史培军、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分别致辞。会议主旨演讲环节由金碚主持,张大卫、范恒山、刘昌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史培军(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后凯、方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做了主旨演讲。讨论环节由杨开忠主持,陈耀、曹文炼、金碚、刘以雷、肖金成、张建清、张学良、张占仓、陈晓东、石军、沈体雁、余东华、张述存等论坛成员和特邀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做了发言。与会专家集思广益,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空间优化等方面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意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以仅占全国河川径流量2%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13%的粮田,贡献了全国14%的GDP。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部地区,是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1.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解决黄河流域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

魏礼群指出,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协调黄河水沙关系、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黄河安澜的迫切需要;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防范和化解生态安全风险、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需要;是强化全流域协同合作、扩大国内需求、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缩小东西部和南北方发展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战略需要;是深化改革开放,激发沿黄地区经济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内在需要;是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彰显中华文明、增强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黄河治理问题,实现黄河流域的全面高

质量发展。

2.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黄河流域各省市加快发展缩小南北差距的重大机遇

张大卫提出,黄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地区,受自然禀赋影响,气候干旱,往期洪涝灾害较多,生态环境比较差,经过70多年的治理,黄河流域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小浪底水库、西霞院水库、三个黄河(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黄河)的构建,调水调沙、标准化堤防建设,滩区移民搬迁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有了历史性改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改善尤为明显。范恒山认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中央基于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基本特点、发展现状、主要风险和时代使命等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刘以雷认为,首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改善和保障中国人居环境和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地带,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发挥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后,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培根铸魂之举,是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动力之源。

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魏礼群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体现,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国土空间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兴邦的历史性决策。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沿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部地区,是中国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刘昌明认为,黄河从地质地貌上看,其最伟大的贡献是在黄河桃花峪以下冲积形成了北至天津、南至淮河特大的三角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基于黄河在各个方面的贡献和重要的文化、政治地位。黄河流域现有耕地1.79亿

亩,林地 1.53 亿亩,牧草地 4.19 亿亩,宜于开垦的荒地约 3000 万亩。黄河流域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被誉为中国的“能源流域”,黄河流域的能源总量占全国的 60%。此外,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既有保护又要发展。而“引黄济淀”、供水雄安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黄河流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与会专家提出,当前黄河流域发展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流域发展不协调、城市群发展不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以及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等 5 个方面的问题,要充分认识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14 亿中华儿女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黄河治理问题,实现黄河流域全面高质量发展。范恒山指出,由于黄河战略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不仅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树立久久为功的思想意识,更要紧扣实际,在操作路径上做出务实科学的选择。

1. 水问题

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要素,黄河流域发展最大的短板是水。多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水。刘昌明认为,黄河总长度为 5464 千米,与长江 6280 千米的总长度相差不大,但是黄河的水流量却只有长江的 1/19;黄河流经 9 个省区,供水 11 个省,全流域地表水开发利用率和消耗率分别达到 86% 和 71%,已是超负荷供水。而且,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黄河上游“水塔”区冰雪消融,雪线下降,下游河口三角洲萎缩,湿地退化,国土蚀退,从而给流域生态保护带来严峻挑战。肖金成也认为,黄河流域水的供需矛盾非常尖锐,难以满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随着黄河上游植被的逐渐恢复,黄河径流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黄河全流域年平均降水量为 400 毫米左右,平均年径流总量仅为 574 亿立方米,仅占全国的 2.6%,在中国河流中居第八位,可是却承担了全国 12% 的人口、17% 的耕地面积以及 50 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

高达 80%,水资源供给潜力已经很小了。因此,推动黄河水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做好水文章,用好黄河水,将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现实选择。

2. 生态脆弱和生态补偿问题

范恒山强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既存在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也存在人类行为的侵害问题,环境保护修复压力巨大。与此同时,“地上悬河”形势严峻,洪水风险依然严峻,防洪运用和经济发展矛盾长期存在。刘以雷认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从源头看,突出的问题是草原退化,从而严重影响到水源涵养;从干支流看,存在水量减少、水质污染和水土流失等 3 个突出问题;从黄河三角洲看,主要有海水倒灌、环境污染与海草入侵三种病症。张建清认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将是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要探索建立具有黄河流域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顶层设计,解决生态保护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改变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生态补偿模式,积极创新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走出一条通过体制、机制与能力建设解决流域生态保护问题的新路子。

3. 流域发展不协调不充分问题

范恒山指出,地区差异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流域发展不协调不充分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形势艰巨性和复杂性的集中体现。黄河流经 9 个省区,连接中国南北地区,横跨东、中、西部 3 个地带,绝大部分地域属于欠发达或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地区间发展差距悬殊,上中游地区和下游滩区是中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区域,各个地区的发展需求很不一致,这就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魏后凯认为,发展不协调不充分是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即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刘以雷也认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区域协作不充分,给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压力,人口、经济、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紧要问题。

4. 城市与城市群问题

范恒山认为,黄河流域城市结构不够合理,大

城市偏少,中等城市稀疏,区域辐射带动力不强,严重影响了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张大卫指出,黄河流域城市群之间互相联系不密切,要素流动性不强,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经济发展协同性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城市群和核心城市对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5.南北差距问题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事关中国南北差距问题和区域协调发展全局。陈耀指出,“十三五”期间,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15个省(区、市)的经济份额下降了5.81%,目前北方地区的人均GDP相当于南方地区16个省(区、市)的82%。数据表明,2016年前,中国的南北差距并不明显,然而“十三五”期间南北差距迅速扩大,该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余东华也认为,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存在着“东西差距仍在、南北分化加快”的问题。造成南北分化加快的原因除了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外,还包括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创新创业精神、市场成熟度和人口流动趋向等差异的日渐突出。

四、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蓝图和2035年远景目标,应紧紧抓住体制机制建设、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空间优化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久久为功,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变成美好现实。

1.坚持系统谋划,完善黄河战略实施体制机制

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应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把握好生态、产业、创新、城市、时间、空间等要素,建立健全黄河命运共同体新体制、新机制。魏礼群指出,要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量水而行、节水优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等基本原则,着力形成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体制机制。魏后凯提出了“黄河共同体”建

设新体制,即以共同体建设为载体,在流域层面打造黄河流域“生态共同体”“创新共同体”“产业共同体”和“城市共同体”,在区域层面打造“城乡发展共同体”和“乡村发展共同体”,以此推动黄河流域全面协调发展。以生态、创新、产业和城市共同体建设为抓手,推动黄河流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2035年黄河流域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杨开忠提出“构筑幸福函数、打造幸福河”的新机制。他认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就是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首先,要提升人民幸福函数的总产出和总效用。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舒适物”,不断提高黄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次,要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提升幸福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比。再次,要从部门、空间和时间3个维度深入观察、分析和解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最后,要舞好山东省这个“龙头”。山东省地处黄河下游,工作力争上游,应奋力扬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实现从京沪经济走廊的“桥墩”到京沪经济走廊和以新亚欧大陆桥通道为依托的黄河现代化经济走廊“枢纽”的重大转变。要打造京鲁跨区域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强化京鲁科技合作,使山东省成为北京市科技拓展和转化的新高地。

2.坚持统筹推进,实化细化黄河战略实施路线图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找准切入点、突破口,实化细化路线图、施工图。范恒山认为,应把握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的5个关键操作路径。其一,分类指导,以分工为基础推进地区间协同联动。以国家颁布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为依据和指导,协同制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等专项规划和地区综合性实施方案,协同推进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等举措。其二,生态优先,以绿色为底线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其三,标本兼治,以水资源调控为主体优化生产活动和安全防护。其四,“两端”突破,以强化重点地区发展为抓手推动流域整体提升。一方面,进一步

革除体制障碍,强化城乡联动;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城市间、城乡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其五,战略引领,以创新平台为支撑提升内生动力与外联水平。

3.坚持生态优先,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大力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探索形成全流域生态修复系统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刘昌明认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滞后,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和活力,真正成为幸福河。黄河三角洲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拥有世界上暖温带保存最广阔、最完善、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好,农业潜力大。应把山东省和黄河中上游的8个省区串联起来,从山东省的“黄河口”到青海省的“黄河源”进行全流域的系统规划与综合治理。

肖金成认为,充分用好一湾黄河水,有3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以历史用水量为基础,建立水权交易市场;二是根据用水量收取水资源费,并按照各断面的水量分配水资源费;三是以人口和流域面积为基数确定水权,采取市场化方式实现用水结构调整,提高用水效率,解决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问题。

张建清认为,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跨省市、跨流域、跨部门协调,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要制定实施差异性的区域补偿政策,多利用绿色税收、绿色信贷、价格激励等经济手段实行生态补偿。在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之上,加快推进碳汇交易、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机制的实施。黄河流域不同区段的生态条件差异很大,上、中、下游和河口湿地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完全不一样,建立统一的生态补偿市场化交易机制,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区段、各方面的积极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

与会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顶层设计,积极研究制定“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总体规划”;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评估,划定黄河源、祁连山、黄河入海口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区域;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全面推进全流域污染治理。

4.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黄河流域现代化经济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应适应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谋划新发展格局,积极构建黄河流域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先发展具有黄河特色、黄河品质的现代农业。曹文炼认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以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明显减少,肉蛋奶等食品消费量显著增加。随着中国逐渐开启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人民群众的食品将不再仅仅只是稻谷和小麦,人民群众对生态、绿色、有机、健康型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充分利用黄河流域优质的生态牧场和基本农田,发展绿色畜牧业和绿色种植业,探索生态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合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

二是大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先进服务业集群。张大卫认为,要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各省区都面临深入扩大开放和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要全面梳理供应链,认真分析其系统结构、功能和流量、流向问题,准确把握各省区的优势和短板。建设强大的国际交通枢纽,对现有枢纽进行升级改造,提升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国际国内转换效能。增强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交通枢纽的对接能力,建设强大的国际国内市场物流集成和分拨能力,建好现代化功能性口岸,提升便捷通关能力,形成覆盖国内主要城市的贸易物流网络。提高数据收集、管理和开发利用能力,争取建设面向东北亚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数据跨境流动自由贸易港,发展强大的数字经济集群和数字贸易集群。提升新工业革命条件下战略管理、价值管理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提升金融服务、人才培养、营商环境和制度政策保障能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先进服务业集群、新产业新业态集群及其创新型产业生态系统。

三是发展高吸收碳经济等新生态经济。史培军认为,高吸收碳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道路。高吸收碳经济实现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高度统一。所谓高吸收碳

经济,就是有效实现固碳、吸碳、储碳和转化碳,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新生态经济。贯彻落实黄河战略,既不能不发展,也不能走破坏生态的发展道路,而是要走第三条道路,即把发展与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一个核心就是发展生态经济,发展高吸收碳的生态经济,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史培军建议,山东省委、省政府应把山东省与青海省联合起来,认真研究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思路、新模式和新途径,支持两地协同发展高吸收碳经济。

四是加快形成黄河流域双循环新格局,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曹文炼认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特别是要加快黄河流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应充分发挥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区的资源优势 and 分工优势,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等新型要素市场,促进水权、林权以及资金、产能等指标按照市场价值在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进行交易和置换,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流域创新治理现代化

创新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与会专家认为,应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流域创新治理现代化,打造富有生机活力的黄河流域区域创新系统。陈耀认为,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提振北方经济,务必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创新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适应市场竞争和国际化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调整和优化以重化工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创新体系;以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抓手,推动黄河流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让黄河流域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应有作用,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长中起到引领示范效应。

沈体雁提出,推动创新方式变革,打造“创客山东”新名片。山东省的核心问题是创新不足,根本问题是以礼制和等级差序格局为要义的地方文化和地方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开放创新的需要。应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变革,培育千万量级的新兴创客阶层;推动文化变革,锻造新时代山东省创客精神;推动城市品质变革,打造人才“雀巢”和人才枢纽;推动产业治理变革,打造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推动创新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新时代山东省创客共同体;推动创新空间格局变革,优化“创

客山东”布局。

陈晓东认为,治理现代化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黄河安澜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统筹治理是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人民共享是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因此,应积极推动黄河流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6. 坚持集聚集约发展,打造高质量空间格局

与会专家认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应妥善处理黄河高滩、中滩和低滩之间的三滩关系,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三段关系,城市群内、外的区域关系,以及国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两环关系等重要的空间关系,坚持集中集约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

一是妥善解决三滩关系,构建人滩和谐的河滩治理模式。张占仓提出了“三滩分治,建设平安黄河”的治理思路。所谓“三滩分治”,就是针对黄河大堤内的高滩、中滩和低滩等不同的空间范围,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科学治理,探索创建一种新的黄河下游滩涂治理模式。高滩就是1956年以来再没有被洪水漫过的范围,中滩是高滩和低滩之间的摆动空间,低滩则是靠近河道的范围。建议继续加高高滩居民点的高程,确保大堤内100多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采取工程手段,进一步加固地处中滩的这一块土地与河道的过渡地域,提升黄河抵御河水冲刷的能力,减少黄河摆动对其的影响。黄河最大的特点就是摆动大,从而形成了河道较大幅度的往复性变化,河道摆动的范围就是低滩。如果有效遏制其摆动,那么就可能形成从郑州市桃花峪到山东省东营的500吨的通航航道。可见,三滩分治是一种来自黄河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是一种破解黄河下游特殊难题的新途径,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妥善处理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三段关系,促进流域协调发展和优势地区加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用,石军和张述存都强调了在黄河流域协调发展的大前提下,山东省发挥龙头作用的重要性。石军认为,山东省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黄河下游,而在高质量发展上应该当好龙头。山东省具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条件,应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率先垂范,发挥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上蹚出一条新路子。张述存认为,山东省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和内需市场优势,应率先形成在生态保护、流域治理、产业合作、战略互动等方面的龙头示范作用。

三是妥善处理好城际关系。张学良建议,应在加强济南市和青岛市等山东省内部城市合作的同时,积极加强青岛市、济南市与上海市的城市合作,加强济南市与郑州市的城市合作,优化城市合作格局。此外,诸多专家学者都强调,未来应高质量建设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把三大城市群建设成为带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柱。

四是妥善处理国际国内双循环关系,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刘以雷提出,应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机结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远景规划有机结合,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张学良提出,应进一步加强省际毗邻区域的合作,创新区域合作方式;大力推进“多式联运”,打造内循环的门户枢纽,畅通内循环;强化产业创新,让重工业占比下

降一点,轻资产占比上调一点,新经济占比提升一点。

五、结语

黄河宁,天下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协调解决跨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次论坛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新形势和对策建议等重大问题,并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黄河流域社会治理与区域合作”“黄河文化与文旅融合”“新旧动能转换与黄河流域协同发展”等方面展开了专题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从体制机制、实施路径、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空间优化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了黄河共同体建设、黄河战略实施五大路径、积极发展高吸收碳经济、实行三滩分治、优化空间布局等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Overview of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Xiao Jincheng Shen Tiyan Liang Shengping

Abstract: on September 18, 2019,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ome up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in a speech delivered in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opte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2035 Vision Proposal”, which made clear arrangements and requirement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n December 13, 2020, the “18th Symposium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y Forum of 50 people” was held in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the symposium had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on the topic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erm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patial optimization.

Key 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Forum of 50 people
(责任编辑:齐 双)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 合作带建设座谈会综述

张学良 贾文星 费婷怡

摘要: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座谈会在河南省洛阳市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重要意义、原则要求和战略路径等问题发表精彩观点。本次座谈会不仅有利于推进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而且对于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黄河流域;郑洛西;高质量发展;路径举措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152-06 **收稿日期:**2021-05-04

作者简介:张学良,男,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 200433)。

贾文星,男,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433)。

费婷怡,女,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

2021年4月26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座谈会在河南省洛阳市举办,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陕西省政府督查专员周和斌,洛阳市委副书记、洛阳市市长刘宛康出席会议并致辞。范恒山、仇保兴、金碚、李浩、张占仓、张学良、张大卫、陈文玲、肖金成、张建清、孙久文、陈耀、李国平、刘以雷、陈晓东、董雪兵、余东华、杨涛、朱喜钢等专家学者依次做了精彩发言。本次座谈会也是“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九次专题会议、首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会议,由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洛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议围绕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重要意义、原则要求、战略路径及举措等展开了讨论。

一、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重要意义

2020年10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明确了“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重点任务。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郑州市、洛阳市、西安市简称“郑洛西”)连接中西、贯通南北,区域内的豫、陕、晋三省文脉相通、人员相亲、山水相依、交通相连、经济相融。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不仅有助于打通中西部区域合作新经脉,在新发展格局下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极,更为晋、陕、豫三省合作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研究员指出,必须着眼于中长期来谋划中国的发展,在国际风险急剧扩大、国家面临安全挑战骤增的情况下,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是新发展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前沿地、战略纵深地和具有战略价值的经济发展高地,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是一场创造有序资源、区域优势集成的战略行动。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张建清教授认为,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等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向型经济驱动的沿海地区将会遇到日益严峻的挑战,作为中国腹地的内陆地区,比如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要努力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担当更多的使命与责任。

第一,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能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坚实的支撑和枢纽。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教授指出,以都市圈协同为重点建设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可以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封锁,推动生产要素在“城市”“省城”“区块”等不同区域空间尺度间循环流转;可以促进供给与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匹配对接,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高效畅通。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不仅能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本身也能成为重要的战略枢纽。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教授认为,构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要力求对内与对外开放和谐统一,要将其打造成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衔接、中心节点,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做出更大贡献。

第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有助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伴随北方地区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中国经济走势分化状态由“东西差距”逐渐演变为“南北差距”。张学良教授指出,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布局的层面上看,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极有可能被打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五极”,对于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构建中国“钻石菱形”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连接东西、贯通南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朱喜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几十

年以来,东西部之间、南北方之间和城市之间发展关系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发达地区是多极化发展,内陆欠发达地区是单极化发展,这种局面对整个区域实现均衡化发展、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但仅靠几个城市“点”的带动作用不足,需要“带”的支撑作用。以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和西安都市圈串联起的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可以对区域协调发展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第三,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能够为落实战略核心要求形成强力的示范和带动。范恒山教授指出,对于幅员广阔但“体弱多病”的黄河流域来说,无论是做好生态保护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特色明显:一方面,保护发展矛盾尖锐,全流域面临的共性问题众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地缘人缘相亲,当前经济地位突出且近年来国家战略利好叠加,具有良好的探索条件。建设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将有力地促进和引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认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还存在诸多现实约束条件。在黄河流域各大城市群内部营造有序嵌套等级体系的同时,增进城市群之间的网络关联也不容忽视,其中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正是城市群之间互动的重要实践。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在地理空间上同陇海产业与城镇发展轴高度吻合,具备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原则要求

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既是沿海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向内地转移的重要通道,也是中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门户、最具活力的创新高地之一。与此同时,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也充满着困难和挑战,合作带生态环境普遍脆弱,水资源自然禀赋较差,水沙关系不协调;豫、陕、晋三省高效协同发展的机制尚未建立;受行政区划、政绩考核等的影响,一体联动面临各种形式的阻碍等。机遇与挑战并存,构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应重视和把握如下原则和要求:

第一,把握概念先行的原则。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设涉及多个概念,比如“空间”“高质量”

“发展”“带”等关键词,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是构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提出,要重视区域经济中每个“空间”概念的内涵。区域概念的提出要有经济和文化机理,对于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概念,要发掘深、把握准,经得起历史检验。此外,深刻把握“带”这个概念。“带”的形成有一个从轴到群的过程,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处理好轴、带、群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提出,对于经济发展或者高质量经济发展,人类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本质是“流动”,“流动”的本质是“畅通”,“畅通”的本质是“有序、协调”。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研究员认为,要科学认识高质量发展,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要在筑牢高质量发展理念上下功夫。

第二,坚守生态底线的原则。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山水资源丰富,但是生态共保机制尚不完善,需要共同做好水、气、地、山四篇文章,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张学良教授提出,一方面,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要共同推动水资源保护利用,联动实施黄河流域水生物资源保护和恢复工程。另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监测监管、应急处理等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跨区域生态项目共同投入机制,同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生态治理市场化平台,联合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陈文玲研究员认为,黄河和长江这两大流域作为中华的两条巨龙,能不能修复生态关系到中华能不能永续发展。要以黄河干流为主线,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生态保护体系。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一方面,要立足于城市的发展实际,明确自身定位,做好产业分工。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教授认为,在强化郑州、洛阳、西安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的同时,要进一步明确三大支点城市(国家中心城市郑州、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国家中心城市西安)的分工与定位,特别是要围绕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总体要求以及三大都市圈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共建跨地域产业链中强化差异化分工合作。另一方面,依托郑州、洛阳和西安都市圈以及黄河金三角建设,加强城市之间的产业、市场、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和联系,实现互

利共赢。范恒山教授提出,合作是合作带建设的题中之义,合作联动也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互利共赢才能使合作之路走得实、走得远。合作带建设各方应树立全局观念,从整体利益出发,自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不断深化合作内容、拓展合作空间。

第四,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跨行政区的合作大多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但是政府的推动必须尊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顺势而为。李国平教授主张,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优化组织领导、治理结构和市场化是重要保障,至少需要建立起涵盖整个发展带的高层次省级协调小组,同时要发挥好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机制,而不要仅仅是政府唱“独角戏”。刘以雷研究员以最近实地调研的企业为例,提出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没有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就没有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在营造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张学良教授提出要发挥好要素交易市场的作用,不断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建设国家级要素交易场所,在郑州、西安等重点城市打造“百千万”工程,即建设要素市场与交易平台上百家、基金管理公司上千家、线上线下开发园区上万家。

第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要在规划的引领下,根据城市发展实际,切勿“一刀切”,要坚持先易后难、先行先试与大范围推广等循序渐进的原则。范恒山教授认为,合作带作为探索者、示范者,应努力开拓进取、积极创造经验、做好引领带动。但推动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面临着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难以疾步速成、一蹴而就。在路径选择上应遵从规律要求,分清轻重缓急,视难易状况稳步推进。应科学制订年度工作方案,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时限化和滚动式管理,建立强有力的跟踪督促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力求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巩固和发展建设成果。张建清教授提出,要率先推动三个都市圈在有共同诉求的、容易推动的领域实现合作,如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旅游资源共建共享等;对于比较高层次的问题,如产业协同、规划协同等,可以待时机成熟之后加以推动。对于都市圈合作,应首先在各自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部推动,比如西安市、郑州市和洛阳市率先

在各自都市圈内实现一体化,然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大范围推动。

三、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战略路径

与会专家认为,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要抢抓后疫情时代国民经济发展和重大生产力战略布局的宝贵时机,充分发挥黄河及路桥通道的牵引作用,以规划制度为引领,以机制保障为依托,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文旅融合为重点,以服务提升为目的,以交通互联为支撑,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发展成果共惠,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积累经验、提供引领和示范。

第一,规划引领。“规划引领”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各区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担当的重要先手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研究员认为,应依据黄河流域规划纲要,编制《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规划》,规划内容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建立合作机制,加快合作带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郑州市在合作带中应发挥龙头作用,规划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促进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西安市地处西部,但教育资源丰富,是西北地区的龙头,作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组成部分,要进行重新定位。洛阳市是古都,拥有辉煌的历史,制造业基础雄厚,但现阶段实力不足且规模不大,要在合作中谋求发展,促进产业集中、人口集聚,使自身发展成为合作带中实力雄厚的大都市。

第二,交通互联。“交通互联”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重要前提基础。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杨涛教授认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发展应突破行政界限,谋划共建跨区域的战略性综合交通体系,加强战略引领、刚性管控,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规划构建连接全球的国际性门户枢纽群和全球高铁网络;二是面向全国构建联通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上游以及东北、西北地区的综合立体运输通道,积极推动东部出海、西部出口,发展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发展高铁快运;三是加快谋划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立体综合交通廊道,构建联通郑洛西城市

群、中原城市群和洛阳都市圈的交通轨道,进一步推动文旅结合。

第三,生态保护。“生态保护”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前提条件,“生态共治”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第一要务。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教授提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这个板块,在碳排放方面距离国际标准的水平还差的很远,应把城市作为主体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在实践过程中,要做好绿色建筑与社区微能源的结合,在社区中争取首先实现“碳中和”。要学习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让绿氢代替一部分的煤,改变现有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利用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第四,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核心动力。黄河流域高校、科研院所众多,但是创新要素之间的结合、自由流动、开发利用还不够充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研究员指出,打造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科创走廊有以下七大着力点。一是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比如洛阳市可以在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上去着力,西安市可以建设前沿基础科学原创中心,郑州市可以建设科技转化和技术交易的中心;二是争取更多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布局;三是要举全省之力建设好一流高校;四是加快科研投入的力度,加快培育高科技企业;五要建设人才高地,郑州、洛阳、西安三地在高科技人才引进上要向大湾区和海南学习,积极争取更多优惠政策;六要实行政策共享;七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推动建立三省协调联动机制,尤其是建立科技合作的城市联盟。

第五,文化共兴。“文化共兴”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使命的必然担当。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李浩教授以“从两京到双城:长安与洛阳的前世今生”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战略中,为西安市与洛阳市谱写新“双城记”提出四点建议。首先,认识自我,明确定位。以世界优秀的古都城市规划建设为范本,积极取经学习。其次,保护遗产文化。像保护物质生态多样性一样保护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既要保护好活态文化,又要保护好遗产文化;既要保护好单

体文物,又要保护好大遗址。再次,修复传统文化。文化破坏迅捷,恢复缓慢。复兴优秀传统文化,要重传习,重践行。最后,构建“双城”或“三城”高品质旅游网络。

第六,共享发展。“服务提质”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提升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张学良教授指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要追求“四高”发展目标,打造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沿线高质量发展轴、高品质生活轴、高效能治理轴、高水平开放轴。具体到高品质生活轴,一方面,要推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紧密合作,支持西京医院等医疗机构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范围内以独资、合资或合作等方式,建设区域医疗联合体和区域性医疗中心。同时,要推进医疗保险互联互通,稳妥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系的跨区域转移接续。另一方面,可以筹备成立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高校智库联盟,鼓励联盟内的高校探索开展多层次合作。探索设立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国际教育园区,实现从教育洼地向教育高地的转变。同时,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基础、产业特色与现实需求,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与当地产业发展有机融合。

第七,机制保障。“机制保障”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真正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依托。张学良教授主张,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一是要建立豫陕晋三省政府间定期会商合作机制;二是要逐步健全政策制定协同机制;三是要借助市场的力量,联合民间智库、社会团体、政府机构、企业代表各方力量,共同建立独立法人的区域联动体。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余东华教授发表提出,要建设“5+2”区域协同合作机制。所谓的“5”分别是:黄河流域产业合作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的协同机制、流域治理和公共政策协同机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机制、区域间的联动合作机制;“2”就是水机制和碳机制。

四、洛阳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洛阳市作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中的区域中心城市,也是本次会议的举办地,与会专家对于洛阳市的高质量发展极为关注,并就这一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洛阳市是黄河文化、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素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是黄河流域的重要节点城市、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近年来,洛阳市迎来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一系列重大机遇。特别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洛阳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方面,作为千年古城、传统工业城市,洛阳市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为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研究员指出,洛阳市发展具备五大优势:一是以大河大山大坝为支撑的生态屏障;二是创造大国重器的重工业基地,最近几年在全国高度关注的大国重器的研发和生产很多都直接与洛阳相关;三是一贯重视创新驱动的中西部创新高地;四是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和洛阳都市圈核心城市;五是由“千年帝都”支撑的文化旅游圣地。

另一方面,洛阳市的发展也存在诸多不足和短板。李国平教授指出,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内,洛阳市的相对地位还比较低,能级不高,因此加快提升洛阳市经济实力和资源集聚力是该合作带发展的关键以及难点。如果洛阳市不能加速发展和隆起,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就不能够立起来。肖金成研究员提出,洛阳市是古都,拥有辉煌的历史,制造业基础雄厚,但现阶段实力不足且规模不大,应抓住机遇,实现复兴。张占仓研究员认为,洛阳市发展存在以下障碍: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中发展步伐偏缓、开放发展水平较低、重工业重资产重负荷压力大、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高质量发展尚没有形成比较优势。

新时期,洛阳市要借助于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因时顺势,聚焦定位,把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作为主战场、主抓手、主平台,加强与郑州市、西安市的合作发展,强化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辐射力、吸引力。因此,洛阳市要立足于自身实际,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对此,孙久文教授认为,洛阳市虽然尚未成为中心城市,但却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关键

节点,如果洛阳市的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态势不佳,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就会出现断点,也就无法连接成带状区域,省际交界区城市群间的合作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洛阳市应秉持高点定位,以产业为基、以人才为鼎、以创新为源、以文化为魂,加快向中心城市进军的步伐,以城市尺度下的“小集中”带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的“大分散”。

张占仓研究员指出,洛阳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从以下几点着力,一要全面强化高质量发展战略意识;二要协同推进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规划;三要坚定不移扛稳大国重器责任;四要以开放发展为市域经济发展赋能;五要用激活创新资源的方法促进创新创业创造;六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步伐;七要合作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教授提出,洛阳市要当好中原城市群“副班长”,推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要在3个方面发力。一是变“地理中心”为“高质量发展中心”。要唱好郑州市和洛阳市“双城记”,推动洛阳市和济源市、三门峡市、平顶山市的一体化发展。将洛阳市联通内外、沟通全国的地理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二是变“历史名都”为“数字新城”。以全方位数字化改革释放洛阳市发展潜能,加强大遗址文化保护、古都文化旅游带、黄河文化干部学院以及隋唐大运河建设,助力古都“变道超车”。三是变“老工业基地”为“‘链主’企业集聚高地”。主动参与“三

链”重构,培育智能型、创新型、敏捷型“三链”集群。

张大卫理事长认为,洛阳市要在以下7个方面发力:第一,提升洛阳市交通区位优势,一定要把对外联系的通道枢纽进一步地建设好。第二,抓好洛阳市的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传统产业底盘比较重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可能是重大机遇。第三,深入推进洛阳市企业的改革,在重视国企、央企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机制性改革。第四,加快培育新业态,在培育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第五,注重低碳转型。第六,重视打造供应链。利用好大数据,判断清楚发展短板和优势。第七,充分发挥好、利用好洛阳市的科技研发力量,为洛阳市乃至全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创新提供强大动能。

五、结语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为主题,本次座谈会全面分析了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重要意义、原则要求和战略路径等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共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大计,共谋郑洛西高质量发展,本次座谈会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座谈会不仅有利于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而且对于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Belt of Zhengzhou—Luoyang—Xi'an

Zhang Xueliang Jia Wenxing Fei Tingyi

Abstract: In August 2020,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liberated “the outlin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la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ould be taken as a major pla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October 2020,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lan”, which defined the key tasks of the “Zhengzhou—Luoyang—Xi'an high-qualit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belt”. In this context, the forum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Zhengzhou—Luoyang—Xi'an high-qualit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bel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Luoyang.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the forum expressed their brilliant views on the significance, principle and strategic path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Zhengzhou—Luoyang—Xi'an high-qualit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belt. This forum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Zhengzhou—Luoyang—Xi'an high-qualit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belt, 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ing new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 and realiz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Basin; Zhengzhou—Luoyang—Xi'an; High-quality; Path and Measures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研讨会综述

陈锦山 黄桂媛 沈奕

摘要:2020年11月26日,第二届中国北部湾发展论坛暨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研讨会在广西钦州召开,会议旨在践行新型全球化发展理念、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民族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研讨中国北部湾发展战略。与会专家学者在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的自贸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向海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和交流,为钦州市高质量发展与自贸区建设、“十四五”规划与发展,提出了诸多良策。

关键词:新型全球化;自贸区;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北部湾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4-0158-03 **收稿日期:**2021-04-16

作者简介:陈锦山,男,北部湾大学党委副书记,钦州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北部湾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钦州 535011)。

黄桂媛,女,北部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通讯作者(钦州 535011)。

沈奕,女,北部湾大学钦州发展研究院馆员(钦州 535011)。

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北部湾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和北部湾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北部湾发展论坛暨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研讨会于2020年11月26日在广西钦州北部湾大学召开。本届论坛围绕“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主题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演讲、高峰对话和分会场讨论,在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的自贸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向海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一、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面对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戴慧提出,应对经济全球化应坚持双循环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改革,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关系深入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戒骄针对自贸区建设,建议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广西社会科学院周明钧认为打造西南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动载体有重大意义,应加强宣传舆论引导,推进西南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载体的建设。新疆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吾斯曼·吾木尔指出,新疆应对新型全球化趋势,须紧扣以“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为主线,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为引领,加快新疆商品“卖全球”步伐。新疆大学郑嘉禹、栗迎春指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就是要形成“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坚持市场化改革。专家学者

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上,都认为应坚持双循环发展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与“一带一路”国家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民族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中央民族大学李曦辉提出,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帮扶力度,推动少数民族经济尽快高质量融入国民经济及全球化,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增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外在动力。广西民族大学胡超指出,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兴边富民行动理念需要从“输血”转向“造血”,行动主体需要从政府“独唱”转向政府、社会力量和边民三方“合唱”,行动方式需要从缩小均值差距的“大水漫灌”转向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精准滴灌”。中央民族大学冯彦明建议打通钦州港与广西内地及西北、西南、中南甚至全国的陆、海(河)、空联系,解决交通不便问题,实施包括大数据产业化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教育振兴工程和金融发展工程。吉林大学刘国斌、杨富田指出,必须加强政策对接和民心沟通,提高投资质量,进行差异化竞争,创新区域合作模式,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北部湾大学陈锋指出,应从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更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新格局。西南科技大学付巾书、宋加山指出,成渝双城经济圈须加快接入国家高铁大动脉,通过中欧班列和“一带一路”规划进一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积极承接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重庆市巫山县委党校雷兆玉指出,重庆市巫山县远离经济圈“双核”,应坚持积极融入双城经济圈,内谋发展,外求合作,打造长江三峡国家公园和“两山”“两化”创新试验区。中国旅游研究院徐宁指出,边境民族地区要以旅游业作为先导产业,打造边境旅游核心区,推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综上所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结合民族地区的现实条件,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实施民族振兴工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三、民族地区的自贸区建设

自贸区在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实施新管理模式、创新投资管理等层面皆有可能出现法律层面的瓶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孟广文针对广西自贸区,提出了“一城二区”的发展模式、逐渐享有较大事权与简单明了政策法规、自贸区核心区可逐步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监管、建立以航运物流业为基础的产业群等对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戒骄指出,随着中国加入RCEP,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会有密切经济联系,钦州和“一带一路”直接相连,在“十四五”期间要通过先进制造业,一方面和内地联系,另一方面带动进出口。大连海事大学李忠操指出,广西自贸区既为国内循环之“终点”,亦为国际循环之“始点”,应探索和构建国际商事法庭解决商事争端,加快广西自贸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北部湾大学李燕、陈金源提出,北部湾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多重政策优势助力金融改革,采取搭建多层次对外开放平台、支持优势产业“引进来”与“走出去”、探索自贸区旅游新业态模式等措施,全面提升北部湾城市群对外开放程度。广东海洋大学廖健聪提出,北部湾城市群服务业合作发展应抓住东盟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北部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服务业发展的差异性机遇,着眼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推进北部湾城市群服务业合作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北部湾大学占金刚、程嘉认为,广西自贸区的发展应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与东盟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稳定广西外商直接投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任晓莉针对钦州自贸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指出,钦州自贸试验区一是应更新理念,深化对自由贸易区的认知;二是要整合机构,提升创新主体的能效;三是要多策并举,优化整体的建设生态;四是要大胆探索,优化引才引智的政策环境。中央民族大学冯彦明指出,钦州自贸试验区应认清形势,改变观念,规划设计先行,并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争取国家支持。北部湾大学朱念等指出,钦州正处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多重机遇叠加的黄金发展期,随着产业环境的完善和硬件条件的提升,加快发展枢纽

经济刻不容缓。北部湾大学沈奕等人针对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营商环境,提出要强化简政放权,完善行政效能机制,创新金融制度,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跨境贸易服务,打造与世界先进自贸区对标的国际营商环境。综上关于自贸区建设的研讨,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自贸区应在法律法规的监管和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完善各项基础设施条件,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内外联动,形成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集群,加快自贸区发展。

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向海经济发展

西南大学宗会明指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西部地区要注重高等级陆路交通干线建设,助力边缘城市和口岸城市交通发展,提升区域交通网络均衡性。北部湾大学傅远佳指出,钦州建设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国际陆海通道重要节点城市、重要国际门户城市、产业合作枢纽城市,应当通过强交通扩港口拓通道、深改革简流程提效率、全开放配政策真兑现、搭平台聚产业优结构、强文教促交流扩旅游、强东

盟融粤港澳接西部等建设路径,加快早日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中共钦州市委党校侯名芬指出,钦州市要进一步凝聚共识,抢抓机遇,突破码头、航道、货源、集疏运、智能化、人才等瓶颈,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北部湾大学赵君指出,向海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千载难逢的机遇,应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打造向海经济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向海经济科技创新动能,推进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北海社科联伍朝胜指出,为迎合时代发展要求,北海应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水平推进向海经济发展,探索出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向海经济发展之路。北部湾大学罗嘉琪等人指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广西应当加强物流业管理协调,加快现代物流规划与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集疏运体系,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培育一批重点物流企业。综上,专家学者们普遍认同民族地区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搭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海洋特色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壮大西部经济发展实力。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New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s in Ethnic Regions

Chen Junshan Huang Guiyuan Shen Yi

Abstract: On November 26, 2020, the second China Beibu Gulf Development Forum and seminar on new glob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 in ethnic areas were held in Qinzhou, Guangxi. The conference aims to practice the new concept of global development,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and sea channel in Western China and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ethnic areas,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Beibu Gulf.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the meeting had in-depth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n the new globalization and "Belt and Roa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are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area in the ethnic areas, the new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China S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a economy, etc., and put forward many good strategi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development of Qinzhou City.

Key Words: New Globalization; Free Trade Zone; New Land Sea Channel in Western China; China's Beibu Gulf

(责任编辑:柳 阳)